

蘇聯·麥林斯基著  
葉文雄譯

# 世界教育史

五十年代出版社發行



520.9

345

2

# 世界 教育史

著基斯林麥·聯蘇  
譯 雄 文 葉

行發社版出代年十五

# 世界教育史目錄

## 第一部 古代教育

### 第一章 原始社會中及古代東方各國的教育

- 一 原始社會中的教育……………一
- 二 古代東方各國學校的發生……………六

### 第二章 古代希臘的教育

- 一 斯巴達教育……………九
  - 二 雅典教育……………一二
  - 三 希臘哲學家們論教育……………一八
  - 四 希臘主義時期的教育和學校……………三四
- ### 第三章 古代羅馬的教育……………三八

## 第二部 中世紀教育

### 第四章

#### 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教育

- 一 早期中世紀（六—十一世紀）的教育……………四九



二	煩瑣哲學。大學的產生	五七
第五章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	六五
一	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人文主義的教育學（一般特徵）	六五
二	人文主義教育學的最主要代表者	七〇
三	德國宗教改革時期的教育學	七九
四	耶穌派的教育體系	八六
五	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莫亞、康巴乃拉）的教育觀	九〇
第六章	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	九四

### 第三部 近代教育

——從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到十七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第七章	約翰洛克的教育體系	一二一
第八章	十七—十八世紀學校	一三二
一	德國學校	一三二
二	英國學校	一四一
三	法國學校	一四六



第九章	盧梭教育的體系	一五三
第十章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教育思想	一七四

## 第四部 近代教育

——從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第十一章	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期的教育問題	一八五
第十二章	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	一九五
第十三章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教育	二一〇
第十四章	弗祿貝爾的教育學說	二一八
第十五章	第斯多惠的教育學說	二二八
第十六章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歐美學校	二三七
一	學校發展的一般特徵	二三七
二	英國學校	二三九
三	美國學校	二四三
四	法國學校	二四五
五	德國學校	二四九

第十七章 海爾巴德的教育體系……………二五五

第十八章 斯賓塞的教育觀……………二六八

第十九章 十九世紀五十一六十年代的歐美學校……………二七八

一 法國學校……………二七八

二 德國學校……………二七九

三 英國學校……………二八一

四 美國學校……………二八四

第二十章 十九世紀初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教育思想……………二八六

一 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徵……………二八六

二 傅立葉的教育觀……………二八八

三 聖西門和聖西門派的教育觀……………二九二

四 歐文的教育觀和實際教育活動……………二九六

## 第五部 近代教育

——從巴黎公社到一九一八年底

第二十一章 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的教育理論



和實踐的一般特徵……………三〇三

第二十二章 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三〇九

第二十三章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的歐美各

國學校概況……………三一四

一 法國學校……………三一四

二 德國學校……………三二一

三 英國學校……………三二九

四 美國學校……………三三三

第二十四章 戰前帝國主義時代的市民階級教育學……………三四〇

## 第六部 晚近教育

第二十五章 晚近教育學的特徵……………三五七

第二十六章 從一九一八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的歐美

各國學校概況……………三六〇

一 法國學校……………三六〇

二 英國學校……………三六九



三 英國學校

三七一

四 德國學校

三七五

# 第一部 古代教育

## 第一章 原始社會中和古代東方各國的教育

### 一、原始社會中的教育

#### 關於原始社會中的文化和教育材料來源的特徵

在發掘古物時所找到的實物，並不能給我們任何指示，以說明遠古時代原始民族進行教育的方法。因此，關於原始社會中的教育，須要根據旅行家和人種學家所見到的那些尚在原始狀態中的民族的實情，來加以判斷。

這種研究的方法，是完全合於規律的。摩爾根（Morgan）在十九世紀研究北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後，根據他的四十年的考察所得，寫成了一本古代社會。他研究出「人類由蒙昧狀態進化到野蠻狀態，由野蠻狀態進化到文明狀態」。恩格斯說：「摩爾根的最大的功績，是在於他把我們所寫的歷史的史前時期的基礎，發現了和恢復了一個主要的輪廓。在北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合同體裏，他找到了解決古代史——希臘史、羅馬史和日耳曼史——中最重要的一直至今日還沒有解決的謎——的一把鎖鑰」（註）。

關於原始社會中的教育，我們可以依據各種旅行家和人種學家所供給的非洲、澳洲、波利尼西亞（Polynesia）等原始民族的生活實情的描寫，來加以判斷。這些著作可以給我們實際的材料。另一種來

（註）見恩格斯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源，就是幾種古代歷史家的著作（例如一世紀時描寫氏族時期的羅馬和日耳曼教育情形的泰季泰 *Thucydides*）。

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和「勞動在類人猿進化爲人類過程中的作用」兩部著作，可作我們方法論的著作，這種方法論的著作是估計人種學家實際報告時所必需的。

法國社會學家列多諾（Lacourneur）曾搜集極豐富的原始民族教育的材料（註），但是作者對於這些材料的闡明，下面我們會看到，却是站在不正確的立場上。

## 教育的

## 起源

關於教育起源問題，和歷史——教育文獻問題，曾有若干種理論。現在先把幾種資產階級的理論，加以批判的評價。

上述列多諾根據進化的原則，運用機械的解釋方法，提出了些生物學的教育起源論。列多諾在書的開端繪出一個「動物世界裏的教育」的梗概，認爲在動物世界裏，不僅在脊椎動物裏，甚至在無脊椎動物中，都已有了教育過程，甚至學習過程。列多諾在這些動物裏，發現了自覺的教育，教導和學習。他認爲甚至在動物界裏，都可以有「教師」和「學生」。

這種理論是根本錯誤的，因爲他把教育的概念，解釋爲一種生物現象。我們認爲教育是一種社會現象，祇有人類社會所特有的。列多諾和其他許多資產階級學者（艾斯賓那斯、列魯亞等等）却把人類社會生活現象，解釋爲生物的生活現象，從而否認了教育的社會性，教育的自覺性，而樹立了教育爲一種自發現象的論據。

另一種理論，我們稱之爲心理學的教育起源論，這是美國教育家孟祿（P. Monroe）所提倡的，他把原始人的教育的起源，解釋爲兒童對公社中的老年成員的無意識的模倣。孟祿的出發點，是原始社會

（註）見列多諾著「各種人種的教育的進化」。



中尚未形成吸收知識及訓導合成物的義務，尚未確立教育方法，所以一再着重指出：原始教育就是一種「無意識的模倣」（註）。

這種理論，也像其他一切企圖把社會的心理現象解釋為出發點一樣，是唯心主義的。當然，原始教育中（不僅原始教育中，而且近代教育中），模倣的成份是不能否認的，可是，把全部教育歸結於模倣，和把教育的起源解釋為模倣，却是不正確的。

勞動創造人類本身——祇有從恩格斯的這個著名的原理出發，才能够了解教育的起源。教育也是在勞動過程中產生的。

據恩格斯的解釋，早期原始社會——「蒙昧時代」——是取用現成的天然生產品的時代。凡是被採集的東西，幾乎馬上就被應用。

取用現成的天然生產品的過程，自然需要大量的原始人的勞力，但是這個過程是並不複雜的。

成年人的經驗，還是很有限，以致容易被兒童模倣了去。兒童在飢餓刺激下，像其他年齡較長的青年和婦女一樣，用手或木棒去採掘植物根部，和摘取果物。在這一階段——採集現成的天然生產品的階段（像動物界裏一樣）——開始時，根本就沒有教育，猶如動物界裏沒有教育一樣。

恩格斯在「勞動在類人猿進化為人類過程中的作用」一文裏說道：「勞動過程，不過是在製造工具的時候開始的」。工具的製造和使用，即使是最原始的一種工具，都要有老年人方面對兒童們加以某些指示。

下面讓我們引幾段人種學著作中所描寫的文字，以證明上述早期原始社會裏胚胎形式的教育的性質。

（註）孟蘇，教育學史，一九二三年版第一、五、九等頁。



列多諾說，在新幾內亞，兒童們所學習的主要就是模倣和幫助成人的勞作。艾爾說：「最有趣的是菲列賓羣島上成羣結隊出外打獵的黑人：男人、女子和兒童，都在一起，像出外行劫的猩猩羣一樣」。

隨着勞動經驗的複雜化，原始人由粗製的工具改用琢磨過的石器和骨器，取火方法的發明和若干種猛獸的馴服——教育的作用也就提高了。勞動本身過程中偶然需要的指示和教導，已經變成不夠了。在某些（還是原始的）製造工作中，產生了學習較複雜的勞動習慣的需要。

原始社會，大家都知道是無階級的社會。因此，在原始社會條件中所發生的原始的胚胎的教育形式，是同樣普及於一切青年的。在這一方面是完全平等的。家庭還沒有產生。孩子據恩格斯的說明是大家公有的。當時開始出現的不複雜的教育即由公眾實施，尤其是由製造工具的老年人來實施的。

俄國著名旅行家米克魯哈·瑪克蘭（Mikhail-Makrai）在文化水準極低的新幾內亞居民中住了幾年，回來作出報告說：他們對孩子的教育是由共同負責的，他們所教的是幾種習慣。

列多諾引英國旅行家觀察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居民教育情形後的報告書作爲證據：「孩子到了相當的年齡，男人就教他們學習拿槍，學習利用石斧、利用樹皮製的盾牌、利用木棍、學習攀樹、開土，如果有網，就教他們學習用網。這種實踐的教育，結束時期是很早的，因爲這種教育很簡單，孩子們在敏捷上並不遜於他們的父母」（註）。

過了一千年。原始氏族公社發展了，雖然這個發展是很緩慢的。由現成的天然生產品的取用轉到了畜牧和農業，在階級以前社會的這一較高度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了社會教育的萌芽。青年們須認識種族的法律和習慣，認識宗教崇拜的規則。要給他們講述種族英雄的故事。自從畜牧民族和農業民族劃分界線以後，這兩族之間的武裝衝突就開始了；因此出現了軍事教育的萌芽。

（註）列多諾，教育的進化。

古代阿拉伯人的教育，便是這種教育的例子：孩子從幼年時代起，就開始學習摔跤、賽跑、荷重、射擊、投槍、爬山。男孩子們還要學習捕捉敵人和設置埋伏。在有些種族裏，婦女要和男子比武，使用同樣的武器和爬山。智力教育就是灌輸沙漠英雄的故事。

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中，也有相同的教育特徵。孩子到了四五歲，就開始學習。男孩子學射擊，女孩子學家事。在漫長的冬天的夜裏，老年人給男孩子們講述動物的名稱，和捕獵這些動物的方法，給他們講述怎樣造獨木船，怎樣造雪橇，等等；給他們講述祖先們的光榮的事蹟，和各種種族的生活習慣。給女孩子們講述某些家事，暗示她們保持謙遜，等等。

在大多數種族裏，青年人經過族中長者所主持的公開和嚴格的試驗之後，便被公認為軍人。在這種試驗之前，通常先經過專門的訓練：在幾星期和幾個月期間，訓練青年人養成忍耐力，禦御武器的能力，以及關於族中各種戒律的知識。

恩格斯說：「家畜的馴化和動物的養殖，造成了空前未有的財富，和產生了全新的社會關係」。

（註一）

在原始社會的後期，跟着私有財產，奴隸制度，一夫一妻制的出現，原始氏族制度便發生解體，社會階級劃分的萌芽也產生了。恩格斯在說明這一社會發展階段的特點時，說道：「個別婚姻制度，是歷史上一個重大的進步，但是同時，它除了開闢奴隸制度和私有財產制之外，更開闢了直到現在還在繼續中的時代，這個時代就是一切進步同時也是意味着相對的後退，這個時代就是幸福和繁榮要用另一方面的痛苦和壓迫來實現。」（註二）

（註一）見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註二）見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和這些變化相關聯的，公社中的統治集團的出現和經驗的積蓄，自然也使教育性質發生重大的變化。智力教育開始脫離勞力的教育，逐漸成爲社會上層階級的獨佔品。開始時代的教育平等原則消滅了。階級教育的萌芽出現了。

## 一一·古代東方各國學校的發生

學校最初是在蓄奴制社會形成時期，在古代東方各國發生的。

這裏還在紀元前幾千年以前，就已形成了大規模的國家——東方專制國家（埃及、巴比倫、亞述等等），發生了大規模的城市。

這些國家的農業，是以人工灌溉爲基礎的。這就要求對各大河（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等等）的定期泛濫和堤壩的修築，加以經常的注意。

由於這些注意，在築堤和築城過程中，就逐漸積蓄了經驗，出現了科學的萌芽——算術、幾何學、天文學（或者更正確的說，占星術）、醫學。這些知識是由祭司加以保存的，不讓民衆知道，祇專授給少數預備將來充任祭司的人物。在祭司階級裏，知識由父親傳授給兒子，但在大城市的神廟裏，也設有祭司學校。狄奧多爾（Diodorus）說：「祭司教孩子們算術和代數；因爲每年尼羅河的泛濫衝毀了疆界，以致鄰國之間引起糾紛，這些糾紛就用幾何學來解決」。祭司們爲了本階級的目的，把學校和科學的胚胎塗上了宗教的形式，這些學校和科學還在階級社會發生的黎明期就已不但成了滿足社會需要的武器，而且成了祭司階級爲自身創造社會中特權地位和統治地位的工具。

古代埃及的文字，是一種「神聖的文字」——象形文字，這種文字正如上面所說，是完全應用於祭司階級的。除了象形文字之外，也產生了一種比較簡單的僧侶用的文字——接近實際生活的草書。隨着



這種文字的出現，在古代埃及，除了祭司學校之外，更產生了書記學校。這裏也接收手工業者的孩子。校中課程爲抄錄各種原文和解答數學問題。學生最初是在黏土盤上練字的，到了養成相當習慣之後，才給他草簿。對於端正和秀麗的書法，加以特別注意。學生所抄錄的手稿內容，是各種格言、文藝作品、公文書。

數目字是很原始的。象形文字要用九個單個記號來表現數目字九。但已有數目字十和一百等等的特別記號。分數是知道了，但埃及人只會用分子是單數的分數。除了算術以外，也應用幾何學。在中王國時代，埃及在數學方面的成就特別偉大。從這時起，埃及人會計算三角形、四角形、圓周等面積；知道兀等於三，一四一六。會計算若干種體積的容量，如整個金字塔和截頭金字塔。

在古代東方各國確立了四季，年月和晝夜的劃分，奠定了日曆的基礎。埃及人會預知日蝕和月蝕，要做到這一步，就要有充分高深的天文學知識。

此外又編了占星表，以預知未來的種種。預知疾病是和占星表有密切關聯的，因此醫學的萌芽和占星術有密切的關聯。

這樣，古代東方各國（埃及、印度、亞述等等）成了文化的搖籃。在這些國家裏，幾千年以前就產生了文字和數學的萌芽，天文學和其他科學；產生了學校。

學校的發生是和文化的複雜化及文字和科學的出現有關聯的。最初關於學校的記載，是在紀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前埃及「古王國」的文獻裏發現的。這是一種專供官僚子弟求學的宮庭學校。

在「新王國」時代，甚至產生了特種教育科學機關「Ramesseum」，專事訓練祭司、軍人、彫刻家和醫生等人材。

由於和東方的貿易往來，初期文化和學校也傳入希臘。

### 參考資料

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恩格斯：勞動在類人猿進化爲人類過程中的作用。  
列多諾：教育的進化。

瑪蒂耶：四千年以前埃及人讀什麼。



## 第二章 古代希臘的教育

古代希臘，是在前氏族制度解體的條件下所發生的許多規模不大的蓄奴制國家。在這些國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達（Sparta）或拉科尼亞（Laconia）和雅典（Athen）。這兩個國家在紀元前六世紀時形成了兩種教育體系——斯巴達體系和雅典體系。

在這些國家裏，存在着不同的統治形式和不同的教育體系，但是雖然有這些不同，而教育祇爲奴隸主而組織，奴隸却不能利用學校。列寧說道：「在蓄奴制國家裏，我們可以看到君主政治，貴族共和國，或甚至民主共和國。在實際上，統治形式雖非常複雜，而本質却是一樣：奴隸沒有任何權利，奴隸總是被壓迫階級，他們是不配稱爲人的」（註）

### 一·斯巴達教育

斯巴達是公社國家，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Peloponnesa）東南部。斯巴達的人口，由下列各部份構成：（一）該地征服者的後裔——農業貴族（斯巴達人），（二）不獨立和無權利的人民——貝立阿克人，（三）成爲國家的財產和依附於斯巴達人農地上的奴隸——希洛（Heior）。

斯巴達人是最少數獨立的統治者：在紀元前八世紀時，他們約有九百戶，他們的數量是隨時在減少的（五世紀時希臘歷史家希洛多德Herodotus已估計他們祇有七百戶），當時被奴役的人民總數却有二十五萬人。奴隸在斯巴達的榨取具有特殊殘酷的性質。殘酷的榨取引起了希洛的暴動。所有這一切使斯巴達

（註）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三七〇頁。



人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團結，在設防的斯巴達城裏隨時處在作戰準備狀態中。拉科尼亞主要是依靠天然條件來防止異族侵略的。

下面我們要說到的「斯巴達教育」，是祇有農業貴族（斯巴達人）的子弟才能享受的。如果這種教育的目的，首先是爲訓練抵禦外敵侵略的軍人，那末當然爲了斯巴達人的利益，就要盡可能的訓練更多的軍人，而因此，軍事教育不但應該貫輸給斯巴達人的子弟，而且也應貫輸給貝立阿克人的子弟。可是實際上並不這樣。

斯巴達教育，是把農業貴族的子弟訓練成軍人——被奴役人民的榨取者。

斯巴達人子弟在七歲以前是在家庭中受教育的。男孩子到了這個年齡，才被送入國家教育機關，一直居住和受教育到成年爲止。

爲要發展兒童的忍耐力，孩子被養成了忍受各種艱難，忍受飢渴、凍餒、痛苦等習慣。用裸足和穿了一件冬夏並用的薄衣服的方法來鍛練斯巴達少年的耐寒力。他們睡在親自從河邊採來的蘆草上。菜湯就是他們唯一的食物。孩子還要受毒打，打痛了哭出聲音來是一種恥辱。

兒童和青年的一天中大部份時間都是用在軍事體操的練習上，尤其是用在徒手搏鬥上。此外還有賽球和野戰。青年們適應整個教育目的，須受一種「實踐學習」——夜間捕獵奴隸的練習；大隊斯巴達青年在夜間封鎖城市中的幾個區域或城外的某一區域，把所有奴隸驅到街上或封鎖區中，然後加以屠殺。這種捕殺奴隸的目的，是在恐嚇奴隸。

「至於說到閱讀和書寫——希臘作家——歷史家普魯泰克（Plutarch）說——孩子們所學習的只是最必要的東西，其餘的教育只求一個目的：絕對的順從，忍耐力和征服科學」，除了體育以外，還有音樂和軍事宗教的舞蹈。音樂鼓舞勇氣和紀律。孩子們都要學唱讚美歌和軍歌。

教育機關中，常有斯巴達領導階層出身的成年人來訪問，他們和孩子們及青年們進行政治問題的談



話，以期從學生中造就未來畜奴制國家的統治者。他們向孩子們發問：「誰是好公民和誰是壞公民？」，「誰是國中的好人」等等。爲了表示伶俐，回答必須迅速、簡短，而有內容（拉科尼亞（Laconia）一字，即用辭簡潔的意思，就是這樣產生的）。

領導教育機關的，是族中的長者——沛堂（Paton）（註）。受教育的兒童，被分成數隊：隊中優秀者即爲集團的首領，其餘的兒童處處要服從他，以他爲範模。青年到了十八歲，就要參加軍事演習和捕殺奴隸的演習。二十至三十歲的青年除參加軍事演習和捕殺奴隸的演習之外更要領導兒童的教育。

女孩也在國家監督之下，受體育教育和軍事教育。所以要受這種教育，第一是爲要生育健康的兒童，第二是因爲戰時男子都上前線，防護城市的責任就落到留在那裏的婦女身上。

舊的教育史通常都把斯巴達教育理想化，讚美這種教育的完整和嚴格，却全不過問這種教育的目的。我們知道，斯巴達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在訓練軍人，尤其是鎮壓希洛起義的軍人。在上面我們所看到的希臘作家們（普魯泰克、克森諾豐達 Xenophon，派美塞尼亞 Pausania）所描繪的斯巴達教育的輪廓中，這種目的表現得非常明白（尤其是在捕殺奴隸一事上）。所以在斯巴達教育中，我們看到了階級教育的明顯的雛型。

蓄奴制農業貴族教育的單純和嚴格，可以斯巴達人所樹立的目標和斯巴達國家的其他某些特徵爲原因。斯巴達沒有廣泛的農業，和東方各國缺少聯系，東方專制國家統治階層的奢華淫逸的影響沒有觸到斯巴達。

在這奴役者的武裝陣營裏，文化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的。因此教育也是非常局限和貧乏。

上面我們只分析斯巴達教育的目的，指出了它的偏頗性。但是同時也要把斯巴達教育對於當時一些

（註）據古代希臘文的字義，沛堂就是「爲兒童制定法律的人」。



積極特徵指出來：（一）斯巴達人把教育視為最重要的國家使命和社會使命的觀點；（二）為統治階級青年一代的教育而從事整個社會的和國家的教育機關的建設；（三）整個統治階級對教育問題的注意；（四）婦女的教育。

## 二· 雅典教育

雅典——阿提喀（Attic）國家的主要城市——和斯巴達不同，由於便利的海港地位，很早就成了希臘的商業中心。大部份蓄奴貴族由於對東方各國（埃及、非尼基、小亞細亞）的商業的發展，在紀元前六世紀時已由農業貴族變為商業貴族。

商人階層（富豪政治家）的暴富，使他們可以得到大量的奴隸，而蓄奴在這一時期的雅典就異常普遍。柏拉圖（Platon）在紀元前四世紀時寫道，在每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裏有幾十個男女奴隸。

在農業貴族和商業貴族的統治集團間，為奪取政權進行了猛烈的鬥爭。起初鬥爭是雙方都有勝負的，到紀元前六世紀末葉優勢轉到富豪政治家方面。然而鬥爭在五世紀時還是繼續着。

伴隨着蓄奴制的發展和雅典經濟的繁榮而來的，是阿提喀小農的破產，因為農業貴族在對富豪政治家的鬥爭中加強了農民的榨取，小農民的生活水準降低了。其中很多人不得不賣去自己的土地而遷居到城市，但是他們在那樣也由於奴隸勞動的發展而找不到足資糊口的工作。雅典於是充斥了大批半飢餓的沒有土地的人民，他們在物質上毫無保障，但享有政治權利（共和國官吏選舉權等）。這些沒有財產而有政治權利的人被稱作 *Demos*（希臘語人民）。鬥爭中的統治集團就利用這些雅典人民來作爭奪政權的工具。

這樣，階級鬥爭在雅典是比在斯巴達帶有更複雜的形式。雅典成了民主的蓄奴制的共和國，其領導者是商人階級的代表。



紀元前五世紀，在伯里克里斯（Pericles）執政時期，雅典達至強盛的最高點，把希臘許多島嶼和小亞細亞沿岸變為它的實際朝貢者（藉口為同盟的希臘艦隊募集款項以抵抗波斯的侵略）。雅典文化在伯里克里斯時代達至繁榮的最高點。

哲學在紀元前五—四世紀的雅典得到最大的發展。恩格斯說：「幾乎後來一切類型的世界觀，在各種形式的希臘哲學中已有着萌芽和發生」（註一）。唯物論是在古代希臘產生的，在雅典各派哲學代表中，辯證法的成份是很有力的。雅典人從古代東方各國學來自然科學、數學和其他科學，並加以發展。歷史得到極大的發展（克森諾豐達，希洛多德，齊克第達 Thucydides）。希臘藝術，尤其是雅典藝術，站在很高的水平上；希臘雕刻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創造了高度傑出的藝術作品；花瓶上的繪畫是以意味深長而具可塑性為特色，雖然希臘人只用三種顏色——黑，紅，黃。希臘建築物在莊嚴中含有優美、輕鬆、調和的特色。例如伯里克里斯時代建築的派弗儂宮殿（Parfenou）就是這樣。恩格斯在說明古代希臘（尤其雅典）的文化特徵時，說道：「我們無論在哲學裏，無論在其他許多領域裏，對於這個小民族的功業不得不加以經常的注意，這個小民族的天才和活動，保證了她在人類發展史中任何其他民族所不能得到的地位」（註二）

沸騰的雅典政治生活，相當高的阿提略經濟水平，對東方各國的活躍的貿易關係，高度的文化發展——所有這一切，決定了紀元前六—四世紀雅典教育的特點。

在雅典，孩子在七歲以前是在男女奴隸看守之下在家庭中受教育的。這些學齡前兒童主要注重於遊戲：戲骰子、玩奇數和偶數、踢球。也做模塑和彫刻；亞里士多芬（Aristophanes）在他的喜劇『蛙』

（註一）馬恩文集第十四卷第三四〇頁。

（註二）同上



裏，曾記述男孩子們把軟木樹皮做成小船，把蜜蠟彫成小屋。孩子在幼年時期就受禮節的訓練。給他們講述故事和神話。女孩子們在七歲以後在母親領導之下受家庭教育。男孩子們在七歲以後繼續住在家裏，也常去學校。

供七至十四歲兒童求學的原始雅典學校，有文法學校和絃琴學校兩種。兒童或者在兩個學校同時學習，或者先進文法學校。後進絃琴家學校。

這兩種學校，都是私立和納費的；這些學校收容作戰殘廢的軍人和脫離奴隸身份而自由的人。這兩種學校的教師，統稱為Didasko（即希臘文教師）。爲了避免「街上無禮貌的事物的接觸」，孩子進校和出校都由年長奴隸伴隨，這個奴隸就被稱作「教僕」（Pedagogue，希臘文的字義即爲孩子指導者）。在文法學校裏，孩子學習閱讀、書寫和計算。孩子在學閱讀時，是用疊字法暗記字母和疊加字母的。在教授書法時，教師用細棒輕輕的寫在沙盤上，然後學生依樣畫下。孩子學計算是以手指、石子和計算板等爲工具的。

在絃琴學校裏，孩子們習音樂、唱歌和讀詩（則讀希臘敘事史依里亞特Iliad與奧特賽Odyssey及詩人海西奧特Hesiodos等作品之一節）。

當時還沒有一種由國家規定的課程。一切都由私人獨創，或由習慣造成。但也有幾種決定學校組織特點的法規。梭倫（Solon）的一條法規，規定學校應由日落時起關閉到日出爲止。但這決不能解釋爲學校上課時間有如此長久。保留在雅典花瓶上的圖畫繪出教師在這種學校裏教育一個學生的情形。然而也有一種法規，規定兒童集合上課。但如果兒童果真同時聚集在一個學校裏，而教師却沒有教全班兒童的事，每個兒童還是自己學習的。這種教育組織，後來在中世紀時期還是保存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才告結束。

據若干種歷史材料判斷，對兒童的體罰是應用很廣的。例如有一塊習字用的小木板上，教師親筆寫



下一句格言：「孩子，你如要不挨打，你就得勤勉」。這句格言再由學生重覆寫了四遍。

孩子到十三歲，就升入「鬥爭學校」(Palestra)，在體育導師(Paidotribes)指導之下，從事體育訓練：學習戰鬥、賽跑、跳高、擲圓盤和投槍、游泳。除了純粹體育練習以外，在鬥爭學校中，還有對青年的談話。

一部份青年在鬥爭學校畢業之後就結束學業。家境最富裕的青年預備未來担任國家的要職，則在鬥爭學校畢業之後升入體育學校(Gymnastii)，繼續從事體育練習，並用談話方法得到政治、文藝和哲學等等的教育。當時希臘哲學達至發展的最高點，認識哲學成爲貴族階級上層的必需。

十八至二十歲的青年，升入成人學院(Ephēbia)。他們立誓尊重國家的法律和服從政府，並立誓爲祖國作勇敢的奮鬥。

成人(Ephēbos)獲得軍事教育的最後的訓練：他們學習建造防禦工事，注意作戰機構並在城市衛戍隊裏服役實習，編組邊防軍，研究海軍事務，練習陸軍遠征。成人參加公共祝祭和戲劇表現(因爲戲劇是希臘各族人民反抗異族的愛國教育的工具)。

所以，紀元前六至四世紀的雅典教育的體系，可用下表來表現：

十八至二十歲	成人學院
十六至十八歲	體育學校 (體育訓練、政治、文藝及哲學講話)
十三至十五歲	鬥爭學校 (體育訓練)



## 七至十四歲

## 文法學校

## 絃琴學校

(閱讀、書寫、計算) (音樂、唱歌、讀詩)

甚至初等學校(文法學校和絃琴學校)，都不是人人都能自由進去的。即使這些學校的收費是如何低廉，也不是一般沒有工作，沒有土地的雅典人民大眾能力所能擔當的。統治階級上層叫無錢人的子弟去受工藝教育。依照梭倫的一條法律，如果父親不給子弟學習工藝，那麼他在老年時就不能得到兒子的物質上的幫助。這條法律，顯然是爲貧苦公民而訂的，因爲他們沒有經常固定的職業，他們對於統治階級上層是一個極大的危險，所以也就「關心」到這般窮人的工藝教育來了，但是統治階級上層並不從自己方面提出任何辦法，他們只把這種教育的責任推到屬於平民階級的父親的身上。

所以，在「民主」的雅典，整個教育體系是適應於有錢的社會上層階級的需要。各種歷史材料証實了這個論點。柏拉圖在他的對話「普羅太谷」(Protagoras)裏，描寫了當時教育情形後補充說：「這就是那些有錢的人所作的。他們的子弟很早開始受教育，很晚纔結束教育和學習」。

像在斯巴達一樣，在雅典，蓄奴制的貴族階級也把從事肉體勞動視爲一種耻辱，把它視爲奴隸的命運。奴隸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的。但是不同的社會生活條件也決定了斯巴達和雅典的教育體系間的鉅大的區別。

在斯巴達，教育機關是國立的。而在雅典，初等學校和一部份鬥爭學校是私立的。

斯巴達教育，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幾乎完全限於軍事和體育教育。而雅典教育則分體育教育和科學藝術教育兩種。

在雅典體育教育中，注重健全有力的體格的發展，運動的軟韌和美麗。這種人體美和力的引誘，在



美學教育中也有更進一步的表現。

雅典社會生活的發展，把措辭美麗而內容深刻的說話能力的養成，作為智力教育的特殊的任務。學習雄辯的技能，在紀元前五世紀，雅典教育體系中佔了極大的位置。雄辯對於統治階級上層是影響羣衆的工具之一。

文藝教育，尤其是对希臘（荷馬）叙事史及海西奧特等作品的認識，是當時極重視的。在高等學校的智力教育體系中，哲學和政治起着極大的作用。

兒童精神教育，是在發展他的紀律、禮貌、謙遜、勇敢、自制、自尊、以及抑制情感的能力。

應該指出，綜合和聯系各方面的教育，是雅典教育的一個極重要的特徵。我們已經指出體育教育和美學教育的聯系。這兩種教育同時也和精神教育及智力教育有着密切的聯系。

柏拉圖在「普羅太各」裏描寫雅典教育時說道：「音樂教師要注意的，是他的青年學生學習自制和避免各種不良的行爲。他在教他們七絲琴時，要和他們研究抒情詩人，把他們移到音樂上來，使孩子們和調和及韻律合體，養成他們溫和順從的調和和韻律的習慣，從而適應於言語和行動，因為人類生活在它各方面的表現上，都需要調和和韻律」。

雅典人極重視人的發展及教育的各方面的配合。他們提出了各方面調和的完人的概念。雅典人用複雜的概念「*Kalokagathia*」來表現教育的理想，這個概念所包含的意義就是人應把美麗健全有力的體格和高尚的德行配合起來。因此智力教育的要求，也要和尊重美觀、愉快及參加社會生活興趣的要求配合起來。當然，這種理想是只爲着奴制的貴族階級代表而提的。在當時所存在的社會關係下，不是一切自由生長的平民都能接近這種理想的，祇有蓄奴制的社會上層階級能接近。蓄奴制的貴族階級的高度發展水平是以榨取奴隸的方法換來的。但也要指出，在人類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奴隸制度是保證文化前進的條件。恩格斯說道：「只有奴隸制度，造成了農工業間更廣泛的分工的可能，由於它，才有古代希臘世



界的繁榮。沒有奴隸制度，就不會有希臘國家，希臘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度，也就不會有羅馬。而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定的基礎，也就不會有現代的歐洲。我們不要忘記，我們所有經濟、政治和智力上的發展，都是從那需要奴隸制度的預備狀態中，產生出來的」（註）。

#### 參考資料

列多諾：教育的進化，第十五—十六章。

### 三·希臘哲學家們論教育

#### 詭辯學派

五世紀時雅典經濟的繁榮，促成民主共和國產生的殘酷的階級鬥爭的進行，以及雅典文化的發展，所有這些使統治階級上層提出了提高教育的要求。這個要求同時引起了週遊各城市的哲學家——教師、詭辯學派（Sophists）的出現。教授雄辯術的詭辯學派同時也是適應變動中的雅典生活條件的新哲學的通俗解說者；詭辯學派是科學——自然科學、天文學、法學的通俗解說者。他們在雅典精神生活的歷史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他們檢討了過時的舊見解，提高了人的意義。

詭辯學派就他們的哲學見解說，是相對論者，他們證明一切存在的相對性。他們在認識論上是感覺論者，認為一切認識就是感覺。「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詭辯學派的首領普羅太谷說。另一個有名的詭辯學家哥爾基亞（Corax）更發展了這一主觀主義，認為真理只是個人的意見；每一個人只要他自己看來是真正的正義的好的東西，就可以認它為真正的正義的好的東西；每一個人能夠追求的只是自己的愛好和興趣。

（註）恩格斯：反杜林論。

主觀主義在詭辯學派的見解中佔了統治地位。在指出他們的思維中的這一否定方面時，同時也應指出：詭辯學派以其反對保守主義、反對陳腐觀念的鬥爭，是起了進步的作用的。他們打破了神爲世界主宰者的見解，而把人和他們的要求及判斷提到了第一位。列寧在「哲學筆記」裏說道：「多方面的普遍的概念柔軟性——這就是本質。用主觀方法應用這種柔軟性——就是折衷主義和詭辯學說。用客觀方法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性的方法來應用這種柔軟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永久發展的正確反映」。（註）

詭辯學派對宗教的態度是懷疑論者。詭辯學派的首領普羅太谷寫過一本題名爲「論神」的書。它的內容我們不知道；但是有一點是知道的：該書曾受譴責並被公開的焚毀，而普羅太谷也不得不逃出雅典；由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它的傾向了。該書所保留的只有下面一段話：「關於神，我不能知道他們是不存在；因爲有許多東西阻礙我們去知道它——一則對象是如此模糊，二則生命又如此短促」。

詭辯學派的基本職業，是對「黃金青年」教授雄辯術，藉以獲取高額の酬金。詭辯學派遊歷各城市，吸引大批富家子弟。詭辯學派教授學生對某一題目發表演說；進行政治問題的談話；有的進行自然科學、文法、雄辯術等的有系統的講話，在授課時，經常舉行練習和討論。

他們從一個城市遊歷到另一個城市，做了這些城市間的活的聯系。當時還沒有報紙和雜誌，詭辯學派就做了活的定期刊物。詭辯學派訪問了許多城市和東方各國，培植了地方科學家和積蓄了豐富的觀察所得的材料。

適應着正在成熟中的多方面教育的要求，詭辯學派因爲長於雄辯術，在雅典富家子弟中得到了極大的成就。

（註）列寧：哲學筆記第一一〇頁。



詭辯學派利用了他們的信從者的私室和體育學校的校舍，來作他們講學的地點。

詭辯學派在教育雄辯術的過程中首先提出了格式問題。他們從形式方面對文藝作品作精密的分析（作品結構，句子構造，用字選擇）。詭辯學派推動了文法的進步。說服和辯論的技術，要求對論理學和哲學或當時所說的辯證法作深刻的認識。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 *Dialektiké* 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藉助於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註）。

可是詭辯學派的「辯證法」，正如列寧在前面所說，是用主觀方法來解釋概念的，沒有反映現實的發展。他們教育論戰的方法，多於教育對真理作深刻的探求。

三種科學——文法、修辭學（即雄辯術）和辯証法（哲學）——的系列已貫串在詭辯學派的實踐上。

此外，詭辯學派對自然科學、天文學（地理）也極加注意，可是他們對這些科學的解釋是功利主義的。後兩種科學的意義，對於雅典的航海業和對外貿易起着極大的作用。活躍的政治生活要求在政治、法律和道德問題上決定一個方向，詭辯學派的許多演說就是發揮這個問題的。

最後要指出，詭辯學派首先提出了教育的重大作用問題。有名的詭辯學派之一，安蒂芬（*Antiphon*）認為教育應該放到人類一切問題中的最高的地位：「種下泥土裏的是什麼種子，得到的也就是什麼果實。青年如果加以良好的教育，那末開出來的定是一朵保持久遠而不為雨水和乾旱所摧殘的花朵」。

普羅太谷發表了許多有趣味的教育思想：「學生要有天然的本能和練習；我們必需跟青年學習。沒



有實踐的理論，和沒有理論的實踐，都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沒有一定的深度，教育就不能在精神中萌芽。

適應這個原則，在詭辯學派的教育方法中，練習是很被重視的。

### 蘇格拉底的

### 教育任務和

### 教育方法

蘇格拉底（Socrates 紀元前四六九—三九九年）是一個哲學家，他反對詭辯學派的相對論，而提出了絕對真理和精神行為標準固定性的學說。

蘇格拉底也是從那詭辯學派所宣佈的公式裏（「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出發，不過他對這個原理的瞭解，是和詭辯學派不同的，他所瞭解的是「作爲會思想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他要大家作深刻的思想，作精神上的深造，他重覆說：

「要認識自己」。他力求絕對精神，以與詭辯學派的相對論及主觀主義對抗，他力求精神上的深造，以與詭辯學派的功利主義精神對抗。這是希臘哲學一個重大的進步。蘇格拉底第一個提出了教育學習的思想。在他爲精神上的深造、爲善行的努力中，蘇格拉底認爲最高的善行就是知識。「沒有一個人是自願犯錯誤的」——蘇格拉底常常這樣說，他證明不正確和不道德的行爲只是無知識的結果。

在這個學說中，應該指出人類所製定的宇宙觀的重大意義，和完成高尚德行的號召。蘇格拉底認爲人是會思想的，內部自由的個體，人的一切行爲決定於理智。他認爲智慧就是最高的善行。在人的活動上，這種善行就是勇氣——行爲能力，而在感情上，這種善行就是適度（因爲只有智慧能夠控制感情的激動）。蘇格拉底的這部份學說，後來是被他的學生柏拉圖所接受了。

可是蘇格拉底對知識的重視，是從人類善良天性的唯心論的思考出發的。依照蘇格拉底的解說，知識不過是一種自我認識，是絕對精神概念的發現，而不是周圍現實的認識。蘇格拉底對研究外部世界的必要性，是抱着否定態度的；他認爲研究自然界，是沒有意義的。蘇格拉底承認自我認識和自我反省，而他對同時代的社會生活却抱着否定態度；雖然他是民主階層出身的（蘇格拉底是手工業者——彫刻家



和產婆的兒子），而他却是雅典民主的反對者。

對於教育史，除了這些思想之外（即精神教育的思想，重視人為理智動物的思想，以及分析自身行動和不斷尋求真理的號召），蘇格拉底所教示的方法，也是極重要的。他沒有提出什麼是真理的現成的原則。他用問答方法進行教育，鼓勵學生自己在教師幫助之下解答問題。他只加以暗示。如果提出來的問題得到不正確的回答，他不立即加以更正，也不指出錯誤所在，而是提出由這不正確的回答所發生的補充問題，使對談者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對談者明白了錯誤原因，研究工作便繼續進行。

這種所謂蘇格拉底方法，使學生不得不共同尋求最正確的回答，發展他們的獨立性。

蘇格拉底把自己的方法分為兩部份：說明對方錯誤的否定部份，「反問法」，和發見真理所在的肯定部份，即「產婆術」（Maieutik）。

蘇格拉底在用這種方法進行談話時，時常由學生所熟識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談起，再由這些事物和現象得出結論。亞里士多得稱他為歸納法的父親。

蘇格拉底在說明自己的方法時，說他好像是個產婆，只是幫助真理的誕生：「我的產婆術的特點是這樣：它在分娩時是替男子服務的，而不是為女子服務的，它所關心的是靈魂，而不是身體……學生不能從我那裏學到什麼，相反的，他們只有從自己的那裏發現很多優美的東西，然後把它們保存下來」。

希臘大哲學家，客觀唯心論的創始人柏拉圖（紀元前四二七—三四八年）曾在蘇格拉底晚年做了他的九年學生。蘇格拉底死後，柏拉圖便遊歷各地。從三八〇年起，到臨終時為止，他主持雅典阿加的米學院（Academy）的哲學講話。

## 柏拉圖的教育觀

### 柏拉圖的

柏拉圖把世界分為暫時的現象世界和永久的思想世界兩種。依照柏拉圖的唯心論的

見解，我們的生活和我們周圍的世界不過是唯一存在的永久思想世界的反映。這個『思想世界』依照柏拉圖的解說就是光明和善良的王國。



思想的主要屬性，就是它的完全、純粹、和不受外來要素影響的性質。

人類靈魂，據柏拉圖的解說，在未和肉體連在一起以前，是在觀念世界裏找到的。但是在和肉體連在一起時，遇到恐怖和驚愕，它就忘掉純粹思想的幻景或實質。

所以，照柏拉圖的解說，認識就是對思想世界的接近，對絕對真理的努力，而這個接近，是由回憶思想世界的方法來達到的。

思想是無限止的多數。柏拉圖建立了整個的思想金字塔。例如櫟樹、柏樹等的思想，比起喬木的思想來，是低級思想；這後者又服從於較高級的植物的思想。這一思想金字塔的最高峯，是幸福思想，也就是上帝。真理、美貌、和正義等的思想，是服從於它的。這個幸福思想，像太陽一樣，是一切生物的泉源。

保守的農業貴族的代表，柏拉圖對雅典民主制度抱着極端仇視的態度。爲要反對這種制度，他描繪了一個理想國，在這個理想國裏，政權是屬於知識貴族——哲學家的。

在這個世界裏，階級鬥爭正在進行，一切都在運動和變化，雅典由不久以前的經濟繁榮轉到貧困——在這樣的世界裡，柏拉圖認爲是毫無真實和優美的東西的。

依照柏拉圖的解說，人類靈魂過去是在思想世界裡的，後來纔和肉體結合。靈魂由三部份構成，即（一）理智部份，（二）意志部份，（三）感情部份；第一個部份由思想世界中產生，後兩個部份由靈魂和肉體結合後產生。

在柏拉圖的倫理學中，三種優點是和靈魂的這三個部份符合的：智慧符合於理智部份，剛毅或勇敢符合於意志部份，中庸適度符合於感情部份。在柏拉圖的社會學中，三個社會集團是和靈魂的這三個部份及其相應的優點符合的，即（一）哲學家，（二）軍人，（三）手工業者和農人。前兩個集團是特權階級，是以榨取第三個集團（手工業者和農民）和奴隸的勞動來生活的。哲學家治理國政，軍人守衛



國土。柏拉圖的這些心理、倫理和社會學上的構造，顯然可以作成下面的圖：

心理學	倫理學	社會學
(靈魂各部)	(人類優點)	(社會各集團)
(一) 理智	智 慧	哲 學 家
(二) 意志	剛 勇	軍 人
(三) 感情	中 庸 適 度	手工業者及農人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奴隸還是存在。不僅奴隸沒有權利，就是自由的手工業者和農人也沒有權利。他們祇有靈魂的最低級部份——感情部份和適合於統治集團的那些優點，如中庸適度和順從。

馬克思在說明柏拉圖對理想國的觀點時說道：「因為在柏拉圖的共和國裡，勞動分工是國家極度的基本原則，所以這個共和國不過是雅典人對埃及階級制度的理想化」(註)。

馬克思也說到柏拉圖的共產主義，認他為烏托邦共產主義的祖師之一。其理由是柏拉圖在他的理想國裡，夢想為統治者的貴族階級實行財產共有制。所以，柏拉圖的共產主義，是保存奴隸榨取和手工業者及農民榨取的貴族階級的共產主義，而且只是消費者的共產主義。

這種「理想國」的目的——依照柏拉圖的解釋，是在接近幸福思想——主要是用教育方法來實現的。所以柏拉圖在自己的著作裡，對教育問題極加重視。

他確曾創造完整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是建築在客觀唯心論的基礎上而專為特權集團——哲學家

(註) 馬恩文集第十七卷第四〇五頁，



軍人——服務的。

柏拉圖在兩部著作——「共和國」和「法律篇」——裡闡明了這個體系。

柏拉圖在他的體系裡，利用了當時存在的雅典和斯巴達教育的實踐。他從雅典教育裡利用了學校的體系、科學和藝術教育、以及當時最廣泛的科學範圍、調和發展的思想。他在斯巴達教育中，利用了教育國有的原則、教育的嚴格性、忍耐力的培養、音樂和詩歌的精選，——他排除了依奧尼亞（Ionia）的生活情調，認它為驕養的情調，而發展了多立斯（Doris）的即斯巴達的生活情調，認它為培養勇氣的情調。他也從斯巴達的教育中，利用了女子教育制度。所以，在柏拉圖的方法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後來教育發展中那個基本原理，即教育理論是和教育實踐有密切聯系的。

在雅典，我們知道教育是分為智力美學教育和體育教育兩種。柏拉圖也採納這種劃分：「很難找到一種比用長時期的經驗方法所找到的更好的東西，而這對於體育家的身體和音樂家的心靈都是適宜的」（註）。

這種劃分，後來我們在亞里士多德那裡也曾見到。可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間在這一問題上是有鉅大區別的。

從何種教育入手呢？柏拉圖踏襲了他的哲前提，也就是說，踏襲了他的承認思想為最先本質的前提，認為應從那種使人類和思想世界接近的教育即智力美學教育入手。

柏拉圖在「共和國」裡，描繪出一個烏托邦的理想國，在這個國家裡，哲學家 and 軍人是沒有私有財產和家庭的。國家代為男女選擇配偶，並代理育兒的工作；後者要有一個條件，即母親年齡須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父親年齡須在三十歲至五十歲之間。不在這個年齡生出的孩子，國家即加虐殺。



(註一) 孩子生出以後，就被送到特設的養育所，由乳母加以扶養。生母有的也到這裡，爲其自己的孩子和別人的孩子哺乳。在「法律篇」裡，柏拉圖把這個原則取消——他在那裡已經承認家庭存在的必要了。

柏拉圖爲七歲以前的兒童，確立一種學齡前的教育制度。

柏拉圖對這種教育，極加重視，不僅在「共和國」裡，提到這種教育的社會組織，而且在「法律篇」裡，提到這個組織。所有三歲至六歲的兒童，在樑母監護之下，寄養在神廟中附設的幼稚園裡。

柏拉圖對於兒童的遊戲，是極加注意的。他對於爲兒童講故事以及慎選童話材料問題，也極加重視。柏拉圖的這種意見，我們認爲很有價值，但是他爲故事選材問題所提出的原則，却和我們離得很遠：柏拉圖不主張採用希臘敘事詩中的故事斷片，因爲這些故事對於神的描寫缺乏引人注目的力量。在音樂中，他主張拋棄衰弱和可憐的旋律。

男女兒童從七歲起，即入國立學校，其普通課程在雅典學校中有閱讀、書寫、計算、音樂、詩歌。初等學校畢業後，入門爭學校。柏拉圖提倡體育教育的目的，是在養成溫和的生活樣式，養成忍耐力、耐寒耐熱的能力、遊戲、舞蹈，然後作戰、擲球、投槍、賽跑、射擊、騎馬、野營練習等等。「女孩子和婦女也要知道這一切。做女孩子的，她們應該練習各種跳舞和作戰，做婦女的要練習排隊和裝卸武裝的方法。她們所以要知道這些智識，是因爲一旦全體男子拋棄城市開赴前線去殺敵，她們就能担任看護兒童和城市的工作」(註二)。

經過兩三年的體育練習之後，兒童須受更進一步的教育，其課程爲算術、幾何、天文、而其研究目

(註一) 理想國，第二卷第四六〇—四六一頁。

(註二) 法律篇，第八一三—八一四頁。



的主要是和實踐（軍事）有關。算術「對於軍人排隊時是需要的」，幾何學「對築營，奪取地方，集中及分散軍隊以及在作戰和進軍時的其他一切軍事編排中，都是有用處的」。

青年在成人學院裡經過三年（十七至二十歲）訓練之後，如果對各種智力上的學科沒有興趣的話，從二十歲起就改作軍人。如果對抽象的思維有變好的話，則在二十歲至三十歲期間，對哲學計劃、算術、幾何、天文及音樂理論等作繼續加深的研究。這時「研究算術純粹是為思考數的性質一種思想」，而不是「為買賣」。研究幾何「是為吸引靈魂接近真理，和創造哲學情緒」，研究天文學不是為了航海，而為思考無窮的宇宙。此外也研究辯證法的基礎。

担任上述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到了三十歲就充任比較不重要的行政官吏，能力最強的則繼續研究辯證法到三十五歲，然後便成為哲學家——國家的統治者。

柏拉圖所確定的科學和過去詭辯學派所應用的文法及雄辯術，後來（中世紀時）構成了「七種自由藝術」，自然，這些科學的內容在中世紀時已經不同了。

我們在詭辯學派那裡也見到過辯證法。可是柏拉圖對「辯證法」概念所加給的意義是和詭辯學派不同的：詭辯學派把辯證法視為一種論爭和說服對方的藝術，而柏拉圖把辯證法視為最高哲學的規律，引導認識最高幸福思想的關於思想的科學。柏拉圖認為這種辯證法是教育的成就，祇有成人能加以研究，而且不是個個成人能加以研究，祇有那些表現哲學思維能力的人纔能加以研究。

柏拉圖把整個教育建築在輕視生產勞動的基礎上。依照柏拉圖的解釋，體力勞動是會發展醜惡的性情和養成無力觀察思想世界的習慣的。他要未來的哲學家 and 軍人不去模倣奴隸或「打鐵匠及船夫」。甚至禁止他們「對任何類似事業（即手工業和農業）發生興趣」（註）。

（註）共和國，第五二五頁。



資產階級教育史家只把柏拉圖教育體系的貴族傾向視爲次要東西；實則柏拉圖的這種貴族主義及其輕視民主的態度構成了柏拉圖教育觀的社會基礎。

柏拉圖的教育體系在後來教育的發展上造成極大的影響。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接受了他的教育體系中的許多個別原則。柏拉圖對中世紀許多學者的思想給了極大的影響。在文藝復興時代，柏拉圖的著作曾被人文主義者所研究；他對於這一時期在佛羅倫薩所建立的阿加的米學院給了特殊的影響。描寫理想的社會組織的柏拉圖的「共和國」一書在十六—十七世紀時成了空想社會主義者莫亞（Thomas more）和康巴乃拉（Tommaso Campanella）著作中的參考資料之一。資產階級的教育學時常以柏拉圖的唯心論的原則做基礎（直到近世拿多爾普（Paul Gerhard natorp）在一八九九年所寫的「社會的教育學」〔Sozialpädagogik〕一書還是如此）。

我們在指出柏拉圖教育體系的貴族主義性及其構造的唯心論基礎時，同時還要評價他的教育體系的嚴整性和許多別的因素。他首先指出了教育的重大政治意義；首先規定了心理學的基本分類；規定當時最廣泛的科學的範圍，指出每種科學對於發展抽象思維的意義。他首先提出了社會公有的學齡前教育的思想，指出了遊戲在這種教育中的重大意義，提出了精選童話材料問題，承認童話的重大教育意義。

我們一方面指出柏拉圖因受其哲學的約制而形成和生活脫節的事實，但同時也應該承認柏拉圖在自已的學生中建立完整世界觀的寶貴的努力。柏拉圖的教育體系，是以組織嚴整爲特點的；柏拉圖把他的教育學的每一條原理和每一個特性，用他的方法論的目標——客觀唯心論哲學——來做基礎。

## 亞里士多德

### 的教育觀

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 紀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年），馬其頓王腓力侍醫的兒子和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私人教師，曾作二十年的柏拉圖的學生。紀元前三三五年，他在雅典創辦一個哲學學校，校址因爲在利森（Lyceum）阿坡倫神廟隔壁，這個學校就取名爲利森學園。



亞里士多德是古代希臘最偉大的學者和哲學家，他在認識論、政治學、倫理學、作詩法、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留下了許多著作。在他的著作中，除了形式邏輯以外，還有許多辯證法的閃光；除了唯心論以外，還有許多唯物論的因素。希臘科學和哲學，到他那時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峯。他對古代世界和中世紀（尤其是十二—十四世紀）的科學和哲學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影響。但是要指出，中世紀把亞里士多德的一切進步特徵全部刪去，把他變成形式邏輯的創造者，拋棄了亞里士多德的許多辯證法的因素。資本主義的哲學和教育學也抹煞了亞里士多德的辯證法。祇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人才正確的評價了亞里士多德的辯證法的因素。恩格斯斷定亞里士多德「已經研究了辯證法思維的一切最本質的形式」（註一），而稱他爲「古代世界的黑格爾」。列寧指出「煩瑣哲學和僧侶主義拿去了亞里士多德的死的東西，而沒有拿去活的東西」，稱亞里士多德「到處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關於辯證法的問題」（註二）。列寧在說明亞里士多德的特徵時，屢次指出亞里士多德的現實主義和指明亞里士多德在唯心論和唯物論之間的動搖，破壞唯心論的基礎（在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關於思想學說的批評中）以及在某些問題上接近唯物論的事實。

柏拉圖把世界分爲絕不相關的思想世界和現象世界，亞里士多德則不同，他認爲世界是唯一的，物體的思想是和物體本身不能分離的。物體和現象的思想雖然也存在，但是存在於物體和現象本身內部。依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思想可以比作形式。任何東西我們都可分爲物質和形式兩部份。在物質中，有物體的可能；物質變成物體而取得或種的形式，例如大理石這物質能夠變成彫象而取得一定的形式。

物質沒有形式——據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是世界生存最低級的境界（所謂原始混亂狀態）。純粹

（註一）馬恩文集，第十四卷第二十頁。

（註二）哲學筆記，第三三二頁及二八八—二九五頁與三二九—三三七頁。



的無物質的形式，據亞里士多德的解釋就是神。在純粹物質和純粹形式之間，像連鎖一樣安排着世界各種物體和現象。它們生活着並從一個思想境界——無形式的物質——進到另一個思想境界——無物質的純粹形式。生存的每一個新階段對於後來的發展階段就是物質。

這樣，整個生活就是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在外力影響之下完成的，而是被亞里士多德認作內部的發展。我們知道，在這全部見解中就包含着許多辯証法的因素。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不同，他不懷疑外部世界的現實性和認識的基礎是感官的經驗及感覺。認識的錯誤據亞里士多德的解釋是起源於虛偽的思維，即對感官的經驗作不正確的說明。由此亞里士多德就作出一個正確的結論：知識必需積蓄、組織和概括。

這樣，亞里士多德把哲學思想提高到更進一步的階段，指出了形式和內容的統一。他比柏拉圖把辯証法更接近於現實世界。

亞里士多德把人分為肉體和靈魂兩部，而這兩部像物質和形式一樣是不可分割的存在着的。依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靈魂共有三種：第一種是植物靈魂，其表現為飲食和繁殖，第二種是動物靈魂，性質高於植物靈魂，其表現為感覺和慾望，第三種是理智靈魂，性質高於動物靈魂，其特徵為思維或認識。在人類中，動物部份的靈魂因其服從於理智，也能稱作意志靈魂。

依照亞里士多德的解釋，適應上述三種靈魂的是教育的三個方面。我們試把這種適應列表如下：

心 理 學 (靈魂各部)	教 育 學 (教育各方面)
(一) 理智靈魂	智力教育
(二) 動物(意志)靈魂	精神教育
(三) 植物靈魂	體力教育



柏拉圖把生命和肉體視為靈魂的監獄，而現實主義者亞里士多德則承認肉體是靈魂活動的必要條件。

存在，據亞里士多德的解釋就是活動。活動和發展是一切生存的基礎。這種論斷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成爲基本的論斷。可是活動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在人類中，有低級活動和高級活動，高級活動與靈魂的理智部份——思維、認識及意志活動——有關。

善是實現上述活動的才能。善只有在人類一切活動服從於理智，而理智永遠處在中間地位，即不跨過界線到達某一方面——也不匱乏也不過多——的時候，才能够實現。所以可以說，善就是中庸，是尺度的遵守。例如寬仁這個字，是吝嗇和浪費的中間；勇敢是懦弱和輕率的中間；溫柔是屈從和暴怒的中間。

人類最高的東西是理智。因此最高的德行就是靈魂的思辨能力，這種思辨能力有許多等級。最高的一級是智慧。

人類生活的目的，像其他生物一樣，是在幸福的獲得，而任何幸福都是和活動有密切聯系的：「沒有活動也就沒有幸福；幸福是一切活動的完成」。思想活動也可求得最高的幸福。

教育目的是在發展靈魂的最高方面——理智和意志。像在每一種物質中有着發展的可能性一樣，在人類中，天性只是我們能力的胚胎；在人類中，有從天性中得來的發展的可能性，而它是由教育方法來實施的。天性把三種靈魂密切聯系起來，我們在教育中也要追蹤着天性，把體力教育、精神教育和智力教育密切聯系起來。

上面我們已經引了亞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教育的哲學基礎和心理學基礎。和這些有密切關係的是亞里士多德所建立的教育的社会學基礎：「因爲整個國家有一個最後目的，所以很明白的，全體公民要有同樣的教育，而對這種教育的關心，應該成爲國家的關心，不是私人倡導能了事；凡有共同利益的事業，



應該共同去經營。尤其不要以爲每一個公民都是單獨的；決不是的，一切公民都是屬於國家的，因爲每一個人是國家的細粒。關心每一個細粒自然應該成爲全體的事業。在這一方面，拉栖第夢人（Lacedaemonians）很足以稱道：他們對兒童教育極加注意，他們的兒童教育也就含有全國的性質」（註）。

亞里士多德把教育當作加強國家組織的工具：「如果公民不習慣於國家的秩序，如果他們不在靈魂上加教育，……那麼最有用的法律也不會帶來任何利益……」

亞里士多德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年齡階段的企圖，是極有價值的。亞里士多德把青年生活分爲三個時期：（一）七歲以前，（二）從七歲起到思春期，（三）從思春期到二十一歲。亞里士多德把「適應自然」的必要作了這種劃分的根據。

至於從那種教育——智力教育或體育教育——開始問題，亞里士多德是和柏拉圖意見大不相同的，亞氏認爲「體力教育應該先於智力教育」。這種分枝是亞氏哲學中的唯物論因素所促成的。

七歲以下的兒童，應受家庭教育。亞里士多德對學齡前教育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他指出兒童須以乳類爲食料，以及運動衛生的重要。他一方面指出遊戲（尤其是輕快遊戲）對兒童的重大意義，同時又警戒在遊戲過程中使兒童身體過於疲勞。故事和童話在這段年齡中具有極大的意義；對於這問題，亞里士多德像拍圖一樣，要求精選童話的材料。亞里士多德認爲兒童從五歲起參加他們將來要在學校中所研究的某些課程的學習是極有用處的。

兒童必須盡可能的避免接觸奴隸社會。一般說來建立相當的教育環境是必要的。「……一切不合於自由民尊嚴的事實，應該避免投入幼年期兒童的耳目」。

男童從七歲起應入學校。和雅典當時現實生活相違反，亞里士多德適應於他的教育觀的社會學前提



，要求學校歸國家經辦。

亞里士多德對婦女教育的思想極加反對；他引證了從動物界裡所觀察到的事實，斷定婦女在天性上和男子有根本區別，因此高深的教育對於她們並無用處。在這個問題上，亞里士多德像在別的許多問題上一樣，只把當時社會生活的實踐公式化。

關於體力教育問題，亞里士多德要求把兒童先送到體育教師手裏。亞里士多德到處運用其發展漸進性的思想，反對以體育練習使青年人的器官過度疲勞，而主張在器官未健全以前，採取柔軟運動。亞里士多德關於智德體三種教育相互關係性的論斷是極有價值的：「關心身體應該先於關心精神，關心身體之後須要關心性癖的教育，這樣可以使他們的教育服役於智力教育，而使體力教育服役於精神教育」。亞里士多德對斯巴達的體育教育制度——只求發展肌肉力量的過度的體育鍛練——極加反對，而依雅典的實踐，要求以調和發展健全美麗的體格為體育教育的目的：「在教育中，起首要作用的應該是優美，而不是野蠻」。

亞里士多德認為應學必要的東西，但又避免狹隘的實際主義。在初等教育階段上，除體育以外，應學習閱讀、書寫、文法、繪畫和音樂。學習音樂的目的，是在發展優美的感情，同時注意它像繪畫一樣不致變為一種職業。所有具有職業性的學識都是自由民認為無價值的。「在『自由』科學中，有幾種自由民所能研究的只有研究到一定限度為止；過此而研究其細目就會招來上述的害處」，就是說，招來職業研究的危險性。

亞里士多德的作品祇有一部份到我們手裏。「政治學」第八卷末尾失散了；關於教育部份的著作完全得不到手。但應當推想，在高等教育階段上，亞里士多德認為必需學習哲學（論理學和自然哲學）。關於這一點，利森學院的教育實踐也有間接的提示，因為該校對於這些學科是很注意的。

在精神教育方面，亞里士多德在自己的哲學中提出了意志的和活動的原則，並不限於蘇格拉底和柏



拉圖的用知識及自我深造方法獲取善行的觀點，而認為精神習慣和活動在這方面具有極大的意義。

天然性癖、習慣的發展、和理性——就是精神教育的三個源泉。

亞里士多德的教育體系，也像他的哲學一樣，把教育和心理學聯繫起來，建立了調和發展學說的基礎，這種教育體系是古代世界理論思想的最高峯，最高的成就。

他利用了他的導師柏拉圖的若干教育觀（把教育視為社會機能，提出智力教育的意義和學齡前教育的思想等等），把教育思想推向比柏拉圖更前進的地步（調和發展的思想，教育學與心理學的聯系、教育史上第一次的教育適應天性原則的提出、第一次的年齡階段的劃分、兒童積極性的理由的提出、關於教育環境的思想，以及將圖畫加入教科中等等）。

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教育論著中，適應於他的現實主義，比柏拉圖更憑藉於當時教育的實踐，而將這種實踐加以天才的概括，同時他也比柏拉圖更會利用雅典教育的實踐。至於從斯巴達教育中，他只利用國立學校的思想。

亞里士多德以其調和發展的思想，以教育與心理學聯系的要求，以及他的其他許多教育上的見解，給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學以極大的影響。

#### 四·希臘主義時期的教育和學校

自從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以後（起自紀元前三三四—三二三年），希臘文化就普及到廣大的領域，其中除希臘和馬其頓以外，包括小亞細亞、美索不達米亞、伊則，埃及，以及東方其他各國。東方在紀元前三世紀亞歷山大後繼人統治時代，形成了兩個國家：一個是托勒密（Ptolemy），包括埃及和地中海東南岸，其首城為亞歷山大利亞（在埃及境內），一個是賽拉夫基達（Seleukidus），包括亞歷山大在亞洲所征服的其餘領土。後來又從賽拉夫基達分出許多小國（柏格曼 Pergamum 等等）。



成爲這些國家城市高等人民的語言的，是希臘語。希臘文化迅速普及到整個東方。「希臘人」(Hellenes)這個概念成了和「文明人」同等意義的概念，以與「野蠻人」(Barbarians)區別。雅典文化和文學，希臘藝術，在此情形下就和東方發達最早的數學、天文學以及初期自然科學接合起來了。希臘文化和古代東方文化的這一結合，在歷史上通常用「希臘主義」(Hellenism)這一術語來表示，而傳播這種文化的時期(紀元前最後三個世紀和公元一世紀)則稱作希臘主義時代。

希臘主義文化的中心，是托勒密的京城——亞歷山大利亞，紀元前三三一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在尼羅河河口所建立的並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

紀元前三世紀時，在亞歷山大利亞創辦了一個古代最大的圖書館，其中藏有手寫的(寫在羊皮紙的本子上)書籍七十萬冊。在這裡也有博物院、天文台、植物園和動物園。博物院是希臘主義時代世界科學的中心。這是一個國立機關，其中從事研究工作的是許多具有各種專門知識的學者。下面我們要談到的當時科學上的一切成就或多或少地是和亞歷山大利亞博物院的活動有關的。渴求高深教育的青年從各國會流到亞歷山大利亞。亞歷山大利亞的博物院漸漸變成了特殊的大學中心。這裡開始設置語言學、修辭學、哲學、數學、醫學等的講座。這些部門中的科學研究都是依照亞里士多德的方法進行的。亞歷山大利亞的影響後來也表現在羅馬帝國高等學校的工作上。

希臘哲學及科學和東方極發達的數學及自然科學知識的影響，以及大規模的科學機關的存在，保證了亞歷山大利亞城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機械學、醫學等的發展。紀元前三世紀歐幾里得(Euclid)就是在此創造了幾何學的體系的。數理科學在亞歷山大利亞城裡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峯。在天文學方面，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ios)，以及和亞歷山大利亞博物院有密切關係的阿里斯泰克(Aristarchos)等人的著作有着極大的意義。阿基米得(Archimedes)是在這個時期工作的。在記述的植物學和動物學的發展上，得到了若干種成就，地理學的研究基礎奠定了(托勒密



的「地理學」，斯特累波 Strabo 的著作）。在雅典就開始研究的歷史學更向前推進了，語言科學得到了極大的進步。

在哲學方面，希臘主義的主要特徵是柏拉圖的影響和宗教神秘主義的學說，這種學說是企圖把希臘哲學和東方各種宗教學說調和起來的。

在文藝和詩歌方面，希臘主義力圖恢復各種希臘舊詩的形式，但在古典社會解體的條件下，這些企圖在創作上並沒有得到有力和基本的效果，反而產生了枯燥的作詩法，人工和模倣的學院主義。在新的詩歌形式中，可以記述的祇有田園詩的出現，田園詩是農村生活的詩的理想化，是反對着奴制解體時代城市生活的奢華和放蕩的一種反動現象。

我們已經知道，希臘主義在數學和其他精密科學的發展上產生了很多成果。在哲學和文藝方面雖然得到的成果並不多和比較的初步，而它還是起了極大的作用：希臘主義的中心（尤其是亞歷山大利亞）成了希臘哲學、文學和藝術的保管者。古代文化大部份是從亞歷山大利亞在阿拉伯人媒介之下流傳到中世紀的歐洲的。

希臘主義時代在保存古代希臘文化和發展精密科學的事業上雖然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但也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哲學、語言知識和藝術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在註釋上的過分形式主義和瑣碎，在哲學上的神秘主義。

在希臘主義時代，人民的階級劃分繼續加深，財富不平等繼續增長；奴隸數量日益增加；蓄奴制度的矛盾日益加深。教育漸漸地變成了上等階級人民的特權。

希臘主義時代的學校制度一般地是沿用雅典的制度，兒童最初入文法學校和絃琴學校，然後入門爭學校，最後入體育學校。

上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上的變化不能不在教育制度上留下自己的痕跡。



學校在過去是私立的，現在變成了國立或公立。許多文件證明城市行政當局開始關心市民的學校。在每個學校裏，開始設置特殊的官職——學校管理人（*Gymnastarch*）。這是一個被人認作有名譽的官職。規模龐大和組織完備的學校產生了。在這些學校中，教師的物質條件改善了。相傳有些城市裏的教師是由選舉方法產生的。學校教育的水準適應着科學的發展也日漸提高了。

隨着希臘獨立的喪失，成人學院——這一希臘文明和希臘民族團結的學校——也就漸漸衰落了。成人學校的修學時間過去原為二年（從十八歲到二十歲），至此便縮做一年，後來成人學院就根本取消了。

在希臘有一時期很發達的體育教育，至此也就失去了過去的意義了。

高等教育在希臘主義時代要比過去在雅典進步得多了。我們已經談到亞歷山大利亞的科學機關和高等學校。除了亞歷山大利亞以外，還有兩個有名的科學中心，一個是柏格曼，那裏有一所藏書二十萬冊的圖書館，另一個是安提阿（*Antioch*）。在其他城市裏，也產生了許多高等學校。作為高等學校的柏拉圖所創辦的阿加的米學院和亞里士多德所創辦的利森學園繼續在雅典存在。



## 第三章 古代羅馬的教育

### 王政時期的 羅馬教育

古代羅馬，在其發展上經過三個時期：王政時期（紀元前六世紀以前），共和時期（紀元前六世紀至一世紀），和帝政時期（從紀元前三十年起，到公元四七六年東哥特族征服羅馬為止。）王政時期的羅馬，是規模不大的國家，領土僅佔亞平寧半島的一部份，國內有小規模農業，和發展薄弱的奴隸勞動。土地由羅馬每一家庭利用奴隸勞動自行耕種。家庭中的父親，親自和兒子們及奴隸們從事農耕工作，母親則在女兒協助之下管理家務。這種古代羅馬的家長氏族制度，決定了某種家庭關係。作為經濟的細胞的家庭組織，在當時是很穩固的。兒童甚至成人，以及家庭中的一切成員，完全須聽父親的指揮，父親對他們握有生死的全權。

家長制度和統治的經濟形式——農業——決定了家庭生活樣式和宗教及教育。宗教的祭日是和農耕上的最主要的節日相符合的（播種祭、釀酒祭等等）。除了共同崇拜的神以外，每個家庭還有自己的神——祖宗的魂靈（普通稱作家神）。

在技術落後條件下的小農的鎖國經濟的狹隘的小世界，經濟上對自然界自發力量的極大依賴性，以及家長氏族制度，決定了生活的單調、嚴酷、忍受、節制、嚴守紀律、保守、迷信、以及古代羅馬人的某些偏狹性。

羅馬人在經營農業時，同時還要隨時作武裝準備，以便擊退覬覦農田和牲畜的鄰近各族的侵略。王政時期的羅馬教育，是農人——軍人的家庭教育。孩子須在家庭中受教育，從幼年起就參加經濟和農耕工作。在精神教育方面，最注重於敬神、崇拜雙親及一般長者、謙遜、愛國和勇敢。為了防禦敵人，孩子學習使用武器、騎馬、游泳、作戰。在家庭中有時也學習閱讀、書寫和計算。



## 共和時期的 羅馬教育

紀元前六世紀末葉，羅馬確立了共和政制。

羅馬人在幾世紀中，除了對鄰近各民族進行幾次勝利的戰爭以外，更把亞平甯半島的大部份領土控制到自己的政權下，到紀元前三世紀時，已把現今整個意大利控制下來了。

大量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尤其是在羅馬的集中），引起了私立的初級學校（*ludus*）的興起，這種學校的教科，仍像以前家庭教育的課程一樣，是閱讀、書寫、計算、十二銅標法。學校設在小屋或神廟的柱廊下。教育含有極原始的性質。

在羅馬共和國成立時期及其存在的最初幾世紀中，形成了古代羅馬共和國教育的典型。兒童須養成對共和國負責與效忠國家的感情，發展其剛勇和堅定其意志，養成廉潔、謙遜和節制的習慣，提高其自尊心。對兒童們講述的故事都是關於勇敢的祖先和有名的戰役及其英雄的事蹟。兒童須訪問裁判所和元老院，有時也參觀軍營。

在羅馬共和國成立後最初二世紀中，教育制度和王政時期的羅馬教育很少有區別，但從三世紀起，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以迦太基（*Carthage*）的破壞為結束的紀元前二六四——一四六年的彪尼克戰爭（*Punic War*）和紀元前一四六年整個希臘征服的結果，大量的奴隸和財富就流入羅馬。羅馬變成了蓄奴制的強國，在貴族階級和暴發戶的平民中，日漸染習了東方的奢華、東方的崇尚和賤視肉體勞動的習慣。過去精神上的單調和嚴格都消失了。適應着這些變化，家庭教育的性質和傾向也變化了。以前由父母自己教育孩子。現在（尤其是在征服希臘以後）家庭中出現了乳母和希臘保姆及希臘「教僕」（由有知識的奴隸充任）。貴族階級，避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初等學校去求學，因為普通平民的孩子也在那裏求學。他們力主在家庭中對兒童施以初等教育。



還在希臘被征服（紀元前一四六年）以前，羅馬就廣泛傳佈了希臘（雅典）文化的影響。希臘語成了貴族和商人的語言，成了一切受教育的羅馬人的語言。希臘哲學迅速傳入羅馬，希臘文學成了研究的對象。幾千個希臘教師向羅馬投奔。仿照希臘方式的完整的學校制度便應運而生了。變化了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條件，選舉者對影響羣衆和在元老院及共和國其他機關中發表言論的必要，使辯論教育成爲教育的第一位。希臘教師（文法家和雄辯家）成了羅馬最得人望的人物。

文法學校是爲貴族兒童創辦的，在那裏所學習的，有希臘語、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文法，閱讀荷馬和希臘其他文學作品，然後又讀羅馬作家——威吉爾（Vergilius）、霍拉斯（Horatius）等——的作品。雄辯術的教授，就是在此開始的。

文法學校不久顯出不敷應用。羅馬便從希臘（也正是從詭辯學派那裏）襲用了高級雄辯學校，在那裏所學習的，是雄辯術和哲學（辯證法）。在雄辯學校中，也要研究羅馬行政上起有極大作用的法律學（主要是民法），和數學、天文學及音樂。生於共和末期（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著名辯士和作家西塞羅（Cicero）在列舉上述各種對於訓練辯才所必需的科目時，要求對羅馬歷史也加以研究。

共和末期的羅馬高級教育，簡略地可稱作辯士教育，而且這個任務可作很廣的了解：辯士（演說家）不僅應該會作很好的演說，他還應該精通文學，會在演詞中的適當地方引用必要的文句；他還應該做一個學識廣博、對於當時各種科學都能知道方向派別的人物。

若干思想保守的農業貴族代表，對希臘文化和辯士學校肆意抨擊。例如卡托（Cato）紀元前三四——一四九年）就用舊的方法教育自己的孩子，並對辯士加以猛烈的攻擊。紀元前一六一年，羅馬市長旁波尼（Mark Pomponii）要求元老院通過下面一個法律：「予羅馬市長旁波尼採取共和國福利與其個人職務上責任所要求的各項預防手段的權利，使羅馬城不留一個哲學家或辯士」。

這個法令是在紀元前九十二年頒佈的。可是並不發生效果。需要辯士教育的傾向正是貴族階級中間



生長起來的。在一切選舉中，在元老院的發言和羅馬官吏對民衆的演說中，以及在法院中，都是需要雄辯技能。

農業貴族的個別代表，看到羅馬貴族中所流行的懶惰、苟安和奢華，正在威脅羅馬本身的存在。因此他們力主恢復過去的單純，反對一切希臘文明，尤其是反對辯士學校，他們很天真地認爲用這種方法，可以阻止奴隸制度所造成的羅馬社會的解體過程。

### 帝政時期

帝國。

### 的羅馬教

### 育和學校

領土廣大而住有各種被壓迫民族和種族的羅馬帝國，需要大批忠於帝政的官吏。羅馬皇帝就在高等學校（文法學校和辯士學校）面前提出了這一任務——訓練官吏的任務。初等學校在帝政時期也產生了一個新任務——教育忠實的民衆。

共和時期所存在的私立學校沒有確實保證這一任務的執行。帝政不信任私立學校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就產生了一個新任務：把學校完全改爲國立，把教師改爲帝國的官吏，和建立國家對學校的監督辦法。

羅馬歷代皇帝對學校的注意，規定教員俸給和給他們各種特權及權利，從而把學校變爲統治的工具，因此也就十分自然了。最可注意的是舊時教育學通常只提到皇帝對學校的「關心」，却沒有提到這種關心的原因。

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us，公元三三一—三六三年）建立了政府對學校的監督辦法。四二五年的皇帝勅令規定開辦學校爲政府特權，一切企圖創辦私立學校的行動都被宣佈爲犯法。

在希臘被征服以後，羅馬添了幾個圖書館。在帝政時期，又創辦了幾個新圖書館。在「和平神廟」裏的圖書館的基礎上，產生了一個大學型的高等學校（其名稱爲阿坦紐姆 Atraneum）。



在羅馬帝國最後幾世紀中，教育以及整個文化，走上了衰落的過程；雄辯術已不再負有社會使命，變成了純粹表面的「辯論技術」；演辭的修飾，文體的洗練，掩蓋了思想的貧乏和內容的單純；這一時期的教育，主要成了社會優勢的標誌，和升登官僚主義階梯的工具。教育的階級性是更加强了。

最後幾代的羅馬皇帝在把基督教教會變成自己的忠實工具後，自然就關心到學校教育的宗教性，而任用了基督教徒的教師（大多數是牧師）。這種學校的宗教性質逐漸加強，到了中世紀時已經成了統治的教育形式了。

由王政時期羅馬守衛自己土地的農人——軍人教育，轉到共和時期羅馬的貴族辯士教育，最後又轉到帝政時期羅馬的順民教育和官吏教育；由家庭教育轉到私立學校，由私立學校轉到政府官辦學校——這就是羅馬各時期中教育發展的路程。

## 昆體良的

一世紀時的著名演說家，羅馬學校修辭學校教授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 紀元後四二——一八八年），是羅馬教育理論家。他在「雄辯術原理」一部巨著中

## 教育觀

（該書共有十二卷），把由希臘傳入的教育思想作一系統的概括，補充許多自己的理論。這部著作是在一四一五年時發現的，極爲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者所重視，把它當作籍以認識古代各種教育思想的材料。

昆體良對於兒童發展的廣泛可能性，具有深刻的信心，他認爲智力活動是天然所賦予我們的。「愚鈍和無能好像一切變則一樣是比較的少有」。這種勇敢的見解在教育學上是極端重要的，我們應該強調提出這一點就是昆體良教育學的珍貴的特點。

昆體良要大家從幼年時代的初期起就注意兒童言語的發展。因此必須挑選擅長辭令的乳母和褓母。和孩子一起遊戲的伴侶也要作慎重的選擇，使同伴的拙劣語言和不良行爲不致影響到孩子。孩子到了長大的時候，就要送他進學校。昆體良對學校教育的各種優點會作特別熱烈的引證。



依照昆體良的見解，學校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在訓練演說家。良好的學校應該考慮每個學生的個人特性，指導學生從事作業，調和學生作業上的智慧努力和休息。最好的休息就是遊戲。

昆體良反對當時學校中所流行的體罰，而叫教師遵守賞罰的尺度。

教師應該處處做學生的模範，應該愛護學生（教師首先要使自己對學生發生父母般的感情），研究他們的個性（「注意智慧的差別」，辨認他們中間每個人對甚麼最有天資）。昆體良對教師所提出的另外一些指示，也是很可注意的：「教師對於須要矯正的學生，不要過分激怒，同時也不要容忍。對於學生提出的問題，要樂於作答，對於默不作聲的學生，要加以詢問。教師對於獎譽，不要過分吝嗇，同時也不要過分慷慨」。昆體良對中級高級以及初級學校的教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要求。同時希望每個高等學校的教師能分出一部份時間在初等學校裏任教，製定兒童工作的方法，和研究兒童。

他適應當時的習慣，主張先從人文主義的兒童教育入手，不教本國的拉丁文而教外來的希臘文。在文字研究上，他對於名著閱讀和解剖加以特別的重視。

我們知道，羅馬人在最早一個時期是幾乎不知道音樂教育是什麼的。昆體良在希臘教育的強有力的影響下，力主這種教育的必要，其理由是演說藝術需要這種教育；音樂可以鍛鍊演說家所必要的聲音的柔軟和曲折，演詞的旋律和運動。

語言和音樂的研究，產生了良好的發音，洗鍊的詞藻和優美的姿勢。演說家的思想的整齊調和和一貫，則從數學（尤其是幾何學）的研究中求得的。

說到教育方法，昆體良介紹了三個循序遞進的階級：模倣、理論上的訓導、和練習，而且對於後者特別重視。說到背誦和暗記，昆體良主張背誦名著中摘出的一段。他有一個珍貴的要求，就是要把教育的基礎打得穩固，而不是打得快速，因為性急和快速是會在將來得到有害的反應的。

昆體良是最初的教育理論家之一，他對教育方法會作詳細的研究。他是第一個極周詳的建立和編訂



了許多教授原則和規則的。

### 早期基督教 對古代文化 的關係

羅馬帝國是奴隸制社會經濟上、智力上和道德上整個解體的一幅畫圖。被榨取的奴隸的生活是很困苦。被生活逼得無路可走的奴隸只有揭竿而起，實行暴動。不獨立的小農無力和廉價的奴隸勞動作競爭，同時又受苛捐雜稅、羅馬官吏和高利貸者橫徵暴斂的壓榨，也都紛紛破產和拋棄了自己的土地。到處都是田園荒蕪。除了一小部份腐化墮落的貴族階級之外，羅馬帝國其餘各階層的人民都經了解體中的奴隸制度的壓迫。

這一時期所產生的新的宗教——包含希臘、埃及、猶太等各種宗教學說原素的基督教，宣傳天上和「來世」的永久幸福，勸人今生受苦，叫被壓迫的奴隸放棄對腐朽的奴隸制度實行革命鬥爭。基督教反對到處勃發的奴隸反榨取者的鬥爭，而宣傳和睦、溫和、服從、長期忍耐和禁慾主義。

基督教從其發生初期起，直到後來君士但丁大帝（Constantine 二七二—三三七年）統治時代成爲統治的宗教爲止，對於高度發展的古代文化，始終抱着否定的態度，基督教把這種文化，視爲罪惡和「邪教」的文化，而禁止信徒們加以研究和信從。

基督教尤其是對古代希臘已臻發展最高峯的體育文化抱着這樣的態度。基督教之所以反對體育教育，反對崇拜健美的體格，是因爲這教育來自「異教的雅典」，也因爲這種教育和基督教所宣傳的「斷絕肉慾」的禁慾主義相對立。

在希臘有高度成就的美學教育和藝術，起初也爲基督教視爲罪惡卑污的東西。但因爲基督教不能從人的生活中侵蝕藝術，在較後一個時期，當基督教幹部中得到了受過古典文化教育的統治階級代表的補充時，它就完全爲着宗教目的來利用藝術了（圖畫對於聖像，建築對於神廟，音樂、唱歌、演劇活動對於禮拜，都是有用的）。對於俗界的藝術，基督教則繼續表示敵對的態度。



基督教對古代教育，也是抱着敵對的態度。在教會活動者中間，有兩個派別：（一）許多東方的希臘教會的代表（克萊曼斯 Clemens of Alexandria，奧理蓋 Origenes 等等）認爲利用希臘哲學，把它當作基督教的先驅，還是很可能的；（二）羅馬大多數「教會之父」，則堅決反對和解的可能（志滔良 Tertullian 寫道：「……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呢？在阿加的米和教會之間，能夠實現怎樣的協調呢？難道異教徒能和基督教徒和解嗎？」）。第一派代表的見解，有着相當的影響；但是仇視希臘文化的第二派的見解却佔着支配的地位。這些保守成見幾世紀來對於歐洲文化命運給了極端有害的影響。

基督教教育對古代最豐富的文化遺產既抱着狂妄的態度，就降低了智力發展的水平 and 縮小了文化的視界。

基督教在君士但丁大帝時代成了統治的宗教之後，漸漸把學校奪到自己的手中，把教育限制在背誦現成的「真理」，消滅一切探求真理的努力，把整個教育變成教條和形式。

在羅馬帝國最後幾世紀和中世紀最初幾世紀歐洲所見到的文化的低落和思想及創作的混亂，大部份是由基督教所造成的，基督教本身就是奴隸制解體的成果之一。

同時要指出，隨着基督教傳入羅馬帝國版圖內的各民族（這些民族的文化原低於古代文化），文字和著作也日漸普及了，但是普及到的祇限於一小部份的人口。書籍是在教會以及後來在僧院中輾轉抄錄和保存下來的。

#### 參考資料

列多諾：教育的進化，一九〇〇年版。

G·汝拉科夫斯基：古代教育史大綱，一九四〇年版。



## 結 論

在原始公社制度解體條件下所發生的奴隸制度，曾為貴族階級造成了科學、哲學、藝術等的研究的機會。初期的科學、哲學、藝術、以及文字是紀元前幾千年前首先在古代東方各國產生的。最初的學校也是在那裏產生的。

後來（紀元前最初幾世紀）文化和學校的要素在古代希臘獲得了更進一步的發展。這裏形成了兩個教育體系：斯巴達體系和雅典體系。斯巴達教育是由國家教育機關經辦的。兒童須受軍事體育教育。雅典教育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配合智力、道德、美學、體育四種教育，進行各方面的教育。這裏也形成了一定的學制和學科的範圍，這些學科後來（紀元前二—一世紀）又被古代羅馬襲用了去，而在奴隸制解體以後又由羅馬轉到中世紀成了中世紀教育的實踐，這些學科就是文法、修辭、辯證法、算術、幾何、天文、音樂。

在四世紀時的古代希臘（雅典），大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概括了希臘教育的實踐，首先創造了教育學說——自己的教育體系。每種教育學說及其作者的政治立場和哲學立場，都為教育的社會意義、教育的方面及其相互的聯系、學校制度等等提出根據。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為當時雅典所流行的學科提出根據，規定學齡前教育的內容。他們的教育學說，給了中世紀的教育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教育以極大的影響。

一世紀時羅馬教育家昆體良對教授原理的研究，是教育思想更進一步的發展。昆體良利用了希臘各種教育學說，根據羅馬文法學校和辯士學校的經驗，在教育理論上提出許多新東西。

奴隸制的解體在古代史的最後幾世紀中（二—五世紀）使燦爛光輝的古代文化和古代的教育陷於衰



落。古代希臘的文化和教育只有在十四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才被歐洲重視和被這一時期蓬勃發展的文化教育運動所利用。

普及於歐洲的基督教對高度發展的希臘文化和希臘教育一般地抱着否定態度，把它們看作異教的文化和教育。

這種文化的要素會被阿拉伯人採用，在八世紀時並被他們移植到歐洲。







## 第二部 中世紀教育

### 第四章 文藝復興時代以前的教育

#### 一·早期中世紀（六—十一世紀）的教育

教會  
教育

羅馬的陷落（四七六年），開闢了中世紀的歷史，封建社會的歷史。封建社會的特徵，是農奴經濟，超經濟的強制，和社會階級的劃分：支配者的俗界及教會的封建領主，和被支配者的農民，後來又從農民中分出手工業者和商人。

封建社會思想上的依靠是教會；教會在自己的手裏獨佔了 個教育，把它變為訓練民衆的工具，以適應封建領主的利益。

恩格斯在說明早期中世紀的文化特徵時說道：「中世紀是從完全原始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它從地面上掃除了古代文化，掃除了古代哲學、政治學、和法律學，一切都是從頭開始。中世紀從死去的古代世界接受下來的唯一遺產，就是基督教和幾個一半毀壞了的、失去了過去一切文明的都市。這結果，便是僧侶取得了教育獨佔權，教育本身主要含有神學的性質」（註）。

在學校中，僧侶階級用「牧師薰陶」的方法，對民衆宣傳無條件的服從、忍耐、勤勉、禁慾。教會



還在早期基督教時期所提出的「絕滅肉慾」的說教，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教會宣佈，「肉體是靈魂的監獄」，因此竭力暗示：「今世」在地上愈受苦，「來世」在天上愈享福。絕食、祈禱、甚至夜間祈禱（僧侶在所謂僧院學校中，有時叫兒童一夜作幾次祈禱），其目的就在絕滅和抑制「肉慾」，從而也是剝奪人的意志，使他無力作任何反抗。

爲了這個目的，就實行了嚴格的紀律，和對兒童的頻繁的體罰。整個教育是建築在對聖書及其解釋者——教師——的盲目服從之上的。「Magister dixit」，「教師說」——成了教育的公式，它要求盲目的服從，而不准學生作任何思考和創作。教育變成了教育所許可的教科書的機械的背誦。

教會給整個教育添上宗教的性質。它提出口號：「科學是宗教的奴婢」。「全部真理已在聖書裏提出」。它對修辭學的研究，是以養成教會說教技能爲目的；而對辯證法（哲學）之研究，則以反對異教徒爲目的。

學校既完全集中於教會之手，其首要任務就是僧侶階級的訓練。僧侶階級隊伍的補充，起初是以僧侶子弟和其他階級的人物爲來源的，從天主教僧侶獨身制確立後（一〇七四年起），就只有從其他階級的人物中來求補充了。這樣，學校的目的雖然是在訓練僧侶階級，而學校所招收的學生也有其他階級的子弟。後來這些階級（尤其是手工業者和商人）開始爲自己的需要而利用了教會學校，但在十三、十四世紀時，又爲了這種教會學校不能給手工業者和商人以必需的知識，而開辦了行會學校和基爾特學校來和他對抗。

我們一方面指出教會和教會「教育」的退步作用，同時另一方面必須指出，在中世紀上半期文化普遍衰落的條件下（與古代文化繁榮的情形相比），中世紀的僧院不失爲一個傳播文化和保存書籍的根據地。恩格斯說（見全集第十六卷第一章第二九五頁），僧侶階級是當時唯一受教育的階級。在僧院中，沒有圖書館和學校。在那裏除了讀「聖書」以外，還讀羅馬古典作家（威吉利、西塞祿等）的作品。



## 教會學校

學校。

的類型

在中世紀第一期中，有三種學校：（一）僧院學校，（二）主教學校，（三）教區學校。在中世紀初期，似乎只有前兩種學校——僧院學校和主教學校。他們之出現，是因為教會需要訓練僧侶階級和出版（抄錄）各種宗教書籍。

僧院學校最初是一種專事教育從小就被父母委身於未來修道生活的兒童（*Pueri oblati*——聖童）的學校。後來這種學校分爲內外兩部，內部學校（*Schola interna*）教育這些兒童，外部學校（*Schola externa*）則教育外來的兒童。教師通常是由對書籍有相當興趣和愛好教育工作的僧侶充任的。他們只有從事學校教育之後，才在這種工作過程中得到若干教育經驗。書籍都在僧院中抄錄和保存。僧院學校對於手抄書籍的供給自然比較的良好。把這一切綜合起來，決定了教育事業的良好環境，使學科不限於閱讀、書法、神學和唱歌，而逐漸提高僧院學校的水準。有三僧院學校很早就採用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的教授，後來又採用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理論的教授。八世紀末葉的著名學者阿爾昆（*Alcuin*）把法國的土爾僧院變爲當時教育中心之一。阿爾昆寫過許多關於文法、修辭學、辯證法、算術等的教科書，用問答形式解釋這些學術。在瑞士聖高倫（*Sent Gallen*）僧院學校裏，十一世紀末葉讀過關於西塞祿、賀拉西、維維爾圖（*Dionysius*）、索福客德（*Sophocles*）等的講義。

主教學校設於教會中心，和主教管區的長官所在地，組織上和僧院學校相近。由於這些學校設於教會生活中心的結果，其教育內容在當時說來是很充實的（除閱讀、書法、計算和神學以外，還研究「三學」*Trivium*，後來少數學校更研究「四科」*Quadrivium*）。

教區學校是供少數兒童求學的，其課程有拉丁文的神學、書法和教會音樂。計算科的成績最惡劣。祇有少數教區學校教計算。學校設在牧師家裏，或教會的小屋裏。在各種學校中，要算教區學校的組織最簡陋。各種聖禮（洗禮，葬禮等等）使僧侶階級子弟不能經常顧及校課。



還在中世紀初期，五二九年時的維尚宗教會議就通過一個決議：「教區牧師應該把兒童一一學生領到自己的家裏，像慈父一樣的教育他們，教他們唱讚美歌、教他們讀禮拜和神學，以便從他們中間訓練出一批有價值的後繼人」。

可是這個決議，沒有執行得很好。七八七年查理大帝爲開辦教區學校頒佈勒令，而過了兩年——七八九年——不得不又重覆頒佈這個勒令。

### 教會學校

### 的教育內

### 容和方法

僧侶學校和主教學校的教育，像教區學校一樣，是由同樣的要素開始的：背誦（拉丁文）祈禱和一百五十首讚美歌、學習字母、閱讀聖書、書法、計算。

對於最有力的學生，在上述學科之外逐漸又加上文法、修辭和辯證法（哲學）的教授。這三種學科，統稱爲 *Trivium*（三科）。有些僧院學校和主教學校在早期中世紀末期（十一—十一世紀）更進一步除了「三科」之外又添授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理論，

即所謂「四學」（*Quadrivium*）。「三科」和「四學」合稱爲「七藝」（七種自由藝術 *Septem artes liberales*），再加上神學，構成中學教育的內容。

文法所以被重視，是因爲他教學生「正確的閱讀、寫作、和了解聖書」。修辭學是研究聖書的格式和文體，養成說教的技能。辯證法（哲學）則研究辯論的技術，對於教會反駁異教徒是必需的。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在對宗教關係上也起了服務的作用。音樂對於禮拜是必需的，算術和天文對於推算復活節的時期是必需的，幾何在教會的建築中也起有作用（註）。但因爲「四學」上的各學科對於神學沒有「三科」中的各種學科那樣具有直接的關係，所以這些學科的教授也要比文法、修辭學和辯證法的

（註）幾何具有極不確定和極無形式的性質；其中也包含從聖書中或古代作家著作中採來的大部份幻想性的地理和自然科學性的知識。



教授不注重得多。在一七種自由藝術中，起有主要作用的是文法。

教育方法是建築在機械的記憶之上的。學習閱讀是用疊字的方法。很早就教兒童讀那不認識的拉丁文，閱讀的材料——禮拜書、讚美歌——是難懂和兒童不感興趣的。書籍都是由各種筆跡寫成的手稿。這種種，就阻礙了閱讀技術的把握，通常爲了把握這種技術要化兩三年時間。整個學習過程使用背誦方法（最初要用不認識的文字背誦許多祈禱文和讚美歌），使學生受到大量的淘汰。剩下來的祇有那些有着良好記憶力的學生。

文法算術科中的各種規則，也叫學生採取強記的方法。學生所讀的文法科甚至算術科的材料都是含教條性質，大部份以宗教爲歸結的。

算術教育非常複雜。中世紀學校研究者曾引5069除以4的除法爲例，而其計算往往佔了整個的書頁。在低級學校裏，算術科大部份用神秘方法解釋數字。單數祇用於說唯一的上帝； $\infty$ 用於說耶穌的兩種天性（神性和人性）； $\infty$ 用於說三個神人； $\infty$ 用於說四個福音傳道者等等。更神秘的是對 $\infty$ 字的解釋：這個數字在基督教中含有某種秘密和神聖的意義——一星期的七天，七個天使，七個聖餐禮，七重天等等。

對於數字的研究既然抱着這種態度，算術科就主要變成了「宗教」科。

上課——全班學生在教師領導之下的集體工作——在中世紀的學校裏是沒有的。雖然學生在學校裏的習作時間是相同的，而每個學生讀的和寫的東西却不相同：一部份學生還只開始記字母，另一部份學級字，第三部份已經開始了閱讀，有的還讀完了第一本。教師是依着次序個別地教學生的。在這種教學組織下，兒童入學時期也是參差不齊的，一年四季都可以開學。校中也沒有一定的學年，修學時間的長短是以學生的能力爲定的。

在學校中，實施了嚴格而盲目的紀律。棍棒和別種體罰的工具成了每個學校中必需的用具。甚至打成殘廢都是常有的事。除了體罰以外也使用別種侮辱學生的方法（如罰跪等）。學校生活可以用「Sals



virga degere] (鞭子下的生活)一語來形容。

### 俗界封建領

### 主的教育(

### 騎士教育)

貴族階級兒童的教育，則是另一種情形。在以超經濟的強迫為特點的封建社會裏，俗界封建領主的統治是用劍來保持的。在鎗砲尚未發明，騎士穿了甲冑和敵人個別決鬥的軍事技術不發達的時代，在封建領主間經常發生衝突的時代，軍事體育教育對於俗界封建領主具有特殊的意義。

這種教育的內容，就是「七種騎士的技術」：騎馬、游泳、射術、擊劍、遊獵、將棋、作詩 (Versificare)。首五種技術，是以養成強健敏捷的軍人為目的。將棋是以發展機智、應付變化和佈置進攻及防守計劃為目的，同時也是不知勞動的封建領主消磨時間的方法。最後一種，作詩對於封建領主是向君主表示忠誠，表揚他和自己的武功的方法。

騎士教育制度最後是在十字軍遠征時代(十一世紀末期起)形成的。封建領主的子弟從七歲起被送到地位較高的貴族家庭裏，在那裏受教育。十四歲以前受近侍教育，十四歲到二十一歲受騎士侍從的教育。

近侍和騎士侍從都要領會「愛情、戰爭和宗教的基本原則」。愛情在這裏是被理解為慇懃、敏捷、悅耳的辭令，作詩的能力、豁達、和對君主及女王的忠誠等。

「騎士教育」主要是在發展外表的虛飾，操縱高於自己或與自己同等的社會的能力。至於閱讀和寫作的能力在十二世紀以前是不被認為必要的。

有許多俗界封建領主是文盲，但是說所有封建領主都是文盲却是不對的。在十三世紀末葉，阿爾昆已經為查理大帝和宮廷貴族的子弟在宮廷中開辦了宮廷學校 (Schola Palatina)。學校的課程也像教會學校一樣，是七種自由藝術。依照這種有名的宮廷學校的例子後來又產生了幾種其他學校，因為行政上的需要使高等階級的人民有略加教育的必要。這種需要大部份不是由學校來滿足的：封建領主的子弟



是在請來的僧侶那裡學習讀書的。但是受教育的只有一小部份的封建領主。

領主的子弟往往從小就被委身於僧侶生活，後來並擔任教會中的高級職務（主教等）。他們在童年時在主教學校或請來的牧師那裡受教育。封建領主的女兒往往從小就被送到女修道院裡，在那裡培養宗教的信仰心，謙遜和服從等等，學習手工、學習閱讀、書寫、音樂並學習作詩。在有女修道院裡，學生甚至學習文法和修辭，自然這是少有的現象。

男童的教育隨時都有着進化。女童的教育則幾個世紀很少有變化。這種教育的某些特點甚至到了十九世紀尤其是在天主教各民族中都還保存着；婦女修道院寄宿學校，直到現在還在某些國家裡（例如南美各國、比利時、葡萄牙等）存在着。

## 拜占庭 的文化 和學校

拜占庭（Byzantine），三九五年羅馬帝國解體後所產生的獨立國，是後來幾世紀的古代希臘文化殘餘的保存者。西方在中世紀最初幾世紀中，希臘文已完全被人遺忘。而在拜占庭帝國裡，却恰恰相反，還在讀荷馬、海西奧特、索福客麗、伊士奇（Aeschylus）、幼里披底（Euripides），以及其他詩人的原著，還保存着和研究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還在閱讀希洛多德、齊克第特（Thucydides）的歷史著作，普羅泰谷（Protagoras）的傳記。

西歐在古代與中世紀之交，在政治上的震動尤其是在未開化民族的侵略影響下，曾有幾世紀沒有高等教育。羅馬帝國的高等學校在五世紀時已不再存在；中世紀的大學是在十二世紀時才開始發生的，其中只有二三個例外（波倫亞Bologna的法律學校，塞勒爾諾Salerno的醫學院，由東方遷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學校）。拜占庭的高等學校保存到早期中世紀結束。西歐各國青年在九—十世紀時是在拜占庭受高等教育的。在這些學校裡，除了教授「三學」和「四科」以外，也教授法學。拜占庭對歷史極加注意，而且歷史學家中不僅有男子，更還有女子（例如皇帝的女兒安娜、康能Anna Komnenen曾在十二世紀時



寫了十五卷關於她父親的皇朝的歷史》。

拜占庭的許多俗界貴族階級代表都受過高等教育，這在早期中世間時期的西方是看不到的。在此一時期中拜占庭的高級僧侶中，也有不少是學者。

這種比西方更高的文化水平，這種拜占庭和古代文化的密切的繼承關係，在十字軍遠征時期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給了西歐極大的影響，因為那時——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佔領君士但丁堡以後——拜占庭學者都向西歐各國投奔。

高等學校是受皇帝控制的，皇帝通常指派宮廷中的學者担任學校的校長。拜占庭高等學校中的教授通常是由僧侶階級的學者代表充任的（君士但丁堡大學中的一院教授即由十二個僧侶組成）。

這一學校中的教授方法大部份還保存着希臘主義時代的特徵：說明的形式主義和瑣碎，哲學的神秘主義。皇帝的政權把這些學校變為訓練官吏的工具，使古代文化殘餘適應於自己的需要。例如羅馬法在六世紀初期被查士丁尼（Justinianus）用來適應於拜占庭帝國政治組織的需要（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

同時教會也利用了古代希臘的哲學。顯然這是對希臘哲學含有宗教目的曲解。在語言學和文學教授上，把古代希臘作品的優美的文體和聖書上的文字編織了起來。教會的雄辯術是在這個文體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的。

教會在僧院中開辦學校。僧院學校最初就是在拜占庭產生的；由此再傳到西方。僧院除開辦學校，以訓練僧侶階級，與從事出版事業外，並在院中附設大規模的圖書館。

底層人民的教育，是向不被注意的。閱讀、書寫、計算、唱歌、宗教等的初等教育，僅普及於極小部份的人民，而且也是在僧院學校中進行的。這種教育在對宗教道德教育的關係上，是佔了從屬的地位。在這種教育下，起領導作用的是所謂東方教會之父，尤其是四世紀時的士拉托斯特（Joann Zlatoust



的教育思想。

## 一一·煩瑣哲學 大學的產生

### 煩瑣哲學的發展

對古典文化（「異教文化」）抱有敵意的天主教教會，曾在幾世紀中毀滅了一切創作，一切獨立的思想。「一切真理已在聖書中提出」——這句口號排除了任何探索和任何懷疑。

但在奴隸制解體和封建制誕生所促成的文化長期衰落後，在十二—十三世紀的文化和教育中却也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這個變動是和煩瑣哲學的發展和大學的發生有關的。

煩瑣哲學是一種思維、研究、和教育的體系，其目的在調和理性與宗教，企圖用論理形式來解釋宗教的教條，它所利用的是亞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典哲學家的論理和哲學（註）。東方教會的「異教」的分派主義的學說和阿拉伯的哲學對於煩瑣哲學的發展曾有極大的影響。

八世紀初期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他們把含有希臘主義文化各種成就的哲學和科學帶到西南歐。著名的阿拉伯哲學家亞衛羅愛斯（Averroes，一一二六—一一九八年），給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寫了一個詳細的註釋，這個註釋在煩瑣哲學的全部統治期中（直到十六世紀開始衰落為止）始終在歐洲獲有廣大的影響。在亞衛羅愛斯的著作中，包含了許多崇拜論理思惟力量的合理主義的要素。

亞衛羅愛斯的哲學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給了歐洲煩瑣哲學極大的影響。尤其是他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理解，他的亞里士多德熱，成了十二世紀開始的中世紀的統治的趨向。他被稱作「阿拉伯的亞里士多德」。

（註）「牧師主義把亞里士多德的活的東西殺死，把死的東西流傳千古」（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三一九頁）。



阿拉伯人佔領西班牙後，開辦了許多學校。低級學校的課程是閱讀、書寫、文法、可蘭經；高級學校的課程是較高深的可蘭經、文藝、天文、數學、哲學、醫學。在十世紀時，只在考多瓦（Cordova）就有二十七個高等學校。識字（阿拉伯文）在人民中是很普遍的。除學校以外還有大量的圖書館。考多瓦圖書館藏書有四十萬冊之多。

高等學校從歐洲各國吸引了大量的聽眾。十二—十三世紀的歐洲最初的大學就是做照了他們的例子而產生的。我們知道，阿拉伯人是古代東方和古代希臘的文化繼承者。通過他們，這種文化在十一—十二世紀時期開始傳入歐洲，促成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西歐文化生活的繁榮，這個繁榮在基本上是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所引起的。

對於煩瑣哲學的發展，對於中世紀西歐各大學以及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的發展起有強大影響的，除了阿拉伯人的文化以外，還有拜占庭的文化和教育，西方人是在十字軍遠征時期（一〇九六—一二七〇年）認識這種文化和教育的。

由於手工業、商業和城市的發展而在西歐抬頭的反對封建支柱——天主教教會——的反抗行動，一方面在阿拉伯文化中，另一方面在東方各種分派主義的學說中，找到了他的思想上的支援。

在哲學中，發生了唯名論者（Nominalist）和實在論者（Realist）之間的殘酷論爭。後者以柏拉圖為憑藉，認為一般的概念（*Nomino*）、思想、是獨立於物體（*Res Realia*）而存在的。概念這東西，依照他們的解釋，是神所創造的原物，而生活現象不過是從思想中產生出來的。依照實在論者的解釋，一般的概念在有物體之前就已存在（*nomina sunt ante res*）。唯名論者則以亞里士多德為憑藉，斷定實際上所存在的只有物體，概念是這些實際存在的物體的反映，只是一種名稱（*Nomina*）。唯名論者是和感覺論接近的；在他們的學說中最初在中世紀就出現了唯物論的要素。

實在論者和唯名論者之間的論爭，拖延到幾個世紀之久，起初勝利是在實在論者方面的，後來隨着



文藝復興時代的接近，唯名論者就佔了上風。他們的學說破壞了教會的教義，教會也對唯名論者大肆壓迫。爲要避免這些迫害，唯名論者在十二世紀提出了二重真理的調和學說：某種原理從哲學觀點上看來是對的，而從宗教觀點上看來是錯的，某種原理則從宗教觀點上看來是對的，而從哲學觀點上看來是錯的。

所有這些學說的發展，就把過去毫無餘地的教會的威信破壞無餘了。教會已經不能忽視這些新的哲學思潮，不得不對它們加以顧慮。煩瑣哲學也就是覓取中間地位，以調和理性與信仰，哲學與宗教的一種工具。它的目的是用理性來支持信仰，重新加強教會的威信。

初期最著名的煩瑣哲學者，有堪答倍利（Canterbury）的大主教安塞爾姆（Anselm 1033—1109年）和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 1079—1142年）。安塞爾姆企圖調和宗教與哲學，他提出一個論據，把重心仍放在信仰之上：「我爲認識而信仰」。他和實在論者接近。阿伯拉德則更進一步。他的「我爲信仰而認識」的論據，成了理性的重點。他說：「沒有被理性照明的信仰，對於人類是無價值的」。他對實在論者和唯名論者的關係，是站在中間立場上的，他企圖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來作他的思想的根據。他提出一個論據：「作爲個人創作結晶的聖書，是可以受理性批評的」。這個論據從教會的觀點上看來是異端的，他的書籍因此曾遭受焚毀。他爲要證明這個論據，出版了「是和非」（Sic et non）一書，他在這裡將聖書中互相矛盾的論據加以對比。

此外最有名的煩瑣哲學者，要推大亞爾伯特（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年），他第一個用系統的形式，複製了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阿奎那托瑪斯（Thomas Aquinas, 1225—1274年）也是享有極大盛名的，他建立了煩瑣哲學的神學系統，用亞里士多德的論理學、倫理學和心理學來做這個系統的基础。他的著作幾乎在五百年中成爲中世紀大學和耶穌學院的神學教本。

消滅已有幾世紀之久的智力利益，中世紀上半期末的煩瑣哲學却成了它的發展的初步。在上述許多



最著名的煩瑣哲學者的著作中，發揮了形式論理學的精巧的思維方法，以及分類和釋義的方法。

阿柏拉德在「是與非」一書中所提出的問題，如「人類的信仰應否以理性為憑藉？」「上帝是否為禍害創造者？」等等，可作煩瑣哲學各種問題的實例。許多煩瑣哲學提出了物質和精神及有限和無限的相互關係問題，可是這些問題的提出方式却是煩瑣而時常極不合理的。

作為研究和教育方法的煩瑣哲學，在其發生後最初幾世紀中，曾培植了智慧的能力，促進了思考活動養成了注意和守秩序的習慣，較之早期中世紀自然是個重大的進步。

說出煩瑣哲學對於當時（十二—十三世紀）所起的這些積極作用，並不就是承認他的一般地都合於目的。過了兩世紀（十四—十五世紀）煩瑣哲學的範圍對於發展中的思想已經顯出狹小了。煩瑣哲學甚至在其繁榮時期（十二—十三世紀）除了上述積極方面的特徵之外也還有許多消極方面的特徵：不反對宗教，而企圖調和理性和宗教，枯燥的形式主義和粗野。這些特徵特別尖銳的反映在教育方面。

著名哲學家法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六二六年）在描寫十七世紀初期的煩瑣哲學的特徵時，說道：「煩瑣哲學者擁有銳利和有力的智慧，以及富裕的餘暇，却不能把自己的學說磨練得好；他們的智慧鎖在幾個作者（主要是他們的支配者亞里士多德）的狹隘的世界裏，好像他們自己鎖在僧房裏或經院裏一樣。他們幾乎不知道自然界的歷史，不知道人類的歷史，但在不斷的機智努力下，却也編織出一幅科學的蛛蜘蛛網，這就是我們在他們的著作中所見到的」。

## 中世紀大學的發生和發展

和手工業及商業的生長有密切聯系的城市的發展，城市爭取自身獨立的鬥爭，俗界以權對教皇的鬥爭，文化和智慧利益的生長（指阿拉伯人文化的影響和煩瑣哲學的發展），——這一切，成了十二—十三世紀大批中世紀大學的出現及其後來幾世紀繼續發展的條件。高等學校相繼產生，在那裏實施各種科學的教授（Universitates Literarum）。教授和學生組成了特種的組合和學團——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最初的中世紀的大學是在十二世紀產生的（在意大利的塞拉爾諾有著名的醫學院，後來改爲大學，在波倫亞有法學院，一一五八年改爲大學，在法國有巴黎大學，在英國有一一六八年成立的牛津大學）。在十三—十四世紀時，意大利產生十八個大學，法國產生十六個，西葡兩國產生十五個（包括著名的塞拉門卡大學），英國產生了一個劍橋大學（一二〇九年），十五世紀時又產生三個，德國在十四—十五世紀時創辦九個大學。

在意大利北部，最初的大學不是由教會設立的，而是由學者和熱心科學事業的城市人民創辦的。這些大學成了一個自治組織，對地方長官和教會保持相當的獨立。

領導大學的校長是由教授或學生推舉的。一部份學生住在大學寄宿舍裏。大學中的全體人員享有大學特種法庭的權利。屬於同一民族的學生組成。特種的團體——「民族會」（其後直到二十世紀所產生的反響就是學生「同鄉會」）。學生和教授在對破壞大學自治的教會或城市當局發生衝突時，都是離開了城市遷到另一個中心的。

由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的變化所促成的自治性的大學的發展，威脅了天主教教會對學校事業的獨佔。因此教會除了企圖控制自治性的大學之外，同時還起了教會大學組織者的作用。它想用這個方法重新操縱脫離它的影響而獨立的科學，想加強自己的地位和訓練它所必需的僧侶階級幹部，教會法庭的法官（宗教裁判是當時很普及的）和醫院救濟院的醫生。

巴黎大學是在十二世紀末葉由教會創辦的，後來模倣它而產生的有法國、德國、東歐和一部份英國的大學。領導巴黎大學的是一個主教的代表——掌璽官。大學的自治權是極受限制的；大學職員的選舉權只有博士和碩士才能享受（而不是學生能享受），教授不是選舉的，而是由教會委任，受教會俸給，那時意大利北部第一批大學的教授俸給已由學生自己來負擔了。

中世紀大學分爲四科。每科設分科長爲領導人。教授「七藝」（*Septem artes liberales*）的藝術科



是預備的普通教育科，先於其餘各科。學生學了文法、修辭和辯証法的基礎（三科）之後得到了藝術得業士的學位；再學了哲學全程和「四學」（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理論）之後得到了藝術學士的學位，然後才能進任何一個專科：神學科、醫科、和法科。除意大利北部各大學以外，神學科在大學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

修學時期並沒有規定；學生年齡也沒有規定。藝術科的修學時期普通為五年至七年，其他各科也是一樣。

教授方法是讀講義和辯論。講義原文須受教會的認可，講師讀時加上許多煩瑣哲學的註解，有時這種註解瑣碎和沉長，使原文反而退到次要的地位。修畢一個專科之後，學生才能得到醫學、神學、或法學得業士的學位。後來他們更能得到博士學位。

中世紀大學對於當時起有很大的文化作用。它們適應實際生活的需要，享有鉅大的威信（有時甚至俗界政權和教皇間的許多糾紛都要交給大學去解決）。教授和學生由一個國家的大學轉到另一國家的大學，促進了國際間的接觸和過去封建孤立狀態的結束。因中世紀歐洲經濟和政治生活的發展結果而出現的大學同時也促進了城市的發展和在某種程度上準備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運動。

### 城市學校（工

### 場學校和基爾

### 特學校）

十二—十三世紀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成了城市的生長。富裕的商人和手工業者用租借或鬥爭的方法對封建領主取得了獨立。城市變成了自治的單位。

隨着手工業生產和商業的發展。隨着城市的生長，主要爲了訓練僧侶階級而設立的過去的教會學校已經不能滿足城市人民的識字和基本知識上的需要了。在城市中，除了原有的教會學校（教區學校、僧院學校和主教學校）以外因此又產生了手

工業者公會設立的工場學校和商人公會設立的基爾特學校。

後來過了一些時候，這兩種學校合流爲城市學校。



在這些學校中，除閱讀以外，對於書寫和計算要比教會學校注意得多，因為這些學識在商務關係上是必需的。在有些大城市裡，這些學校還教授文法、修辭和幾何。有些學校裡教拉丁文，有些學校裡則教本國文（後來更甚），而拉丁文就變成一種特殊的學科（拉丁文在當時不僅是天主教做禮拜的用語，而且也是科學上的文字和大部份國際關係及大規模商務契約上的文字）。除了上述各科以外，自然也教授宗教。

工場學校和基爾特學校都是納費的。同業公會和市政當局負擔學校建築和學校經濟關係上的一切支出，而主要部份的教師俸給是由學生家長負擔的。教師和校長的委任權是屬於手工業者公會、商人公會或市政當局的（要看學校是甚麼學校——工場學校、基爾特學校或城市學校）。

工場學校和基爾特學校的產生，是破壞教會獨佔學校事業的進步現象。因此教會對這種新式學校發動殘酷的鬥爭。這類新式學校出現之後手工業者公會、商人公會、市政當局和另一方面僧侶階級之間就發生了尖銳的衝突（在利比克 *Ljubeck*，布律斯勞 *Brzeslau* 等城市裡）。有時釀成教徒襲擊工場學校和基爾特學校、毆辱學生、破壞校產等舉動。

可是教會不能用這些方法停止新式學校的發展。城市學校繼續發展着；到十五世紀時，西歐所有大城市裡都有了城市學校，有些較大的城市裡甚至有幾個。

除了工場學校、基爾特學校和城市學校以外，在有些城市裡還出現了私立學校，兒童在那裡學習本國文的閱讀和書寫。

這樣，到中世紀上半期結束時，學校發展的特徵，便是反對教會在學校事業上的獨佔鬥爭，學校和生活的某些接近，和高級學校——大學的出現。封建的解體，引起了學校教育的變化，同時也有這些變化加速了解體的速度。



## 參攷資料

- N·B·斯件良斯基：西歐國民學校史綱，一八九六年版。
- F·包爾遜：德國教育發展史綱，一九〇八年版。
- I·U·克拉契科夫斯基：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一九三九年版。
- 蘇聯大百科全書及勃洛克好斯與埃夫倫合編之百科辭典中之「大學」條。



## 第五章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

### 一、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 人文主義的教育學（一般特徵）

十四—十六世紀工商業的發展，速度漸漸的加快。在經濟關係上最發展的意大利北部（威尼西亞、佛羅倫薩、熱那亞、派杜亞），十五世紀時已經發展了工場手工業。「……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的萌芽在十四—十五世紀時已經散見於地中海沿岸的個別城市裡」（註一）。

這種生產的發展和封建主義解體的開始引起了科學、文學及藝術的勃興。恩格斯在描寫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特徵時說道：「如果在中世紀的黑夜之後突然以一種意外力量恢復了科學，並以奇蹟的速度開始向前發展，那末這種奇蹟我們還應歸功於生產」（註二）。恩格斯在說到十四—十六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時，會對這個時代加以很高的評價，「這個時代創造了歐洲的君主政治，打破了教皇的精神專制，恢復了古代希臘及其他高度發展的藝術，使它重現於新時代……這是地球上從來所發生的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革命」（註三）。

初生的資產階級在其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和中世紀禁慾主義及信仰「來世」的志向相反，他提於出了康、積極、活潑的人性的崇拜。這是特殊的世界觀，其名稱為人文主義（Humanismus，導源

（註一）馬恩文集第十七卷第七八四頁。

（註二）全書第十四卷第四三九頁。

（註三）全書第十四卷第四一六頁。



拉丁文Humanus一字)。

中世紀教會宣傳「肉體爲靈魂的監獄」，而要求「斷絕肉慾」。文藝復興時代則恰恰相反，提出了「把生命所能給的東西都拿出來」的口號。充滿生命愉快，渴望活動，以及廣闊的視界，是和前世紀的黑暗的禁慾主義，宗教直觀及沈默，處於對立地位的。自然，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學，對於體育教育也很注意，而這種教育在中世紀學校裡是完全被忽視的。

封建的天主教會對藝術抱了仇視態度，認他爲異教希臘的產品。可是教會不能把藝術完全消滅，只能把他適應於自己的需要。

在十四—十六世紀時，「意大利藝術達到了空前繁榮的高峯，他表現了古典文明的反射，他在後來任何時期都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註)。

當時出現了大批偉大的作家，藝術家和彫刻家：詩人有彼得拉加 (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年)，薄伽邱 (Giovanni Boccaccio 1313—1375年)，阿立俄斯托 (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年)，太梭 (Torquato Tasso 1544—1595年)；藝術家有文四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年)，米蓋蘭安吉羅 (Michael Angelo 1475—1564年)，拉斐爾 (Raphael Sanzio 1483—1520年)，第契阿納 (Vecelio Tiziano 1489—1576年)，科烈久 (Correggio 1494—1534年)，維洛尼西 (Veronese 1528—1588年)，丁托萊多 (Tintoretto 1519—1594年)等等。藝術是在新的世界觀的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了。

文藝復興時代的這種文化特徵，在這一時代的教育學中也找到了明顯的反映：一切的主要的教育家都提出了藝術教育的要求。

(註) 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七五頁。



十四—十六世紀的人文主義者，熱中於古代希臘文化，熱中於希臘人的體育和美學外貌，文學和希臘語言，希臘哲學，提出了各方面調和發展的完人的理想。古代作家的手稿開始被搜集起來了。印刷術的發明使古典作家的作品廣泛傳播到西歐，爲了要引起狂熱的崇拜，久被遺忘和隱沒了的大理石彫像又被搜尋出來了。

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佔領君士但丁堡以後，拜占庭的學者和教師就大批遷居到西歐，他們在那裏受到了狂熱的歡迎。在中世紀上半期不很流行和幾乎被人遺忘了的希臘語到十四—十六世紀時又在上層階級的人民中廣泛流行起來了。

在西歐各國，產生了新的、純粹世俗的文學。

「……爲阿拉伯人所帶來的包含了新發現的希臘哲學的內容的愉快的自由思想開始漸漸地在羅曼民族中生根了——這種自由思想會準備了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註）。

在科學上，發生了真正的革命變革。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懷卜勒（Johannes Kepler）、帕拉賽爾斯（Paracelsus）、塞爾威德（Serveto）和哈衛（William Harvey）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學的基礎。科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了。依照恩格斯的描寫，這是科學對宗教的一次起義。

在十四—十六世紀期間，完成了許多偉大的科學發明和發現：羅盤針（一三〇二年）、印刷術（一四三六年古登堡 Johannes Gutenberg 發明）、手錶（一五〇〇年）、紡車（一五三〇年）、太陽中心的地動說（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發現）、物體下墮的規律（一五九〇年伽利略發現）、顯微鏡（一五九〇年）、望遠鏡（大約一六〇〇年）。



和工場手工業及商業的發展有密切依附關係的水道的探尋，引起了一四九二年美洲的發現和一四九八年（過了六年）繞道非洲通印度的航路的發現。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裏所描寫的瘋狂追逐新發現各國的財富的事實，就此開始了。

這些航路擴大了向來被教會所束縛的人類的眼界。它給人類帶來許多知識同時也向人類要求了知識。許多發現和發明，天文學和數學的發展，都是和航海及工場手工業的發展有關係的。

恩格斯在描寫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繁榮和人類的多面性及積極性的特徵時說道：「這是人類直到現在為止所進行的一次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缺乏巨人也是產生具有各種思想、熱情和性格、具有多面性和博學性的巨人的一個時代。……當時幾乎沒有一個大人物，不會作長距離的旅行，不會說四五種語言，不會在幾個創作領域裡表現燦爛的成績！」（註）。

文藝復興時代的這一切特徵，也確定了人文主義教育思想的性質。

發展中的生產和商業的需要，以及他們所引起的科學的繁榮，喚起了對知識的興趣。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學，因此就提出了發展兒童積極性和自動性的要求，對於智慧發展加以極大的重視。在十四—十六世紀的許多人文主義教育家那裡，我們看到往往多面性的廣泛的教育計劃。前幾個世紀只有「七藝」，而且其中「四科」並不引起很大的注意。在文藝復興時代，教育內容就被許多新的科學知識的要素——自然科學、物理學、地理學、歷史學——所擴充了。同時提出了一個要求，使學習對兒童發生引誘力，注意他們的興趣。

文藝復興時代以及其後幾世紀的科學的發展和新學科的出現，可從下表得到明白的說明：

（註）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七六頁。



音 樂	天 文	幾 何	算 術	辯 證 法	修 辭	文 法	十四世紀以前											
音 樂	機 械 學	天 文	地 理	幾 何	算 術	辯 證 法	修 辭	歷 史	文 學	文 法	文藝復興時代 (十四世紀)							
音 樂	化 學	物 理	機 械 學	天 文	動 物 學	植 物 學	地 理	幾 何	三 角	代 數	算 術	倫 理 學	論 理 學	修 辭	歷 史	文 學	文 法	十七—十八世紀



人文主義教育學的特徵，就是把兒童當作一個發展的人來加以注意。發展個性成了教育的任務。一切最大的人文主義教育家，都要求對心理特性及兒童興趣加以注意，要求實施興趣教育。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學，反對中世紀學校的嚴格的紀律，對肉體懲罰抱着否定的態度。它宣佈溫和的紀律和愛護兒童的態度是必要的。

在文藝復興時代，教會的影響一落千丈。我們記得恩格斯說的這一時期教皇精神獨裁已被破壞的話。這個反對禁慾主義的全部鬥爭，這個崇拜古典文化的全部努力，就是一種反對教會鬥爭的方式。

當時的文學充滿了這種反對天主教教會的抗議，有時是用巧妙的反語或譏諷的形式來揭發，像薄伽邱的「十日談」(Decamerone)，這部作品對僧侶的淫蕩和牧師的偽善加以痛烈的鞭打。

在教育學中，這種教會影響的衰落，表現在國立學校的發展上，對古代希臘和羅馬作家的研究上，以及教育性質的改變上。古典文學和自然的研究，被提到了第一位，以代替過去作為整個學校工作中心的宗教的研究。宗教當然沒有從學校中完全絕跡。甚至最有名的人文主義教育家還把學校中的重要地位分與宗教，但這已經不是我們在中世紀上半期所看到的宗教在教育中的絕對統治地位了。大部份學校還在教會手裡，而教會對學校的獨佔權却已被打破了。

## 二、人文主義教育學的最主要代表者

以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的名字出名的文化運動，在意大利北部各國要比在其他各國發展得更早。在意大利人文主義教育家，最著名的是韋多利諾 (Vittorino da Feltre, 一三七八一—一四四六年)。韋多利諾在巴多瓦大學畢業後，曾擔任一個時期的哲學教授。一四二四年他應了孟多瓦公爵榮柴干的邀請，擔任公爵子弟的家庭教師。韋多利諾把自己所辦的學校，稱作「歡喜之家」(Casa Gioiosa)，他被人譽為「一切人道的父親」(Pater omnis humanitatis) 和「第一個新型學校的教師」。



學校的校舍就是一個郊外的別墅，位於湖濱，在森林和田野之間。這樣韋多利諾第一個實現了後來許多教育家所提出的天然學校的理想。別墅中的奢華的傢具都被搬走，許多傭僕都被解僱，韋多利諾是想以此養成樸素的生活，來和當時貴族階級的過度奢華淫蕩相對立。課室牆壁飾以兒童遊戲的壁畫。房間高大寬敞，充滿陽光和空氣。韋多利諾認為美麗誘人的學校環境可以幫助學習的進行。

學校中受教育的學生是八十個貴族的子弟。學校的聲譽普及到意大利國界之外；全意大利最有名的貴族都想把子弟送到這裡來。韋多利諾本人是一個大公無私的人，死的時候赤貧如洗，甚至由國家代為埋葬，他對貴族和非貴族一視同仁，凡有天才的兒童即使出身於貧苦家庭也都免費加以接受；然而韋多利諾的學校終究是貴族學校，它是為統治階層而設的。

在韋多利諾的學校中，對於學生的體育發展是很注意的；遊戲、騎乘、作戰、擊劍、射擊、游泳等的實習都是以此為目的。

韋多利諾也像其他人文主義教育家一樣，把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而極重視人格的示範。韋多利諾想發現每個學生的個性，而依據這些個性去接近兒童。

作為人文主義者的韋多利諾，把古典語言和古典文學作成教育的中心，而要求（和中世紀的背誦相反）學生自覺的研究和自動的創作。在學校中，羅馬作家——惠吉爾、西塞祿和希臘作家——荷馬、狄摩西尼（Demosthenes）——的作品曾受精心的研究。語法和一般的雄辯術是很被重視的。韋多利諾是一個傑出的數學家。在他的學校中也研究代數、天文、甚至自然科學的各種要素。韋多利諾實施新的教育方法；他教學生識字是採用活動字母的方法；最初對兒童灌輸算術知識是用遊戲方法進行的；兒童學習幾何是和製圖、測量面積和體積的工作同時進行的。

學校中的體罰是被廢止了。實行了學生自治。可是除了許多新教育的特徵之外韋多利諾的宗教影響還是很強的。



這樣，韋多利諾在他的學校實踐活動中，實現了人文主義教育學的許多最主要的特徵：創造了愉快的學習環境，良好的體育教育環境，依個性接近兒童，自動原則，以及增加學科，實施新教育方法，提倡古典語文和文學。

法國人文主義的發展，略遲於意大利人文主義（始於十五世紀末葉），且有許多和後者不同的特點，因為法意兩國的經濟、政治及歷史文化條件是不同的。尤其是古典文化的影響，在這裡比較的薄弱。在法國人文主義教育學中，除了上述人文主義教育學的許多特徵尤其是對古典文化的崇拜以外，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表現得更為強烈，法國人文主義者不只提出純粹人文教育的要求，更提出了文字和事物並重研究的要求，而接近於現實教育的思想。許多人文主義者要求建立數學及自然科學教育的良好環境；在大學中，除了「七藝」教育之外，他們更要求研究許多新興科學：植物學、解剖學、物理學等等。十六世紀法國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表現在教育上要求學生認識各種工業生產，雖然當時只用參觀的方法。

法國人文主義教育學在十六世紀作家刺柏雷和蒙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明顯的表現。

刺柏雷（François Rebelais，一四八三—一五五三年）曾受僧院教育，做過牧師，後來又在著名的蒙皮利醫學院中研究醫學，做了醫師和解剖學教授。刺柏雷是法國最大的人文主義者之一。他在他的著名的小說「加根透和攀推軋羅耳」（Gargantua et Pantagruel）中，給了封建制以辛辣的諷刺，而提出了新的不受封建壓迫約束的人類的崇拜。

時代的矛盾——封建制度的解體，工場手工業的生長，尖銳的政治鬥爭，宗教戰爭等等——強烈地表現在刺柏雷本身的矛盾中。他是牧師，却在他的整個意識生活中反對教會。他是醫師，却嘲笑了當時的醫學水準。他由僧侶變為僧侶的死敵；他做過牧師，後來做醫生，最後又做牧師。他是教育百科全書的編者、神學者、醫學者、法律學者和自然科學者；作為作家，在他的書裡沸騰着健康生活的熱情的渴



望，無拘束的愉快和改善社會生活的希望；作爲作家，他極滿意他所描寫的大醉大飽的糜爛生活和高深思想及世界教育學的優美的篇頁熔於一爐的畫面——這就是永遠動蕩着的充滿了熱情和矛盾的刺柏雷。

刺柏雷在他的幻想小說中，講一個國王爲了他的兒子加根透的教育，請來了許多煩瑣哲學者和牧師。這些煩瑣哲學者當中最好的一個奧羅芬（Olofen），只教他的學生認字母要化去五年多時間。後來加根透又讀了幾十年的煩瑣哲學的文法讀本和修辭學讀本，據說成績優異，「考試時不但能够從頭背誦到底，而且能够倒轉來背誦」。刺柏雷用這種辛辣的形式，嘲弄了煩瑣哲學者教育方法的愚笨，同時也用極辛辣的筆調描寫了那個學生的生活方式：加根透醒來很遲，在床上躺了很久；起身之後，塞滿一頓早飯，就跑到教堂裡去，然後做半點鐘功課，做完功課，又吃午飯，吃到大飽爲止；吃完午飯，玩紙牌、喝酒、睡一個半鐘頭午覺；醒來之後，又喝酒，最後吃晚飯。這種生活方式和「有益」的學習的結果，加根透就變成了一個「完全愚鈍的沉思瞑想的怪人了」。

那時加根透的父親逐走了那班煩瑣哲學者的教師，另請一個新式教師坡諾克拉特（Ponocrat）。在這新教育的實例上，刺柏雷展開了一幅現實教育的廣泛的圖景。

加根透的日常生活及其整個教育根本改變了。他很早起身，做體育練習，化許多時間作知識上的進修，並和他的教師共同散步。他還有不少時間作有益的遊戲。

加根透的體育教育，有賽跑、戰鬥、跳高、游泳、擲槍、射擊、體操、騎馬等的練習。

加根透研究許多科學，勤讀各種書籍，並和教師談話，利用教師的參考書，同時對自然界作實地的觀察。教師和學生一同觀察慧星，考察它們的地位。在作野外散步時，從事植物研究。在通過「牧場和其他草地時，他們就觀察樹木和水草，拿它們和古書上所寫的作一比較，並採集一大束帶回家去」。他們也訪問藥舖，觀察植物的果實、種子、根莖、葉子。幾何學是利用各種圖形的建造方法來研究的。加根透和教師一同參觀金屬熔鑄，訪問各種工場（紡織工場、製革工場、鑄鐵工場、玻璃工場等等），印



圖，和「參觀並研究工業及手工業的發明」。

可是，刺柏雷雖然繪出一幅記述教育學（Descriptive Pedagogy）的精緻的圖畫，却沒有正式確定作為教授原則的教育記述性，沒有給這種原則建立一種根據。刺柏雷所描繪的圖畫，還不是後來誇美紐斯所提出的成熟的記述教育論，而不過為時代所要求的第一次記述教育論的理想，第一次對記述教育論的接近。

談話在教育中佔了很大的位置。甚至在進餐時，坡諾克拉特和他的學生都要談論食桌上的一切：麵包、酒、水、鹽、肉、魚、水菓、蔬菜、根莖。困難的功課的複習，沒有變成機械的強記，而是帶着創造性質的：為要使加根透更容易通曉書本的精義，就從實際生活中舉例子。刺柏雷是實踐教育的熱烈擁護者。在加根透寫給他的兒子攀推軌羅爾的信中，刺柏雷用加根透的名義，發表下面的希望：「至於說到自然界現象的認識，我願你對它們懷抱着一種好奇心，使無論海洋、河流、水源、魚類、你沒有一樣不認識；天空中的一切鳥類，陸地上的一切樹木、森林、水草，地底下的一切金屬，南方和東方的一切寶物，你沒有一樣不研究；你沒有一樣不知道」。但是刺柏雷也不拋棄古代語言的研究：在這封信裡，也說到希臘語、拉丁語、猶太語、甚至阿拉伯語的研究（和阿拉伯人的商業關係及過去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和法國傳播的影響）。同時還表現這樣一個希望：「你應該把一切歷史大事保存在你的記憶裡」。拉柏雷很注意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加根透和教師的共同研究工作像國王消磨時間一樣愉快、輕鬆、和有引誘力，而不像教導學生」。

加根透的美學教育，就是學習音樂和唱歌（他學習彈奏幾種樂器）。

在這部小說中，也提出了道德教育的基礎。加根透在給他的兒子攀推軌羅爾的信中說道：「智識如果沒有良心，那便是靈魂的死亡」。刺柏雷認為道德教育的基礎，就是宗教和勞動生活。可是他所了解的宗教，是和天主教教會所宣傳的不同的，因為他自己就從宗教戰爭時期的宗教狂信急燥中，受過了不



少痛苦。他辛辣地嘲弄僧侶，譴責僧侶的偽善。在加根透爲反對天主教修道院而创建的帶列姆修道院中，只接受善良、正直、愉快、和藹、仁慈的人，而不接受偽善者、狂信者、欺詐者、人民壓迫者。和普通修道院的生活不同，這個修道院的成員，男人和女人，都是過着愉快的生活，享受自然界、音樂、文藝等的樂趣。這個修道院的規則祇有一條：「聽隨你的便利」。

和教會的人類天性有罪說不同，刺伯雷認爲人類是有天生愛自由的善良的性癖和傾向。

這樣，我們從刺伯雷的教育見解中，看出了教育方面人文主義進步要求的一切表現：優良的體育教育環境，溫和的紀律，誘導性的教育，學生學習興趣的注意，廣泛的智力教育，新教育方法（記述、談話、遊覽），美學教育等等。

蒙且（Michel de Montaigne, 1533—1592）是傑出的人文主義作家，他在他的「經驗集」（Les Essais）裡，發表了他對許多問題的見解，其中也有對教育問題的見解。

和刺伯雷不同，蒙且不用鞭撻、反對、和嘲弄的方法。他是冷靜而毫不動人的，用懷疑的微笑和你們談話。他是個傑出的美文家，時常使用聰明的比喻，和美麗的教育警句：

「學院是被捕獲的青年的牢籠」。

「腐儒把自己的知識像石膏一樣塗在一個健康人的理智上」。

「腐儒把知識從書本中偷出，只放在嘴唇上，讓它隨風吹送」。

蒙且反對經院學派的機械的死記，認爲「背誦的知識不是真正的知識」。像這樣用讀教義的方法得來的智識，他稱之爲「浮在腦子表面的智識」。

人文主義的代表者蒙且，反映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實踐，對古典希臘的教育理想和方法作了高度的評價。在這種教育中，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多面性：「不要叫孩子把大部份時間和大部份精力耗用在體育練習上，有時也要注意智慧的發展，反過來，也不要只注意智慧的發展而忽視了體育的鍛鍊」。蒙且認



爲不能單獨培養身體，也不能單獨培養靈魂，而是培養整個的人。

體育教育的目標，是在養成學生的忍耐力和鍛鍊忍耐力，因此也是發展他的「靈魂的偉大和精神的堅強」。學生應該發展體力，養成使用武器習慣。

在一切教育中，必須放在第一位的是道德教育，這種教育不是由各種道德格言所創造，而是由以身作則和身體力行的方法創立起來的。

蒙且批評當時經院學派的教育，反對盲目崇拜權威。「普通說：『亞里士多德或柏拉圖這樣說』，但我們說，我們自己的意見怎樣呢？重覆別人的話等於一隻鸚鵡……這種乞食的生活是我不能忍受的。固然，可以用別人的智慧來增益自己，但是賢明只有用自己的教智去創造」。我希望教師不要利用單純的權威而毫無根據地把東西硬塞到他（學生）的頭腦裏——蒙且着重的說。

這樣，蒙且給學生的自動性——這一文藝復興時代所提出的教育原則——添加了極大的意義。蒙且說：教師不應把現成的知識塞到學生的腦中，他只能推動他、幫助他、強迫他去自動地工作。蒙且要求積極的和自覺的吸收知識，把它變爲實際的價值。和這直接有聯系的，蒙且提出了下面一個建議：

「教師要強迫學生用一百種不同的形式去解釋他們所學得的知識，並應用於同樣多的不同的場合，以觀察他們對這些智識的了解和吸收是否最優越……」

蒙且是在時代要求的影響下，提出了學生自動性和積極性的要求的初期思想家之一。可是蒙且還沒有爲這種要求，提出理論根據。這個根據和對這種原則的較深入的了解，是爲後來教育的發展（夸美紐斯、盧梭、斐斯塔羅齊、迪德維希 *Diesterweg*）所提出的。

爲十四—十六世紀人文主義教育家所提出的溫和的紀律和誘導性的教育原則，完全爲蒙且所支持。像後來洛克一樣，蒙且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他想培養俗界人物，反對智力方面的強度訓練，但同時也要求多方面的教育：閱讀、書法、算術、幾何、物理、歷史、論理、修辭、拉丁文、希臘文、本國文



、以及「與我們有往來的鄰近各民族」的語文。

關於女子教育問題，蒙且認為教育只能損害「女子的天然美」。出身於良好家庭的女子，「應該滿足於她自己的財富的享用，不要在別人的美點下，掩蓋了自己的美。要讓她們在受人敬愛的空氣裡生活」。『如果女子有時在某些地方不及我們，由於好奇心的緣故需要略窺書本的話，那末詩歌對於她們是很適當的消遣』。

蒙且雖然很明白的批評了經院學派，教條式的教育，腐儒的和淺薄的，已死的「博學」，他雖然提出了許多文藝復興時代所特有的新教育原則（溫和的紀律、優良的體育教育環境、學生自動性等等），但在他的教育觀中，還有很多貴族的見解。

**韋佛** 西班牙人文主義者韋佛士（Juan Luis Vives，一四九二—一五四〇年），在人文主義

**士** 教育家中佔了顯著的地位，他對夸美紐斯的教育觀給了極大的影響。韋佛士在巴黎大學畢業後，曾在英國居留多年，担任英王公主的家庭教師。這個職業成了韋佛士撰成教育史上第一篇以婦女教育為主題的論文的原因。

韋佛士晚年住於柏林，從事文學及哲學的研究。除了上述教育論文以外，他還寫了許多別的論文（「教育方法論」，「語言研究論」等等）。

像夸美紐斯的教育學一樣，韋佛士也把宗教的努力和現實的切身任務配合起來。

韋佛士反對經院學派的教育方法。他提出一個原理，即「教育的主體為事物，而不是文字」，這個原理在教育思想更進一步的發展下，成了夸美紐斯教授法中的主要原理。依照這個原理，學生須養成觀察自然界及周圍生活現象並加以思考的能力。

韋佛士明瞭歸納在認識中的作用。他就哲學觀點言在某種程度上是和前人倍根相同的。

韋佛士適應上述的要求，給自然科學添加了極大的意義。他也給數學，古代語言（拉丁文和希臘文



及古典文學作了極高的評價，認為應把歷史列入學科中。韋佛士用各種實際的科學，擴大了學校教育的內容。

韋佛士哲學及教育學著作中的最珍貴的東西，是他的兒童心理分析的思想，和他的心理學的理解——第一次對經驗心理學的接近。

韋佛士對學校地址選擇問題及學校衛生問題，提出了許多意見，這些意見後來也被夸美紐斯所發揮。

韋佛士極注意教師問題。教師應該是學生道德、紀律、勤勉的活的模範。對學生的態度要親愛、和藹、而不宜責罵，只有在非常情形下使用懲罰，教師要認真預備功課，造成自己的必要的威信。

德國人文主義發展的廣度，沒有意大利北部和法國那樣廣大。這是因為德國經濟一般的比意大利北部落後，德國缺乏古典文明的傳統，以及另外一些理由。

在北方（德國、荷蘭）人文主義代表中，最著名的是耶拉斯默（Erasmus Von Rotterdam, 一四六七—一五三六年），他是優秀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專家，寫過許多語言研究問題的著作。

在有名的小冊子「愚昧讀」裡，耶拉斯默幽默地嘲弄了天主教教會。同時他在這裡對經院學派的學校，它的皮鞭的紀律和粗野的教師作了殘酷的批評。他的對話錄「西塞祿學派」在教育史上具有極大的意義。他用辛辣的諷刺諷刺了諾索波奴斯（Nozopolis），因為諾氏在研究拉丁文時，由於害怕損害文字，只利用西塞祿的著作，而拒用一切其他作家的著作。諾索波奴斯花了七年時間，從事西塞祿的研究，直至背誦他的文集。他又花七年時間，模倣西塞祿的行爲。

耶拉斯默和這種形式主義相反，他認為研究文字（拉丁文和希臘文），起初固然從文法開始，但不能長久停在文法上，必須進而閱讀優秀作家的作品，和實際應用語言。在這情形之下，閱讀的材料必



需求其有興味和能實用。

耶拉斯默一方面熱中於古典文字的精神和風格，反對天主教教會，但同時又不能和教會的世界觀絕緣。他認為每個人必需讀聖經；因此每個人應當識字。

據我們看來，耶拉斯默的教育學說（象德國其他人文主義者一樣）比意大利和法國人文主義者的教育學說貧乏得多。在他的學說中佔了最重大的位置的，是古代語言和古典作家的研究性質問題。他對宗教教育所發表的言論比前述一切人文主義者更為明顯，我們在他那裡看不到記述教育及教育與生活聯系等的要求。德國人文主義者教育學說的這種貧乏性，是決定於德國在這一時期的比較落後性。

### 三、德國宗教改革時期的教育學

#### 路德在國民教育方面的要求

十六世紀初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對封建制的反抗，表現在德國宗教改革的形式中，因為封建制的思想支柱是天主教教會。一五一七年，前天主教牧師路德（Martin Luther），一四八三—一五四九年）作了九十五條檄文揭於威興堡寺門，控告天主教教會貪錢。一方面受貴族壓迫，另一方面受天主教教會榨取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加入了運動。支持這個運動的還有一些不滿於天主教教會橫征暴斂的小貴族的德國公爵（註）。德國許多公國脫離了天主教教會。

在恩格斯的「德國農民戰爭」一書裡會有卓越的描寫。

但是宗教改革一經成功，反對天主教教會的群眾運動就被德國公爵和貴族利用去了。對於這些公爵和貴族，廢除天主教教會自然是有利的，因為教會搜括了納稅階級的大部份地租；德國公爵和貴族階級

（註）宗教改革初期所有反對天主教教會份子的這一個團結。



希望藉廢除教會來增加自己的收入。據梅林格 (Ernst Meisinger) 在「中世紀末葉後的德國史」一書裡所載：「從一五二三年到一五二五年，路德一貫的出賣所有革命份子」。具有革命情緒的手工業者和農民，在閔載爾 (Thomas Munzer, 一四九〇—一五二五年) 領導之下發動起義 (一五二五年的農民戰爭)，但起義是在路德協助之下被壓平的。

宗教改革是被德國公爵和貴族階級所利用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宗教運動。宗教改革的溫和、不澈底和狹隘性，就是由此產生的。這一切特徵，在德國宗教改革時期的教育學中也找到了相當的反映。

在宗教改革以前，學校是在天主教教會手裡，成爲教會思想影響的強有力的工具。因此領導宗教改革運動的馬丁路德對學校加以極大的注意，並從天主教教會手裡力爭這個工具，把它變成新教的工具，來和天主教對抗，就成了極自然的事了。

路德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貴族階級書」(一五二〇年) 和「告德意志各城市市長書」(一五二四年) 中，宣傳興辦學校和山市政機關資助學校的必要，並宣傳男女兒童的義務教育。路德也指出專門師資訓練的必要。

他力斥天主教僧院學校，因爲天主教僧侶是在那裡把青年「當作籠中的鳥一樣來看押，不許他們見人，不許他們去聽活人的世俗的談話。青年不但要見聞一切，而且要以自己的經驗去吸收各種知識……暴政式的僧侶的束縛對青年人是極端有害的；他們也像飲食一樣需要娛樂和愉快；他們的健康也是由此得來的」。

一五二四年，路德籲請各城市的市政當局爲全體市民開辦城市學校。父母應把年齡滿六七歲的兒童送入學校。路德把兒童留校時間一天定爲一小時至二小時。路德開辦城市學校絕不是一個新改革。實際上城市學校已經開辦了兩世紀，而且這種開辦隨着城市的發展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在進行。路德非但沒改革，甚至在某些關係上貶低了這些學校：(一) 加強了校內的宗教教育，(二) 縮小了授課時間。



但在這些學校網的量的發展上，宗教改革却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路德所說的初等學校，首先就是一種灌輸新教精神的宗教學校。兒童在這裡所學習的，有閱讀、書寫、計算、神學和教會音樂。路德詳訂宗教教育的容量，他所編訂的新的問答教授法成了這種教育的基礎。路德也實施了禮拜日的祭司學校。在路德完全轉向到公爵方面之後，他就放棄了羣衆性的國民學校的思想。而把整個注意力集中於拉丁學校，以培養所謂學術人材（說教者、法學者、書記等等）。因此他在一五三〇年的文告中，只說到「至少要送幾個兒童」入學校。

路德爲高級學校規定個課程，有拉丁文、希臘文、猶太文、歷史、哲學、自然科學和音樂。

這樣，德國學校發生在宗教鬥爭過程中，而帶了明顯的懺悔性和信條性。它把這種性質一直保存到一九一八年革命時期。

### 梅蘭希敦的教育計劃

路德在實施宗教改革其是教育改革上的最接近的合作者，是梅蘭希敦（*Peter Melancthon*，一四九七—一五六〇年），德國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之一，希臘文專家，一個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廣博知識的學者。他在二十歲就做了講師，後來又做了威典堡大學的教授，擔任古典語言學、歷史、倫理學和物理學的講授，吸引了數萬極多（達二千人）的聽衆。

梅蘭希敦編了許多教科書（拉丁文文法、希臘文文法、修辭學、歷史、哲學、倫理、物理）。許多傑出的教師和教授是他的學生。他創辦和改造了許多推行新教的大學（在萊比錫、杜平根、海德堡、法蘭克福、凱尼斯堡、葉尼）。

因爲這種種，梅蘭希敦得到了最偉大的教育權威的榮譽。他的同時代人稱他爲「*Magister Germaniae*」（德國的導師）。梅蘭希敦是人文主義最偉大的代表，他作了十六世紀兩大潮流——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的活的聯系。



一五二八年，梅蘭希敦編了一個塞克遜正規學校計劃。

他在這個學校計劃中，主張避免兒童的過勞，僅以教授拉丁文為限，他認為同時教授德文、拉丁文、希臘文和猶太文是兒童能力所不及的。

兒童在學校中，須劃分班次。梅蘭希敦的這個要求，把學校大大的推向前進，因為在此以前的學校是沒有正規的班次劃分的。

學習閱讀、宗教（祈禱）和唱歌的兒童，編入第一級。第二級的兒童學習文法、唱歌和神學。

第三級繼續學習文法，添入羅馬詩人（奧維特Publius Ovidiusnaso及惠吉利）和散文家（西塞祿）的作品閱讀，並繼續學習神學及唱歌。

學校中的授課時間，定為午前午後各二小時。

### 宗教改革的時

### 期的德國學校

### 和拉丁學校

在德國各城市工商業發展影響下所發生的和為宗教改革所支持的城市學校，曾在十六世紀的德國獲得極大的成就。在德國許多公國中，頒佈了學校法規。例如一五二八年勃朗希威格學校法令規定在城市中除拉丁學校外應開辦德國學校兩所。在斯特拉斯堡，一五三〇年市議會規定開辦六個男童初等學校，和四個女童初等學校。

在這一時期的胡登堡有優良的初等學校的設施，那裡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共有德國學校一五六個，其中有許多設在鄉村中。授課時間定為一天四小時。課程有閱讀、書寫、宗教問答、唱歌和計算。學校是在當地牧師監督下；牧師往往也是校中的教師。

這些初等學校中的通常的課程內容是閱讀、書寫、宗教、唱歌。學習閱讀以循次背誦字母為第一步。學習書法須在學生會閱讀之後。學習閱讀費時最多，其內容為背誦祈禱文、讚美歌、和路德手訂的宗教問答。



依照梅蘭希敦一五二八年編訂的塞克遜正規學校計劃所創辦的拉丁學校在德國各城市裡推行極廣。依照這個計劃，在德國其他公國內也產生了許多拉丁文法學校，到十六世紀末葉，全德國已有三四三個拉丁學校（平均一萬人中約有學校一個）。

除了這些學校以外，更創辦了比較高級的拉丁學校（招收已有初等拉丁學知識的兒童）。這些學校通常為公爵所辦，成了準備入大學者的預修學校。

拉丁學校的教育內容和文法，基本上是建築在梅蘭希敦的計劃上的。在拉丁學校第一級中，兒童以疊字方法學習拉丁文字母，並默記最通用的祈禱文。然後進一步默記容易讀的羅馬作家的原著，以積蓄拉丁文字彙和練習名著的閱讀。此外也學習唱歌。

在第二級，中學生學習拉丁文法，領次研究語源學，文章構造法和韻文學（作詩法）。在學習文法時，採用語尾變化和動詞變化的練習。除文法以外，更有伊索寓言（拉丁文譯本）及若干羅馬詩人（德萊西奧Bernardino Telesio，普拉夫泰Plautus）的作品閱讀和音樂的學習。最後，對於拉丁文的會話也極為重視。授課是依照課程表的規定在上下午進行的。一星期中有一天完全教授神學。

在第三級中，繼續研究羅馬作家（威吉里、奧維特、西塞祿）的作品，開始用拉丁文作詩，並學習修辭、哲學和神學。教師對該級學生談話主要是用拉丁文。

梅蘭希敦的文法教科書的應用是很普及的（從一五二五年第一版出版時起，二百年中印了五十版以上）。

## 司打麻的

## 中學校

人文主義是對中世紀禁慾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一種反抗，在十四—十五世紀時是向生活愉快、人類個性自由、各方面發展及健美的一種努力，而到十六世紀中葉却退化為枯燥的和形式的古代語言研究了。對希臘作家和拉丁作家的研究，漸漸的山內容轉到形式，而且這種研究是極端瑣碎而無生命的。拉丁文修辭學被提到第一位。



新教主義，最初是對天主教教條主義、保守主義、宗教滲激、天主教僧侶階級特權等的一種否定。但是新教主義的大學也像過去的大學一樣退化為研究神學的教育機關。只是代替了天主教的教條，這裏開始被新教主義的教條所統治。教育內容又轉到純粹教會和神學利益的狹隘的圈子裏了；宗教過激、懷疑、重又抬頭了。大學中的神學科又佔了統治地位。在中學和大學裡，在科學和文學中，掀起一個以新經院主義出名的潮流。

一五三八年司打麻 (Johannes Sturm, 一五〇七—一五八九年) 在斯特拉斯堡所創辦的拉丁學校 (中學校)，就是建立在這個新經院主義的原則上的。

司打麻以三種思想——由宗教改革所產生的虔敬 (Pietas)，由人文主義所產生的雄辯 (Eloquentia)，由生活需要所產生的知識 (Sapientia)——奠定學校的基礎。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拉丁語雄辯術的教育上的。

中學校分爲九級和第十預備級。其課程略述如下：

第十級 全組拉丁字母。閱讀。宗教問答。

第九級 拉丁文語尾變化，動詞變化，不規則形式。最常用的拉丁文字彙。

第八級 拉丁文文章構造法。西塞祿的「書信集」，及其文法解剖。

第七級 拉丁文文章構造法。西塞祿的「書信集」。文章練習。翻譯宗教問答爲拉丁文。

第六級 西塞祿的「書信集」。賀拉西 (Horatius) 詩集。宗教問答。開始希臘文研究。

以下各級爲完全拉丁文及希臘文研究。

最高兩級的課程內容爲：

第二級 羅馬作家及希臘作家的作品比較研究，論理學，修辭學。亞里斯多芬、歐里辟特 (Euripides)、索福克儂、戴倫西 (Terentius) 的戲劇作品。



第一級 基本數學知識。基本幾何學及天文學知識。論理學，修辭學，演說術（當然是拉丁文和希臘文的）。

在最後一級裏，雖然也載明數學一科，但實際上在一五六六年以前，數學完全未被教授。青年在司打麻中學校裏學過十年之後，連點簡單的算學常識都還沒有，據同時代一個作家的證明，學生甚至不能數書本上的實數，更不能數負數。

只有後來在十六世紀六十年代末期，才開始教授數學，並添入地理歷史兩科。

所以，司打麻中學校所實施的教育，是極端片面的教育，它爲古代語言犧牲了中學一切其餘課程。過分注重拉丁文及希臘文的文法解剖，使它變成了極端形式主義的學校。

司打麻型的中學校，在許多城市裏相繼產生，而且到處都以這種片面性的教育內容爲特點。古典中學校以訓練新教教會職員及封建國家官員爲任務。

在宗教改革初期，德國的大學是衰落的。耶拉斯默說道：「路德教所到之地，科學就告滅亡。」

### 新教主義 的大學

這種現象是完全明顯的：以前大學是天主教神學的苗床。許多人所以要受教育，是爲了想得祭司的位置。路德取消祭司職時，得到民衆的絕大擁護。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只有少數人去準備前途渺茫的職業了。

天主教僧侶階級因爲強調教育目的是爲了解「聖書」，所以許多擁護宗教改革的份子就反譏他們「不需要學術，而只需要了解基督教精神」。可是宗教改革的主要活動家也很懂得爲了他們的勝利，是需要有大量的說教者的，因此也需要有最高神學教育的苗床——大學。

威典堡大學（路德的住所）成了新教主義的第一個支柱。一五一八年梅蘭希敦是在這裏開始講學的。後來爲了對抗繼續存在的天主教大學，陸續產生了許多新的新教主義的大學：在馬爾堡（一五二七年）



、凱尼斯堡（一五四四年）、萊尼（一五五八年）、海爾姆斯塔（一五七五年）。爲了對抗新教主義大學的發展，十六世紀後半期在德國幾個公國中又產生了七個天主教大學。

新教主義大學的經費，大部份是靠天主教僧侶階級那裏沒收來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來維持的。大學的設備是很貧乏的；在學校附設的機關中祇有圖書館一種；沒有實驗室，也沒有陳列室。大學醫科甚至沒有解剖室，解剖學純粹是用口頭教授的。屍體解剖是爲宗教成見所阻止的。祇有幾個大學在十六世紀中葉才偶或舉行（一年一次或二次）自殺者和被處決者的屍體解剖。

#### 四·耶穌派的教育體系

### 耶穌派教育體系的發生和發展

十六世紀是在許多國家裏以宗教改革的形式發動了反對天主教教會運動的時代。德國宗教改革是在一五一七年開始的。一五二五年芝溫黎（Huldreich Zwingli）在瑞士沮利克發動了反對天主教的運動。一五三四年英國教會脫離了天主教。喀爾文教（Calvinism）也在這個時期在法國瑞士和其他等國開始發展起來了。

天主教教會爲保存它的過去的統治而進行殘酷的鬥爭；爲了這目的，它創立了一個戰鬥組織——耶穌會（Societas Iesu）。耶穌會是一五三四年創辦的，一五四〇年得教皇的批准。耶穌會的主要任務，是在和宗教改革作鬥爭，使全世界服從教皇的統治。同時以傳教的形式，耶穌會會員對新發現各國（尤其是南美各國）人民實行經濟的榨取。

耶穌會的創辦人是羅效拉（Ignatius de Loyola，一四九一—一五五六年），一個西班牙的退伍軍官，宗教狂信者。

耶穌會的戰鬥武器是（一）實行說教，以感化民衆，（二）實施懺悔，使個別人物服從教會，（三）實施教育，使青年服從羅馬教廷。



隨着資產階級的加強及其啓蒙哲學的發展，反對耶穌會的鬥爭也就抬頭了。著名的學者帕斯加爾（Blaise Pascal，一六二三—一六六二年）還在十七世紀就發表了一部反對耶穌會的普羅漢瀉爾書札（Lettres provinciales），在這部書裏，他力斥耶穌會會員的偽善和陰謀。在十八世紀時，福祿特爾（Voltaire）和法國其他啓蒙哲學代表發動了強有力的反對耶穌會的鬥爭。

耶穌會會員想在許多國家裡奪取重要的官職，使用陰謀和恐怖手段，不僅招致民衆的反感，甚至引起許多國家（包括天主教國家）當局的不滿，因此在十八世紀中葉會遭法國和其他許多國家的驅逐。不滿耶穌會會員的情緒是很強烈的，甚至教皇克里曼特四世（Clement IV）都因為恐怕天主教教會勢力的喪失，不得不在一七七三年頒佈了一個解散耶穌會的命令。

但是實際上耶穌會並沒有消滅，它在俄國（波蘭）、南美和其他等國繼續存在。在拿破崙被推翻後的時期裡，耶穌會又告恢復（一八一四年），直到現在繼續存在於許多國家（尤其是南美各國）。

作爲天主教的戰鬥的組織，耶穌會在十六和十七世紀期中展開了大規模的教育活動，其目的要叫青年一代服從天主教教會的影響。耶穌會會員不願經營民衆的初等教育，他們直率地承認教育對於民衆是「有害」的。他們把整個的教育力量投在支配階層身上，而只經辦中學和大學。

在耶穌會成立五十年以後，天主教國家的大部份學校就已落入耶穌會會員之手；一六一六年他們在三十二州裏已有三七二個學院（中學及一部份大學的學院）。而在一七一〇年，學院數量增爲六二二個。

耶穌會教育以鞏固天主教教會的影響爲目的，可是實現這一目的所採用的方法，却是和以前幾世紀不同的方法——適應教育方法於文藝復興時代要求的方法。體育教育、優良的學校設備、溫和的（外表）紀律和親切的（偽善的）對學生態度、廣闊的普通教育知識領域——這些都是耶穌會教育的新特徵。

耶穌會會員在自己的教育體系中，把極端保守主義及個人服從於教會威信和個人主義的表現結爲一



體，把絕對統治和溫和的紀律結爲一體，把智慧自動性的消滅和形式上的思維發展結爲一體。像在一塊活動中一樣，在教育領域裏，他們也表現了強大的毅力，表現了爭取目標的堅強意志和聰敏。

### 耶教學院的

### 教育內容方

### 法和組織

耶教學院的教育內容方法和組織，是由一五九九年編訂的學校法令 *Ratio studiorum et institutiones scholasticae*（學業計劃與組織）所決定的，這是當時最完備和最周密而直到十九世紀仍起着作用的一部法典。

耶穌會會員爲要使學生完全服從於自己，防止他們受外界的影響，就把自己的學校變成關門學校——寄宿舍學校。被收容的學生祇有支配階層的子弟。

良好的學校設備，寬敞的教室和宿舍，上課和休息時間的適宜分配，經常的假日，紀念日，休息日，免收學費，以及其他組織方面和教育方法方面的種種優點，都是吸收貴族子弟入耶教學院的方法。

學院中的課程爲「七藝」（文法、修辭、文學、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理論）和神學。學生也研究古代語文（拉丁文和希臘文）。作爲宗教說教工具的雄辯術的研究是很重視的。但因爲日益發達的科學和生活要求更廣泛的教育，文藝復興時代對早期中世紀的「七種自由藝術」已經感覺不能滿足，使耶穌會會員不得不在文法和修辭中添入許多文學、歷史、地理方面的智識。後來特別設立一種「博學」科（*Erudicio*），以教授這些普通教育智識的要素（大部份是斷片的無系統的）。當然最注重的還是宗教、拉丁文學和「三學」。

耶教學院中對體育教育提倡是值得注意的。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時代提出了體育教育的要求，耶穌會也考慮到這個時代的要求。像其餘一切一樣，提倡體育教育也被利用爲鞏固天主教的利益。因爲體育教育可以發展體力，準備「應教皇第一個要求，派赴任何國家」，和「爲了上帝的光榮」，去負擔某種肉體上的損失。這裏是指耶穌會會員在新發現各國的傳教活動而言。

耶教學院分爲二級：*inferiora*（下級）和 *superiora*（上級）。下級又分爲五級，其中第五級是二年



(共爲六年)：低級文法級、中級文法級、高級文法級、人文學級、修辭學級。下級學生都要精通拉丁文。學生不但在教室中而且在教室以外祇准用拉丁文說話。

上級通常有三年學程，其課程內容與大學「藝術科」相同。這裡最注重的是適應於宗教的哲學（倫理學）和神學。

強記必要的智識，可以認作耶教學院教育方法的優點。

每天早晨要把學生昨天所學的功課作一次檢查。在星期六那天，要把一星期中所學過的東西作一次溫習。最低三級學生在學年最後一個月中要把一學年中所學過的東西作一次溫習。溫習是很重視的；學過的東西必須記得很牢。這無疑的是具有紀律意義的。

耶穌會爲要用教育方法使支配階層服從於自己，就竭力避免對學生課以過重的負擔，使學習盡可能的輕鬆和愉快。在耶教學院中，甚至舉行拉丁語的戲劇公演。

爲要實現耶穌會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就需要有實行這任務的熟練的教師。耶穌會對師資訓練問題是很重視的。它首先實施了有系統的師資訓練工作。

教師完全是耶穌會會員。最有希望的學生，在耶教學院畢業後就能擔任耶教學院低年級的教授工作，紀錄教育日記。這些教師的功課和他們的日記要在教師會議上受比較有經驗的教師的評價。這樣經過幾年試驗學習之後，青年教師完成了他的神學的訓練，就成爲高年級的教師了。

## 耶穌派的教育體系

### 耶穌派的教育體系

耶穌派的教育體系以完全服從教會爲目的，對全體學生實施嚴密的監視。提倡學生之間的互相偵察，和對師長的阿諛屈從。

每一個學生要向師長報告一切過失！！同學的疏忽、無禮、和不够虔敬。犯過失的學生如果能夠指出他的同學的類似的過失，就能不受處罰。

體罰雖然取消了，但耶穌會提倡一種損害自尊的處罰辦法（戴附有驢耳的腰帶，坐長椅子等等）。



耶穌會廣泛採用競賽辦法：常把全級學生分爲兩個陣營，進行大規模的公開辯論。平日在考查每一學生的學業成績時，叫另一學生去「批評他、催促他、反駁他、並取笑他考試的失敗」。

這種「教育」體系，消滅了同學間的一切友愛的感情，發展了虛偽和偽善。耶穌會的整個教育體系，是要馴服學生，使他們的意志完全服從教會。

## 五·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莫亞、康巴乃拉）的教育觀

莫亞（Thomas more 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年）在英國生長時，正是英國發生所謂原始資本積蓄過程的時期。羊毛生產日益發展，同時從十五世紀末葉以後發生了一「圈地」運動。

小農的土地被地主奪去，被他們變成牧羊的牧地，演成了「羊吃人」的悲劇。城市中充斥着大批赤貧的人民。

十四—十五世紀英國社會生活的矛盾，和在這一資本主義及封建制度交相輝映階段上的民衆的赤貧化，準備了英國比任何其他國家更早出現了空想社會主義。

湯瑪斯·莫亞是英國最著名的人文主義者和國會議員。他曾勇敢的反對國王的專橫和對人民的橫征暴斂。一五一六年，他發表了一部「烏托邦」，痛斥當時英國國民經濟和政治制度，指出社會生活的基本缺點——私有制度——和描繪一幅社會主義制度的圖景。

莫亞以國會議員資格在國會中的活動，引起了當時英國先進勢力的同情。在新王亨利八世當政時期，他擔任了英國政府的許多要職。但因為在宗教改革問題上尤其是在承認國王爲英國教會首長問題上和國王意見不同，一五三五年被處死刑。

莫亞在「烏托邦」裡，描繪社會主義社會情形：所有公民每天工作六個小時，沒有私有財產，公民之間經濟完全平等。



莫亞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思想，是在距今四百年以前，那時還在資本主義關係的黎明期的中世紀裡。自然，他的社會觀中還有許多受歷史限制性所約束的不正確和幼稚的成份（如公爵政權；奴隸的保留；合理化的宗教等等）。然而我們還是把他當做第一個空想社會主義來給以高度的評價。

莫亞在「烏托邦」裡，對教育問題極加重視。莫亞繪出在烏托邦島上，所有兒童都受良好的初等教育。所以莫亞還在十六世紀初期，就已提出了普遍的義務教育的思想。

公民在公餘之暇，進圖書館和博物院自學。國家給一切願意上進的人民，以利用這些圖書館和博物院中的書籍和儀器等的全權。莫亞想把科學和藝術變為一切勞動人民的財產。

烏托邦島上的全部教育，是用本國語言來進行的。

除了閱讀和書法以外，學校中也教授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哲學、自然科學。在教授天文學時，烏托邦島人民廣泛地利用教授用標本，「他們發明一種機器，可以很明白和很詳細的繪出地平面上所看到的太陽、月亮和星的相互關係」。

當外來旅行家把希臘文學和哲學介紹給烏托邦島人民時，烏托邦人民就熱中於這些他們認為新知識的研究（這裡說明這位人文主義者莫亞本人對古典文化的崇拜）。

一部份最聰敏的學生，經教師介紹和人民選拔担任科學和藝術的研究工作。教師如果不副人望，就把他從校中召回，委以體力工作。反之，許多在自學中有了深刻造詣的手工業者，則改任學術工作。智力學習是被烏托邦島人民當作最大的娛樂之一。

莫亞對體育教育極加重視，而且堅持雅典體育教育的系統：用體操和軍事練習方法發展強健有力和美麗的體格。

莫亞對勞動教育極加注意。他是最初提出這種思想的思想家。學校中的兒童，一方面在理論上研究農業，同時在實際上介紹他們認識近郊的農田，不但讓他們在那裡觀察，而且讓他們親自操作。烏托邦



島上的每一個青年、男子或女子，都要至少學習一種指定的工藝。學會這種工藝之後，他能依照自己的選擇學習別的工藝。

莫亞的教育思想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他宣佈普遍教育的原則，要求男女同等教育，提出了廣泛的自學組織和成人教育的思想，第一個企圖跨上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間的矛盾消滅的道路。他要求用本國語言教授學生，規定廣泛的課程範圍，並以自然科學為學科的中心。莫亞認為記述性的教育是必要的。他除了智力教育以外也極重視體力教育和勞動教育。莫亞是第一個社會主義教育思想的佈告者。

## 康巴 乃拉

「烏托邦」出版後差不多過了一百年，意大利人康巴乃拉 (Tommaso Campanella, 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年) 寫了一部社會主義的空想小說「太陽城」，他在這部小說裡，也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教育思想。

領導「太陽城」的是一和祭司！哲學者。私有財產已被取消，一切公民都要勞動，並各取所需。所有兒童都受社會教育。嬰兒由社會機關公有。

兒童到了三歲，開始學習字母；讓他們在牆上繪有大字母的迴廊中遊戲。兒童從七歲起學習數學、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採用記述教育方法。領導學習的是各科教師：天文學家、幾何學家、歷史學家、詩人、論理學家、文法家，醫師、物理學家、政治家、道德家。

太陽城的建築形式為七個集中的圓圈。每個圓圈用強固的城牆圍繞起來。所有城牆飾以精緻的圖畫，表現幾何學的圖表，地理學的山水和地圖，各種樹木和青草，各種動物，歷史畫面，各種手工業及其工具等等。每一道牆表現一種科學，而且表現方法是一貫的和有系統的。

所有圖畫都有簡短的圖文加以說明。所以整個的城市恰像一個博物院。「每幅圖畫都有教師擔任講解，兒童可以毫不費力的像遊戲一樣的用觀察方法認識各種科學」。

在教授兒童時，也採用參觀自然界和工場的方法。教師把兒童「領到工場裡，領到鞋匠、麵包師、



鐵匠、木匠、畫師那裡，去明白各種人的性癖。他們被領到田場上和牧場上，去觀察和學習農業及畜牧業」。

除了智力教育和勞力教育以外，兒童也受良好的體力教育（賽跑、體操、擲圓盤和擲槍、遊戲）。像莫亞一樣，康巴乃拉也要求男女受同等教育。

文藝復興時代的教育學，在早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著作中達到了它的發展的最高峯。在他們的著作裡，我們也看到當時其他方面的活動家所提出的許多教育思想。他們首先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思想，並首先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普遍教育，教育和生產勞動聯系，男女同等教育，科學民主化等的思想。雖然我們知道在莫亞和康巴乃拉的著作裡有着許多為歷史條件所造成的缺點，但我們極重視這些烏托邦社會主義祖師為先進的和他們所首創的原則而奮鬥的教育觀。

#### 參考書籍

刺伯雷與蒙旦：教育思想。

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德國教育發展史綱。

莫亞：烏托邦。

康巴乃拉：太陽城。



## 第六章 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

### 略傳

大教育家夸美紐斯 (Johann Amos Comenius 一五九二—一六七〇年) 是捷克種。他生於製粉師的家庭裡，是宗教團體「波希米亞兄弟會」的會員。夸美紐斯在初等兄弟學校卒業後，還祇十六歲就考入拉丁學校，因為父母死後就沒有人關心他的教育問題了；保護人認為再進一步的教育對於製粉師的兒子是不需要的。

在中等（拉丁）學校裡，夸美紐斯表現了他的輝煌的才能。他也在這裡首先發現教育內容、組織和方法上的許多缺典，而決心獻身於教育事業的改進。由於他的學業的成績，夸美紐斯被波希米亞兄弟會保送到嚇爾朋大學的神科求學，畢業之後，又入海得爾堡大學。就在這時，夸美紐斯表現了知識民主化的傾向：他夢想以母國捷克文設立一個圖書館，以增進民衆的智識。他說：「不要把科學專爲學者藏匿在書本裡，智識要使大家都能够接觸」。

夸美紐斯回到母國後，便主持兄弟學校的校務和充任波希米亞兄弟會的牧師。波希米亞兄弟會是當時許多反對教會教條主義和反對天主教及貴族階級的教派民主組織之一。

在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初期，波希米亞兄弟會遭受德國貴族階級驅逐，不得不在山林裡躲了幾個月，甚至不敢舉炊。他們被逐出母國，遷到波蘭。

就在這些流亡時期，夸美紐斯失落了許多原稿，死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當波希米亞兄弟會經過許多飄泊，最後到了波蘭黎撒城找到避難處以後，夸美紐斯又開始主持兄弟學校的校務了，那時的兄弟學校，已改爲中學。一六三二年，他編了一本教授用書「語學入門」(Janua Linguarum Reserata)。這本書使夸美紐斯獲得極大的名聲。一六三二年，完成了他的教育學的鉅



著「大學教授」(Didactica Magna)。這時夸美紐斯進而研究Pansophia(註)的思想。

夸美紐斯的研究工作，得到了英國先進人士的同情。一六四一年，他應了英國國會的邀請，到了倫敦。國會議決設立一所專門研究Pansophia的學院，由夸美紐斯主持其事，佐以各國學者。但是英國忽然發生內戰，這個計劃竟不能實現。一六四二年至一六四七年，夸美紐斯受了瑞典政府的委託，担任教科書和語學用書的編輯工作。後來夸美紐斯被選為兄弟會會長，於一六四八年回到黎撒。當兄弟會被解散時，夸美紐斯又從事教育工作。

他在匈牙利經營幾年學校，編了一部「世界圖解」(Orbis Sensualium Pictus)——第一部依照記述性的原則編成的教科書。

當黎撒——波希米亞兄弟會的最後根據地——被匈牙利人佔領和破壞時(一六五六年)，夸美紐斯就逃到漢堡，最後，在阿姆斯特丹一個崇拜他的荷蘭人那裡找到了他的避難處。後來依照荷蘭元老院的議決，出版了他的全集。

偉大的教育家民主主義者人文主義者，夸美紐斯把教育理論和實踐結為一體，奠定了近代教授學的基礎，提出了珍貴的教育體系，把十五——十七世紀的龐大教育經驗加以綜合。他以身作則表現了對教育事業和對兒童愛護備至的模範，表現了在教育工作中的鉅大毅力和堅定，表現了概括教育經驗的能力。

### 民主運動、培根哲學和文藝

復興時代的教育學對夸美紐斯世界觀及教育學的影響

教派民衆運動的民主主義，宗教信仰和教育實踐，給了夸美紐斯的世界觀和教育觀以極大的影響。

當時若干教派團體，實行民主主義的原則，實施社會教育和全體兒童的教育。例如農民戰爭時期所產生的再浸禮教派(Anabaptist)就提倡將學齡前的男女兒童寄托在「母親院」——學齡前的社

(註) Pansophia是希臘語，指各種一般智識的研究。



會教育機關——裡，由教團所委託的婦女——「學校母親」——擔任撫養。「母親院」對兒童施以體育教育，養成他們衛生習慣；用談話方法發展他們的語言，給他們認識周圍環境的初步面貌。

經過這種教育之後，所有兒童就轉入「學校院」，在「學校導師」領導之下，進行數年的學習。在這段時期中，兒童學習閱讀、書法、計算。宗教和勞動（男童學工藝，女童學家政）。兒童被養成守紀律的習慣。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採用體罰。

下面我們就會看到，這些教派團體教育學中的許多特點，後來都被列入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如學齡前教育、國語學校中的普遍教育、學習工藝、紀律等等）。

夸美紐斯從當時教派運動中，吸取了民主主義，同情勞動及仇視貴族和天主教教會的態度。夸美紐斯的民主主義，表現在他和英國民主團體的聯繫中，表現在一切兒童不分階級財產地位和性別的普遍義務教育的要求中。

波希米亞兄弟會會員（大部份是手工業者）是把現實主義的實踐的生活態度和宗教信仰結為一體的。夸美紐斯也有這樣的矛盾。雖然他的教育體系一般的具有現實主義性，但在他的教育理論中却反映着宗教的影響（尤其強烈的是在他論述教育目的的部份）。但也要指出，十七世紀時期宗教對學術的影響一般地是很強大的。

組成夸美紐斯世界觀和教育學時所受到的第二種影響，是培根 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一六二六年）的哲學，培根的活動部份地是夸美紐斯時完成的。

夸美紐斯自己不祇一次地提到培根給他的影響。例如夸美紐斯在給自己的物理學校教科書所寫的序文裡（一六三三年），稱培根的「科學大革命」（Instauratio Magna）一書為「驚人的著作」，他說他把這部書看作「行將到來的哲學新時代的一部最光明的著作」。

當然，夸美紐斯是唯心論者和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的人，他所吸取的只是培根哲學的某些特點。但



是直接引證倍根固不必說，在夸美紐斯的教育著作中，也可看出倍根所給的極大的影響。

倍根所表現的反對過去經院「學說」和學派的傾向，我們在夸美紐斯那裡也能够看到。依照倍根的解說，我們的全部智識就是各種現象間因果聯系的智識。夸美紐斯幾乎逐字地把這個思想重覆說一遍：「智識是什麼，智識就是根據事物的原因來研究事物」（大教授學第十八章第三十六節）。

倍根提倡歸納的研究方法。夸美紐斯也在他的教育工作方法中實施這種歸納主義：從事實到結論，從具體到抽象，從簡單到複雜。

依照倍根的學說，「一切感覺是可靠的，可以成爲各種智識的來源的。科學是經驗科學，是對感覺到的材料合理化方法的採用」。夸美紐斯對這種材料極加重視，屢次反覆說道：「沒有一種智識不是先從感覺得來的」。夸美紐斯站在感覺論的立場上。倍根在這一方面給夸美紐斯的影響特別強大。

夸美紐斯世界觀中的許多特徵，是爲前面所說的文藝復興時代累積而成的。

在中世紀上半期，人只被當作神的奴隸；生活被看作悲哀與受難的深谷；肉體被看作靈魂的監獄。在文藝復興時代，生活被看作美麗的存在，人被看作最完善的創造，生活的慾望生長起來了。

文藝復興時代的這些特徵——熱中於生活，讚美自然，無限制的樂觀主義，相信人類的高尚使命——我們也能在夸美紐斯那裡找得到。

在他看來，人是「最完善和最美麗的創造」，是「奇蹟的小宇宙」（註一）。「領導自然界的人，能够創造一切」（註二）。

夸美紐斯在這首人的讚美歌裡讚歎道：「我們的智慧確實比世界還偉大」。他看出「人愛好和諧，和渴求和諧」。而且「人的本身不是別的，正是肉體方面和靈魂方面的和諧」。

（註一）大教授學，第五章第十四頁。

（註二）全書第五章第八頁。



在中世紀上半期裡，盛行「原始罪孽」的學說，依照這種學說的解釋，人是生來就犯罪和墮落的。夸美紐斯距離這種學說是多麼遠啊，他肯定人「是容易成爲賢明，有道德而聖潔的人的，却不能以外來的曲解去阻止運動的前進」（註）。

夸美紐斯在三十年戰爭的恐怖中，在妻歿子喪的流亡生活中，還是相信人的高尚的使命，相信教育的力量，相信 *Pansophia*——用世界各種可以了解的文學編成一般科學——的可能。夸美紐斯的個人生活和三十年戰爭時期的普遍破壞，沒有造成夸美紐斯著作中所貫串的無限樂觀主義的理由。這種生活的樂觀和人的崇拜是文藝復興時代所累積而成的。

夸美紐斯的教育目的，是由宗教出發的。但甚至在這宗教的教育基礎上，他也要比早期中世紀的宗教進步得多，早期中世紀的宗教是把人當作奴隸和「生來有罪」的墮落的動物的。

夸美紐斯說：「人是最完全和最優越的創造」。但是這種生活，據夸美紐斯說來，只是對永久生活的準備。這種準備有三個階段：認識自己和自己周圍，管理自己，和傾向於神，或者簡單的說——科學教育，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

雖然努力和才能的種子，據夸美紐斯的意見，是種在人的靈魂裡的，而恰恰「每一個人生來就能獲取事物的智識」，而且人之所以變成爲人，只是利用教育的方法；教育是應在最適當的年齡——童年——授與的。教育是應該各方面的和完全的，要智育、德育和宗教信仰同等重視的。

### 夸美紐斯教育學

#### 的自然適應性

正確的教育，必需適應自然。這種思想，以一條紅線貫串在「大教授學」的全部敘述中。所以夸美紐斯的教育學，常被稱作自然適應的教育學。

自然適應性的原則，這裡先從夸美紐斯說起，後面在古典教育家（盧騷、裴斯塔羅齊、第斯多惠）的教育學中也要屢加提及，而且每個教育家都給這個

（註）大教授學，第五章，第二十五頁。



原則添加了不同的內容。

夸美紐斯怎樣理解自然適應性的原則呢？在歷史和教育著作裡，這個問題會有各種不同的答案。一部份作者認為，夸美紐斯所理解的自然適應性，只是人的發展及教育在外表上和動植物的生活相似。作這樣解說的理由是從「大教授學」的若干章裡找來的，因為夸美紐斯在這裡引證了植物的生活和鳥類發展等事實。例如在「大教授學」第八章裡，夸美紐斯引證了自然界一切生物都是聚集在一起的事實，來作兒童必需入學的根據：樹木生長在森林中，「草類生長在田野上，魚類生長在水中」；由此作出結論說，兒童教育和學習，也應聚集在學校中。說到學習和休息交替的必需，夸美紐斯引證了一年中的某一時期需要休息的植物為實例。

這樣的解釋夸美紐斯的自然適應性的原則是不正確的。夸美紐斯在教育學上尤其是在教授學上所作的概括，不是從動植物生活的觀察出發的，而是從教育經驗出發的。只有根據教授工作的豐富的個人經驗，和根據時代先進的教育經驗，才能在夸美紐斯那裡產生像「大教授學」中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深刻的教育思想。但是夸美紐斯必需把這種經驗放在哲學基礎上。以前人家是用引證聖書的方法來給每一條原理找尋理論根據的。夸美紐斯一方面不放棄這種舊的論證的方法，同時也採用了新的論證——引證自然——的方法。

夸美紐斯的自然適應性的原則是在於：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人應以自然一部份的資格服從於整個自然的法則。

夸美紐斯指出（大教授學第十四章），「正確的學校程序應從自然界中吸取」並指出，必需以觀察「自然界活動中所表現的那些過程」為出發點（大教授學第十四章第七節）。他企圖在「大教授學」各章裡（第十六、十七、十八等章）建立一種以同樣情形表現在植物、動物和人類生活中的一般的自然法則，並從這些法則中對教育問題作出結論。例如，根據整個自然界和生活各部門的觀察，建立一個一般



的「基礎（Fundamentum）」——「自然法則」，說「自然界不採納無益的東西」。夸美紐斯用這個論証，來支持他的學校中只需學習最有實利的知識的思想。

在「大教授學」第二十二章裡，夸美紐斯提出兒童年齡的劃分問題，指出每種年齡的特点，和適合於每種年齡的學校的等級。但就是在這裡，他也不在兒童發展特性上去找一般的規律，而是把他們看作一般自然法則的部份情形：四種年齡（幼年、少年、青年、成年）適合於一年中的四季（第二十七章第九節）和植物的展發的四個階段（兒童到了六歲，好像生根和抽枝的小樹，二十四歲受畢教育以後，好像開花結實的大樹）。

作為教育家的夸美紐斯的天才，在這裡是表現在他的豐富的經驗上，他根據教育經驗，觀察兒童發展中的許多情形。心理學在夸美紐斯的時代還沒有形成為一種科學；因此夸美紐斯自然不能憑藉心理學的法則，而給自己的觀察提出了杜撰的根據。夸美紐斯的功勞，是在於提出自然適應性的原則，和他在經院學派的鬥爭中竭力以自然——生活——為依據。而他對自然適應性的原則了解的錯誤，却在於他看不見，而且由如當時科學的情形使他不能看見人類發展所依據的特殊的社會生活的法則。

### 夸美紐斯 的兒童觀

夸美紐斯在「大教授學」第十二章裡，說到學校可以担負良好的改造，他表示一種深刻的信心，說「一切兒童，都可以改造為人」。別人反駁他說，也有一種十足愚鈍的頭腦，是一點東西都塞不進的，夸美紐斯抱了勇敢的信心回答說：難道有連一個字都寫不上的不平的黑板；難道有一點反映不出的不潔的鏡子。

他利用他的舉例和對比的方法說：如果鏡子不潔，可以將他拭擦；如果黑板不平，可以而且必需將他持平，那末每個兒童也是都可以教育的。

另一種反駁，說：「有些兒童，不是沒有求學的能力，只是歡喜遊戲，而反對他的意志，強迫他去學習，也是不愉快和無益的」。夸美紐斯回答說：這種甚至有能力而頑固不守紀律的兒童的不肯受教育



，只是說明教育者本身的無能：「這種憎惡學習的原因，是教師自己造成的」。

夸美紐斯依照兒童的能力和性質，把他們分爲六類。

第一類的兒童是有才智有求知慾而肯服從的；像這樣的兒童最適宜於學習；教育學的態度只要注意他們不要太性急，不要因學習課予他們過重的負擔。

第二類的兒童是雖有才智和肯服從，而進步都是緩慢的。「這只要施以適當的鼓勵」。

第三類的兒童是有才智，有求知慾，而野蠻和頑固的。夸美紐斯曾作精細的分析，說他們在學校中雖然常被認爲無希望的人，但是偉大人物往往是從這一類的兒童中出來的。在這裡教師對兒童需有一番熟練的手腕，不然「許多卓越的天稟就會因教師的過失而埋沒」。

其餘三類兒童都是才智不足和能力薄弱的，第四類兒童除這個標誌以外，還有肯求知和肯服從的特點，第五類兒童懶惰而肯服從。第六類兒童則所有三個標誌（才智、服從程度、和求知程度）都是否定的。但就是這一類兒童，夸美紐斯也認爲有加以矯正的可能：「因爲大家都知道，在整個自然界裡，是有方法可以對付不治之疾的，大家知道，生來不結實的樹木，可用栽培方法使他結實，所以一般說來是不必絕望，只要留心克服兒童的頑固性，或至少排除這種頑固性就可以了」。說到這一類兒童，夸美紐斯在結論中指出，這樣的兒童是一千人中難得找出一個的。

在夸美紐斯的這些言論中，可以看出這位偉大教育家對兒童個性的深刻的見解，看出他對教育力量所懷抱的偉大的信心，對所有教育家不把「難制御」的兒童撇開不管和不把兒童早熟當作「落後」作了正確的號召。

## 學校的意義

### • 普通教育

夸美紐斯是學校的熱心擁護者。他和同時代的學校作了嚴格的批評，譴責他們的經院性質、無意義的機械背誦、嚴厲的紀律、和缺乏各方面的教育。他認爲這些學校都是只爲貴族和富豪而存在的。「在青年受教育期間，幾乎時常採用嚴厲的方



法，以致學校通常被認作恐嚇兒童的草人和智慧的拷問室」(註一)。因此學校中的學習進程也極慢：一年可以學畢的學科，要耽擱學生五年十年及至十年以上的時間。

夸美紐斯反對這些舊式學校，提出新式學校的組織，他證明一切兒童都應該入學，證明學校應該供給各方面的(或者像他自己所說，「包容一切的」)教育，發展智慧、道德和意志。學校應該成爲「人的工場」(註二)，不但要把青年一代變成觀衆，而且要把他們變成未來的活動者。

夸美紐斯力主實施普遍教育：「不僅富人和貴族的子弟要進學校，而是所有城鎮和鄉村的貴族和非貴族、富人和貧民、男童和女童，同樣要進學校」(註三)。

夸美紐斯熱心提倡婦女教育，打擊當時極流行的反對此種教育者的「論證」。他更打擊一種武斷某些兒童因爲沒有天資或天資不夠而不能進校的「論證」。

夸美紐斯關於學校、普遍教育、婦女教育的一切言論，都是滲入民主主義的思想。爲了學校教育的民主化，他要求初等學校中用國語進行教育。

### 學校的體系

夸美紐斯把青年生活定爲四個時期——幼年、少年、青年、成年——同時爲每一階段規定六年教育時期(六年學校)：幼年期的學校就是「母親的胸懷」——每個家庭中的母親學校；少年期有每個村鎮中的國語學校；青年期有每個城市中的中學校，或拉丁學校；成年期有每個國家或每個大州中的大學。教育結束時，須出外旅行，在印刷不甚發達的時代，旅行對於學校教育是一個極大的補助(手工業的學徒由一個工場轉到另一個馳名全國的工場去學習

(註一) 大教授學，第十一章第七頁。

(註二) 大教授學，第十章第三頁。

(註三) 大教授學，第九章第一頁。



，大學學生由一個大學轉到另一個有著名教授擔任講授的大學去聽講——成了中世紀普遍的現象；大家都知道，夸美紐斯本人就曾遊歷過許多國家和城市。

夸美紐斯的學校體系

年 齡	階 段	教育等級	教 育 內 容
十八—廿四歲	成年期	大 學	專門教育。 文法、修辭、哲學、數學、天文學、音樂、物理、歷史、地理、倫理、神學。
十二—十八歲	青年期	拉丁學校 (中學)	閱讀、書法、算術及初等幾何、初等自然科學、地理、宗教法規、手工、唱歌。
六—十二歲	少年期	國語學校	由周圍生活發展兒童常識；宗教教育、發展外感覺器官；學習家政。
由出生至六歲	幼年期	母親學校	

夸美紐斯的這一教育體系，是浸潤在他所愛好的百科全書主義的思想中的。夸美紐斯的百科全書主義 (Pansophia)，是以探求各方面的教育，擴大視界為目的。

和學校體系有密切聯系的，是夸美紐斯所建立的各級學校的教育內容。

教育內容

夸美紐斯詳細地規定學齡前家庭教育(母親學校)的內容，指出這種教育的目的，是在發展兒童對周圍生活的常識，和發展兒童的外感覺器官。在「物理」科中(當時稱為自然科學)，最初六歲兒童所應知道的，是「何謂水、土、空氣、火、雨、雪、冰、石、鐵、木、草、鳥、魚、牛等等」；在「天文」科中，兒童應知道何謂天空、日、月、星，並應指出他們在何處上昇，在何處沒落。在「初步地理科」中，要使兒童明瞭何謂山、谿谷、田野、河流、村落、城



市。「初步的歷史科」是要使兒童能够回想和講述不久以前所發生的事情，和兒童在這三場合中處什麼態度；甚至不妨帶點稚氣（註）。

自然，夸美紐斯在說到母親學校中的「天文」、「物理」、「地理」時，並沒有要求把它們當作一種課程來實施有系統的教育。他所說的只是在學齡前兒童完全能作到的限度內，擴大兒童對周圍生活的常識，和發展兒童的語言能力。

除了發展兒童的常識的語言能力以外，夸美紐斯更主張自幼養成兒童生產和勞動的習慣。

美夸紐斯一方面雖然證明六歲以內兒童的興趣範圍很難超過家庭的界限，因此也很難以政治概念灌輸給兒童，同時却主張給兒童講解（如果他們本身已經引起注意的話）關於市會議員集會的情形，關於各種官職的名稱（城市首長、城市裁判官等等）。在這個問題上，夸美紐斯對學齡前兒童的能力作了過量的估計。

在精神教育方面，學齡前兒童應培養節制、廉潔、恭順、服從、公正、誠實、尤其是對人的愛。兒童還在這幼年時期，就要養成勞動生活的習慣，從事輕易的工作和遊戲（只要不虛度光陰）。服務精神和「忍耐力的練習」也是必要的。

夸美紐斯對於兒童的智力教育和精神教育雖然極加提倡，主張兒童應認識各種生活概念，反對強記各種不明瞭的事物，但是「提到宗教教育問題，就違反了自己的原則，他寫道：「六歲的兒童應該記誦教義問答的章目，記誦他們所信仰的教條的基本原理」。

爲要正確實施學齡前教育，夸美紐斯認爲必需爲雙親編製一套教科書。

夸美紐斯是第一個不懂提出學齡前教育必要性而且詳細發揮了這種教育的內容的教育家。固然，夸

（註）大教學，第二十八章第三十八頁。



美紐斯所了解的學齡前教育和「母親學校」只是家庭的和家內的教育，沒有觸到社會的學齡前教育的思想。

我們反對夸美紐斯為適應他的世界觀和當時社會條件而提出的兒童宗教教育的思想，但我們應該承認，夸氏所擬定的其餘全部學齡前教育的內容一般說來是有價值的。

國語學校的任務，是在教育六歲至十二歲的男女兒童，不問他們階級地位如何，不問他們預備從事學術活動或實際活動。這種學校的目標，是在訓練學生自由閱讀和書寫，教授算術和基本幾何知識，訓練唱歌和認識教義問答以外的「聖史」知識，精神教育的各種要素，及「經濟政治的一切概念」，使他們明瞭周圍的社會生活。這種學校也教授地理和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教授各種「普通的手工藝方法」。

拉丁學校的教育內容，是從當時和以前幾世紀高等教育的課程中剽竊來的：這就是我所知道的「七藝」——文法、修辭、哲學、算術、幾何、天文、音樂理論。

但除此以外，夸美紐斯又在中學課程中添加了許多學科——物理、地理、歷史及年代學、倫理學（道德）。在中學校中，須學習四種文字——拉丁文、希臘文、國文、及一種新文字。

夸美紐斯所擬定的學習程序是和經院學派的學校不同的。在經院學派學校中，先研究三學（文法、修辭、哲學），後研究四科。夸美紐斯則主張文字（文法）學畢之後，兒童就可進而研究實際的科學——物理（自然科學）、數學、最後研究哲學和修辭。

在大學中，夸美紐斯規定當時普通的分科為神學科、法學科、醫科。

○ 夸美紐斯考慮兒童的年齡特徵，提出了教材集中支配的原則。「一切文字、科學、藝術，起初應從最簡單的基本原則教起，使學生明瞭整個的概念；然後教以全部規則和方法；進而教以全部體系及不規則的例外；最後使用註解的方法」。



這種集中主義的原則，在某種程度上直到現在還沒有失去它的意義（例如在學齡前教育系統中，兒童所得到的是周圍自然界現象的初步常識；在初等學校中，這些自然科學知識就擴大了；到了中等學校，學生所研究的已是有系統的自然科學課程了）。問題只在於集中主義原則的正確的應用。

夸美紐斯關於各種學科必需相互聯系的學說，是極有價值的，這正因為「文字和事物需要配合教授和學習」，思想和語言須同時發展；「閱讀和寫作須同時進行」。

夸美紐斯對學校工作的組織和教育方法會詳加論列。

### 學校工作的組織

夸美紐斯詳細證明幼年教育的必要。他選擇早晨為學習時間。在國語學校中，授課時間一天不超過四小時：早晨兩小時用以訓練智慧和記憶，飯後兩小時用以「練習手和聲音」，即練習唱歌和手工。夸美紐斯所確定的初等學校中的授課時間支配方法直到現在我們認為還是正規的。

我們知道，在當時學校中，教師對每個學生是分別施教的。因此，我們所了解的分級和上課，在當時根本還沒有。這就使學生能在一年中任何時期進學校求學。

夸美紐斯要求學生在同一時期入學，「以便由開學逐漸教育到學期終了，務使任何人不能在開學後插班，任何人不能在卒業前退學」。夸美紐斯完全正確的要求每年祇准招收學生一次（在秋季），而且所有學生要在同一時期結束學年。

夸美紐斯要求教師對全級實行集體的工作——上課，並提出了許多關於授課方法的意見：教師應維持上課時的紀律；以相當部份時間注意新教材及學生所提出的問題的解釋，以及練習等等。

所以，夸美紐斯首先確立了學年的概念，証明了學校休假的必要性，確立了每週一定數量的授課時間，實行了上課及教師對全級的集體工作。

夸美紐斯在他的「學校法令集」裡，草擬了許多關於學校組織方面的寶貴的規則。他要求每級要有



自己的教室；並提出了關於學習紀律的意見。

夸美紐斯關於學習工作明確性和計劃性的意見是很寶貴的：「時間應作慎重的分配，務使每年、每月、每日和每小時都適合於它的特殊的任務」。

夸美紐斯認為整個的學校紀律是正確組織學校工作的必要條件。教師應密切注意全級學生的行動；「對破壞紀律的學生須實行叱責，叱責無效，則實行體罰」（註）。

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考查學生的學業，教師應使全體學生能澈底吸收知識，而牢記不忘。要確保知識，就要用複習和練習的方法。要考查知識，就要用考試的方法。每年年終要在學校檢查人監視之下舉行學生學業成績的公開考試。

夸美紐斯關於「一個教師祇能教授適當數量學生」的推斷，成了他在授課方面的一切言論的缺點。他在另一地方却說得比較具體，認為一個教師能教三百學生。這表現了夸美紐斯的相當的機械，和過度相信「統一教授法」的力量。夸美紐斯主張把全體學生分爲許多小組，每組十人，每組委托一個優秀學生在教師協助之下領導學習。

這就是夸美紐斯所提出的授課方法。三百年前他所發表的這些見解，大部份還被現今的學校所採用。如果我們一計算這些言論發表的時期，我們就會發現作爲教育家的夸美紐斯的整個偉大的特點。

教育方法的基礎。  
感覺在教育中的作用。  
用·記述性的原則

夸美紐斯提出了許多教授法原則，並根據這些原則編訂了許多教授規則，這些規則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它們的價值。例如，他曾提出了教育的記述性、自覺性、系統性、確固性、澈底性、伸縮性、以及教材分配的集中主義的原則。

現在我們把這些原則以及由它們所生產的規則，逐一加以檢視。



記述性。關於教育記述性，在夸美紐斯之前我們知道已有刺伯雷、莫亞、康巴乃拉等人在他們的空想小說中談過了。後兩個作家的作品，夸美紐斯是熟悉的。在十六世紀末期初等教育的實踐中，已有用繪畫圖解若干種書籍的初步的企圖。

然而夸美紐斯却是第一個把記述性當作方法論原則提出來的教育家，他從認識論上和教授學上提出論証，完成了記述教育的理論，有系統的在他所編的教科書裡採用了記述性。

夸美紐斯站在感覺論的觀點上，以現實世界的研究作為教育的基礎：「從來認識無條件的都是由感覺開端的（因為先前沒有感覺過的東西是不會認識的）：因此學習也要從實物觀察開始，而不應從研究字面上的事物解釋開始」（註一）。

夸美紐斯反對當時學校中所通用的文字上的和經院主義的教育方法，而要求教育從事物和現象開始，因為「事物是肉體，文字不過是衣服」。夸美紐斯認為學習應該是研究事物，而不是研究別人對事物的觀察和証明，要在學習中使聽覺和視覺配合起來，「使文字和手的活動配合起來」（註二）。

夸美紐斯從這當時極新穎的教育中的現實主義原則出發，達到記述教育的結論。

他要求「一切事物，儘可能的用感覺去認識，也就是說，能看的用視覺、能聽的用聽覺、能嗅的用嗅覺、有滋味的用味覺、能觸的用觸覺；如果同時可用幾種感覺去認識的話，那就同時要用幾種感覺去表現」。夸美紐斯並不把記述只限於形象的記述。

夸美紐斯以此奠定了後來曾被實驗所確證的教授法的一個規則：感覺如果同時有幾種感覺器官加入活動的話，那末這種感覺就更有力量。

（註一）大教授學，第二十章第六十七頁。

（註二）大教授學，第十七章第四十二頁。



夸美紐斯要求教師對學生施教時，不只是講述，而且要示例：「最好每級所講述的一切事物，都能繪在教室的壁上」。

說到實物的參觀及一般標本的參觀，夸美紐斯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方法上的規則——記述教育的規則。他主張參觀實物，要先看全體，然後循序看其局部，在整個實物未完全明瞭之前，對每一部份要繼續加以研究。

夸美紐斯把記述性應用在實踐上，他在他的教科書上附加了許多插圖。

夸美紐斯天才地概括和深化了當時已有相當實際經驗的記述性的原則。他提到這些經驗時，說當時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幾何學家、測量學家和地理學家已有用插圖來解釋他們文字上的記載的習慣（大教授學第二十章第十頁）。

自覺性、系統性和循序性。夸美紐斯極端反對教條性的教育：「不要只依據權威去施教，而要依據用外感覺和理性所得來的證據去施教」；不要只用分析方法去施教，而要用綜方法去施教。我們知道在這些論據中，反映了培根的影響。

夸美紐斯駁斥經院主義的教育和機械的背誦，說：「除了悟性所能了解的東西外，不要強迫學生去死記」（大教授學第十七章第三十八頁）。學生應該藉教師的解釋，去認識「所學習的東西給日常生活帶來怎樣的益處」。

在研究現象時，要引導學生認識這些現象的原因，了解各種現象間的聯系。在觀察一件事物或現象的一般輪廓之後，要詳細研究其各個部份。要養成學生「辨別事物的習慣，使各種事物的知識能够更精確」。

夸美紐斯以培根的歸納法為依據，指出學習方法應由簡單而複雜，由具體而抽象（由事實而結論）由容易而困難，由近及遠。實例要放在規則之前。每一條說理的規則要用簡短、精確而明白的文字去解



釋。

夸美紐斯爲要使教育循序化，考慮各級年齡的學生心理特點後，主張最初應發展學生的感覺（因爲沒有正確的觀察能力，就不能受正確的教育），然後發展其記憶和思維，最後發展其言語和雙手，因爲學生應該會把所學得的東西正確表現出來和應用出來（大教授學第十七章第二十八頁，第二十七章第六頁）。

教材適應學生能力及其吸收的確固性。和教材闡述的循序性有密切聯系的，是教材適應於各級年齡的學生的能力及其通曉的確固性。「天性不是急促的飛行，而是緩慢的前進」，夸美紐斯曾爲這些原則建立了自然適應性的論據。教材適應學生能力，是要使學生所學得的不是混亂及各種不同的原理，而是幾種基本的原理。在闡述時，教材要逐漸加深，使後面的功課成爲前面的發展。

除了教材內容以外，教育方法（前述的標本示範及由淺入深等方法），教師支配學生習作，避免學生過勞以及力求學習興趣化的方法，也是極重要的。

夸美紐斯對於教材複習和練習，是極加重視的。

夸美紐斯不但提出了一般的教授法的意見，而且也提出了許多詳細的教授規則，這些規則直到現在還保存着他們的意義。

### 夸美紐斯 論教科書

夸美紐斯關於教科書的意見是很寶貴的。他認爲必需爲每一學級編製一套包括各種必要知識的教科書。這些教科書要包含豐富的知識，但不是多餘的和抽象的知識。這些教科書的教材應有有系統的配列。敘述應求淺顯明白，使各級兒童都能接受。書名和各種章目的名稱應有興趣而切合內容。

教科書的數量應充足。除了學生用的教科書以外，夸美紐斯認爲必需編製一套教師用的方法參考書。



夸美紐斯不但提出了這些要求，而且提供了實現這些要求的實例；在一六三一年，他編了一本 *De linguarum reposita*（語學入門）——這是一本風行兩百年的語學教科書。這本書在短時期中被譯成了歐洲十二種文字，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夸美紐斯為包含各種知識部門的讀本材料搜集了各種含有文法變化和語言特性的字彙和語句，所以他所編的不但是一本語言教科書，而且是一本兒童所能接受的各種知識入門書。

他的另一本附有插畫的名著 *Orbis sensualium pictus*（世界圖解）是完全建築在記述性原則上的一部各種基本知識的百科全書。

## 對教師的要求

夸美紐斯極重視教師，認為教師的職務是光榮的，「太陽底下沒有別的東西比他更高級的」（註一）。

他要求每一個教師都能明瞭他們在社會中所負擔的重要使命，而充滿自尊的感覺。教師要注意的「是用善良的模範誘導學生」。「要向學生示例，使他們能看見東西；向他們說明，使他們能明瞭這東西；強迫他們模倣，使他們也能表現教師所表現的一切」（註二）。

教師應該是一切善行的公正、積極、堅決的活的模範。他應愛護自己的事業，以慈父的態度對待學生，放慮和鼓勵兒童的學習興趣。這些對教師的要求我們認為是很寶貴的。

夸美紐斯對教育工作問題的發揮雖然沒有比教授法問題深刻和周詳，但他對於教育問題也是很注意的。

他對體育教育問題的闡述是比較簡短的。他在「大教授學」第十五章裡（「生命持續的基礎」）曾提到它。夸美紐斯提倡樸素的生活方式，簡單健康的飲食，有益的體育練習

## 教育 工作

（註一）夸美紐斯學校法規，文集第二卷第一六三頁。

（註二）全集第一六五頁。



勞動和休息的適當交替，他對校舍的衛生設備提出一些意見。

夸美紐斯關於道德教育的見解是以基督教的倫理思想為基礎的。新的道德論和道德教育問題的研究是在十七世紀末期為另一個大教育理論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提出的。

夸美紐斯引證柏拉圖的見解，主張培養四種美德：賢明、節制、勇敢和公正。

說到節制和勇敢，即克服自己的熱情的教育，夸美紐斯最初所提出的思想後來成為他的晚年同時代人洛克教育觀的基礎。後者認為，教育應該發展肉體的規律和精神的規律。夸美紐斯對這種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接近，認為兒童應該學習自制，「抑制煩燥、不平、憤怒」；人應該是「自己的行動的主人」。夸美紐斯宣稱，兒童應學習公正，「不欺凌別人，要各守本份，避免說謊和欺騙，表現自己為一守正不阿誠懇慇懃的人物」（大教授學第二十三章第八頁）。

夸美紐斯對於培養兒童的勤勉及工作忍耐力，也是很注意的，他認為兒童的時間應被勞動或正當的娛樂所佔據，使他們沒有空閒。

在另外一些著作裡，夸美紐斯主張培養兒童們謙遜、順從、仁慈、清潔、整齊、和尊敬長者（註）夸美紐斯適應於他的宗教的宇宙觀和他所提出的教育目的，把宗教教育提到了第一位。

夸美紐斯認為道德教育的主要工具就是以身作則。此外需要條令和規則。雖然「大教授學」第二十三章的標題是「道德教育的方法」，但是他對這種教育的方法却闡述得不很完全；他主要闡述道德教育的內容。

只有關於紀律問題，夸美紐斯提出了詳細的意見。他極重視紀律，認為「學校沒有紀律好像磨坊沒有水一樣」。換句話說，紀律在學校中有着頭等的意義。

（註）夸美紐斯，興行觀範，文集第二卷。



他反對當時學校中所流行的嚴厲的紀律，要求學校廢止體罰：「我堅決主張，皮鞭和木棍，這些對付奴隸的工具，是完全不適合於自由的人的，絕不應在學校中使用，而應從學校中排除」（註）。但他不主張體罰完全廢止；他認為體罰不能用於處罰學業成績劣等的學生，只能用於處罰背教的行為。

### 夸美紐斯 的憲法

夸美紐斯是大教育家。他是資本主義發展黎明期中各種教育體系的奠基人。夸美紐斯在教育史中所起演的作用像哥白尼在天文學中一樣。

普遍教育的思想，統一學校的原則，作為教育工作基本組織形式的上課方式，學校編制，各級學校的課程內容，教育循序性，系統性及確固性的原則，記述性的原則——都是夸美紐斯首先提出的。他首先決定了學齡前教育的內容。他給經院學派的學校一個強有力的打擊。

夸美紐斯是民主主義和人文主義的教育家，他重視人民，愛護兒童，畢生獻身於教育事業。他的教育學中所存在的那些否定的特徵是為當時的歷史條件所造成的。我們把它們拋棄，但是一切有價值的特徵（這些特徵却在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中佔了統治的地位）却為我們在研究教育理論和進行教育實踐時所利用。

夸美紐斯在他的教育體系中，憑藉了他的起自古希臘哲學家的先人們的哲學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切發展。康巴乃拉和倍根對他有著特別重大的影響；伊拉斯姆和偉佛士也有極大的影響。在同時代許多反對經院學派的學者和教育家中最影響最大的是德國教育家拉德開（Wolfgang Ratke）。

夸美紐斯接受和發展了同時代教育實踐中一切優秀的東西。他概括了個別學校的優秀成績，和作為大教育實踐家的本身的經驗；學齡前教育及再浸禮派初等學校的實踐，城市學校中的國語教育，梅蘭希敦及耶穌會派所樹立的學級劃分。他對同時代學校組織的優良特點曾作深刻的研究和概括。他細心研究

（註）大教育學，第二十六章第十三頁。



了同時代個別學校的教育方法，研究了當時優良的教科書（梅蘭希敦、拉德開等所編）。

夸美紐斯利用這種教育文獻及實踐的深信研究，來建立他的整齊深刻而有含蓄的新的教育體系，這一個體系對於同時代的學校及十九世紀教育思想的發展會有極大的影響。

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初期德國許多公爵領地的學校章程所添入的個別要求無疑的是受了夸美紐斯的影響（如分級上課制等等）。在他影響之下，有些章程中添入了六歲至十二歲兒童須受強迫義務教育的要求（實際上並未實現）。夸美紐斯以自己的著作推動了女子學校和農村學校的發展。

夸美紐斯對於十七世紀西南部俄羅斯及烏克蘭兄弟學校會有極大的影響。西南部俄羅斯領土和捷克鄰接，而反對天主教會的波希米亞兄弟會領導人夸美紐斯的著作也和西南部俄國兄弟會會員的精神相接近。

迅速普及於歐洲各國及亞洲若干民族（阿拉伯、土耳其等）的夸美紐斯的教科書曾具有極大的意義。流行於十八世紀下半期和十九世紀初期的作為學校教科書的俄文的「宇宙概觀」一書就是根據他的「世界圖解」一書而編的。「世界圖解」一書被採為學校教科書曾達二百年之久，他奠定了同類許多教科書的始基。

## 結 論

在早期中世紀時期（六—十一世紀），教會——封建主義的思想支柱——獨佔了一切科學和學校。僧侶階級教導青年服從、忍耐、謙遜和宗教信仰。

在這一時期，形成了三種學校：僧院學校、主教學校、和教醫學校，這些學校的主要目標是在訓練僧侶階級。



教區學校的課程內容有閱讀、書法、宗教、教會音樂，有時也有計算。在僧院學校及主教學校中，則教授文法、修辭、哲學（三學），有些學校更添授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四科）。這些科目對宗教起了從屬的作用。授課是用拉丁文進行的。在教育中流行聖書背誦及紀律的盲從。

俗界封建領主的教育形成「騎士教育」的特殊的體系，內容幾乎完全是軍事體育教育。

在十二—十三世紀時，西歐經濟發生極大的變動（手工業和商業的增長，城市的發展）；阿拉伯文化輸入歐洲；在十字軍遠征時期，歐洲人認識了比六世紀至十二世紀的西歐文化更接近於古代希臘和古代東方的拜占庭文化。自然，在西歐哲學及教育生活中，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十二—十三世紀經院主義的發展，中世紀大學的發生，行會基爾特學校的出現）。

在十四—十六世紀時，最初在地中海及大西洋沿岸（意大利北部、法國、英國），後來又在歐洲中部，陸續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形式。工場手工業和商業發展了，城市勃興了，新興階級——資產階級——誕生了。在十五—十六世紀的交界時期，發生了地理上的大發現，打破了舊世界的疆界。這一切的發展促成了蓬勃的文化運動，促成了科學和藝術的復興，也就確定了這一有名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名稱。

人的崇拜（人文主義），教會影響的削弱，生活樂趣的享受，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和天文學）及藝術的發展，古典文化（尤其是雅典文化）的崇尚，人類視界的擴大——就是文藝復興時代的特徵。

教育思想也復興了：人文主義者（如意大利的章多利諾，法國的刺伯雷和蒙旦）提出了優良的體育教育、溫和的紀律、放寬兒童興趣、注意兒童個性等的要求。他們要求發展兒童自動性、反對經院主義的教育。他們提出了研究自然科學和古典文學的要求，提出了許多新的教育方法（如標本示例，參觀等等）。

早期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莫亞、康巴乃拉）提出了第一個社會主義教育的計劃。他們以教育民主



文化的思想補充了人文主義者所提出的教育要求（普遍的義務教育，男女平等教育，及科學知識的普及），並首先提出了勞動教育的思想。

在學校實踐上，因為當時學校大部份還在教會或封建國家的手裡，所以先進的教育思想只有採行了一部份。

但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末期（十六世紀），學校生活中却發生了某些變化：學校網的擴大，女子學校及農村學校的出現。在某些學校裡，擴充了教育內容：除了原有的「七藝」之外更添授文學、歷史、自然和地理。出現了人文主義者所編的大量教科書。城市的生長和資產階級的發展促成了高級學校（拉丁學校）的出現。

宗教改革運動促進了城市初等學校的發展。

新教主義的德國初等學校是反對天主教教會獨佔學校事業的，但自身却成了宣傳新教精神的宗教學校。宗教改革運動也促成了德國境內大量拉丁學校的出現，和反對天主教大學的新式大學的發生。

在新教和天主教間的尖銳鬥爭中——這個鬥爭是社會鬥爭的形式之一——天主教教會喪失了過去的學校獨佔地位，而以耶穌會的教育體系去對抗教育思潮。這個體系是加強天主教對學校事業影響的企圖。天主教教會在這一體系中一方面保存了學校工作的原有的內容，同時又不得不在文藝復興時代教育進步的影響下改變了這個工作的方法（如注重體育教育，提倡表面溫和的紀律等等）。

資產階級更進一步的成長及其反封建的鬥爭引起了十七世紀夸美紐斯教育體系的出現，這個教育體系主要是由文藝復興時代（尤其是十六世紀）的教育思想和實踐準備而成的。

構成夸美紐斯教育體系基礎的最主要的影響是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培根哲學和十六—十七世紀的教派民主運動。

當時某些學校工作的實踐給了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以極大的影響（國語教育、自然科學、歷史、地



理教育的實篇，拉丁學校中的分級制的出現，各種教科書的出版等等）。

夸美紐斯概括了學校工作的經驗，創立了以自然法則為根據的卓越的教育體系。他反對經院主義的學校，以新的（現實的）學科擴充學校教育的內容，建立了許多教授法的原則（記述性、系統性、及教育確固性等等），並在理論上加以公式化。夸美紐斯提出了許多新的教學工作的組織方法（學年、上課、年終成績、固定課程表、學校制度等等）。夸美紐斯創造了當時模範的教科書，並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方法上的原則。

夸美紐斯是新教授法的鼻祖。尤其要指出的是他奠定了現實主義教育的基礎，他要求學習實際事務，而不另學習文字。

夸美紐斯以自己的教育體系，給了後來教育思想的發展和當時學校工作的實踐以極大的影響（在德、英、匈、荷、瑞典、及西南部俄國）。夸美紐斯教授法對法國初等學校教授成就的影響無疑的也是通過夸美紐斯所編的教科書而產生的。

夸美紐斯的體系是後期中世紀教育思想最高的成就。夸美紐斯天才地概括了當時教育理論中和實踐中所存在的一切先進的東西，把教育學更推進一步，奠定了新的教育學尤其是新的教授法的基礎。這樣還在中世紀的胎胞內就已誕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的教育學。

在夸美紐斯教育體系中，除了這些新因素之外還有許多中世紀的特徵：教育目的的宗教性，完全依據基督教宗教的道德及經院主義殘餘的保存，體罰問題的二重性等等。







## 第三部 近代教育

從十七世紀英國革命到十七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

### 引言

十七世紀下半期和十八世紀在教育思想和學校方面會有顯著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教育運動是由英國大哲學家約翰洛克開端的。他在十七世紀末期提出了他的反映進步的新興階級——資產階級——要求的教育體系。他在教育目的的公式和在他的倫理學中已經不像夸美紐斯那樣從宗教觀點出發了，而是以「事業」家的利益爲出發點。他駁斥過去哲學和教會所固守的先天性的思想，而奠定了以經驗爲根據的新的認識論的基礎。他駁斥了過去中世紀的教育內容（七藝），而成了實在教育體系的鼻祖。我們從古代教育時期起第一次在洛克那裡看到了展開了的體育教育體系。

法國唯物論哲學者根據洛克的許多哲學原理和教育原理而更前進一步：他們提出了唯物的道德學說，要求教會與學校分離，學校由國家經營。他們提出了學校民主化的要求（實施普遍、強迫、免費的初等教育）。

當時流行的人類自然權利學說反映在盧騷的自然教育學說中。盧騷比洛克更有力和更堅決的批評了封建教育，提出了新社會的人的教育的思想。他反對中世紀對兒童個性的壓抑，而要求尊重兒童，發展兒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他從洛克的感覺論中做出教育結論，而發揮了他的外感覺器官教育的學說。他反對洛克所提出的極端狹隘的功利主義的教育目的（訓練事業家），而擴大和加深了這三目的——創造人生。



洛克——盧騷——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教育學說，雖然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點，但他們和  
前人夸美紐斯的教育體系共同構成了先進的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更進一步發展的基礎。

在學校史上，這一時期產生了許多新現象：國家對學校事務的組織作用日漸加強，女子學校數量增  
多，初期的實科中學校相繼開辦，普通中學中的實科成份日漸加強等等。



## 第七章 約翰洛克的教育體系

### 洛克是一六八八年階級調和的代表者

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六四八年，政權落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手中，而後又落到以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為首的軍隊的手裡。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貧民羣衆的參加使革命具有空前的廣度和深度。「……祇有依靠這些城市和平民份子的干涉，鬥爭才能堅決進行到底，而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台」（恩格斯）。這是一六四九年的事情。一六五八年克倫威爾死後，君主政體又告恢復。反對君主政體的鬥爭促成了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國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不得不放棄王位。大資產階級得到了政權。它爲要不再重蹈像平等論者（Leveler）的運動那樣的民主運動的覆轍，就實行和貴族妥協。資產階級請奧蘭治族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即英國王位，建立了立憲民主政體，以保證自身參加國政的管理。這樣，一六八八年的革命就以資產階級和貴族階級的調和而結束。洛克正如恩格斯所說，是「一六八八年階級調和的產兒」（註）。

約翰洛克（John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生於資產階級的家庭裡。洛克的父親是牧師，曾參加一六四八年革命，擔任反對王室的國會軍的騎兵中隊隊長。洛克受過經院主義的中等教育，一六五二年考入牛津大學，畢業後於一六五八年擔任該校希臘文及修辭學教師。後來在笛卡爾（Descartes）的著作影響下，洛克熱中於自然科學，献身於醫學的研究。

從一六六六年起，他做了自由主義政治家沙夫德斯比利（Shoforeshbury）伯爵的家庭醫師，和他



的孫兒的教師。由於接近莎夫德斯比利伯爵和洛克的自由主義的觀點，就惹起了查理二世政府的懷疑，一六八二年洛克不得不隨着他的保護人的家庭流命到荷蘭。祇有在一六八八年英國二次革命之後，洛克才有回到英國的自由。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就是在這個時期出世的。

在十七世紀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王權的鬥爭影響下，在資產階級家庭和接近英國自由主義貴族階級的影響下，形成了洛克的世界觀。

在哲學家中，對他影響最大的要推培根和笛卡爾。洛克在研究認識論的各種問題時，繼續發展了培根肇始的英國唯物論。

洛克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人類悟性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一六九〇年出版)一書中，研究了人類知識的發生及其確實性和容量。他在悟性論第一卷裡證明我們意識中的先天性的思想和概念並不存在，我們的靈魂象一塊無字的寫字板 (tabula rasa)。

那末我們的概念究竟從那裡來的呢？悟性論第二卷解答了這問題。概念是由外部世界得來的，逐漸充滿我們的意識的。我們的概念的來源是感覺。我們一切思維只是由外部物質世界的影響而發生的。在這個問題的決定上，洛克堅持着唯物論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稱洛克會爲「主要的原則」；知識和思想起源於感覺世界的原則」提供了正確的證據。由外部世界用感覺方法得來的經驗洛克稱之爲外部經驗。但除了這外部經驗以外，洛克認爲還有內部經驗（反省），本身的悟性活動就是由這內部經驗得來的。洛克認爲內部經驗是獨立的知識源泉，所以他並不站在澈底唯物論的立場上，而是二元論者。他肯定說，我們的知識不是事物的知識，而只是我們關於事物概念的知識。真理不是我們意識中的客觀現實的反映，而是表象和觀念相互間的協調。

所以，洛克把認識論引到心理學問題上之後，就更進一步集中注意力於心理學問題的研究。洛克是實驗心理學的鼻祖，他在心理學中以經驗爲出發點，但可惜這經驗是用自省方法得來的。他也在這心理



學上建立了他的教育學。

洛克最主要的認識工具是感覺，所以洛克是感覺論者。在洛克哲學中，前面說過，有唯物論的方面也有唯心論的方面。洛克以他的學說的唯物論的方面給了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海爾威西、荷蘭巴哈、狄特羅等）以極有力的影響。

從他的社會觀點說來，洛克是當時先進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是後來盧騷所發展的國家起源的契約論和自然權利論的擁護者。依照洛克的見解，人類最初是生在天然的自由狀態中的。自由是人類不可分割的天然權利。財產也是天然權利。洛克推論：如果人類在天然狀態中是自由和平等的話，那末國家及其強制的力量和政權的發生，只能解釋作人類自願的約束。他們似乎自願把他們一部份的天然權利交給執政的當局，爲的要後者去保護他們的生命、自由、財產。

這種理論，後來在整個十八世紀也很流行。我們經過半世紀後在盧騷那裏會遇到它（「民約論」）。這種理論在本質上是不正確的，但在當時却起了進步的作用：由它所產生的結論，就是君主或他的先祖是從人民那裏得到自己的政權的，因此人民是最高政權的掌握者，君主如果不履行對人民所負的義務，人民就可把政權收回。洛克應用契約論的目的，只是要給立憲君主政體建立論據；盧騷則從這種理論做出民主的結論，提出民權的學說。

洛克倫理觀，歸根結蒂就是幸福和利益的思想。在選擇幸福和利益時，我們要受理性的指揮。理性衡量和評價了何者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並控制我們的熱情。因此最重要的教育任務之一就是發展節制的精神。因爲肉體的慾望是最有力的慾望之一，所以教育任務首先就是鍛鍊肉體。

理性是我們選擇幸福時的指南針，但習慣也是必需的。因此習慣的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任務之一。洛克不否認智能的傳授，却否認先天的思想和先天的經驗。洛克對教育意義的極高度的評價就是由這先天思想和先天經驗的否定中產生的。洛克甚至過度估量了這個意義，斷定十個人中有九個人的造就



完全是依靠教育的力量。

洛克首先提倡的先天思想的否定和教育效果的重視後來曾被十八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所發揮，成了「啓蒙時代」整個哲學和教育學的特徵。洛克的弟子在這一問題上斷定，甚至天才都能由教育造成。

這些哲學目標是當時年輕進步的資產階級反對教會和封建貴族的工具之一。他們否認教會關於宗教思想是人類先天思想的學說。他們反對封建貴族關於管理國家的經驗是由經驗內部傳授即先天傳授的論斷。

### 教育的意義、目標和組織

洛克根據自己的哲學體系，概括了當時先進資產階級的教育經驗，在他的「教育意見」(Sa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 一六九三年出版)一書中，發展了教育體系，以「健康思想」的教育和「紳士」的實際要求作爲這一體系的基礎。他適應了他的否認先天思想的理論，對教育效果極加重視。他認爲教育的目的是在訓練善於合理地種有利地處理自己的事務的「紳士」。洛克的教育體系和這一體系所提出的教育目標，是以人類個人福利原則爲基礎的。洛克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教育任務的公式中得到了極明顯的反映。洛克在著作中的另外一些地方認定教育的任務是創造健康的肉體中的健康的精神，是發展肉體的紀律和精神的紀律。「世俗性」，處羣能力的發展，良好風度的養成——這些在他的教育學中佔了很大的位置。

洛克是個別教育的積極擁護者。他固然知道學校教育有它的許多優點，例如學校可以發展兒童在學習上的競賽，但他認爲「甚至家庭教育的缺點都要比學校中得來的知識有用處得多」。洛克認爲，父親把兒童送進學校，送到「教養不良和品行惡劣的各種雜色兒童隊伍中和集團中，這種想法真是令人不解的。父親如果請了家庭教師來教自己的子弟，那就好多了，因爲家庭教師會用更精練的方法教育兒童，喚起他的較成熟的思想，最高潔的思想，善良、榮譽和禮儀的認識及努力，並能給他各種豐富的知識



，比任何許多學校所能做到的更早鼓勵他的一個謹嚴的人的精神成熟的表現」(註)。

和貴族階級協調的意識形態，在這幾句話裏表現得特別明白。在富裕的有產者的家庭裏，在家庭教師指導之下，施以良好的風度、禮貌、和謹嚴生活態度的教育，這就是洛克理想中的個別教育。洛克認為學校是「盜劫果園」的野童薈集之所。

洛克對教師極加重視，認為教師應該是一種有教育和有知識的人。此外，他必需是一種有禮貌而深明世故和上流社會裏各種待人接物規則的人物。

這種處世態度和禮貌，常被洛克認作生活中最必需的品質和最最重要的教育任務之一，而反覆加以闡述。洛克認為，機敏、文雅和誠實乃是最主要的實踐的德行。

## 體育

原則，來作這種理論的基礎。

洛克在「教育意見」第三章裏說道：「健康對於我們的事業和我們的幸福是多麼必要，一個能夠忍受災難和疲勞的堅強的體格對於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所作為的人是多麼必要——顯然是要加以證明的」。

身體必需鍛鍊，使它能夠忍耐疲勞、災難和各種變動。爲了這個目的，就要不給兒童穿得過暖，出外不戴帽子，每天用冷水洗足，任何時期空氣流通。

說到衣着，洛克極端反對束縛身體自然發展的不正常的緊身衣服（如婦女的胸衣學）。

兒童的飲食應求簡單樸素。兒童最好的飲食是牛乳、粥湯、麵包、蔬菜、水菓。香料和烈性的飲料應絕對避免。

(註) 教育意見，第七十節。



洛克對健康生活極加重視，要求兒童盡可能的早睡和早起；尤其不應該兒童醒着在床上睡覺。

洛克對兒童對外遊戲極加重視。

洛克對體育教育的見解，尤其是他的寶貴的實際指示，有很多地方過了四分之三世紀曾被虛騷利用了去，固然虛騷對體育教育所提出的論據是另外一個。

## 道德教育

洛克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也在它的一切形式中奠定了新興道德論的基礎。代替了完全建築在宗教和「先天思想」上的原有的道德，他提出了由個人利益原則出發的經驗論的和感覺論的道德觀。洛克就以這種新的道德觀比夸美紐斯更進步的把道德教育的學說推向前進。

洛克在道德教育方面的基本要求，是精神的紀律。這個問題在十七世紀末期和十八世紀的教育學中提出來，是因為原有的封建的棍棒紀律曾被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所反對。洛克和這種完全建築在宗教、權力和強制上的紀律相反，而提出了精神的紀律。

洛克認為，性格的鍛鍊，道德的訓練，意志的發展，都是最重要的任務。兒童必需自幼養成克服本身幻想和抑制情感的能力。肉體的強固是養成人類忍受各種艱難的能力，精神的強固則養成人類抑制自己，將自己的願望服從悟性指揮的能力。

教師如果在幼年時期極端縱容兒童，而在長大以後對他們嚴加管束，這是極不正確的。兒童的合法慾望，自然應該給以滿足，但是這些慾望一超過限度，而變成任性的時候，那就要加以阻止了；「兒童需要衣服的時候，就給他們衣服；但是他們開口要一種織物，或要一種花，那就要加以說服，說他們的要求是不能實現的」。

在不同年齡的兒童中，要建立不同方式的紀律。在幼年時期，當兒童的理智自制力還不可信賴的時候，兒童應把自己的父母和教師看做絕對的權力，應該對父母發生「敬畏」。一起初的敬畏，可以給你



們得到一種控制他們精神的權力，以後的友愛，則能在較成熟的年齡保持這種權力」（註一）。

但是洛克甚至說到幼年期的紀律，都是和中世紀的盲目的紀律，和壓迫兒童不同的。「如果過度侮辱兒童，屈服他們的意志，把他們嚴加管束，那末結果他們會喪失他們全部的活動力」，由此而產生的是懦弱、胆小和受壓迫的人。洛克恰恰相反，他要用教育力量鍛鍊一種具有堅強性格的人物。

◎ 洛克提出了新的教育理論和批評了過去的經院主義的學校，一般說來是反對體罰的。但是我們在他的哲學觀裡所看到的那種二元性，也表現在這裏：他認為需要打破兒童的頑固性的時候，就要採用體罰作為極端的方法。但洛克認為最好用獎譽和非難去影響學生；要喚起兒童的名譽感。

對學生提出的事物，必需給以良好的論証。但主要的教育方法與其說是教訓，不如說是示例和環境的影響。「必需記住一個無可懷疑的真理，任何教訓和禮儀的學科，都不能給兒童得到什麼，對兒童的行為發生最大影響的，要算兒童所處的環境和那些看護他們的人的行動的實例」（註二）。兒童的正確行為，必需轉成習慣。養成固定的習慣是終極的教育任務。

關於發展兒童的希望的天性和壓制他的消積的天性，洛克曾提出許多最詳細的和在心理學上有過精細研究的指示。

必需發展兒童忍痛痛苦的精神和堅定的意志。洛克說到兒童常有的恐怖心理時，認為這種心理一般說來是有用處的，因為它能預防嚴重的危險。不能估量危險和輕率的態度對於理性生活是無價值的。但是恐怖的感覺用於病態的形式也是不對的。必需養成兒童估量恐怖同時又在恐怖面前鎮靜自制的力量。要逐漸教會他們使他們發生極度恐怖的事物，養成他們忍受痛苦的習慣，因為痛苦是一切恐怖的主要原

（註一）教育意見第四十二節。

（註二）教育意見第六十七節。



因。

關於防止兒童的懶惰、說謊、防止兒童的殘忍的傾向等等，洛克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在這些問題和其他許多問題上，洛克的「教育意見」一書是具體接近教育問題的較高模範。

爲要養成兒童的人道心，洛克主張禁止兒童虐待動物，因爲虐待動物的殘忍態度慢慢地會轉到對人的態度上的。必需養成兒童對周圍環境尤其是對下等人的謙遜的態度，不能對他們表現絲毫的傲慢。

洛克爲要培養一種有活動力和有毅力的人才，對於防止懶惰是很注意的。洛克認爲對周圍環境漠不關心，對任何事物缺乏興趣，以及學習時的萎縮不前，都是兒童中的最惡劣的缺點之一。

在懶惰發現的時候，首先應該查明這種懶惰現象還是表現在一切方面呢，還是只表現在某種功課的學習上。如果只表現在功課上，就要對兒童指明他的行動的無智，而引導他去思想；因爲學習不努力，他浪費了很多時間，如果學習努力，就可以省下時間去遊戲了。如果這些論據無濟於事，那就要天天盤問他，問他今天有多少時間學習，並作出不注意他的樣子，把他當作不人正軌的兒童而冷遇他。如果這樣做還是無濟於事，這就逼他從早到晚去玩他所愛好的玩具，直到玩厭爲止。如果兒童對周圍一切都不感興趣，那就設法鼓勵他一點興趣，就利用這種即使片面的興趣，再從這興趣出發，漸漸擴大到另外的問題上去。

洛克要求教師接近每個兒童時，要注意他們的個性。這種要求是很寶貴的。「當你的孩子完全無拘束的耽於遊戲和不懷疑你在注意他的時候，你要及時的開始細心地觀察他的性格，注意他的大部份的熱情和大部份的性癖：他是易怒的，還是溫和的，是胆大的，還是胆小的，是有同情心的，還是殘酷的，是直率的，還是拘謹的，因爲你的教育方法也要依照這些不同的性質而有區別，你的威信要靠這種不同的教育方法來保證」（註）。



洛克對於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是站在自然神教（Deism）的觀點上的。他否定先天的宗教思想，否定獨斷的儀式的宗教，因此比過去的教育更進一步；但是洛克在這裡也像在別的問題上一樣，是二元論的，他認為必需給兒童知道上帝是世界創造者和德行者，却不必作詳細的解釋，不必強迫他們去讀難懂的冗長的教義。洛克保存宗教，只是否定它的儀式方面，否定尊僧主義（Clericalism）。

### 智力教育。

### 洛克在教授法上的指示

洛克認為教育的目的，不是製造「學術的人材」，而是製造有學識的事業人材。「一個有德行的有理性的和精通自己的事業的人材，遠比一個沒有這些品質的大學問家更可取」。我們知道，洛克在教育意義問題上，也是持了片面的見解。洛克所說的「學術人材」和「科學」，是指脫離實際生活的當時經院主義的科學和只授拉丁文及希臘文知識的當時學校教育而言的。

洛克所訂的課程內容，有閱讀、書法、繪畫、國語、法蘭西語、拉丁語（洛克認為拉丁語對於未來的商人和農業經營者是不需要的）、各種地理、算術、幾何、天文、年代學、倫理學等的重要知識，以及歷史、法律知識（尤其是公民法的知識）、自然哲學（研究一般的自然法則）（註）、騎馬、擊劍、舞蹈、簿記。

我們知道，洛克完全和中世紀的三學四科分了家。他的學科的選擇，是以資產階級社會的需要為條件的。實用的因素成了這種選擇的經常的標準。

洛克的全部學科計劃和紳士教育的綱領，充滿了實科教育和實用的精神。「必需在真正有用和本質上必需的知識的獲得上，化費時間、勞動和精力」。

在這一方面，不僅學科的選擇值得注意，而且洛克在給這種選擇所作的理論根據上的個別的說明，

（註）洛克所指的首先是研究實用的自然科學和「無異類比的牛頓先生的奇書」。



都是值得注意的：「商業簿記的必需，是因爲它對每個高等人是有用的知識，它不是爲謀利，而是爲着合理和聰敏的保存財產，不使它混亂無節制的浪費」。

洛克認爲良好家庭的青年，須受某種手工業教育：大小木工、園藝或農業教育。除了這種手工業以外，洛克認爲適宜於貴族青年的勞作，還有香料製造、油漆和彫刻。洛克認爲學習手工的目的，是在防止懶惰，利用學生的閒暇。他重視這些手工，也是因爲這些手工勞動能增進學生的健康。

洛克極重視教育方法，會對這個問題提出許多新的意見。他認爲兒童從最初開始求學起，就要喚起他的學習興趣。無論如何不要使第一步的學習變成對兒童的乏味的義務，因爲這樣是會造成兒童終生憎惡學習的心理，洛克畫了許多附有字母的遊戲圖畫，作爲教授閱讀之用。這些遊戲圖畫看完之後，要給兒童閱讀最感興趣的插圖書籍。教授書法要在兒童已經學會閱讀之後。然後教授繪畫。洛克對繪畫極加重視，認它爲確實簡便的傳達現實的工具。

兒童受畢初等國語（英語）教育之後，就要進而學外國語（法語）。在兒童時期，外國語的學習應從會話入手，而不從文法入手。洛克關於數學、歷史、地理及其他學科的教育，也提出了許多教授法上的意見。

洛克痛斥形式主義，反對教育和生活脫節，反對經院主義學校的機械背誦。洛克說，記憶須憑練習。但是練習記憶要靠活的材料。洛克對於練習問題一般地是很重視的。

洛克關於兒童好奇心的發展，曾發表了很寶貴的意見。他認爲兒童的好奇心就是知識慾。這是兒童天賦的偉大的工具，兒童的好奇心應該加以百般的鼓勵。因此：（一）在兒童提出任何問題的時候，不要加以制止和恐嚇，而使他氣餒；（二）不要用兒童所不了解的說明，去迷惑兒童；（三）不作虛偽的或不可捉摸的答覆；（四）回答兒童問題時，態度要認真。

他對思維的發展是很注意的（曾寫過一本闡發這問題的專著「論理性教育」）。洛克和只會被動地



要用他人智慧的人相反，他要求發展獨立的思維，發展論證和概括的能力，發展系統地和一貫地思考的能力。他認為發展這種能力的最好的工具，就是數學，因為數學在人的智慧中養成尋求一長串結論的習慣，訓練推論的確實性和一貫性。

洛克認為教育須從簡單明瞭的教材開始，一次只授小量的智識。最初只授一個簡單的思想。

### 洛克的教育體系 的意義。洛 克對教育學發 展的影響

洛克的教育體系，是夸美紐斯以後教育思想發展的相繼的階段。夸美紐斯對教授法問題作深刻的研究，但對教育問題發揮得不够。洛克則把幾乎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教育問題上。他在教育家中第一個建立了他的以實驗心理學為基礎的教育體系。

洛克概括了和加深了那些成為英國流行的教育體系的特徵的教育實踐；注重體育（遊戲、運動），注重性格及意志教育，注重有毅力的「實業家」的培養。

在解釋洛克的教育體系時，我們已經指出他的教育學中的許多寶貴的方面。雖然洛克所說的只是「紳士」教育，但這已經不是舊式的貴族，而是資產階級化了的自由主義的貴族和資產階級了。從這一方面說來，洛克的教育學在當時可算是進步的，是準備代替封建貴族的階級的教育學。

洛克曾給法國唯物論哲學家和虛騷的教育觀以極大的影響。他們在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教育的鬥爭中，比洛克更進一步，也比洛克更尖銳的提出了新的教育問題，但是却不能不說，他們和洛克是有距離的，我們在十八世紀法國教育家那裏所看到的以更堅決的方法，以另一種論據，和為另一個社會集團而提出的感覺論，體育教育問題，外器官的發展，先天思想的否定和高度教育評價，兒童經驗和手工勞動的養成，以及其他許多教育思想，我們在洛克那裏已經看到了。



## 第八章 十七—十八世紀學校

### 一、德國學校

#### 初等學校

我們知道，在中世紀上半期末，在許多城市裏已經開始發展了行會基爾特學校，後來又發展了城市學校。但在這個時期這些學校還是稀有的現象。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商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城市的生長，宗教改革運動，國家作用的加強——這些都是促成德國學校更進一步發展的條件。

在十七—十八世紀，學校創辦的主動權由教會轉到國家之手：在德國許多小公國裏，還在十六世紀後半期和十七世紀初期，就已頒佈了許多學校法令（一五五七年和一五八〇年在薩克松尼，一五五九年在胡登堡，一六一九年在魏瑪等等），強制父母送兒童入校。一六一九年的魏瑪學校法令，規定教師和教師應將六歲至十二歲的男女兒童名單造冊。法令規定，不願送兒童入學的父母「應以俗界政權之手強迫其履行這一不能改變的義務」。

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一六四八年）破壞了中歐，給德國學校事業一個極端嚴重的打擊。許多城市的被圍，農村的被焚，飢餓的威脅，傳染病的流行，德國三分之二以上人口的損失，破壞了整個國家，使學校事業陷於完全衰落的狀態。

威斯特弗里亞和約締結後，德國許多公國會作恢復學校的企圖。還在戰事結束以前（那時戰事已移到別的遼遠的地方），在薩克森·科布·哥特公國裏，一六四二年就已頒佈了一個學校法令，規定五歲以上的兒童應受義務教育。對於沒有正當理由而缺課的學生，法令規定課以罰金。一六四九年在胡登堡



也頒佈了同樣的法令；此地十七世紀末期已有學校二五〇個。一六五四年在佛郎克福頒佈一個法令，規畫開辦高等學校。在普魯士，一七一七年的法令規定所有五歲至十二歲的兒童須受義務教育。腓特烈二世在一七六三年頒佈一個「學校總法規」，規定五歲至十三歲的兒童應入學校，對不送兒童入學的父母課以罰金。在十八世紀期中，創辦了二千個左右的學校。

學校由國家經辦，不但城市中的而且農村中的初等學校的出現，不但男童學校而且女童學校的開辦（大部份在城市中）——這些都是十七十八世紀初等教育方面最主要的新現象。學校法令對學齡兒童強制入學的要求，也是一種新現象。

但在物質條件缺乏（學校數量極少）和德國人民經過三十年戰爭後所遭受的經濟文化落後性的條件下，這種強制性實際上定不能實現。

在初等學校中施行國語教育也是學校生活的新現象。這種教育最初施行於十六世紀，但那時只有少數學校採行；到了十七世紀，施行國語教育就成了學校生活的普遍現象了。

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學校法令主張採用教授法中的記述性原則（在教室中懸掛圖表）；規定教師和全體學生共同研習；即一定時期的上課制度。

在這些法令的教授法的指示上，留有夸美紐斯及其先人德國教育家拉德開（註）的教授法原則的強大的影響。

但在學校的實踐上，這些法令的指示是很少付諸實施的。實行這些指示的只有少數最大的城市。成

（註）拉德開（Wolfgang Ratke, 1571—1635年）在十七世紀初期提出國語教育的要求，即

述性的原則，由淺入深和由事實而結論的教育過程，以及其他為夸美紐斯更完全和更深刻地所發揮的教授法原則。



爲三十年戰爭後果的德國，貧困和落後現象，以及封建壓迫的加強，給了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學校生活一個很大的打擊。

初等學校中的課程內容大部份只限於閱讀、書法、計算、神學和唱歌。一六四二年的哥特法令規定學校課程內容如下：

第一級——宗教問答、讚美詩、祈禱。字母、綴字、開始閱讀。

第二級——宗教問答（續）、祈禱。閱讀、書法。加法、減法、乘法。

第三級——宗教問答、祈禱。閱讀、書法。算術（四則習題和三率法）。

在梅蘭希頓和夸美紐斯的影響下，定時上課制至少在城市學校中已經實現了。

城市初等學校尤其是鄉村學校中的大部份授課時間和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宗教教育上的。學校在對新教的關係上是起了服務的作用。每個學生要背誦路德的「宗教問答」。

德國國民教育史家包爾生（Friedrich Paulsen）對十八世紀的德國初等學校曾作如下的描寫：「甚至在較好的學校裏，有許多學生，尤其是不經常上課的學生，除了學些讀書和背書的能力以外就甚麼都學不到……另外一些祇有冬季上課的學生化了多年的心血去記誦字母，綴字和讀字，結果只得到了比較強差人意的成績；習字只是依字母描繪，總之，以辛勤勞動的代價所得到只是一些重覆了多次的宗教問答的對答和聖書中或讚美詩中某段文字的機械的背誦」（註）。

在城市中，充當教師的人是沒有受過教育訓練而以教育爲職業的人。在鄉村學校中，「學校導師」通常是寺僧和手工業者（大部份是裁縫和鞋匠），他們是把教書當作副業來和他們直接的工作配合起來的。腓特烈二世曾手令把鄉村學校教師的位置給與退伍軍人。學費是由學生家長負擔的。一部份學費以現



款繳納，一部份以自然品——農產物——繳納，這兩種學費都是數額極微的。教師的物質條件是很困苦

的。學校的級階劃分是很嚴格的。雖然初等學校已經很發達了，而特權階級（貴族階級，僧侶階級）却不把自己的兒童送到這些學校裏去。

從宗教改革時期起，德國境內因教師和學生的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實行了學校劃分。新教學校不招收天主教徒的子弟，天主教學校也不招收新教徒的子弟。

城市中的學校是全年授課的；鄉村學校夏季停課，以便兒童參加田間工作。每星期授課三十四天，每天六小時。

男童及女童學校在城市中是分別設立的。在鄉村中，如果公社不能開辦單獨男童和女童學校的話，那就進一個學校，由一個教師擔任教導，但課堂得用屏風隔開，以便教師在男童一邊授課時，叫女童練習書法，他能在屏風上面，察看女童在教室中做些什麼。然後他轉到這一邊授課，叫男童自修。

依照一七六三年腓特烈二世的學校法令，冬季授課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一時，下午一時至四時。星期三及星期六下午無課。夏季僅授晨課。法令雖然規定慎選師資的重要，但在缺乏訓練師資的師範教育的條件下，這項規定暫時只成爲紙上談兵，而一七七九年腓特烈二世本人又手令將國民學校的教師位置優先讓與殘廢的退伍軍人。

學校的監督是委與僧侶階級負責的，宗教教育依照一七六三年的法令在初等學校的課程中佔了統治的地位。神學科是每天都有的。此外，在初等學校的課程中有德文讀本和書法、算術、唱歌。一七七三年的薩克遜尼學校法令規定除這些科目之外還添授德國史地知識及農業知識。但在多數情形下這個課程計劃是不曾實行過的。

蓬勃發展的生活提出了城市市民高等教育的要求。這就引起了十七世紀的市民學校（高級初等學校



的出現。在這些學校裏，除了讀本、書法、算術、神學以外，更添授幾何、自然科學、地理、初級物理學；有時更添授各種專門科目（簿記、商品學、測量學）。

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期德國初等學校和一般國民教育的發展上，虔信教徒起了極大的作用。虔信教徒（*Pieters*）是新教分離派的信從者，他們認為宗教生活的重心，不是教條而是虔信（*Piety*）和對鄰人的愛。虔信教徒提出提綱說：「對鄰人的一滴愛，比一洋學術還寶貴」。虔信教徒既背離新教正統派而自成分離派，所以努力吸引民衆到自己的一邊。爲了這目的，虔信教徒舉辦了大規模的慈善事業，開辦了大量的貧民學校。

在虔信教的國民教育方面的活動家當中，最著名的是佛蘭克（*August Francke* 一六六三—一七二七年）。他在哈勒（*Halle*）創辦免費的貧民學校，孤兒院和流浪兒童收容所，奠定了神學師範學校發展的基礎。到佛蘭克逝世時爲止，他所創辦和主持的教育機關已發展爲一完整的網狀組織：（一）神學教育學院，（二）拉丁學校，（三）許多城市的德文學校，（四）孤兒院。這些學校中的學生總數共有二千四百人，教師總數爲二百十八人。他的弟子在許多城市和鄉村學校的開辦上也展開積極的活動（在他們直接參加下在普魯士一地創辦的學校約有二千所）。

虔信教徒的思想出發點是人類天生罪惡性，他們認爲克服這種罪惡是需要經過基督教教育的薰陶的。而基督教教育據虔信教徒的解釋主要是由感官教育和意志教育達到的。他們認爲學問（實際上是積極的基督教）必需不脫離生活。工廠手工業的發展，使虔信教徒不得不在基督教教育的標幟下，把手工一科列入他們的學校課程表中（製木、製玻璃、裝訂等工作）。

虔信教徒在學校教育中所採用的方法論的原則就是明白性、記述性和學生自動性。夸美紐斯的教育學給虔信教徒的學校方法以極大的影響。虔信教徒的教育雖然建築在宗教基礎上，虔信教徒學校中的宗教教育雖然佔了極大位置，而他們的教育活動尤其是他們的教育方法仍應被視爲當時進步的活動和方法。



佛蘭克甚至為學校設置了自然及歷史博物院；物理學的教授以實驗為依據；學生經常舉行自然界的參觀。佛蘭克的一個弟子就在虔信教徒興辦學校的同一城市裡（哈勒）開辦了第一個實科中學校。但是虔信教徒教育學中的現實主義傾向是和宗教傾向相配合的：在每天七小時的校課中有三十四小時是授神學的。

### 拉丁學校 中學校

為城市貴族和最富裕的新興資產階級而設立的中等學校是古典的學校。這種學校是由梅蘭希頓所首創的拉丁學校發展而成的。三級的拉丁學校往往擴大成為五級和六級（而在最大的城市裡更擴大為八級和九級；在這擴大的形式下就改名為中學校）。十六世紀後半期在德國許多城市裏還開辦了許多依照司打麻中學校形式的中學校。拉丁文及希臘文的文字和文學依舊佔了學科中的主要部份；但除了這些學科之外也添入許多別的科目（算術、幾何）。這些中學校的主要目標是在訓練德國許多封建公國的官吏，和訓練將來担任「學術職務」的人（法官、醫師等）進入學深造。當然這些學校也照舊訓練未來的牧師；但是過去成為中學主要任務的這一任務，在十七—十八世紀時已只佔了次要的地位了。行政的需要和國家影響的加強就這樣的改變了中學校的目標。

還在十七世紀上半期，在所有德國較大的城市裡（柏林、司都加特、蓋丁根、佛蘭克福、紐倫堡等）幾乎都有了中學校。在別的許多城市裡有四級至六階的拉丁學校。

三十年戰爭結束以後，破壞了的中學都告恢復，並創辦了許多新中學。在這種情形下，在教育工作的組織上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許多教育理論家反對古典主義的極端的崇尚，和提出了國語文法及法文文法研究的必要。

法國貴族是當時德國地方貴族模仿的對象。過去強制中學生在校內操拉丁語的要求已經逐漸被取消了。中學校的任務不但是要給學生具備應付大學考試所必需的一般的知識，而且是要訓練一種會在「上



等社會」週旋的有禮貌的青年人。因此許多新的學科都被列在中學校的課程中：德文（國文）、法文、英文、幾何、天文、系譜學、紋章學、歷史、軍事學、建築學。

※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中學漸漸地以訓練貴族子弟爲自己的目標了。如果這些中學校中還有少數非貴族的學生的話，那他們已被置於特殊的地位，和貴族子弟是有分別的了。當時的一個中學校長這樣寫道：「我們用來區別貴族子弟和其他出身低微的學生的方法，也還有：第一，容許他們對教師表示更親密、更友愛和更放縱的態度，第二，解除他們某些其他學生必須參加的課內外工作」。

自中學校中的貴族傾向加強以後，教育就帶上了皮相性；多種學科的性質在課程計劃中開始佔了優勢，而損害了教育的深度。

## 騎士 學院

除了這些逐漸貴族化的中學校以外，在十六世紀末期尤其是在十七世紀（威斯特弗里亞和約締結後）更出現了以訓練貴族青年擔任宮廷中的文武官職爲目的 高等學校——騎士學院。這些學院的階級性是很明顯的。

這種學院產生在杜平根（一五八九年）、加塞爾（一五九九年）、哈勒（一六八〇年）埃林根（一六九九年）、勃朗登堡（一七〇四年）、柏林（一七〇六年）等地。它們的課程計劃雖互有不同，但大致由下列各科構成：

- （一）神學。
- （二）論理學。
- （三）民法。
- （四）國家法。
- （五）世界史及地理、年代學、系譜學、紋章學。
- （六）修辭學。



- (七) 數學。
- (八) 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
- (九) 騎士訓練(騎馬、擊劍、舞蹈、射擊、矛及槍的使用)。
- 選科有：

(十) 邏輯與形而上學。

(十一) 物理學。

(十二) 天文學。

(十三) 西班牙文及英文。

(十四) 築城學、建築學、機械學。

### 實科中 學校

中學校中的貴族傾向的加強，「社交」教育及文武官吏訓練的目標的樹立，都是和資產階級的要求背道而馳的。後者需要傳授工商業知識的高等教育。這就促成了實科中學的誕生。

資產階級過去是在「商業學院」裡得到必需的實際知識的，這種商業學院是私立的，最初在十六世紀初期發生於意大利，後來在十七世紀初期發生於德國若干城市中，如一六二七年在洛多克，其後又在亨堡。可是這些學院的數量並不多，所教授的只是一些狹隘性的職業性的商業知識，這可以從「亨堡商人學院」的課程表中看得到(宗教、歷史、商業地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英文、簿記、商品學、商品計算)。

日益發展的資產階級日漸感覺到作為職業基礎的一般教育的需要。過去那種主要爲了訓練僧侶階級和十七—十八世紀時期爲了訓練貴族階級而設立的中學校，已經不合於資產階級的需要了。後者因此在十八世紀初期提出了一半普通教育一半職業教育的新型學校——實科中學校——的計劃。



第一個這樣的中學（「數學、機械及經濟實科中學」）是一七〇八年虔信教徒齊姆拉（Zemmler）在哈勒創辦的。

齊姆拉在編訂該校課程計劃時說道：我們的學習是爲了生活，「而生活要求計算重量、金屬、木料、顏料的知識，利用兩脚軌和定軌的知識，農耕、園藝、養蜂、天文、地理、解剖、行政法律及德國歷史等的知識」。第一個實科中學的課程內容包括下列各科：

（一）數學，（二）物理學與機械學，（三）自然科學，（四）圖畫與製圖，（五）天文，（六）地理，（七）法律。

在教授方法上，廣泛的採用記述性（圖畫、表格與模型等）。

第一個實科中學存在不久。一七四七年海克爾（Heckel）在柏林又創辦了一個「經濟數學實科中學」，該校分八級：數學、幾何、建築、地理、自然科學、工廠手工業、商業及經濟。學生可依照自己的志願，選擇上述任何一個專門的學級。各級均教授圖畫。經常率領學生至工廠參觀。

十八世紀後半期，是德國工廠手工業迅速發展的時期。由於這，實科中學開始在德國許多城裡產生了（一七五六年在威典堡，一七六四年在哈爾伯斯特，一七六五年在不律斯勞等處）。在普通中學中，開始產生了實科學級或專科，以便招收願意研究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及製圖繪畫的學生。

## 大學

前面我們說過中學校的官僚主義化的過程，中學校之變爲訓練官吏的貴族學校的那種變化過程，我們在十七—十八世紀的德國大學發展上也能夠看到。

在這一時期，新大學的開辦是很少的。在原有的大學中，教會影響日漸減小，而國家的影響日漸加強。教授改由政府委任（以前是由大學自己選聘的），大學的自治權也大受削弱了。教育時期縮爲三十四年。學生數量以法科爲最多。學生的社會成分起了極大的變化：在十七世紀尤其是在十八世紀，貴族甚至有官銜的貴族佔了學生百分比的最大的部份。



時代的矛盾明顯地反映在這些大學上。一方面，在這些大學裡可以看到官僚主義化的過程，企圖把大學變成封建小公國的機關和學生中貴族中間層成份日益增加的事實。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發達，新的哲學學派的誕生（培根、笛卡爾、萊布尼茲等），促成了以哈勒大學為中心的大學運動。

這個大學的實際領導人是哲學家基督教徒倭爾夫（Wolf 一七五九—一八二四年），法學家多瑪齊（Thomasius）和我們已經知道的虔信教徒神學家佛蘭克。這個大學反對經院主義的教育方法和內容，反對拉丁語和希臘語的強制學習，而實施國語教育，提出科學研究的自由原則，採用歸納的研究方法（受培根影響），以代替原有亞里士多德影響下的演繹方法。大學的課程範圍擴充了：添授地理、應用數學、物理、歷史、政治、法律。大學實驗室和陳列室也出現了。代替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而教授理性主義的哲學。代替過去的辯論制而產生了研究制。有系統的講學代替了過去的經典的講解。

模仿哈勒大學而創辦的有海丁根大學（創辦於一七三七年）和埃林根大學（創辦於一七四七年），這些大學在全國其他大學的改造事業上起了領導的作用。

## 二、英國學校

### 聖公會 的 初等學校

自從英國實行宗教改革（一五三四年）以後，英國境內的僧院天主教學校都被封閉了。整個的初等國民教育事業集中於英國教會各種教派和宗教組織的手裡。大批私立學校（家庭學校）出現了。

英國初等教育在十七世紀上半期的發展是很緩慢的，遠遜於德國初等教育的發展。祇有在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影響下，在英國初等教育方面促成了若干的變動。

當然，英國民主階層的人民對於當時學校數量的缺少和教育內容的貧乏是很不滿意的。他們提出了



普遍教育、發展學校網及學校接近生活需要、勞動教育等要求。夸美紐斯曾對這些要求起了若干的影響。夸美紐斯曾把他的著作摘要送給他的英國朋友，並應英國國會之請甚至於一六四一年親自訪問了英國。

自英國二次革命（一六八八年）以後，英國資產階級在一六九八年建立了第一個聖書公會（「基督教知識普及協會」）。稍後（在十八世紀）又產生了一個同類的「福音普及協會」，一七五〇年產生了一個「貧民宗教知識普及協會」。

這些英國資產階級宗教慈善團體的目的，是在對勞動大眾作思想上的訓練和在英國殖民地（主要是印度和北美）人民中實行傳教活動。英國資產階級和貴族選定聖書為思想上訓練民衆的工具，聖書公會爲了聖書的閱讀就不得不普及初步的識字教育。同時這也是爲了滿足發展中的工商業需要相當數量的識字工人和低級雇員的要求。

在「貧民」識字教育的普及上，展開了最廣泛的活動的是美以美教徒（Methodist）——接近於德國虔信教的分離派的信徒。到十九世紀中葉，美以美教徒在英國本國尤其是在殖民地中共有三九〇三個禮拜堂，六九三個傳道師，一一七〇三個志願教師，和九八五個受俸給的教師。這時美以美教會學校的學生數共有一一三六〇〇人。此外美以美教徒在英國本國及殖民地還開辦了大量的禮拜日學校（到十九世紀中期禮拜日學校的學生數共有四三七〇〇〇人）。

## 中 學

十七—十八世紀的中學校，是依十四—十六世紀時期所創辦的中學校——溫徹斯特、伊頓、倫敦等處的聖保羅學校——的形式發展起來的。在英國本國及其殖民地北美洲等處依照德國拉丁學校的形式而創辦的，有大量的四年制的文法學校。

英國中等學校作爲形式上和國家獨立的學校（在行政、監督及財政意義上）是發生和繼續存在於十七—十八世紀。



這些學校的物質基礎大部份是私人慈善家所遺贈的資金。遺贈者往往限定學校管理的方法和甚至課程的內容。

在老式學校中（伊頓、溫徹斯特、席夫茨伯里、列格比、威斯特明斯特、哈羅等處的聖保羅中學）確立了幾世紀的傳統和階級籍族思想。在這些學校中受教育的幾乎完全是貴族階級的子弟。所有學校都是寄宿舍學校。學生的學膳費都是極高的。

當時英國每個中學校的課程計劃都是自行規定的，因此國家和教會都無從整理學校的事務。但在這些學校課程計劃上也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極端的保守主義和古典主義的流行。

拉丁文及希臘文文法，拉丁文及希臘文的名著（西塞祿、威吉利、賀拉西亞、荷馬、克萊羅特等的著作）閱讀，由英文至拉丁文及希臘文的翻譯，應用上述各種文字的詩歌創作，以及希臘文的韻言書的閱讀——就是十七—十八世紀英國著名中學校的課程的內容。英國歷史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描寫貴族中學校的情形說：「只應用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文法。學校的練習以古典著作和詩歌散文的創作為目標。另外的科目像法文、算術、數學等，在這些學校裡是不教授的」。

在為資產階級而設立的中學中，課程內容不是這種單方面的古典的學科；在這裡，除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以外（固然還是佔了統治的地位），也教授數學、地理、歷史和各種新的語言。

在英國中學校中，廣泛的採用體罰。年幼學生須對年長學生服務；他們要為他們的保護人——年長學生整理房間，預備飲食，洗滌衣服，同時年長學生也給年幼學生相當的保護，幫助他們預備功課，庇護他們免受欺凌，等等。

古典的中學校不能滿足英國資產階級的要求。運動發展的工商業生活日益迫切的需要以數學、自然科學及新興語言為教育中心和除了普通教育學科之外也有某些應用學科的中學校。

在十六—十七世紀時期，許多進步的學者（包括著名詩人米爾頓 John Milton 和著名經濟學家彼底



William Petty) 都曾提出了實科中學校的組織計劃；但是這些計劃都沒有實現。

還在十六世紀中葉，季爾白德 (Gilbert) 就提出了一個學院的計劃，其中新興文字應代替古典文字的地位，並應教授數學、航海學、農藝學、自然科學、軍事學。但這個計劃並不會實現。過了一世紀，著名詩人米爾頓 (一六〇八—一六七四年) 在他的「教育論文」中也提出了實科學校的計劃，但他不主張廢除拉丁文和希臘文，而要求這些文字服務於實際的目的；研究古代哲學家討論農業、自然科學、歷史、政治等問題的著作。米爾頓認為中學校中最主要的學科應為數學、自然科學、歷史、地理、政治、法律。在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時代，他曾痛斥英國中等學校的脫離實際生活、經院主義和形式主義。米爾頓寫道：「不從外感覺器官所能接觸到的最淺易和最明白的知識入手，却給新生教授抽象的形而上學」。他提出了一個偏重實科的學院計劃，以與經院主義的學校對抗，他所標榜的教育目標，是在訓練一種會執行國家任何使命的人材——公民。

### 勞動教育的要求

在革命前，一六四六年，經濟學家彼底 (一六二三—一六八七年) 提出一個學校改革的計劃。他批評當時學校脫離生活的現象。他要求把初等學校變為「科學的工廠」，讓兒童在裡面學習木工，製造物理數學用具，彫刻，園藝等等。繼這種學校 (彼底稱之為「勞動學校」) 之後，為「機械中學」，校中所有兒童，不論貴族平民，除了理論科學之外都應學習旋盤工作，學習製造時鐘、彫像、造船、製造地球儀、羅盤針、香料品等的方法。

一六九六年，經濟學家倍拉斯 (John Bellers 一六五四—一七二五年) 提出一個「勞動學院建設計劃」。他在這個計劃中，繪出一幅全體成員參加勞動的社會主義公社的圖景。他在這個計劃底下附了幾句箴言：「勞動帶來財富。懶人應該穿破衣。誰不勞動，誰不得食」！馬克思曾不祇一次地引用了倍拉斯的話，他給了他高度的評價，稱它為「政治經濟史中的真實現象」。

馬克思稱倍拉斯「還在十七世紀末葉就已完全明白地懂得了今日的教育有取消的必要……」(註)。



倍拉斯所了解的「學院」，就是社會主義的生產合同體，其中有三百社員經營農業和工業。學院生產本身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全體社員消費所餘的剩餘物品則歸公家貯藏，或作擴充生產的消耗。

倍拉斯詳細證明，社會教育遠比私人教育寶貴，因為「學院」中的教育是把勞動和學習配合起來的；全體兒童對於所研究的材料能夠更容易領會；各種生產方法和生產工具對於全體成人都是熟悉的。兒童可以經常處於互相接觸的環境中；學院中的勞動紀律對於兒童要起鉅大的教育的影響：「兒童看了別人怎樣工作和怎樣愛惜時間之後，就會不想到遊戲，而去研究一種生產的方法，工作對於他們不會比遊戲更苦了。他們看了別人怎樣工作之後，也就會去模倣他們，而模倣給他們的滿足，也和遊戲一樣的多。這樣他們要比成年人更容易進行學習，和得到勞動的習慣」。

倍拉斯極重視教育，認為利用正確的教育方法可以改造一個社會。

倍拉斯是勞動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認為「男女兒童從四—五歲起，除了學習讀書之外還要學習編織和紡織等等。而更長大的男童還要在旋盤上工作」。

兒童要學習閱讀、書寫、計算；要給他們智力教育。說到學校教育，倍拉斯反對用八小時的坐讀去折磨兒童，反對機械的背誦，而要求發展兒童的言語。他要使教育變成活的教育，使教育和生產勞動聯系：「和肉體勞動無聯系的敬育，沒有比怠惰好多少，勞動是給生命的燈添油，思想是給他發火」。

倍拉斯認為勞動在教育體系中之重要，是因為它不僅是訓練某種職業的方法，「而且能使智力機敏，能鍛鍊意志和加強為善的心理」。

重視社會教育，重視教育和生產勞動聯系，反對經院主義學校，這些都是倍拉斯教育學說中最有價值的成份。



倍拉斯在英國革命時代表現了民主主義的民衆在教育上的要求。

### 三、法國學校

#### 初等學校

我們已經知道，德國初等學校從十六世紀起是由國家經營的，國家在這方面活動所憑藉的是新教主義的教會。我們也知道，英國在這幾個世紀裡初等教育是私人 and 公共的尤其是聖書公會的事業，政府在這方面絕未有任何措施。

法國在同期初等教育發展的事業上佔了英德兩國初等教育組織體系之間的中間的地位。這裡也像在德國一樣，從十六世紀後半期起（一五六六年，一五六七年，一五九八年）頒佈了關於兒童強制入國民學校的法令。在十七世紀期間，頒佈了八個關於男女童強制入學及每一教區設初等學校一所的勅令。

第一個這一類的勅令是一六〇六年頒佈的。一六二六年路易十三頒佈一個法令，命令所有學校服從天主教教區牧師的監督。在寬容異教的南茨（Zurich）勅令取消以後，路易十四又對韋格諾教（Hugonots）大肆壓迫，於一六八五年頒佈一個法令，命令所有十四歲以下兒童，尤其是父母改信新教的兒童一律強制入天主教初等學校。在十八世紀期中，又頒佈了幾個強制教育的法令（在一七〇四年，一七四一年）。責令法院檢察事調查未入學兒童的姓名，並叫他們父母負責。

國家政權在初等教育事業中的作用自然不限於這些法令的公佈。實際上法國初等學校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時期已經落到宗教聖會的手裏（天主教會及各種教派）。

還在十六世紀，在天主教會和韋格諾教進行殘酷鬥爭的時代，交戰中的兩方就都開辦學校，把學校當作鬥爭工具之一。在寬容異教的南茨勅令頒佈以後（一五九八年），天主教和韋格諾教在學校事業上的鬥爭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格外擴大，因為教育成了這兩種宗教勢力影響人民的最主要的工具了。



無論天主教會和韋格諾教，都在學校開辦上展開了大規模的活動力。自然，初等學校，無論它是天主教的或韋格諾教的，都不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普通教育知識和習慣上，而放在宗教教育上。當時國民學校的學科，有宗教（聖史、祈禱、宗教問答）、閱讀、書法、計算、和教會音樂。

我們知道在南茨勒令頒佈以後，改信新教既獲得自由，許多教派就開辦了自己的學校。

天主教會爲了反對這些學校，也開辦了自己的學校，而在南茨勒令取消以後，更強迫所有父母已改信新教的兒童入天主教學校。十八世紀天主教初等學校數量所以較多，可以拿這種宗教鬥爭來解釋。

誕生於十七世紀上半期的冉森教（Jansenists），在法國韋格諾教及天主教之間佔了中間的地位。冉森教的運動是一部份資產階級的活動，他們一方面不願和天主教會完全破裂，另一方面又不滿意封建的天主教會的行動。冉森教有時就被稱作「天主教中的虔信教的變種」。

冉森教的基本宗教教育思想就是確信人類天然的情落性和罪惡性。冉森教承認無限祝福和定命論等的學說，而接近於新教主義的加爾文教的變種，也因此而受到教皇的譴責。

冉森教徒由人類天然罪惡性的信仰出發，認爲對兒童的態度必需特別憐憫和慈愛（他們不自知地認爲最初的罪惡是由嬰兒初生時起就已產生的），在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爲必需對兒童實施二重的監視，以防止這種「天然罪惡性」的發展。爲要實施這種監視，每級只能有少數學生（一個教師教五、六個）；爲了避免城市生活的誘惑，冉森教的學校都設在鄉間。教師應將所有知識教給學生。不採用體罰。

冉森教徒認爲發展判斷和理智，是教育中的主要的成份。在這一方面，表現了笛卡爾的強大影響！冉森教徒在某種程度上會自認爲是笛卡爾的學生。他們認爲發展理智是道德教育最好的方法。

冉森教徒從嘉爾特教團（Cartesian）的哲學原則中，作出了教育結論：在學習上，要遵守漸進性，在吸收教材時，需要自覺性和自動性。冉森教徒對當時學校中所流行的機械背誦是持否定態度的。

冉森教徒批評學字法的閱讀教育，要求兒童根據他們的實際發音認識字母。



教育由國語開始，學習國語須特別仔細。在學習一種功課時，冉森教徒主張少提出規則，多舉行練習。在冉森教的這些教育方法上，反映了夸美紐斯及其學生的某些影響。

冉森教的學校雖然沒有大量的量的發展，但在初等學校教育方法的質的進步上，冉森教却在教育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

第一個冉森教的學校是一六四三年在巴黎附近的坡爾·羅耶爾 (Port Royal) 修道院中創辦的；後來在巴黎也產生了幾個同樣的學校。當時許多大學問家如著名的數學家帕斯卡爾 (Blaise Pascal, 一六二三—一六六二年) 等都團集在這些學校的週圍。耶穌派教徒對冉森教展開猛烈的進攻，就在他們要求之下存在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時期的冉森派的學校都被封閉了。

天主教初等學校的空虛貧乏及其完全不適應於時代需要的狀態，實施國語教育（代替拉丁文教育）的資格諸教學校及冉森教學校在廣大民衆中的影響的擴大，使天主教教會不得不建立它的新的宗教組織，以從事初等教育活動，因為耶穌會教徒向來是把全部注意力完全放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上的。

天主教牧師拉沙爾 (Jean Baptiste de La Salle, 一六五一—一七一九年) 在十七世紀末葉所創辦的「基督學校同胞團」，就是這樣的組織。這個組織也像耶穌教團一樣，在初等學校的開辦上展開了積極的活動。到一七八九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時為止，法國境內「基督學校同胞團」所辦學校已有五百五十個學級，八百個教師，和三千六百個學生了。

拉沙爾依照耶穌會的學校法令的形式，編製了一個「學校經營計劃」（一七二〇年），規定初等學校的組織和經營方法。這種學校的學科，有閱讀、書法、算術四則、及初步宗教。各科都用國語（法語）教授。實行學級上課制以代替過去流行的個別教授。每一級的學生，依其進修程度的高低，分爲弱、中、強三組。在教授時，教師應使學生對所學習的功課「完全領悟」；並極重視學生的自修。

除了這些原則以外，拉沙爾又從耶穌會的教育學中襲用了許多關於初等教育的方案。例如他介紹互



對監督的辦法：一個「聰明」的學生負有監視其餘學生的行動的責任，而且他要把他所注意到的行動告訴給教師，但要做到使其餘學生不注意他的告發。一個犯了過的學生如果能把別的學生的行動向教師告發，他自己就可免受處罰，教師而且還要向其餘學生解釋：「他之所以要告發你們，只是爲了愛護同伴」（一）。

在「基督學校同胞團」所辦的學校中，都採用體罰，拉沙爾在他的「學校經營計劃」中，更給這種體罰訂成完整的法規，規定鞭打的位置，皮條的尺寸等等。爲要養成學生守紀律和專心的習慣，「基督學校同胞團」就提倡教室中絕對靜肅；學生須注意教師無聲的記號。

天主教教區學校的教師，往往是些完全沒有教育經驗的人——僧役、手工業者、旅館主人等等。「基督學校同胞團」因此提出了訓練小學師資的思想。法國最初在雷姆斯（Rheims）和巴黎的師範神學校，就是「基督學校同胞團」所創辦的。

在估計「基督學校同胞團」的活動價值時，要着重指出的，就是這些學校雖然在廣大民衆中努力推行天主教教會的影響，但同時也不能抹煞它們的一些積極的特徵（國語教育，分級上課制，初期的師範神學校，免費教育）。這些特徵是法國初等學校中的新現象。

### 弗努朗的 教育觀

法國在十七世紀時期，從其發展程度上說來，超過了歐洲其他各國（除英國外）。這表現在法國哲學（笛卡爾）和教育學的發展上（冉森教徒等）。在十七世紀末葉（一六八七年），法國出現了一部當時極神動的教育著作，弗努朗（François Fénelon）的「處女教育論」。

弗努朗是天才的教育實踐家，他在這部著作裡概括了他們教育經驗，用新的方法提出了許多教育問題。

他認爲在兒童的幼年期中就要注意體育教育。要鍛鍊兒童，避免一切刺戟情感的事物。



他的教育體系的基礎——這是下面一個三聯：順應天性——避免暴力——把滿足變為鼓勵的方法。他認為智力教育應該建築在兒童的天然好奇心之上。學習永遠要使兒童認為是一件樂事。「讓兒童去遊戲，而且把遊戲和學習結合起來，要使智慧通過一種中間物——和顏悅色的面孔去迎接他們」。道德教育要建築在良好的實例上。

除了這些思想以外，弗努則對灌輸天主教教會精神的宗教教育也特別注意，他要求宗教教育應從幼年期的兒童開始實施，並以感情為基礎。

弗努則的「處女教育論」一書，是法國教育學中第一部經典式的著作。它曾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對於後來教育思想及教育實踐的發展有着極大的影響。

## 中學

幾乎所有法國中等學校當時都在耶穌會教徒的手裡（直到一七六四年耶穌會被逐出法國為止）。

## 校

他們為特權階級的子弟開辦了許多學院。上面我們在第五章裡所說過的關於耶穌會教育的基礎和耶穌會學校的教育組織及教育內容等的事實，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法國耶穌會學校裡也是非常流行的。

在十六世紀末期（一五九四年），耶穌會曾暫時被逐出法國，後來到一六一八年，才恢復他在這裡的教育活動。就在這個時期，一六一一年，產生了一個以發展中學為目的的新組織。這個組織就是奧拉托里（Oratorian）。這個組織的產生，不僅說明了中等教育的前途一時被暴露，而且也說明了自由主義的貴族階級和資產階級對耶穌會學院日益增長的不滿。到一六二九年時，已有五十個中學在奧拉托里派掌握了。

該派中學校的低年級各級，是用法文施教的。在耶穌會學院中不受重視的數學、物理、地理、歷史等科在該派中學學科中佔了很大的位置。該派最著名的教育家都以笛卡爾的理性主義哲學為依據。該派



許多教育家在一七八九九年法國革命時期都曾站在資產階級政黨的隊伍裡。所以，奧拉托里派的中學在法國革命前專制君主政治時代已經是資產階級型的中學了。

## 大學

十七—十八世紀的社會生活的發展，新哲學的誕生，自然科學的發展，在當時法國各大學中的反映是很薄弱的。直到革命爆發時為止，法國各大學仍是天主教宗教勢力的中心。

法國大學網在數量上是極大的——共有二十二個大學。其中最大多數是十六世紀以前產生的（在以後三世紀中祇創辦了六個大學）。

大學生的數量在十七—十八世紀時甚至日益減少。這減少的原因是大學教育精神和新的生活要求間的日益生長的矛盾。

大學通常設四科：預科——「藝術科」（哲學科）和專科——神學科、法科、醫科。學生數量較多的是藝術科，尤其是在十七世紀末葉以後。一七六二年耶穌會被逐出法國後，被封閉的耶穌會學院的大部份學生都改入大學藝術科。神學科的學生由於教會影響的跌落和學習的困難及學習時間過長，所以數量也日見減少。醫科學生的數量最少。例如法國最大的大學——巴黎大學共有五千學生，一七八九平時在醫科各級中就學的總共只有六十個人。

在大學教育上，尖銳地反映出十六—十八世紀哲學、數學、自然科學的成就和凍僵了的大學經院主義教育方針間的全部不調和性。例如，還在革命的前夜，當啓蒙哲學已經風行於先進的法蘭西的時候，在法國各大學的藝術科裡還在教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物理學是完全不研究運動法則，物體下墜法則，瑪里奧德（Mariotte）法則，液體平衡法則和近世其他科學發明的（除了兩三個設有實驗物理學講座的大學以外）。

哲學教育的經院性和脫離實生活的性質，表現在下面一些哲學主題上：「論神之統一」，「論靈魂的非物質性」，「論善惡之區別」，「論神之預見」等等。



數學祇限於算術、代數、幾何、和一小部份天文學及三角的知識。雖然那時已經發明了微積分的計算，建立了解析幾何等等。

因此，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對法國大學的批評，都是持了否定的態度。在給三部會議的許多訓令中，可以看到改革大學的要求。在法國革命時期，國民會議會將大學——這一天主教教會勢力的支柱——作了根本的改造。



## 第九章 盧梭的教育體系

### 十八世紀 的法國啓 蒙哲學

我們在第七章裡說到洛克的教育體系時，知道資本主義工業和資本階級的發展會促成了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和造成了新哲學及教育體系產生的前提。我們在洛克那裡所看到的，有作爲反抗封建制度的國家起原的契約論，作爲反對教會和貴族的先天思想的否定，洛克的理神論，實驗心理學的誕生和新認識論中的外部經驗及感覺作用的強調，高度的教育評價，發展外感覺器官的要求等等。

我們在說到洛克時，知道他給十八世紀的法國啓蒙哲學以極大的影響，這種啓蒙哲學在反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教育的鬥爭中比洛克更爲進步。

我們在上一章裡說到西歐最主要各國的學校情形時，知道這些國家（尤其是法國）的學校，不能符合於資產階級日益增長的需要。因此在初等學校方面有各種教育學派的出現（虔信教、冉森教），有第一批實科學校的誕生，有法國境內耶穌會學院的破壞，理性主義哲學對法國中等學校的影響（奧拉托里派的學校），教育方法的鉅大變動（國語教育的實施，疊字方法的批評等等）。

可是這些變動祇反映在少數學校中。絕大多數的學校還是掌握在教會手裏，而採行嚴格的紀律，機械的背誦，經院主義和體罰。自然，隨着法國革命的接近，對舊教育的批評也日漸尖銳化，以致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形成了許多新教育體系。

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在法國所進行的速度遠比英國爲慢。但到十八世紀中葉法國生產力的發展已對原有的封建關係引起深刻的矛盾。工場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受到了封建舊法規的阻礙。封建貴族和僧侶階級變成了真正的寄生者，掠奪了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把全部政權操縱於自己手中。經濟上實力



強大的資產階級在政治關係上是無權利的。

這些矛盾漸漸成熟以後，就引起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革命的思想上的準備是在十八世紀上半期封建制度下的法國哲學和文學領域中開始的，而隨着十八世紀末葉的接近，思想準備也漸趨猛烈。

法國啓蒙哲學者的觀點成了十八世紀法國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當時資產階級所表現的是內部尚未發生分裂的整個第三階級的革命要求。

十八世紀法國啓蒙哲學的代表者（福祿特爾 Voltaire 1694—1778，特蘭伯爾 Jean Le Rond D'Alembert 1717—1783，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海爾威西 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賀爾巴赫 Paul Henri Thery d'Holbach 1723—1789，狄德羅 Denis Diderot 1713—1784 等等）對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作了痛切的批評。「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組織，一切都受了無情的批評，一切都被提到理性的法庭面前，證明它們有無生存的權利。理性成了一切存在的唯一尺度了……過去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不合理性的傳統觀念，都像廢物一樣被拋棄；今天以前的世界，祇爲偏見所支配；祇有今天纔看見日出，纔踏進理性王國；從此迷信、不正義、特權、和壓迫，都要讓位於永久真理、永久正義、以及由自然法則中產生出來的人類平等和法令所不能奪的權利了」（註）。

自由平等被啓蒙主義者看成人類的天然權利。啓蒙主義者的整個哲學和一切言論都充滿了理性萬能的信仰。那種應代替封建制而興起的制度都被他們看成永久理性的光芒萬丈的理想的制度。

過去的一切都被繪成偏見和愚昧的結果。因此啓蒙工作被特別重視；人民的啓蒙成了時代的口號，甚至在歷史上得到了「啓蒙時代」的名稱；啓蒙事業被看成偉大的政治力量。

（註）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到科學的發展。



盧梭便是在思想上準備了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思想家之一。

## 盧梭 略傳

盧梭生於日內瓦一個鐘表匠的家庭裡。在受畢初等教育之後，他被送到彫刻匠那裏去當學徒。主人性子非常殘忍和粗暴，時常打他，過了幾年，盧梭就逃走了。

於是開始了青年盧梭的流浪時代。他做過役僕、家庭教師、書記等等。後來幸得華爾夫人 (Madame de Warens) 的庇護。盧梭在她的莊園裏住了幾年，利用這個時期補充他的教育。

後來盧梭到了巴黎，加入文學家和哲學家的集團，和第特羅交遊。一七四九年，狄永學會 (L'Académie of Dijon) 提出「科學及藝術之進步有益於道德抑有害於道德」的懸賞徵文。盧梭就對這個題目發表一篇論文，企圖證明人類道德隨着文化的發展，也日趨墮落。

盧梭在第一篇論文裡，已經把他在後來所有論文中所發揮的見解，明白地公式化了：人類在原始狀態下是平等和自由的；他們的道德在「自然狀態」中是比後來在「人工」的政治制度下更為高尚。文明人是在奴隸制中誕生、生長、和死亡的。文明沒有給人類帶來幸福。盧梭在這篇作品裡把他的忿怒投到社會寄生者的奢侈和墮落之上。這篇論文因為寫得熱情而極流暢，以致首獎為盧梭所得。

繼這篇論文之後，又發表了另外兩部著作：「人類間不平等之起源」(一七五四年)和「民約論」(一七六二年)。盧梭在論究「不平等之起源」時，證明文明愈進步，不平等也愈進步。一切災難的根源，就是不勞動的私有財產。在「民約論」中，盧梭發揮了過去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和洛克所提出的國家起源的條約論(見第七章)。可是盧梭發揮這個理論，比他們更加明確，也比他們更充滿民主精神。一七六一年。盧梭的小說「新愛洛伊瑟」出版，他在這部小說中批評了封建制度和階級偏見。一七六二年，盧梭發表了一部半小說半論文性的教育作品「愛彌兒」，他在這部作品中，批評了封建教育和經院學校，描繪了新人教育的輪廓。



盧梭在這部作品的第四章裡，描寫「薩伏伊副司教的宗教信仰」，他力斥宗教和教會，教會儀式和教條，並闡發了理神論的宗教原則。「薩伏伊副司教的宗教信仰」是以反對天主教教會為目的的，因此天主教僧侶階級開始迫害盧梭。「愛彌兒」在巴黎廣場上被劊子手焚毀。盧梭在可怕的法國政治監獄——巴斯蒂爾——的威脅下便逃到祖國瑞士（日內瓦）。可是天主教僧侶階級一直追蹤他到這裏，指使一羣狂信的天主教徒攻擊他。「愛彌兒」一書在日內瓦也遭焚毀。盧梭便逃到伯爾尼，最後又逃到英國。

許多年來的不斷的迫害促成了盧梭的精神病——迫害妄想狂——的加劇。

一七六七年，盧梭得到了回法國的許可，他就化名列奴，回到法國，在那裡度完他的晚年。他在這裏寫完了他的「懺悔錄」，一部充滿真誠和心理分析的自傳。盧梭死於一七七八年。

盧梭是哲學家，輝煌的作家，同時是熱烈的封建制的反對者，積極的民主主義者，擁護自由平等的戰士，他在思想上準備了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革命。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聖若斯特（Saint-Just）所領導的雅各賓黨人曾認自己為盧梭的學生。他們從盧梭的民權論中作出自己的革命的結論。

### 盧梭的社會

#### 政治學說

在一七八九年革命以前幾十年中，法國社會生活的矛盾已經非常尖銳化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雖然已成了力量強大的階級，而在政治上還是無權利的階級。一切權利和特權，都在少數封建領主——貴族和高級僧侶——的手裡；一切土地是屬於他們的，但他們完全不繳納地租。宮廷和封建官廳的大量開支，是以從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那裡征收來的苛捐雜稅來償付的，這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總稱為「第三階級」。

十八世紀的法國啓蒙哲學及其代表者之一盧梭在其反對封建制的鬥爭中提出了「自然權利」的學說，這個學說可以簡略地歸納為：一切的人在自然狀態中，是平等和自由的，而後來漸漸被鎖上了枷鎖。人類會締結一個社會契約，把他們一部份的權利自願的交給他們所選舉的政府，這樣政府就要給人民服務



；而成了對人民負責的組織。最高的政權還是屬於人民。然而由於濫用政權的結果，人民又成了被奴役者，壓迫人民的人工的政治制度又成立了。盧梭和其他啓蒙主義者就提出了一種建立在人類天然權利「自由、平等、博愛」原則上的自然制度，來和這種封建制度相對抗。

盧梭提出了「自然的宗教」——「理神教」——來和天主教相對抗。這個宗教的第一個原則，據盧梭對它的了解，是世界是由最高意志造成的。第二個和最後一個原則，是世界之造成既有一定的目的，則因此這最高的意志同時也就是最高的理性。任何儀式、教條、教會、禮拜、以及僧侶階級，在這裡都是被駁斥的。自然權利論反對人類的階級劃分；「自然宗教」則反對人類在信仰上的劃分。盧梭以自然去對抗封建的文化。

## 自然 教育

盧梭所提出的「自然教育論」，是和他的「自然權利」學說完全符合的。這一和自然適應性的原則有密切聯系的教育理論，是盧梭教育體系中的主要的東西。

教育方面的一切要求——兒童由兩親教育，嬰兒由母親撫養，反對兒童早熟等等——在盧梭的教育體系中都是以「自然教育論」為其初步原則的。

盧梭認為，兒童應依自然去施教。盧梭教育學中自然適應性的原則和夸美紐斯對於這一原則的了解的根本不同之點，正是在於盧梭把自然適應性了解為跟隨兒童的自然，也就是說，適應兒童年齡上的特徵，去實施教育。「自然界所希望的，是兒童仍是兒童，却不是要他們馬上變為成人」（註）。

盧梭認為，「我們從自然界中，或從人中，或從物中（Des Choses）得到教育。我們的能力和我們的器官的內部發展，這是得之於自然界的教育；教我們去利用這發展，這是得之於人的教育；我們本身對於影響於我們的客體經驗的獲得，這是得之於物的教育」（L'éducation nous vient de la nature

（註）盧梭：「愛彌兒」第六十八頁。



ou des hommes ou des choses.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e de nos facultés et de nos organes est l'éducation de la hommes; et l'acquis de notre propre expérience sur les objets qui nous affectent est l'éducation des choses.) 祇有當這三種教育（自然界、人和物的教育）在一個方向起作用時，人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得於自然界的教育是不依賴於我們的；得之於物的教育祇依賴我們一部份；得之於人的教育則全部依賴我們。因此盧梭的結論是，得之於人和物的教育要適應「自然界所歸趨」的目標。

這就是盧梭從其「自然教育」（Education naturelle）論中產生出來的自然適應性的見解。在這個見解上，自然適應性被解釋為跟隨兒童的自然發展，幫助他們的天性。

盧梭曾向父母和教師熱烈呼籲：「要愛護童年，鼓勵他們遊戲和娛樂」，不要強迫他們成熟，對兒童的態度要適應他們的年齡。「兒童有他們自己所特有的觀察、思想、和感覺的方法；不要用我們不合理的願望去代替他們的願望」（註）。盧梭激烈反對兒童的早熟，而要求在教育中適應兒童的自然發展的行程。

盧梭對自然及適應自然的兒童發展行程的了解，雖然並不正確，但在他的所有關於教育適應自然的推論上，却非常重視對兒童的尊重和愛護，兒童權利的保護，以及顧慮兒童年齡特殊性的要求。當盧梭在世時，兒童的人性橫受壓制的時代，這些號召會有特殊的意義，並在教育理論中間闢了新的一頁。

盧梭所建立的「自由教育」，是和自然教育有着密切聯系的，甚至可說有着密切依附關係的。「人類自然權利中的第一種權利，就是自由」，盧梭這樣說。這種在經濟上作為反對工商業受封建壓迫和在政治上作為反對第三階級受不平等待遇的自由要求，成了年青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口號。作為對封建



經院主義學校、對機械背誦、嚴格的紀律、體制和兒童個性的壓制的一種抗議，盧梭在教育方面也提出了這種自由的要求。

自然權利論及其所發生的自然教育學說因為建築在不正確的唯心論原則上，所以是不正確的。我們不是「自然教育」的擁護者，更不是所謂「自由教育」的擁護者。我們要指出這些理論的不正確的方法論上的配置。但這些理論是要在歷史的前途上，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去評價的。在盧梭提出這些理論的時候，它們是對封建學校的教條主義和經院主義的抗議，是擁護兒童創造性和積極性的一種鬥爭。

盧梭在歷史「教育文獻中，通常是被認為「自由教育」的擁護者的。上面我們說過，盧梭教育體系中的主要的東西就是自然教育論，而「自由教育」的成份已經是這種理論所產生的東西，是這種理論的歸結（盧梭把自由只認為是一種標誌，是人類最主要的天然權利的一種）。

在這一「自然教育」體系中，他的「人」的教育的思想佔了極大的位置。他以這些要求來反對封建時代所特有的教育中的身份制度，和早期的職業教育。

盧梭反對當時為封建服務的文化。因此在他的教育體系中，對兒童的個人經驗特別重視，要求兒童和青年用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個人經驗，去接觸一切。當然，這種對文化的態度目的雖在反對垂死的封建制度，而其方法是不正確的，這種不正確性在盧梭的教育體系中引起了許多不正確的證據和矛盾。

盧梭把整個青年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四個時期：

### 年齡的分期

育。

從出生到二歲，到開始說話為止，為第一期；在這一時期中，最要注意的是體力教

育。從二歲到十二歲為第二期，盧梭稱之為「理智睡眠」期；在這一時期中，最要注意的是外感覺器官的發展。

從十二歲到十五歲為第三期；在這一時期中，最要注意的是智力教育。



從十五歲到成熟年齡爲第四期；這是「暴風和熱情」的時期，此時應以實施道德教育爲主。

盧梭確立年齡階段的企圖，是很有價值的，但是他們實現這一企圖的方法却是不正確的。這一不正確性尤其表現在盧梭認定二歲至十二歲爲「理智睡眠」期而主張在十二歲以前不必教兒童讀書這一點之上（只許兒童自己學習）。

盧梭每次說到自然教育，總是提出人造的杜撰的年齡階段的公式。但他在「愛彌兒」中具體說到每一階段的教育時，却又往往不遵照上述的公式；例如「愛彌兒」還在十二歲以前就已授與智力教育甚至道德教育了。

「愛彌兒」分五章，每章敘述一個階段的教育；第五章敘述婦女教育。

說到嬰兒說話開始以前的教育，盧梭要求不爲嬰兒裹襁褓。

### 幼年期（二歲

以前）的教育

。體力教育

「初生的嬰兒要自由伸展和活動四肢，使它們不致長久縮作一團而變成麻痺。而嬰兒經常在出無用的力，這種出力消耗了他的體力，或遲緩了他的發展。……你們生出就壓迫兒童；他們從你們那裡得來的第一件禮物就是枷鎖；他們從你們那裡受到的第一次待遇就是拷問」（註）。結果兒童從初生起就變成易怒，而這襁褓往往使兒童變成尪病患者。

往使兒童變成尪病患者。

嬰兒應由親母哺乳。母親和父親應該是嬰兒最初的撫育者。盧梭力斥當時社會中所流行的母親不願親自餵奶和父親因「職務繁忙」不願親自教導兒童的習慣。「誰不能履行父親的職責，誰就沒有做父親的權利。無論貧苦和工作繁忙，都不能使他們逃避親自育兒和教兒的責任」（註）。

（註）「愛彌兒」第十八—十九頁。

（註）「愛彌兒」第二十五頁。



盧梭一方面提出了這一原則性的要求——「兒童應由父母自己撫育」，但在以下的敘述中却又把兒童的看護之責交給一個爲愛彌兒所請的年輕的教師，人工地取消父母而宣佈「愛彌兒是孤兒」。

這又是盧梭的矛盾。盧梭希望將愛彌兒和他的未來的妻子造成新社會的第一個細胞。愛彌兒是一個新人。盧梭也像法國其他啓蒙主義者一樣，認舊制度是偏見的產物，而把愛彌兒的父母取消，藉以取消封建舊社會對他所發生的教育影響。父母是舊社會的人物，如果把他們的道德傳授與愛彌兒，則愛彌兒就不會變成「新人」了。所以盧梭乾脆地宣佈「他的父母活着是不必要的」（愛彌兒第二十八頁）。

盧梭對教師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他認爲在未擔任教人的職責之前，自己應先成爲人。教師應受過良好的教育，要賢明，要做他的被教者的朋友和同伴而處處爲他們模倣。

關於幼年期的教育，盧梭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意見。他認爲必須時常給孩子沐浴，逐漸改換水的溫度至最冷甚至冰凍的程度。不要過分溺愛兒童。「要鍛鍊他們的體格去反抗氣候的反常、盲目的自然力、飢餓、口渴、和疲勞」。

不要勉強發展兒童的語言。強迫兒童很早說話，祇有損害他們的語言。說話過早會造成一生不能矯正的發音的缺點。「儘可能的限制兒童用字過多。如果他所有的字彙比思想還多，如果他所能說的話比能想的還多，那就是很大的障礙」。

盧梭甚至對於教育上的各個細目，都有詳細的論列。出牙、學步、防止任性——沒有一種漏過盧梭的注意。這些問題都是站在「自然教育」的觀點上來解決的。盧梭因爲崇拜「自然教育」的原則，便對醫學尤其是對醫藥持了絕對否定的態度。他說：「我從不請醫生來看自己的病，如果愛彌兒的生命沒有致命危險的話，也不請醫生來看他的病，因爲醫生在最後一次除了死以外也沒有別的可以帶給他」（註）。



所以愛彌兒要學習忍受疾病，像動物在自然條件下一樣，而動物的疾病原是比人類要少和輕的。

## 二歲至十二歲

### 童的教育。感覺

### 器官的教育

盧梭適應了他的杜撰的兒童發展階段的公式，不正確地斷定第二回時期（二歲至十二歲）為「理智的睡眠」。似乎兒童在這一時期是沒有思想，甚至沒有記憶的。「在未達到理智的年齡以前，兒童能接受的只有形像，而不是思想……兒童的一切智識由感覺中得來，却不再走入概念的領域」。

盧梭認為兒童只有形像，而沒有概念，這種論斷自然是不正確的。但是盧梭的最大的功績卻在於他提出了外感覺器官的教育問題，和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供了關於這種教育的詳細和深刻的意見。

盧梭對觸覺特別重視，把它位置於其它感覺中的第一位。因為觸覺比其他感覺更可靠，觸覺能矯正視覺的錯誤。我們利用觸覺和筋肉活動便能知道物體的溫度、大小、形狀、輕重、和軟硬。觸覺是我們用得最多的一種感覺。然而觸覺教育向來極少有人注意。盧梭要求用練習方法去發展觸覺，養成兒童像盲人一樣摸東西的習慣。

視覺所包括的空間最廣，是一切感覺中最易引起錯覺的一種感覺。視覺要用觸覺來矯正，在決定實際任務時，要發展眼睛的判斷力。依照盧梭的註釋，自然界的寫生畫、輪廓畫、以及幾種移動的遊戲，對於發展視覺有着極大的意義。

對於發展聽覺，盧梭主張訓練兒童有連貫的明白的說話，發音要真確和足夠洪亮（而不要太洪亮）。盧梭本身是一個偉大的音樂鑑賞家，他完全正確的認定教師要發展學生聽覺就應注意唱歌，力使兒童發音正確、流暢、柔軟和響亮、養成他們聽拍子和和聲的習慣。

在味覺發展上，盧梭也提出了許多意見，他極注意味覺對於有機體自衛的重大意義。盧梭以自然教育論為出發點，認為「兒童應盡可能的長久保留其原始的味覺：飲食應求簡單和普通；使其味覺祇習慣



於少用調味品的食物」；兒童應避免肉食。關於嗅覺，盧梭認爲在幼年時期，不宜過份加以使用。

還在這第二期開始時，照盧梭的意見，就要兒童離開城市，離開這墮落、懶惰、和淫蕩的淵藪了。盧梭在形容這些城市時，是指當時法國的大城市尤其是巴黎而言的。這是封建君主政體最後幾十年的情形，懶惰的法國貴族階級的放蕩腐敗已達於極點。從羅馬帝國最後幾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見過像在法國上等貴族階級和僧侶階級中所見到的那樣逸樂、放蕩和腐敗的情形。盧梭思於他的自然教育的理論，就宜稱：「我要在鄉村中去教育愛彌兒，離開那些跟在主人後面的一羣阿諛者，避開那種以浮在表面的假漆來誘惑兒童和傳染兒童的城市的黑色風習」（註）。

盧梭要把兒童送到鄉村中去的第二個原因，是在接近自然和吸收清潔的空氣。盧梭的這個要求後來便奠定郊外學校和森林學校的思想的基礎。

除了發展外感覺器官以外，在第二個時期中繼續實施體力教育，廣泛舉行散步、園藝工作等等。盧梭對各種道德上的格言和教訓極表反對，他曾作了辛辣的評論，說這一時期的普通教育和學習只着重於字面，字的本質是孩子所不了解的。

照盧梭的意見，兒童在這一時期雖然還沒有道德的觀念，還沒有責任感，可是他有外感覺器官，他可以藉這些器官的幫助來接受實例的提示。盧梭很正確的指出良好的實例的重大教育意義。

盧梭反對懲罰，他以自然教育論爲出發點，提出了一「自然結果的紀律」。他要兒童明白感覺其行動所產生的自然的結果。「不要給兒童任何譴責；而要使他們從這裏面得到經驗」。愛彌兒毀壞了玩具，不要馬上給他新玩具；讓他自己覺得損失的可惜。他打毀了房間裏的窗子，就讓風吹進來。你怕愛彌兒會受寒嗎？那並無大碍，倒是他得到了一個很大的道德上的教訓：當愛彌兒自己知道決不再這樣做的時



笑，你就去修德吧。

盧梭提出這種自然結果的原則，在教育學上還是第一次。代替了那些不容易了解的「責任」、「義務」等的字眼，兒童可以藉「自然結果」的幫助，根據自己的經驗，去認識必要性、不可能性、和力量。這個原則能夠成爲許多教育方法中的一種，但是盧梭却不正確地認它爲影響兒童的唯一的方法。

盧梭極激烈的反對在第二期中實施有系統的教育。

盧梭說：「我解除兒童一切課程。取消他們製造災難的最大的工具，那就是書本。閱讀是對靈性的一種處刑。……要讓愛彌兒在十二歲時還不知道書本是什麼」（註）。但這並不是說，愛彌兒在十二歲以前還不會閱讀；只是不要強迫他們去閱讀，如果他們覺得需要讀和需要寫，那就讓他們自己去學。

盧梭只是把兒童的個人經驗來作教育的基礎，他把十二歲以前的一切智力教育，歸結爲兒童對週圍生活尤其是對自然界的觀察：要使自然界本身變成兒童的書本。

但在評價盧梭這些和他的一般的文化觀點，有密切聯繫的不正確的論據時，須要注意這些論據在當時是以反對經院主義的教育，反對磨難兒童的中世紀的死「學問」爲目的的。

如果愛彌兒要自學讀書，則盧梭認爲在十二歲以前可以給他讀的祇有一本書——「魯濱遜漂流記」。這本書是最符合於盧梭的自然教育論了：魯濱遜離開了人間，去和自然界碰面；他用自己的親身的經驗和發明精神，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魯濱遜是緊張、積極和機敏，也就是盧梭在其教育中所要發展的一切特點的全部化身。

在第二章結論中，盧梭描寫了實施這種教育所能得到的結果。他的愛彌兒已結實、健康、獨立、而又好學。「他敏捷、輕快、迅速；在他的行動中表現了他的年齡上的全部活力，使你不能去指摘它們中



間的任何一件無目的的行動。方法會永遠適應於他的目的，他對成功沒有信心的事很少去進行。他會細心的觀察和健康的判斷；他不向別人無意義的亂問，而是自己去查；他在提出問題以前自己先作一番研究，並努力給自己解答他所要知道的東西。如果他陷於沒有預見到的困境，他能比旁人更少困惑；如果局面是危險的話，他能比旁人更少受驚」（註）。

### 十二歲至十五歲時期的教育 • 智力教育。 • 勞動教育。

盧梭認為第三期（十二歲至十五歲）為智力教育期，是很短的一個階段，因此要從許多學科中祇挑選出少數學科，使精力不致分散而作深刻的研究。挑選學科的方針是什麼呢？

盧梭提出了兩個標準：第一個像洛克一樣，以實用為指導原則；第二個則認為兒童在十二歲至十五歲時期，還沒有充分的道德觀念，還不能明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此主張在這段時期的課程表中，廢除人文科學（尤其是歷史），而只授以自然方面的智識：地理、天文、和物理。

自然、閱讀、書法、算術和幾何，是在此以前就已授與的。盧梭認為（自然是錯誤的）研究歷史應從第四期即十五歲以後開始。

我們知道，盧梭對智力教育內容的確定，是極片面的。但盧梭的最偉大的功績是在於他以自然科學和其他實科奠定教育的基礎，他完全摒棄了當時學校佔有極大位置的所謂宗教科，放棄了經院主義學校中流行的古典主義和凍僵了的「七藝」學科。

盧梭的教授法原則，歸結起來首先是在發展兒童的自動性、觀察能力、敏銳和機智；和這些品質結成密切聯系的，是記述性原則。盧梭所解釋的記述性，不是圖表和模型，而是生活本身，自然界和事

（註）「愛彌兒」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實。和這一理解相適應，在盧梭的教育方法中佔了最大的位置的，是旅行參觀（有自然科學的、地理學的、生產上的參觀——認識工場手工業等等）。盧梭主張研究地理應由週圍地形開始，研究天文應觀察天空中的星球運動，研究自然應觀察活的和製成標本的動植物；盧梭對經驗特別重視。利用圖表模型與學生談話，在盧梭所介紹的教育方法中，佔了極大的地位。

盧梭要求發展他的學生的求知慾。他不追逐知識的多樣和廣博，而只重視知識的確實性和一貫性。關於分析和綜合問題，盧梭主張在相當條件下兼用二種，認為二種思維方法的同時應用是最正確的。愛彌兒所得到的一切理論知識，都應該和生活——實踐——有密切聯系。

但除了新的教育原則和方法之外，盧梭在其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院主義教育的鬥爭中却過份視重了系統教育的意義和教科書的意義，而過份重視了學生個人經驗及其自動研究的作用。

盧梭對勞動教育是很重視的。他說：「勞動是社會人的不可避免的義務。富的或貧的，強的或弱的，任何有閑的公民都是流氓」（註）。盧梭認為勞動能使人類接近於自然。他希望愛彌兒的手能像手工業者的一樣去工作，同時愛彌兒的腦却像哲學家的一樣去思想。這樣，依照盧梭的解釋，勞動的意義並不在於勞動的機械方法的領會，而在於它的教育的作用。盧梭要求學生先認識各種農業工作。此外也要學習工藝。

盧梭在為勞動教育選擇工藝時，提出了許多必需使手工業相符合的要求。第一，手工業不應製造奢侈品，而應製造公眾有用的物品；第二，它要與人類功業相並立；第三，適應學童的性別；第四，要使動作不變成機械的運動（如紡織），而要有計算，有智力工作；第五，要使手工業對身體無害。盧梭根據這些要求，對許多手工業加以審擇後，認為最適當的基本的手工業就是木工。



除了基本的手工業木工之外，盧梭認為也要令學生認識其他手工業的基本方法：愛彌兒會利用轉槓、鐵槓、銼刀、鐵扣。一切手工業的工具他都認識。

盧梭根據他的自然教育論，要求愛彌兒不僅研究工藝方法，而且要在自然勞動的環境中去認識手工業。所以愛彌兒能知道勞動者的生活。

勞動是一種教育工具，勞動是一種社會義務，勞動也是認識勞動生活和發展學生對勞動者同情的工具——這就是盧梭對勞動教育問題的廣泛的民主的提法。

照盧梭的描寫，愛彌兒到十六歲受畢第三期和前數期的教育之後，雖然還沒有很多的知識，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充分的知識：「他並是一知半解，他不在知識的量上而在取得知識的能力上具有了博學的頭腦」。「愛彌兒已是一個勤勉、有節制、有忍耐力、強固而充滿了勇氣的青年了」。

無疑的，盧梭因為在反對經院主義學派的鬥爭中過份重視自動性的原則，以致把教育結果過份理想化了。他的最主要的缺點就是愛彌兒所得到的知識沒有系統性，對人類所積蓄的知識總和估計得不足。

## 道德教育

因為道德教育是要在社會中授與的，所以盧梭認為在愛彌兒十六歲時又要把他從鄉間送回到城市。愛彌兒已經得到了長足的道德上的鍛鍊，他已學會了在自然狀態中去尊重別人。墮落的城市所有的一切罪惡都不能引動愛彌兒。

盧梭要求實施人的教育，發展學生的人類愛。他以這一要求去反對級階特權和偏見。「各階級的人都一樣」(註)，「要教你的學生去愛一切的人」——盧梭常常這樣反覆說。

在當時條件下，盧梭自然不能認識階級矛盾和階級的道德。在這一時期，全人類的平等博愛以及實施全人類的教育的口號已經算是最進步最民主的口號了。甚至在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上半期，這些



思想還被民主主義傑斯塔洛齊 (Pestalozzi) 和柏林斯基 (Belinsky) 等提了出來，作為反對封建的階級特權的一個抗議。

「人的教育」——這充滿了人文主義的民主思想——是盧梭在教育學中所提出的。盧梭揭露了道德教育（所謂人性教育）的內容之後，要求首先培養「善良的感情」。這種「良心教育」的方法是叫學生看人類受難痛苦悲哀的繪畫（但這些繪畫的含義不能太過份，否則非但不能引起學生對不幸者的同情，反而使感受性麻痺，轉成殘忍和冷酷）。良心教育不是倫理上的說教所能奏效的，而要依靠善良的表率。盧梭認為道德教育的第二個任務，是在培養「善良的判斷」。履行這一任務的方法，主要是在研究歷史，而且盧梭特別注意偉人傳記的教育意義。

道德教育的第三個任務，照盧梭解釋，是在發展「善良的意志」，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在實際活動中去練習行善，幫助貧民和保護不幸者。

依照盧梭的見解，和未滿十七—十八歲的學生是不需要談論宗教的（既不談贊成，也不談反對），因為兒童還不習慣抽象的思維，還不明白這些問題。由於在鄉村中所過的十六年的隔離的生活，愛彌兒還沒有發生過這一方面的問題，因為他還沒有見過宗教禮拜的繪畫，所以，對未滿十七—十八歲的兒童，盧梭是主張實施非宗教的教育。但是更進一步，到了能够思索自然界的目的性，和發現自己的良心的聲音時，那就要學生自動的承認：世界上還存在着一個最高的意志——創造世界和法律，並藉以統治這個世界的最高的理性。

盧梭對問題的解決自然是不正確的。但在評價他對這一問題的觀點時，先應考慮當時的歷史環境。甚至盧梭所提出的那種問題解決方法，在當時天主教教會統治時代都是極大的進步，都是反對僧侶階級、教會、宗教教條和儀式的一個抗議，正因為此，「愛彌兒」一書曾被禁售和焚毀，盧梭也受僧侶階級不斷的迫害。



盧梭稱十五歲至成熟期爲「暴風和熱情的時期」，而在小說中對性教育問題加以極大的注意。盧梭認爲第一種方法是消除一切足以過早刺激性器官的因素。閱讀淫書、懶惰、放縱和淫逸的生活、穿暖衣服——這一切，盧梭認爲都能促成感受性的過早的成熟。青年應該多做體力工作，醒着在溫暖的床上不宜多睡。

要多運動，尤其是在空氣清潔的地方。盧梭因此介紹青年狩獵，讓他們的智慧去應付狩獵的目的物，讓他們的肉體去忍耐健康的疲勞。

最後，第三種正確的性教育方法，盧梭認爲是性的教化。盧梭根據其避免早熟的論據，認爲應向兒童適當避免任何有關性生活的問題，如「嬰兒如何誕生」之類的談話。如果兒童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末盧梭認爲「與其拿謊話去回答他，不若強迫他閉嘴」。兒童對這種方法並不覺驚異，因爲以前對於兒童所不了解的問題，也是沒有給他回答的。

如果教員找到適當的時機，要給兒童一些這方面的知識，則回答時態度要嚴肅，言詞要簡單。不能有任何混雜，不容兒童從不純潔的方面去探問性生活的知識。

盧梭對這問題的忠告，確實是很得策的。他是第一個詳細地研究這問題的人，除了他認爲女子在五歲至十八歲期間應避免與社會接觸這一不正確的指示以外，他的所有指示直到現在都還保存着它們的力量。

## 婦女教育

「愛彌兒」第五章係敘述愛彌兒的結婚和新社會第一個家庭的成立。這就成了盧梭描寫理想婦女及其教育生活的原因。

依照盧梭的見解，男女因爲使命不同，所以兩性所得的教育也應不同。女子的使命，是在生男育女，管理家務，創造家庭快樂，製造男子幸福。「因此女子的一切教育，都對男子有關係。要投合他們的趣味，成爲他們的有用之人，引起他們的愛和敬重，當他們年輕時，教育他



們，當他們年長時，照顧他們，勸勉他們，安慰他們，使他們的生活變成愉快和幸福，這就是女子在各個時期中的義務，也是她們從童年時起所應學習的方向」（註一）。

要使女子能够生育健康的孩子，要使她們美麗和優雅，她們就需要受體育教育。

在道德教育方面，盧梭認爲未來新女子應養成溫和、順從（這一點是女子畢生都要受用的，因爲「她們對男子或男子的判斷從來都是服從，而且也因爲她們不能提出比這些判斷更高的判斷」）（註二），以及節制、有禮貌、清潔等的習慣。

依照盧梭的極端不正確的見解，認真的智力工作對於婦女是不需要的，因爲有一部份科學不合格於女子的天性，另一部份科學不合於她們的使命。盧梭在描寫「愛彌兒」中的理想女子莎菲的智力發展水準時，說道：「她有愉快的而沒有光彩的智慧，有澈底的而沒有深度的智慧」。她除了偶然落到她手裏的兩本書以外，別的什麼都不讀。愛彌兒在童年時的書本是自然界；莎菲的書本是「世俗」。盧梭認爲，婦女一切都要服從「世俗」的見解。愛彌兒處處以效用性的原則爲處世的方針，莎菲則以社會輿論爲方針。

依照盧梭的見解，婦女終生要服從權威（愛彌兒則恰恰相反，是不承認任何權威的）。最初在幼年時要服從母親的權威，而後服從父親，最後服從丈夫。盧梭主張婦女在幼年時就授與宗教教育（而對愛彌兒在十八歲以前是不談宗教的），「因爲如果等到她們能够有方法的判斷這些深刻問題時，從來不對她們談到這些問題便是冒險了」——盧梭這樣補充說。

這位理想的女子莎菲也會做手工，但不愛廚房，廚房惹起他反感（她怕潔白的袖口碰到爐灶上會弄

（註一）「愛彌兒」第三六四頁。

（註二）「愛彌兒」第三七〇頁。



污)。莎菲也不愛菜園：「土地對她是不潔的；她看到肥料就作嘔」。

盧梭在愛彌兒的教育論中提出了許多新的進步的觀點，但在對婦女及婦女教育上，却堅持了落後的觀點。在這裡他逃不出當時所流行的見解的範圍。

固然，可以這樣的設想，如果考慮一下盧騷說的話——「女子應以丈夫的思想為思想，以丈夫的語言為語言」，那末莎菲嫁給這位新人物——愛彌兒——之後。在新社會的條件下，定能接受愛彌兒的進步思想傾向了。但甚至在這樣的假定下，她雖然已在「新社會」（就是說，在代替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她所過的還不是獨立的生活，而是完全服從於丈夫。

### 盧梭教育學的意義及其對後世教育的影響

盧梭的教育體系雖有許多矛盾和不正確的論點，但它在教育思想的歷史發展上却起了極大的進步作用。盧梭的教育體系是貫徹着深刻的民主主義的。盧梭痛恨封建制度，反抗貴族和僧侶階級，反抗身份限制，宣佈平等思想，重視人類個性。

盧梭的整個教育學，是對經院主義的死學校，對教條主義和機械背誦，對中世紀的教育內容的一個激烈的抗議；是反對盲目的中世紀紀律，反對體罰的一個有力的鬥爭。盧梭的號召充滿了對兒童的火熱的愛，對他們的關心和尊重，以及發展兒童自動思想及自動創作的要求。盧梭曾以這樣的力量首先宣佈了兒童權利和個性的保障。

盧梭是第一個極詳細的研究外感覺器官的教育問題的人，是實科教育的熱烈擁護者。他曾提出教育方法積極化、勞動教育、學習與生活聯系等的要求。盧梭熱烈地號召自由國家的公民教育和革命祖國的愛國教育。

盧梭的教育思想給了後世的教育學以極大的影響。博愛主義的教育家們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已經企圖在德國學校實踐上採用盧梭的教育思想了（但只有這三思想的極暗淡的反映）。盧梭的影響表現在民主主義者教育家裴斯塔洛齊和康德（Kant）的教育觀之上。在萊夫·托爾斯泰（Les Tolstoj）關於教育問



的見解上，盧梭的思想也有着相當的影響。

盧梭的教育思想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和二十世紀初期曾被斯賓塞（Spencer）和新盧梭派所利用，在帝國主義時代更被國際「新學校」聯合會及美國實效主義教育所利用。但他們都抽去了盧梭教育學中的革命內容，而加以曲解。

盧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提出他的教育體系來的，當時還沒有大規模的工場工業，當時無產者還沒有形成爲階級，當時在社會學中和哲學中甚至先進的思想家都還站在歷史唯心論的觀點上。盧梭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家。

因此他的教育體系在歷史上，雖然比當時（十八世紀中葉）所流行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要進步，而他的教育學仍不能不有它的歷史上和階級上的限制性。

他的「自然教育」的理論是建築在不正確的唯心論的基礎上的。盧梭在他的反對封建教育的鬥爭中不能正確處理過去的人類文化。在他的教育體系中的錯誤因素有「自由教育」的因素，系統知識的輕視，兒童的理想化。

建立盧梭教育體系的不正確的方法論的基礎使他造成了許多矛盾。盧梭讚揚一切「自然」，他提出了杜撰的人造的兒童年齡分期方法。

他堅稱「自由爲一切幸福之首」，堅稱一切教育規則應由自由出發，但同時兒童的每一行動却都由教師規劃和暗中指揮。「讓兒童永遠去自命爲主人，實際上主人却是你。完全的控制並不比保存自由的外形更好……兒童應做他所願意做的事情；但他祇應願意做那你要逼他做的事情；他不應做那他所沒有預料到的事情，每次當他開口時，你就應知道他所要說的是什麼……」（註）。



盧梭明白要求，父母應負教育之責，同時却在他的小說的開首就人工地取消了他們的教育責任，而宣佈「愛彌兒是孤兒」。

最後一個大矛盾是婦女教育的體系和愛彌兒教育的比較。

我們一方面要指出盧梭教育觀中的這些歷史上的和階級上的限制性，拋棄那些建立在這些錯誤觀點上的結論，同時也要重視盧梭，把他視為反對中世紀教育的勇敢的戰士，視為偉大的民主主義教育家；因他曾提出許多新的教育原則，其中有很多直到現在還保存着它們的力量和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如注意及愛護兒童、發展兒童創作、考慮兒童的興趣、學習和生活聯系等等）。



## 第十章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的教育思想

### 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 應者的革命 意義

在上一章裡，我們指出了十八世紀作為法國革命思想準備的啓蒙哲學的意義。一哲學運動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哲學者那裏達到了發展的最高峯。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人會極重視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他們把它當作哲學思想的一個階段，同時又指出它的為歷史條件所造成的局限性。馬克思在指出空想社會主義和法國唯物論的繼承關係時，說道：「傅立葉的直接出發點是法國唯物論哲學者的學說」（註一）。列寧也說：「在整個歐洲近代史上，尤其是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

，會爆發過反對一切中世紀教會，反對農奴制組織和農奴制思想的激烈戰鬥，在那裏，唯物論成了唯一激底的哲學，它忠於自然科學的一切學說，而敵視着迷信、偽善等等」（註二）。

法國唯物論者把物質看成實質，承認運動是物質的自然屬性；指出自然界中的普遍的相互作用。但他們在闡明關於物質的正確原理時，却沒有觸到發展的思想。

他們在認識論上，受了洛克的極大的影響，所以便成了感覺論者承認感覺是認識的來源。因此他們是感覺論的唯物論者。承認認識是外部世界在人腦中的反映。法國唯物論哲學者肯定世界是可以認識的。但他們除了這些認識論方面的正確的肯定以外，却堅持直觀唯物論的立場。

法國唯物論者站在機械論的立場上，過份重視了環境的影響，把人類只看成週圍環境和教育的產物

（註一）馬恩文集第三卷第一六〇頁。

（註二）列寧：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



，而輕視了改變週圍環境及人類本身性質的人類革命活動。但甚至在這樣的形式下，法國唯物論者的學說對於當時還算是革命的。

法國唯物論者在其對人類性質的見解上是唯物論者，而在社會問題上却是歷史唯心論的代表。他們屬爲統治世界者是意見。封建制度和他們所反對的宗教，在他們看來只是人類偏見和不正確的意見的結果。意識形態上層構造歸根結蒂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產物，是有規律的歷史過程的結果——像這樣的理解還沒有被法國唯物論者所達到。

恩格斯在指出法國唯物論者代表着人類思想的極大的進步和指出他們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時，同時也指出了法國唯物論的最主要的缺點——在理解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上的機械性和反辯證性，以及歷史唯心論。

十八世紀最著名的法國唯物論者爲拉梅德里（Julien de la Mettrie 一七〇九—一七五一年），賀爾巴赫（一七二三—一七八九年），海爾威西（一七一五—一七七一年），第特羅（一七一三—一七八四年）。

他們都提出教育在人類改造及新社會建設上的偉大作用。他們都極重視科學，要求良好的學校組織和普遍教育的實施，着重指出教育的政治意義。

海爾威西和第特羅所發揮的教育見解，比其餘唯物論哲學者所發揮的更詳細。

### 海爾威西的教育觀

一七五八年，海爾威西的主要著作「智慧論」（De l'esprit）出版。這本書受教皇的譴責，遭法國政府的禁止和焚燬，在當時哲學論文、報章及歌曲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和激烈的論戰；在短時期中印行了五十版，並被譯成歐洲最主要的各種文字。

海爾威西逝世後，一七七三年，他的第二部書「論人及其智慧能力與教育」（De

l'homme, 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education）出版。



這兩本書對於判斷海爾威西的教育見解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海爾威西最注意的是教育作用的問題。當那先進的思想家們還沒有產生社會的階級構造和階級矛盾的思想而同時却在對垂死的封建制度進行鬥爭和尋求過渡到新社會制度的方法時，教育是被當作爭取新社會秩序的主要工具而被提出來。

海爾威西繼洛克之後，否認先天思想和承認教育萬能。教育的改變能達到社會制度改變的目的。「教育給我們造成我們現在的狀態」。「爲什麼好的愛國志士和有正義的公民這樣少？就因爲人們所受的教育，並不要他們變爲有正義；就因爲現代的道德只是荒唐的錯誤和偏見之交錯」（註一）。

教育萬能的論斷，是從法國唯物論哲學者對歷史動力的不正確的唯心論的觀點出發的，因爲這些哲學家在下部（在他們對人類性質的見解上）是唯物論者，而在上部（在他們對社會及歷史的見解上）都是唯心論者。他們根據其「世界爲意見所統治」的確信，認爲要改變社會制度，就應先用教育方法改變人的意見，克服他們的偏見——不正確社會制度的本源。

但我們在指出這個唯心論和不正確的問題解決方法時，還應該承認這種重視教育的態度在當時是進步的，因爲啓蒙哲學者曾和教會作鬥爭，破壞封建的偏見，提出平等的思想，鼓勵人的創造和創制精神。

海爾威西把教育解釋爲人類週圍自然及社會環境的影響。這個教育觀後來曾被空想社會主義者沃文（Robert Owen）所利用。海爾威西說：「我認定人是人的週圍一切外物，一切他所遇到的場合，以及一切偶然事件的學生」（註二）。

（註一）論人及其習性能力與教育第四一三頁。

（註二）論人第四一三頁。



海爾威西從感覺論出發，認為人的心理活動的根源是感覺：「人的一切便是肉體的感覺」。判斷——不過是數種感覺的比較。各人智慧上和思維上的差別，不是決定於感覺器官的敏銳和愚鈍，不是決定於這些器官的組織，而是決定於感覺中的不同。感覺的不同，感覺強度的大小，則大部份決定於興趣。人能夠從那些祇有引起他相當興趣的方向去學習。

根據這些論斷，海爾威西便得出一個民主的結論：「因為感覺敏銳性的大小，並不能改變外物對我們影響的比例，所以一切的人，祇要有普通良好的器官，便都有同樣的智慧能力。任何真理，不管如何高超或平凡……也都能同樣為一切具有普通正常器官的人所了解」（註）。海爾威西就以這種智力平等的學說，去反對貴族階級對智力教育的獨佔，而承認一切人民都有享受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的權利。

海爾威西對新興科學特別重視，對經院主義教育及僧侶階級的學校獨佔作了猛烈的批評。海爾威西反對封建學校中的教育方法，重視兒童的積極性和自動性的意義，指出兒童個人經驗的鉅大作用。雖然他像虛梭一樣過份誇張了這個作用，但在形式主義、機械背誦和刻板訓練在教育界中佔了支配地位的當時，海爾威西對上述問題的見解却是一個反對經院主義學校的鬥爭。

海爾威西非難虛梭輕視科學和教化，而得出結論說：「經驗告訴歐洲人民：天才、教化、和知識，是他們的強盛、幸福和德行的真正源泉」。

海爾威西對道德教育極為注意。他認為這種教育是教育中最重要、同時也是最被忽視的部份。

他揭破了偽善的道德格言和教育家非道德的行為間的矛盾，批評了以宗教為基礎的道德，他稱和他同時代的道德是「荒唐的錯誤和矛盾之交錯」。

他駁斥教會的道德，同時認為在專制國家裡也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和道德教育。



他駁斥了宗教的道德觀，指出道德和教育間的重大關係，駁斥盧蔭關於科學進步使道德墮落的論調。道德觀念是我們從經驗中和知識中得到的。

海爾威西認為，以道德為基礎的個人利益是並不和社會利益對立的，而是相反的和社會利益完全調和的：「社會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則」——（註）。

海爾威西否認道德是一種抽象的不變的概念，詳細地證明道德在任何時代在任何民族中是有相對性和為社會利益所決定，他要求發展兒童的道德觀念，發展兒童對社會負責任的意識。教育應以培養社會活動者為目的。

海爾威西認為社會（學校）教育優於家庭教育。學校應從僧侶手中沒收過來，而交給國家去經辦。祇有社會教育能培養愛國志士；也祇有社會教育能把個人幸福和社會福利編織起來。

### 第特羅的 教育觀

在所有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哲學者當中，第特羅雖然一般地是站在機械論的立場上，却在某些問題上表現了一閃的辯證的曙光。

第特羅也像海爾威西一樣，對當時根本的教育問題——教育的作用問題加以極大的注意。但是第特羅在用唯物論的方法解決這個問題時，是和海爾威西的意見稍有不同的。

第特羅在他的「駁斥海爾威西的論人」一書中，雖然一般地同意海爾威西的立論，認為海氏的唯物論哲學是「統一的整體」，但同時却給海氏對教育的估計作了實質的正確的修正。「你斷定教育能製造一切。說得更好聽些：很多的事情都能用教育方法去達到。」

我們知道海氏對感覺的效用曾作了過量的評價。第特羅則除了承認感覺的重大意義以外，同時更正



確指出理智對感覺的加工在認識過程中的偉大作用。第特羅寫道，感覺器官不過是證人，而法庭所下的「判決」（即案斷）却是理智，但要以証人的供詞為根據。第特羅一方面避免感覺和理智分裂，同時又不把它們看成同樣的東西，這樣就提出了感覺和理智統一的思想。

我們知道海氏對環境和「機會」曾作了極端過份的評價。第特羅則反駁這種機會的重視，非難海氏把教育成就歸功於機會，結果只是抹煞了教育的意義。海氏斷定盧梭的天才是機會造成的（應狄永學會的懸賞徵文），第特羅則持不同的見解，他對問題的解決方法是這樣的：「天性、有機體、純粹自然的原因，準備了一個有天才的人物；道德的原因（註一）則給他有表現的機會。頑強的學習，他所得到的廣博的知識，使他能發表成功的推測，如果這些推測能為經驗所証實的話，那它們便成爲不朽了」（註二）。

第特羅在「俄羅斯大學計劃」一文中說道：「教育能軟化（adoucir）性格，能闡明（éclairer）義務，能減少罪惡，減輕或全消罪惡，鼓舞愛秩序，愛正義，愛善行的習慣，促成生活各部門中的良好趣味的發展」（註三）。

第特羅認爲，教育不能給兒童以違反天性的知識。教育的最大作用是在發展天然的素質。教育能够發展好的素質，壓止壞的素質。

第特羅像其他啓蒙哲學者一樣，抨擊法國舊的學院，控訴它們輕視兒童教育，忽視貧民兒童的教育，偏重古典主義及教育效果的微小。從這些學院中畢業出來的青年都是墮落無知和憎惡學習的。第特羅

（註一）這裏所說的「道德」原因，是指社會原因而言。

（註二）Diderot, Oeuvres choisies, Ed, 1884, pag, 301.

（註三）Diderot, Oeuvres choisies, pag 305.



的結論便是「要澈底改造國民教育的方法」。

不但少數被選拔出來的兒童中有好的素質。第特羅堅信貧民兒童也有這些素質，但是惡劣的社會制度剝奪了他們享受良好教育的權利，使民衆中所蘊藏的天才不能表現出來。

我們在評價第特羅對教育作用的見解時，看出第特羅比海爾威西更接近於問題的正確解決的方法。他指出了人的天然素質、能力和機體的意義。

第特羅站在歷史唯心論的立場上，沒有達到人類天性不是不變的和抽象的東西，而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變化了的並以人類自身的活動改變了自身的天性的那種思想。

但我們在指出第特羅對教育作用見解上的這些歷史所造成的缺點時，仍要承認，他在當時提出教育作用及其界限的問題來是意味深長的。

關於智力教育問題，第特羅也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他反對虛梭的科學及教育之進步使道德墮落的逆說，而指出教育對道德的重大影響。他證明教育的解放作用：「無智是奴隸和野蠻人的命運。教育能增加人的價值，能使奴隸立刻覺悟他們不是爲奴隸制而生的」（註）。

第特羅要求，一切兒童，從宰相的子弟到農民的兒童都要能讀、能寫、能算。學校應從借階教手中沒收下來，交給國家經辦。初等教育應免費和義務的實施。在學校中，應組織公共的膳食。教育應爲每一個人都能接近。貧民子弟比富人子弟更重視教育，更勤於學習。說到中等教育，第特羅對數學、物理、化學、自然、天文等科的教育加以特別的注意，而要求縮減古代語文的教育。他不否認古典語言及文學的意義，但反對當時歐洲中學校中所流行的全盤古典教育。

第特羅在其一七七五年應凱塞琳二世（Catherine II）之請求而編製的「俄羅斯大學計劃」中，闡

（註）Diderot, Oeuvres choisies, Ed. 1834, pag. 304.



明了他對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意義及教育內容的關係（但這個計劃因過份急進而未被實施）。

他在計劃中所說的「大學」，是指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學校體系而言的，這些學校正如第特羅所說，「它們的門是無區別的為一切民族的兒童而開着的」（*dont la porte est ouverte indistinctement à tous les enfants d'une nation*）（註）。包括在這一體系中的，有（一）強制、普遍、免費的初等學校；（二）供給中等教育的大學藝術科；（三）高等教育（醫科、法科、神科、以及高等專門學校——政治、軍事、工程、海洋、農業、商業、藝術等學校）。

在供給中等教育的「藝術科」（或稱「哲學科」）裡，第一學期分為八級。首三級研究數學（算術、代數、幾何）、機械、天文，第四級與第五級研究自然、物理、化學，最後三級研究本國及古典的文学、文學與修辭。

第二三學期是授晚課的，課程有倫理、歷史、地理（第二學期）、圖畫、建築（第三學期）與音樂、舞蹈、游泳等等（第四學期）。

第特羅的各級課程分配方法自然是不正確的。但他在中等教育內容方面的指示的價值是在於他對數學、自然、物理、化學等科的熱烈的擁護。他詳細地證明這些學科的效用，指出它對於思維發展的意義。他指出沒有一種功課比自然科學對於兒童更為有用，因為自然科學給一切感覺器官實施了良好的練習。

談到師資問題，他要求教師對自己所擔任的學科具有高深的學識，具有誘導的能力和高尚的德行。他堅決反對牧師充任教師，除非他們在神科中任教（*Entre les maîtres point de pretres, si ce nest dans les ecoles de la faculte de theologie*）。



法國唯物論哲學者的教育觀，表現了當時革命的資產階級的進步民主的要求，而在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革命的教育計劃中和十九世紀初期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它們更進一步的發展。



## 第四部 近代教育

從十八世紀法國革命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 第十一章 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期的教育問題

#### 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的教育原則

十八世紀的法國市民階級革命，是「第三階級」對封建制度的決戰。這一革命之「被稱爲大革命，不是徒然的。它對於它的階級，對於它所服務的階級，對於市民階級，曾有極大的貢獻，以致整個的十九世紀，就是那個給全人類帶來文明與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革命的標誌之下通過的」。

法國革命不但消滅了法國本國的封建制度；它也引起了德國大規模的「暴風雨」的社會運動；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的成長，喚醒了市民階級的哲學思想並促成了十九世紀科學的繁榮。康德哲學，依照馬克思的解說，就是「法國革命的德國人的理論」。十八世紀的法國革命提出了十九世紀市民階級民主運動所標榜的那些公民自由。

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代所提出的教育原則的影響，表現於一切先進的市民階級國家裏，尤其是在國民教育體系與基本組織原則方面（學校型類、強制的、普遍的、免費的初等教育等等），同時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所提出的這些原則，比後來市民階級成爲當權的階級時資本主義各國所實施的爲更明白、更堅決、和更民主。



在革命時代的尖銳的社會對立過程中，國民教育問題含有特殊的意義。戰爭中的各黨派的領袖都能明瞭教育有着重大的政治意義。在政治鬥爭的最緊張的關頭中，教育問題沒有被革命的立法機關所忽視。

### 塔力藍的草案

曾任主教的塔力藍(Talleyrand 1754—1838)是自由主義市民階級的代表。他在國民會議裡提出一個將教會土地收歸國有的法案；在拿破崙帝國時代，塔力藍做過外交大臣，在拿破崙下台和波旁朝復辟以後的路易十八時代，他還能保持這個位置。

因為革命前的法國差不多全部初等學校和大部份中等學校都是教會設立的，而且由教會地產的豐富收入來維持的，所以教會的土地收歸國有之後，學校就被剝奪了物質基礎，因而也發生了國民教育的新體系問題。塔力藍因為是教會土地收歸國有法案的起草人，所以也把起草國民教育法案的責任交給他。

塔力藍寫了一個廣泛的報告，在解散以前不久的立憲會議上提了出來（一七九一年九月十日、十一日、十九日）。因為立憲會議要趕緊結束自己的工作，所以沒有給這個報告做決議。報告就轉到立法會議了。

塔力藍根據一七九一年的憲法，提出了初等教育的普遍性原則。教育應該包括人的一生，從學齡前的童年開始，直到成熟的年齡。教育也應該是智力和體力的，並包括男子與女子的。

應建立國立的學校體系，由下列各種等級構成：

（一）每州開辦初級學校，授以免費的初等教育；課程包括國語、計算與測量、宗教、道德、以及關於一七九一年憲法的常識（研究「人權及公民權宣言」）與體育鍛鍊。

（二）地區學校（中學校），專收「無特殊偏向、無從事手工業及農業勞動的需要，而願意謀另一種職業、或願意只發展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才幹」的人。



(三)對於某一部份以深造專門知識為目的的人，則開辦各種專門學校，以便訓練國家必需的人材：牧師、醫師、法官與軍人。專門學校是收費的。

(四)「國民大學」是全部國民教育體系的完成，是領導全國科學藝術生活與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學術機關。

國民教育的領導機構是中央機關——「公共教育總委員會」。

塔力籃把初等學校留在僧侶階級的手中，不過僧侶階級因為實施了塔力籃的教會土地收歸國有法之後，已經要依賴於國家，由國家委任，並受國家的俸給了。初等學校的任務之一，就是使民衆「納於秩序的軌道」，換句話說，就是灌輸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塔力籃的教育目的，是要把「人人置於適當的位置」。只有初等學校是免費的。對於培養專門家的中等學校與高等學校也給了極大的注意。塔力籃認為女子應受初等教育，但極端反對男女平等與受同樣的教育。在為市民階級準備勞動力的目的上，塔力籃認為初等學校中應致授手工。

所以，塔力籃的草案是調和的。他沒有比當時所存在的教育體系更急進，却向市民階級的學校發展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例如，初等學校的普遍與免費性質，女子教育，公民教育）。

### 康多塞的草案

哲學家、經濟學家暨數學家、科學研究院的秘書、吉倫特黨的領袖之一康多塞 (Condorcet 1743—1794) 在立法會議所組織的「社會教育委員會」中所提出的草案就要進步得多了。這個草案是在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與二十一日在立法會議上宣讀的，但是沒有被可決，後來又轉到國民公會去了。

康多塞的草案宣佈國家有對每一公民實施國民教育的義務，要求普遍教育，各級學校的免費教育。學校中的宗教教育應加廢除。高等學校中的古典語文應被置於最小的地位。康多塞的學校體系，是由下述各級構成的：



(一) 初級學校——是爲不分階級、職業與性別的一切兒童而設立的四年制學校；課程有閱讀、書法、初級文法與算術、最簡單的繪畫、初級幾何學、農業及手工業方法、社會科學與道德原則的基本常識。設於人口四百人以上的所有城市與鄉村。

(二) 二級學校設於人口四千人以上的每一城市或地區，是建築在初級學校基礎上的三年制學校。課程有數學、自然史與化學、「各種藝術」(即各種工業活動)的必要知識、道德原則、社會科學、基本商業常識。每校有一個不很大的圖書館與實驗室，藏有氣象觀察的儀器、機器模型等等。他的草案中的這一特色——注重學術設備——在當時有很大的意義。

(三) 研究所(中等學校)——每省設立一所，此外在最大的城市中亦每城設立一所(康多塞規定全國開辦研究所一一〇個)。研究所包容人類一切知識要素。不但研究「每一個人和每一個公民——不問他們屬於何種職業——所必需知道的事物，而且要研究這些職業的最主要的細目，如農業、機械技術、軍事、甚至最必需的醫藥知識，因爲它們在產科及獸醫實踐上是必需的」。

康多塞極重視數學及物理學。他認爲這兩種科學是發展智慧能力的最可靠的工具，是和成見作鬥爭的武器。「物理學的進步產生了手工業的順利的革命，加速這一革命的最可靠的工具，就是在一切社會階級裏普及這個科學知識，幫助大家研究這個知識」。康多塞對政治科學也是很重視的。

#### (四) 官立中學校(全國共設十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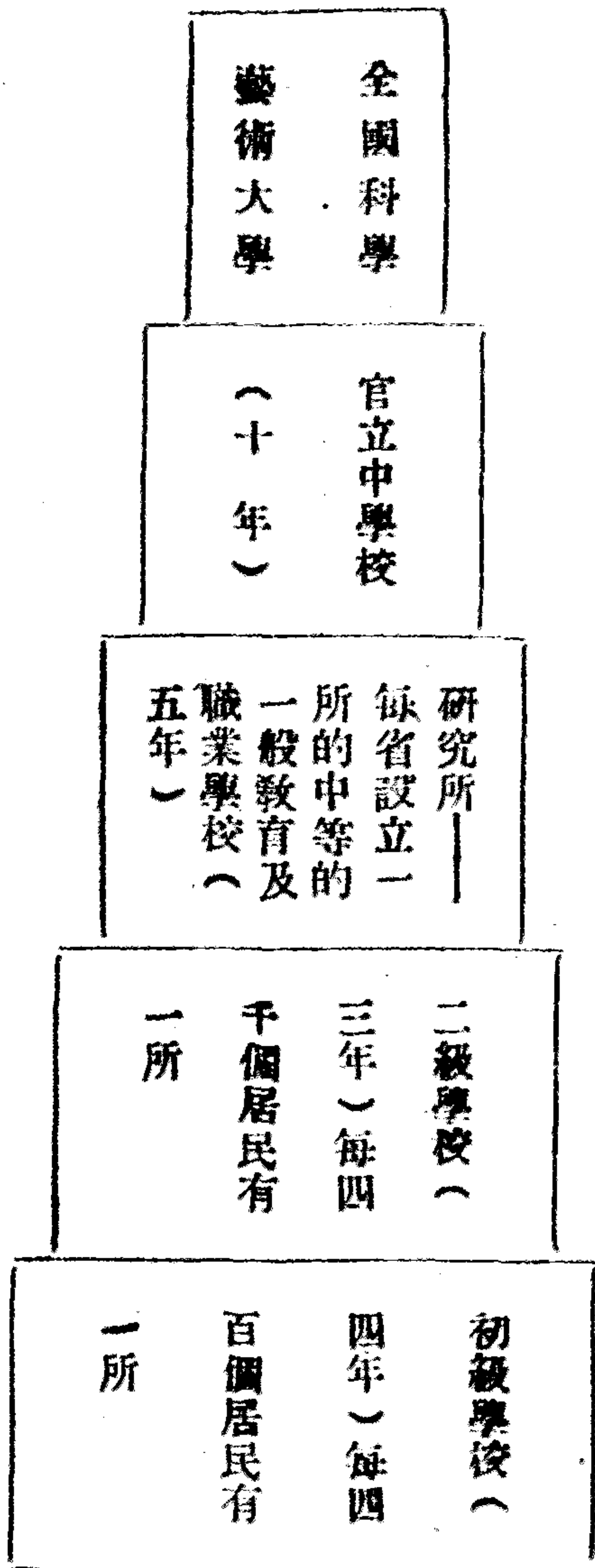
每一等級的學校都是前一級的繼續。每一級的學校不但在課程上與前一級及後一級的學校有聯系，而且在行政上也有聯系：研究所管轄本省的學校，官立中學則管轄本區的研究所。康多塞的學校體系是市民階級民主的體系。它是嚴整而進步的，甚至在革命往前發展的條件下，當政權落到革命的民主派手裏的時候——雅各賓黨人——，它的中級與最高環節還未曾受到任何懷疑或變更。

依照康多塞的計劃，領導整個體系的是「全國科學藝術大學」，它管轄着全部學校體系，從事於科



學研究的活動。

康多塞的學校體系



康多塞認為教育應該是兩性並重的。注重教師的課外工作：教師不但應在學校中授課，而且也要和成年人舉行談話，向他們解釋人權及公民權宣言的內容。廣泛的組織對自修的幫助。當時的大科學家康多塞的整個教育草案，是貫串了科學的熱情，承認科學有極大的意義的。吉倫特黨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十日以前還是革命的，這個革命性也反映在康多塞所擬的教育草案中。社會鬥爭的更進一步的發展，巴黎勞動群眾的發動與革命要求的提出，迫使市民階級及其政黨——吉倫特黨——放棄了過去的急進主義。

187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日，當吉倫特黨人在國民公會執政的最後幾日，國民公會頒佈了一個關於國民教育的法令，這個法令只提及初等教育，而不包括整個的學校體系。這一法令是根據康多塞的草案而編製的。根據這一法令，凡有居民四百至一千五百的鄉村，均應開辦初等學校一所。法令規定應教授一切



公民的必需知識，但忽略了免費與義務教育，男女同等教育，及禁止神學教育。

一七九三年五月三十日法令的這些忽略，及其暗淡與不定的性質，不是偶然的。

吉倫特黨人已經放棄了康多塞草案中所精密公式化了的許多民主要求了，但又害怕向革命群眾及其國民公會中的代表——雅谷賓黨人——表明他們放棄這些要求。

### 雅谷賓黨的教

### 育計劃。萊巴

### 列特的草案

吉倫特黨人被逐出國民公會以後（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國民教育委員會就改選了。但它落入了「泥沼」。曾任牧師的拉卡納爾，負責草擬了一個新的教育草案，他主張國家只經營初等學校，而高級學校歸私人經營。因此，高等教育顯然不是大眾所能接近的了。這個草案自然在國民公會中受到了猛烈的批評，後來就被推翻了。爲要編製新的法案，就組織了一個以羅勃斯庇爾爲首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萊巴列特所草擬的計劃來作它的工作基礎的。

萊巴列特出身於名門貴族，却站在民衆方面參加革命，接近於雅谷賓黨人，主張廢國王以死刑。因此他遭了近衛軍軍官的殺害。他死後留下了一個國民教育草案，這個草案是非凡的民主主義的文獻。這個草案在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被羅勃斯庇爾在國民公會上提出，後來又在雅谷賓黨俱樂部中加以審議。兩次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萊巴列特由批評康多塞的草案開始。後者雖然努力於保證普遍義務的初等教育，却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爲城市和大鄉村比小鄉村處於更有特權的地位，小鄉村是沒有初級學校的。這樣，平等的原則就被破壞了。破壞平等原則的另一個原因，是貧農沒有放棄兒童在農莊勞動的可能，也不能把兒童送進學校。

萊巴列特想用教育方法創造新的人類。他的草案是在盧梭的教育思想的影響下編成的，雅谷賓黨人自認爲是盧梭的學生。



他要建立的教育體系是「爲貧民服務的」、民族的、共和的和人人共有的。爲了消滅落後家庭的保守的影響，爲了建立教育中的真正平等的條件，兒童從五歲起就要送入國民教育所。每個國民教育所收容四百至六百兒童。萊巴列特還爲設立少數的大教育所要比多數小的教育所可以節省很大的開支。沒收的貴族城堡和僧院都可利用來作爲這種教育所的所址。「由於神聖的平等的法律」，兒童在這裏可免費獲得同樣的衣服、飲食、教育和照顧。

在國民教育所中，兒童的體育教育是很注意的。「增加兒童的體力，促進他們的生長，發展他們的靈活性與自動性，鍛鍊他們忍受疲勞、氣候變化、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暫時的缺乏——這就是我們所應努力的目標」。

對於勞動教育，也是很重視的。

萊巴列特要求兒童在國民教育所中認識各種兒童可以接受的勞動。教育所中是沒有工役的：兒童要自己服務自己。

兒童的智力教育的課程爲閱讀、書法、計算、測量、道德初階、人權及公民權宣言、自由民族及法國革命史的故事、農業知識、家政知識。

萊巴列特在體力教育和勞動教育問題上，在宗教教育問題上，雖然受了盧梭的影響，而在紀律問題上，却和盧梭持不同的意見。萊巴列特是紀律的擁護人。

萊巴列特更由「財產神聖性」的原則出發，站在剛成立的市民階級制度的基礎上，但他同時也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要求減消貧富的對立。他想用「貧民兒童的教育由富人負擔」的原則，來解決這一個任務。爲着這一個目的，萊巴列特提出累進的所得稅爲國民教育所的經費來源之一。另一個經費來源是兒童本身的生產勞動。

萊巴列特的吸收兒童家長參加管理國民教育所的思想是很有趣味的。在每一個城區或鄉區，兒童家



長選舉五十二人組織國民教育所委員會。委員會每月開會一次。在一年中，每一家長一星期輪到一次住在教育所考察所內的情形，並在委員會每月召開的大會上提出報告。

萊巴列特把上述教育草案解釋爲「有利於貧民的和平革命」。

在萊巴列特的草案中，我們看到明顯的民主要求，以及對於貧民兒童的關心。他不但提出了普遍義務免費的初等教育和兒童教育的理想，而且更以免費供給兒童飲食、衣服、住所等的形式，來爲這種普遍性和義務性確立了保證。

在萊巴列特的草案中，發揮了體力、勞動及智力教育。尤其有價值的是貧民兒童的教育費由富人負擔的思想，以及父母與學校聯系問題的解決。但除了這以外在草案中也反映了萊巴列特的烏托邦：教育中的兒童和家庭隔離的思想在原則上是不正確的。

從民主性和革命性上說，萊巴列特的草案遠比法國革命時代的其他草案爲進步。因此，這個草案之受雅各賓黨人的歡迎和受國民公會中的「泥沼」代表的反對，也就很明白了。

在幾次會議上的熱烈辯論之後，國民公會於一七九三年八月十三日通過了萊巴列特的草案，並作如下的補充：承認兒童在國民教育所的住宿爲非強制的，同時也通過了組織走讀兒童的學校的提案。但國民公會的這一決議在十月就被取消了。

## 拉伏埃傑的草案

大化學家拉伏埃傑 (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 1793—1794) 在他爲國民教育計劃所作的一篇說明文中 (國民教育的感想)，提出了整個的教育體系。

他從洛克的感覺論出發 (否認先天的思想，承認兒童是一塊「純潔的黑板」，特別重視感覺的意義)。人在誕生之初就具有感覺外部世界的的能力。這些能力必需加以發展。

兒童在誕生以後不久就應學習明瞭大小和距離，用觸覺來矯正視覺的錯誤。然後根據自己的經驗，在落地和受傷中接受更進一步的「物理課」。後來更要讓兒童玩劍，玩木棍，使他認識基本的機械法則。所



以，從童年的初期起，遊戲就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遊戲就是兒童的學習。

根據拉伏埃傑的定義，教育就是「對環境適應的過程」。據他說來，兒童是「正確性不足的研究者」——這自然是不對的；除了正確性以外，兒童的知識也是不夠的。兒童的第一個教師，就是自然。後來兒童不但要適應自然的環境，而且要適應人的環境，要在自然的工具（手等）之外，加上人工的工具。人類的整個工業活動，就是人類適應自然的結果。在這個適應中，人類應利用前人的經驗。因此閱讀、書寫、計算和測量，就有必要了。

我們已經指出洛克的原則對於拉伏埃傑的教育觀的影響。除此以外，拉伏埃傑在許多地方也受了盧梭的影響（兒童的自動性和獨立性；最初大部份的教育根據兒童親身的經驗）。像盧梭一樣，拉伏埃傑也反對學習時的拘泥字句的作風。他也極注意勞動教育。但他比盧梭更注重知識、系統的教育、和學校。兒童所以要參加一切勞動活動，是因為這些活動能夠帶給他們某種知識和概括。

人類各種勞動活動，如果不去分它們的細目，就可以概括為數量不多的幾種勞動方法，統用於農業、木作及冶金等工業。這些基本的勞動方法，正如讀書和計算一樣，是人人都應該學習的。在普通教育的初等學校的課程中，應該包括：閱讀、書寫、計算、測量、初等物理知識、自然科學及基本勞動技能。

繼初等學校之後，便是二等學校，二等學校分為（一）科學文藝學校、（二）機械手工業學校、（三）化學知識及習慣學校。

拉伏埃傑的草案要求更廣泛的展開科學研究工作，以便為民族工業提供新的發展的方法。拉伏埃傑着重指出：國民教育事業的組織，是發展工業，提高國家至繁榮富強幸福程度的必要條件。

在拉伏埃傑的草案中，我們也看到相當估高了兒童個人的經驗。但是草案的基本思想——將國民教育事業的組織適應於發展民族工業的任務——却把這個草案變成了十八世紀末葉法國市民階級革命的傑



出的教育文獻之一。同時也要指出，在弗祿貝爾以前，這個草案已經深刻的發揮了兒童遊戲的教育作用；發揮了兒童勞動教育的理論，認為勞動教育和智識的獲得，有着方法上的聯系。

### 民衆在教育方面的要求

除了上述各人的草案以外，有很多關於國民教育問題的提案，是由巴黎民衆提出的。巴黎許多區域組織了國民教育委員會。一七九三年九月十五日，組織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向國民公會遞出請願書，要求取消成爲階級成見的策源地的大學，並要求除初等學校以外開辦三種高級的學校。

請願書指出，爲了符合社會的利益，每一個有能力的兒童應該得到國家的照顧。同時指出，巴黎的大學回來是中世紀偏見的巢窟，應該代替這些大學，另外開辦一些學校，「讓共和主義者的青年人獲得各種手工業職業上所必需的知識，開辦一些研究所，讓青年人研究科學與語言，開辦一些官立中學，讓天才們爲自己的發展找到一切的方法」。

由於這一大規模的人民請願的結果，國民公會就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除初等學校以外另設二級學校、研究所及官立中學。二級學校教授手工業及產業工人的必需知識。大學被宣佈停辦。但是第二天這個法令又被廢止了。

一七九三年十二月，國民公會根據蒲克的報告，通過了普遍義務教育的法案。

### 熱月保守時期的教育與學校

在熱月九日（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政變以後，國民教育方面所獲得的革命成就，一個個的被取消了。在一七九四年底，初等教育的義務性原則也被取消了。除了國立學校以外，私立學校也被容許了。爲實施高等教育，設立了中央學校，規定每三十萬人一所。在這樣稀少的中央學校網之下，勞動者的子弟自然不能入學校學習了。限制教育直接被認爲是合宜的措置：「大部份青年公民不走向更廣泛的學習，乃是合理和必要的」。一七九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在國民公會解散前兩日，根據牧師多奴的報告，廢止了初等教育的



義務性原則。熱月九日以後，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任何民主原則都被取消了。

但是國民教育沒有退到革命前的水準。市民階級型的國民教育體系確立了；實科中學產生了，職業技術教育更前進了一步，許多新式的高級技術學校也產生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工藝學校的創辦（一七九四年），它爲未來的工程師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準備。

### 巴貝夫派在國民教育方面的要求

萊巴列特在他的教育草案中已經說過：法國革命對於勞工階級是並無貢獻的。勞工羣衆的不滿，在熱月逆流時期特別強烈。組織「平等陰謀」（一七九五—一七九六年）的巴貝夫（François-Noël Babeuf, 1760—1797）也是在這個時期提出他的平等共產主義的思想的。

恩格斯指出：「巴貝夫的陰謀，以平等的名義爲九十三年民主思想作了結論，因爲這些結論在當時是可能的」。巴貝夫把歷史看作貧富鬥爭的舞台，他指出，法國革命只是一個榨取者的集團代替另一個集團。因此巴貝夫和他的信徒就作了一個正確的結論：「法國革命不過是另一個更偉大更宏壯的革命的先驅」。

「平等陰謀」的目的，是在於用革命改變的方法，確立共產主義的政制（但是巴貝夫和巴貝夫派把它解釋爲平等的共產主義）。新政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免費供給麵包和讓貧民遷入反革命派的住所。政權應該只爲勞動者所有。

當時工業和勞工階級的不夠發展，造成了巴貝夫學說的許多錯誤：他沒有估計到勞工階級的革命的歷史作用，對於工業的意義估計得太低，對於城市取否定的態度。在巴貝夫和尤其是他的信徒們的言論中，往往發現原始主義，不了解科學藝術的鉅大進步作用，以及盧梭哲學中抄襲來的「人的自然狀態」的熱中。這種巴貝夫派的觀點一方面由歷史造成的限制性和另一方面保護勞動者權利的革命的努力，也



反映在巴貝夫派的教育思想上。

「準備『平等陰謀』的叛變委員會，認為教育應該是民族的，換句話說，是包括全民的，並應由革命政權來組織的。教育應該是普遍給與一切兒童的。它應該是平等的，對一切兒童都是一樣的。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在每個人的心中培植普遍友愛的感覺』。教育應該發展體力和肉體的靈活性，勇氣和毅力，以及高度的智慧水準。教育應該發展對革命祖國的愛。巴貝夫派對勞動教育（農業與手工業）是很重視的。」

巴貝夫派認為必需教授學生閱讀、書寫、計算、本國歷史與法律、自然科學及本國地理。

巴貝夫派對於體育及軍事訓練、忍耐及節制教育，是很重視的。在這一方面，他們傾向於斯巴達的教育。

巴貝夫派的觀點的歷史限制性，使他們歸結於男女同等教育的否定，而要求為男女單獨組織教育機構。

巴貝夫派的教育觀，是在盧梭和萊巴列特的影響下構成的。



## 第十一章 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

### 略傳。裴斯塔羅齊的實際教育活動

大教育家裴斯塔羅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於一七六四年生於瑞士的涅里克。父親是一個醫生。中學畢業後，裴斯塔羅齊就入卡洛林大學，修習語言學與哲學兩個最低級的課程。第三個課程——神學科——是因受了盧梭的著作的影響而棄放的。在學習時期，給與裴斯塔羅齊影響最大的，是兩個教學生愛護人民和爭取自由的教授。其中之一，是哲學教授，接近於萊布尼茲的伏爾夫 (Wolff) 哲學體系的擁護者。要說明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的哲學基礎，就必需指出這一事實。

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瑞士資本主義已經開始發展了。資本主義深入農村後，就把農村分了層次。裴斯塔羅齊把農民經濟描寫為三個型類：富裕的，中等的和貧窮的。農民除了受封建榨取以外，還受資本方面的榨取。

瑞士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從事於改善農民生活的活動。但是他們沒有看到農民生活惡化的真正原因。他們的民粹主義的傾向使他們不能踏上革命發動的路，而完全帶了教化的性質。但甚至這樣的活動，都受到了當時當權的封建主的追究。裴斯塔羅齊所參加的小組被解散了。裴斯塔羅齊甚至遭了短期的逮捕。

在這一時期（六十年代中期），給與裴斯塔羅齊以影響最大的，是剛出世的盧梭的著作（「民約論」與「愛彌兒」）。裴斯塔羅齊自己曾說過，盧梭的著作喚醒了他的「為更廣泛的與更有益於人民的擴大活動範圍的努力」。

裴斯塔羅齊熱忱地參加了改善勞動人民生活的活動。他爲了要幫助農民改善他們的經濟，曾在一個



模範農場裏研究了染色植物的種植方法。

一七六八年裴斯塔羅齊以工作所得的積蓄購置一塊土地，建築一棟房舍，稱作「納依荷夫」(Z. Hor) 田莊，他企圖在這裏組織示範農場，讓鄰近農民都能學習農耕、畜牧、和紡織的方法。建築在博愛主義基礎上的農場自然是沒有成就的。裴斯塔羅齊非但沒有學會週圍農場上的正確的經營方法，反而把他的農場陷於衰落。結果爲了償債，不得不變賣了一部份財產。

但是還在學生時代就完全支配了裴斯塔羅齊的那種畢生爲人民服務的思想，仍沒有被他所拋棄。一七七四年他又集了一筆資金在納依荷夫創辦了一個孤兒院。

裴斯塔羅齊的孤兒院是依據這樣的原則建築的：兒童的生活由自己維持，夏日在田裏工作，冬日在紡織機上工作。裴斯塔羅齊認爲用這樣的方法可以爲兒童應付生活的給養，在紡織和從事其他工作的時候，裴斯塔羅齊就擔任了作業兒童的教育工作（共有五十個左右學生）。

農場上設有乾酪製造所和紡織工場。聘請了幾個專門工人擔任兒童手工業課程的教授工作，裴斯塔羅齊自己則教授兒童閱讀、書寫和計算。他爲他們的親切的愛撫所包圍，從來和他們在一起，和他們分擔着快樂與悲哀。

募捐來的和裴斯塔羅齊私人所出的錢不能長久維持孤兒院的開支。一七八〇年孤兒院就停辦了。裴斯塔羅齊的第一個教育經驗——「納依荷夫孤兒院」——的失敗，是因爲這個孤兒院的基礎是完全自給的正確原則。裴斯塔羅齊以爲孤兒院可以由兒童的工作收入來維持自己；但兒童是不能够（如果不榨取他們的話）以自己的勞動來抵消自己的教育和給養價值的。裴斯塔羅齊不願意榨取兒童。因此他的經驗是早就註定了。在納依荷夫的經驗上，最寶貴的是生產勞動與教育聯系的思想。裴斯塔羅齊的經常和兒童的接觸（他甚至和他們一同食宿），他的毅力以及他的一般的模範作用，給與兒童以極大的教育影響。

孤兒院停辦了，但是裴斯塔羅齊的以教育方法改善社會生活的信仰，仍沒有喪失。一七八〇年，他



寫了第一部教育著作——「隱者之晚夕」(Abendstunde eines Einsiedlers)。在這部著作中，他以格言的形式指出，「普遍人類的教育，應該是任何專門的階級教育的基础」；「由天然得來的能力，應該用練習的方法加以發展和加強」。

兒童的教育，必需由接近的週圍事物開始，後來才慢慢及於遠方和不知的事物，必需研究現實和生括，而不是文字。裴斯塔羅齊在這部著作中，公式化了人類教育的民主主義的思想：「整個人類，就其本質說來是同樣的，爲了完成它的本質，應該只採取一種方法」。在隱者之晚夕中，反映着盧梭所給與的鉅大的影響。

第二年，一七八一年，出版了裴斯塔羅齊的著名長篇小說「林哈爾德與蓋德路特」(Lienhard und Gertrud)的第一部份。

這部小說的特色不在於藝術價值；它是冗長而感傷的，但在當時，在法國市民階級革命的前夜，這部小說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部小說的目的是在指出社會應該怎樣的改造。

裴斯塔羅齊會夢想改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活，他看出了他們的困難的境况，但沒有從這個境况中找到正確的出路；他把他的最主要的希望寄托在慈仁的地主身上。

一七九二年革命法國的立法會議，曾以「法蘭西共和國公民」的身份獎勵他的著作和教育活動。

一七九八年，法國軍隊幫助瑞士市民階級的革命運動，佔領了瑞士。過去各州的封建獨立局面被取消了。瑞士統一而爲市民階級的海爾威西共和國，歸執政官政府領導。

過去會握政權的貴族階級在各州發動反革命的叛亂。斯坦茨城是在一次鎮壓叛亂的戰事中被毀滅的。留下了許多無家可歸的孤兒。執政官政府就勸裴斯塔羅齊爲他們組織孤兒院，並給與六千法郎和一所已封閉的僧院。裴斯塔羅齊同意了。

馬上就招集了八十個五歲到十歲的兒童。據裴斯塔羅齊在「與友人談斯坦茨城的經歷書」中說，其



中有許多兒童「是患着難治的癩疥，有許多是破了頭的，有的穿了破了衣服，身上爬滿了虱子，而黃瘦的像骷髏……十個兒童中是難得有一個懂字母的」。

在斯坦茨城的孤兒院的組織時期，裴斯塔羅齊根據了下述的原則：喚起兒童的人道感，使孤兒院的建設仿照家庭的方式，由生活印象與示例方法達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以及勞動教育的實施。所以，裴斯塔羅齊在斯坦茨城是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因為孤兒院的經費是由政府供給的），重覆了他的納依荷夫孤兒院的經驗的。

裴斯塔羅齊在「談斯坦茨城的經歷書」中，描寫了他和兒童的關係：

「我的孩子們從清早到深夜每秒鐘都是看着我的額和推測着我的唇，因為我的心是和他們結合的，他們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們的愉快就是我的愉快……從早晨到晚上，我是在他們的中間。對於他們的肉體和精神的一切好的東西都是由我的手給與的。一切幫助和教導都是直接由我出發的。我的手是放在他們的手上，我的眼睛看着他們的眼睛。我的淚和他們的眼淚交流，我的歡笑是跟他們的歡笑之後。他們是在世界之外，是在斯坦茨之外，他們和我是一起的。他們的食糧也是我的食糧，他們的衣服也是我的衣服。我什麼沒有，沒有房屋，沒有友人，沒有僕人，却只有他們」。

斯坦茨的孤兒院也是存在了不久。法軍佔領了院址，孤兒院就停辦了。

裴斯塔羅齊就担任伯蘭尼州的布格多夫初等學校的教師，過了一年又在布格多夫和幾個同志合辦了一個研究所，繼續他在斯坦茨所開始的教學簡單化的經驗，尋求一種能够把兒童教育由每個母親自己担任的方法。在這一時期（一八〇一—一八〇三年），他出版了一部「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的書信集；後來又出版了「母親必讀」、「觀察初步」、「教學淺說」。裴斯塔羅齊在布格多夫工作四年。



一八〇五年，裴斯塔羅齊和他的同志們遷到依弗爾頓，繼續開辦中學和師範學校。師範學校存在的最初十年是繁榮的時期。學生數量日增。學校聲譽擴展到瑞士國境之外，被譽為模範的教育機關。哲學家和教育家們（其中有費希特、弗祿貝爾等等）都到這裡來參觀。

在學生中，有許多是準備投考大學的富農甚至地主的子弟。教育方法，以及學校行政活動，完全吞食了裴斯塔羅齊，不容他有實現過去計劃——以教育方法改善普通人民生活——的可能。但他還是夢想消滅農民的貧困，不過受了當時形勢的限制，裴斯塔羅齊在這一方面的活動不得不採取幕後的方式。

教師們都重視裴斯塔羅齊的方法上的指示，却不了解他的基本思想——改造瑞士農民的生活以及一般的用教育方法改善貧農生活的努力。

裴斯塔羅齊的疲勞，他對於學校所採取的方針的不滿，教員份子的複雜和相互間的不和，不安的政治局面——這一切，給了師範學校的生命以重大的打擊。學校存在的最後十年（一八一五—一八二五年）是逐漸衰落的時期。

在依弗爾頓工作了二十年之後，疲勞過度的裴斯塔羅齊於一八二五年回到他在五十年以前開始他的教育活動的地方——納依荷夫。在這裡，裴斯塔羅齊已經以八十歲的老翁，寫了一部「白鴿之歌」（Schwanengesang），總結他的教育工作，並為他的一切教育上的發現作一個綜合。

裴斯塔羅齊於一八二七年逝世，享年八十二歲。他畢生服務於教育，生活刻苦，並捐助了一筆最後的貧乏的資金給他所創辦的教育機關。他愛兒童，他是教育家的模範，表現了極大的毅力和堅忍，他在他的生命的長時期中把理論和實踐結為一體。

他是民主主義的教育家，他愛自己的人民，並誠心地為改善他們的困苦的情況，為改善貧民的生活而努力，但他沒有找到改善生活的正確的道路。



作爲裴斯塔羅齊教育體系基礎的哲學觀。

裴斯塔羅齊的哲學觀，形成於十八世紀的六十七八十年代，即法國市民階級革命成熟和民主運動生長以及德國文化生活繁榮的時代。給與他以影響的，一方面是當時歐洲社會生活中的這些變動，另一方面是瑞士及德國經濟上的落後性與這些國家市民階級的脆弱性。

盧梭的著作「民約論」與「愛彌兒」剛剛出世，就給年輕的裴斯塔羅齊以極大的影響。他在「白鴿之歌」裡回憶盧梭的愛彌兒一書會使他的熱忱達到最高峯。他認爲「全世界和各階級的被損毀的家庭及社會教育祇有在盧梭的偉大思想出世以後才能找到他們的治療方法」。

對於青年裴斯塔羅齊的民主主義，對於裴斯塔羅齊的第一部著作「隱者之晚夕」（一七八〇年），對於裴斯塔羅齊的哲學筆記「人類種屬發展上的自然行程研究」（*Meine Nachforschungen über den Gang der Natur in der Ens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一七九七年」，盧梭會給與極大的影響。

在「隱者之晚夕」裡，裴斯塔羅齊寫出整個人類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應該只走一條道路，發展他們的天然能力。只有訓練兒童對於週圍物質的適應力，才能達到這一發展的目的。週圍事物的實際知識應該先於文字的研究。應以人的教育爲基礎；教育過程中的主要部份，是「心的教育」。雙親家庭教育應該該是公民教育的基礎和發端。

在這些思想中，不難找出盧梭的許多原則性的觀點。這些觀點也反映在裴斯塔羅齊的後來幾部著作中。

在「人類種屬發展上的自然行程研究」中，主題本身就已受了盧梭思想的影響。像盧梭一樣，裴斯塔羅齊把人類種族的兩種狀態——「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對立起來，認爲「社會狀態」就是「自然狀態的限制」。盧梭的愛彌兒是以這兩句話開始的：「從自然界的手裡出來時，一切都是好的



，到了人的手裡，一切就退化了一，因而把兒童的天性理想化了。斐斯塔羅齊在他的發展的某種階段上，也是和這接近的。

但是斐斯塔羅齊的哲學觀和社會學觀點，不但是在盧梭的影響之下形成的，而且也是當時瑞士現實，十八世紀的法國市民階級革命、盧梭和德國哲學（萊布尼茲、伏爾夫、康德、費希德等哲學）的交互影響下的複雜的產物。

在青年時代，斐斯塔羅齊在加洛林大學會獲得系統的哲學教育，同時，正如上面所說，他的一個最敬愛的教授（勃藍丁格）是萊布尼茲——伏爾夫哲學體系的擁護人。而這一體系對於斐斯塔羅齊的哲學觀和教育觀的發展確實也給了極大的影響。

斐斯塔羅齊的關於認識論、倫理學和宗教的思想，有很多地方是接近於萊布尼茲的觀點的。

在萊布尼茲和斐斯塔羅齊的哲學體系中，自我發展，道德力量及其完成，愛與積極活動，起了極大的作用。斐斯塔羅齊認為每個人的能力是在於脫離無生命狀態和完成其為發展力量的努力——這個公式是和萊布尼茲關於單子自我發展的學說相接近的。依照斐斯塔羅齊的解說（萊布尼茲也一樣），道德就是對人間的積極的愛；而這一對人間的積極的愛，依照斐斯塔羅齊的見解，同時也構成了宗教的本質。

後來，當斐斯塔羅齊研究萊布尼茲——伏爾夫的哲學時，康德的哲學活動就開展了，康德起初也是萊布尼茲伏爾夫體系的擁護者。一七八一年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一七八八年出版了「實踐理性批判」——這是康德最主要的兩部著作。

斐斯塔羅齊在其「思辨」的概念中，特別顯出與康德哲學的接近。康德認為，「我們人的一切知識，都是由感覺開始的，然後轉到思慮，最後結束於理性，理性對於製造明顯的表象的材料，對於將這個材料安放到最高思維統一體之下，是我們的最高審級」。

斐斯塔羅齊的「思辨」觀，是和這一唯心論的圖式接近。後者也從感覺的觀察開始，由表象研究的



方法達到思想，思想在學生看來是未明瞭狀態的已形成的力量；這種先驗思想是在感覺觀察和具體表象的研究幫助下顯出的。斐斯塔羅齊的「思辨」這個術語，似乎是從康德那裏抄襲的。

我們認為認識過程是由不知到知的辯證的過度，是人的意識中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斐斯塔羅齊在這個問題上模倣了康德，認為認識是普遍的和必需的先驗因素的顯現。在關於教育要素的學說中，斐斯塔羅齊也是大部份踏襲了康德關於認識的先驗形式的學說的。

可是最接近於康德的是斐斯塔羅齊的道德觀和宗教觀。依照康德，人的道德意識是和他的天然性辯對立的。在「人類種屬發展上的自然行程研究」中，斐斯塔羅齊模倣了盧梭，把人的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對立起來。

但和盧梭不同的，盧梭認為自然狀態是人的理想，斐斯塔羅齊則受了德國哲學（萊布尼茨和康德）的倫理學說的影響，把第三種最高的狀態——道德狀態——來和自然狀態及其對立物——社會狀態——相對立。

### 斐斯塔羅齊的 教育目的觀。 道德教育。

依照斐斯塔羅齊的解釋，教育是按照自然行程的天然能力的發展。「真正的人性」的出現，完人的創造——就是教育的目的；人的意義，就是要把自己的素質達到可能完善的境地。「除了體力與能力的和諧發展以外，教育沒有另外的目的」（斐斯塔羅齊的「要素教育觀」）。人應該把思想和為善的意志平衡地接合和發展起來。

在「人性」的思想中，斐斯塔羅齊插進了鉅大的社會內容：人的自我發展不但作為個人是重要的，而且作為人類群體的成員是重要的。人應該意識自己是鉅大的人類家庭中的子孫，是別人的兄弟。

斐斯塔羅齊認為每一個人要達到這樣的自覺，就必須通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在斐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中佔了很大的位置。



裴斯塔羅齊差不多在他的所有著作裡，有很多地方提到家庭教育問題，以及作爲女教師的母親的意義問題。例如，在「斯坦茨城的經歷書」中，裴斯塔羅齊說過：「在社會教育事業上，應該模倣家庭教育中所包含的優點……只有在模倣後者的情形下，社會教育才能有益於人民」。在另一個地方（「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第十三信），裴斯塔羅齊說過，對於兒童和人民的愛的感覺，對於他們的信任，紀律、感謝、忍耐、義務等的感覺，宗教的感覺等等，都是從「兒童對母親的關係」出發的。

在「要素教育觀」中，裴斯塔羅齊認定「家庭生活應該是教育唯一的外部基礎」。道德教育是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的中心。道德的本質，依照裴斯塔羅齊的解釋，是對人間的積極的愛。

裴斯塔羅齊也把這個對人間的積極的愛的思想插到他的宗教中。這不是教條式的宗教。裴斯塔羅齊在「林哈爾德與蓋德路特」的一章裡明白摘發了僧侶的獨斷、冷酷、偽善等等。

可是裴斯塔羅齊雖然摘發了僧侶階級，駁斥了各種迷信的儀式的宗教，却同時也表現了當時瑞士市民階級與小市民階級的進步努力與脆弱性及限制性，不能像法國唯物論者那樣達到無神論的地步，而停留在「自然宗教」的認識上，就是他所解釋的對人間的積極的愛上。

發展人身上的體力和能力的方法便是練習：「每一種力量的性質本身，鼓勵着人們去訓練它們。眼睛需要看，耳朵需要聽，足需要走，手需要拿。但是心也需要信仰與愛。智慧需要思想。在人的每一種能力中包藏着脫離無生命與不靈活狀態和完成爲發展的力量，這種發展的力量在不發展的形式中只是力量的萌芽，而不是力量本身（「白鴿之歌」第八節）。

裴斯塔羅齊的整個教育體系的目標，是在改善農民的生活。但是由於不正確的小市民階級的社會學觀與踏襲萊布尼茲的「預定調和」思想的結果，裴斯塔羅齊認爲每一個階級都是應該保存的。農民子弟應該爲了改良農業而受教育，手工業者的子弟爲了從事工藝而受教育，而貴族子弟要受科學教育。裴斯



塔羅齊屬爲現存的生活條件與勞動條件，某種階級的需要，乃是製造教育體系的標準。因此在貧民子弟的教育上，勞動具有極大的意義。這樣就從裴斯塔羅齊的道德教育學說中，產生了他的勞動教育的理論。

## 勞 動 教 育

裴斯塔羅齊在他的《納依荷夫和斯坦茨的實際教育活動中》，和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提出了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思想。

在《林哈爾德與蓋德路特》這部小說中，裴斯塔羅齊描寫蓋德路特家庭中實施勞動教育與初步教育的方法：她的孩子們做着紡織的工作，蓋德路特就在工作時教他們閱讀和計算，和他們練習詩歌，教他們瑞士的歷史等等。

這部小說又描寫地主爲貧農子弟所開辦的學校。兒童在學校中是整天在織機上和紡機上工作的，或做別的工作，由兒童或他們的家長選擇。

爲了教兒童農耕，教師格留爾費開闢了一個校園。每個兒童有三個小花壇。花壇比別人利用得好的兒童就得獎。學校也教兒童畜牧和養鳥方法：校中有豬、羊、兔等畜類和各種鳥類，由兒童加以看護。兒童學習製麻和製羊毛。兒童訪問本村的模範農家，問農家的主人關於貴重植物的栽培方法。在工作時和休息的時間，格留爾費教兒童學習，和他們談話。

裴斯塔羅齊的功勞，是在於他提出了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問題，但他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是不正確的。

他的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並不是兩者同時的會流。在他，勞動和教育是沒有內部聯系的，只是純粹機械的結合。裴斯塔羅齊所了解的勞動教育，只是手工業和小規模農業的教育。兒童大部份時間和教師大部份的注意力都是消耗在手工勞動之上，這自然有害於兒童初步知識（閱讀、書寫、計算、地理等）的傳授。同時裴斯塔羅齊還認爲勞動教育應該服從於教育任務。這是裴氏教育體系的無數矛盾中的一



價。

說到勞動教育的任務，裴斯塔羅齊認為任何職業上的發展對於人類是無價值的，因為職業上的發展不會給與人類以智力的發展。「農耕，家政和手工業不能成爲我的目的。人性的發展才是我的目的，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只把農耕、家政和手工業看作補助的工具」（要素教育觀）。裴斯塔羅齊要「在工作的時間和利用工作的方法來溫暖他們（兒童）的心和發展他們的智慧」（同上）。

關於一般教育和勞動教育，及一般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相互關係問題，裴斯塔羅齊的解決方法是不正確的。裴斯塔羅齊認爲勞動教育只對於農民和手工業者，當作對他們生活中的某種「預定」命運的訓練是必要的。他所以會發生這個錯誤，是因爲他沒有看見改善民衆生活的正確道路，他認爲在當時所存在的制度範圍裡，是可以實現這個改善的。

### 裴斯塔羅齊的

#### 教授基礎：要

#### 素教育論；「

#### 思辨」

裴斯塔羅齊在他的教育理論中，想把三方面的教育：智力教育、道德教育和勞動教育交編起來。

裴斯塔羅齊以要素教育的概念作爲他的教育觀的基礎。他們理解的要素教育，就是把教育過程分解爲若干成爲一切知識基礎的基本要素。

裴斯塔羅齊繼萊布尼茲和康德之後，把教育過程由感覺表象進到明白的概念。裴斯塔羅齊把這一週圍現象的認識過程稱作思辨。思辨的基礎是觀察。

一切教育，都應以觀察和經驗爲基礎，人類由觀察和經驗得到結論、概括和比較。裴斯塔羅齊的這一教育原則，不但適用於外部世界的感覺，而且適用於內部世界的感覺，不但適用於智力教育，而且適用於道德教育；適用於人與人類的思想。

但是裴斯塔羅齊不是停頓在觀察之上——觀察不過是認識的初步。由觀察方法所得來的視覺，聽覺和其他感覺，喚醒了人的思想和表現觀察結果的需要——尤其是說話的需要。所以，「思辨」在裴氏的



理解中，是一種複雜的過程，其中包括：作為初步要素的感覺經驗，然後包括抽象化和概括化的思想活動，以及（利用文字）觀察結果和思想結果的表現。

裴斯塔羅齊長時期中尋求初步學習的要素，並由他的「思辨」概念出發，得到一個結論：存在着三種這樣的要素：形式、數目和文字。

裴斯塔羅齊說，每一個人都想明瞭三個太明瞭的問題：（一）在他眼前有幾樣東西；（二）它們的形式是怎樣的；（三）它們叫什麼名稱。換句話說，「數目、形式和文字，是一切學習的初步手段」，因此，初步學習的目標，是在於發展測量、計算和說話的能力。

裴斯塔羅齊關於這三種要素的指示，可用下表來說明：

要素	學習過程	部份的方法
文字	言語的發展	發音。談話。擴大語彙。閱讀。文法。正確的口頭及文字思想表現力的發展。關於地理、歷史、自然科學的初步知識。歌唱。
數目	計算	數的概念的發展。數目字的背誦和書寫。算術練習。口頭計算。關於分數的概念。
形式	測量	繪畫。製圖。書法。關於幾何學的初步知識。

這種要素的學習，是在發展和激發我們的思想能力。裴斯塔羅齊認為教育最終目的就在於這最後一種能力的發展。換句話說，裴斯塔羅齊是為形式教育辯護和論証。

裴斯塔羅齊反對強制兒童埋頭於無用知識的經院主義的學校；他要求發展兒童的思想活動。在這



方面，他的「要素教育」的理論會有極大的貢獻。裴斯塔羅齊的最大功績，是在於他以這一理論提出了智慧發展的問題，反對無意義的機械背誦，而接近於兒童自覺的吸收教材的原則。

### 裴斯塔羅齊的 教授法原則； 記述性的作用

前面已經說過，裴斯塔羅齊是把觀察作為認識的基礎的。「只有由觀察而產生的真理，能夠給人們一種力量，它可以阻止成見和誤解侵入人的心靈」（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第二信）。「正確的看和正確的聽，是人間智慧的第一步」（林哈爾德與蓋德路特第三章）。

因此，在裴斯塔羅齊的教育學中，記述性的原則是被重視的。「當我現在回過頭來，問問自己：我究竟為人類的教育做些什麼，我就找到下面的答案：我已牢不可破地建立最高的基本的教育原則，承認記述性為一切認識的絕對基礎」（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第九信）。記述性在這裡是被理解得很廣泛的：這不僅是視覺的接受，而是全部感覺器官的參加。「你用來探知事物本質和現象的感覺器官數量愈多，你對於它們的認識也就愈正確」（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第五信）。

系統性的原則，和從這一原則中所產生的循序性，漸進性及教材吸收鞏固性的原則，在裴斯塔羅齊的教授法中佔了極大的地位。

要從最簡單的觀察進到比較複雜的觀察。漸進性和循序性在教育與學習中起着極大的作用。要從最容易和最簡單的事物學起，只有學會這些事物以後才能漸漸轉到比較複雜和困難的事物。「在未轉到複雜的知識之前要先整理自己的觀察和結束簡單的知識。在一切學習上，要遵守認識循序性的原則，在循序性底下，每一個新的概念是對以前所獲得的知識的不很大的甚至不顯著的附加，是容易吸收和難於磨滅的知識」。兒童的觀察應從接近的週圍事物開始，然後轉到遠處。在認識一種新的事物時，要利用已獲得的全部概念和表象。



裴斯塔羅齊的兒童年齡特性的考慮和教材適應於兒童能力的要求是完全正確的。『要依照兒童年齡的等級，分配一切學習爲若干組成部份，並在每一學習部門中作最精密的規定，務使它的組成部份中的知識符合於某種年齡』（蓋德路特怎樣教育自己的兒童，第一信）。

### 裴斯塔羅齊的意義

裴斯塔羅齊是非凡的教育理論家和教育實踐家。他獻身於教育工作達五十年之久。對於每一個教育家，裴斯塔羅齊是毅力和堅忍性的模範，是熱愛教育事業及熱愛兒童的模範。在實際教育活動中，他會遇到失敗（由於經費不足和另外的原因，他所主持的學校停辦了），但他從來沒有喪失勇氣，並以驚人的毅力繼續自己的教育活動。

在他生命的長時期中，他燃起了對農民與勞動者的幫助的願望。他是民主主義的教育家；他以幫助人民爲自己的目的，但在當時的條件下（國家的落後，社會鬥爭的不發展，勞工階級的不成熟等等），沒有找到改善勞工生活的正確道路。

裴斯塔羅齊是夸美紐斯以後的最大的教授法家。他在國民學校中所規定的課程內容，要比過去和同時期的初等學校中的課程內容爲廣泛，包括國語，算術及初級幾何、自然科學、地理、歷史、圖畫、唱歌。他要求考慮兒童在學習過程中的心理特徵，發展記述教育的學說，並極重視兒童的自修和練習。

裴斯塔羅齊在教育學的更進一步的發展上，尤其是在國民學校中的教育與學習方法的發展上，給了極大的影響。

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的各個方面，曾被許多創造教育體系的大教育家——理論家所利用。例如弗祿貝爾曾利用了和發展了裴斯塔羅齊的教育觀，利用他的能力自我發展的觀點。海爾巴特在其活動的初期曾熱中於裴斯塔羅齊的方法論的觀點，並接受了他的心理學習的思想。第斯多惠以裴斯塔羅齊所提出的學生自動性的要求爲其教育方法的基礎。

許多方法論家，如文字學方面的吉拉爾，數學方面的格魯勃，和著名地理學家里德，都是從裴斯塔



羅齊的觀點出發的。

當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俄國開始創辦國民學校的時候，裴氏對於這種學校的發展和六七十年代俄國教育思想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影響。他的學說曾被烏辛斯基、科爾夫、布納科夫、著名的數學方法論家耶吐希夫斯基等所重視和利用。



## 第十三章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教育

（泛愛主義者·康德）

十八世紀末葉德國文化生活的繁榮·新人文主義

德國在十八世紀中葉分割為許多小國和城市，在經濟和政治關係上與英法及荷蘭相比還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葉已經開始發展了機器工業，而在德國許多區域中，手工業與落後的生產方法，狹窄的行會生產性質還佔着統治地位。

德國政治上的封建割裂局面，是和這一經濟落後性相適應的。英法很早就已轉成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國，而德國還是一個由三百個公國和自治城所構成的國家。德國市民階級到十八世紀末葉還是軟弱無力的。在德國生活中，統治着政治的閉鎖性、家長主義的狹窄性和保守主義。

十八世紀的最後十年，在德國個別經濟部門中的某些經濟繁榮的影響下，和在法國革命運動的影響下，德國思想生活上開始了繁榮的時期，這就是「暴風雨和衝擊」（*Sturm und Drang*）的時期。文學、哲學、藝術力謀打破束縛生活的足枷。許多為自由呼號的大作家——列辛、歌德、席勒——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的文壇上輝耀。在哲學上，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年）和費希德（一七六二—一八一四年）提出了新的哲學體系，奠定了德國唯心論哲學的繁榮基礎。這一哲學提出了發展的思想，因而也比法國唯物論哲學家在哲學思想運動上更前進了一步。

以前受封建制壓抑的個人人格的尊重，各方面發展的思想 and 古典文化的熱中——成了新文學與新看



學的口號；新人文主義的運動就展開了。

「新人文主義是『第二次的文藝復興』。熱中於希臘文化與古代希臘人所解釋的『多方面發展』的理想，以及崇拜個人——這就是新人文主義的特徵。與形式上的模倣古典作家的文字及十七—十八世紀的無生命的虛偽的古典主義相反，新人文主義要求接受古代希臘文化的精神。」

新人文主義者說得很對：生活條件從古代希臘時期起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動。科學與文化也進步得很遠；因此單純的模倣古代世界便是倒退，便要受人工造作的害處了。必須先有民族的發展，這一發展所應利用的只有古希臘所創造的價值。新人文主義者認為這種價值的特徵就是人的崇拜，各方面發展和古代希臘人的快樂的世界感，他們對於美的崇拜，古代希臘人的積極性，希臘文和拉丁文的明白、柔和與旋律性，希臘藝術的模範與古希臘哲學的高度發展。

在德國所展開的民主傾向表現在對雅典共和國民民主管理的愛好的形式上。

所以，新人文主義是一個進步的運動，它是與民主主義的傾向、民族獨立的努力以及反封建的鬥爭有密切聯系的。接近於這一運動的有許多大作家——列辛、歌德和席勒——以及奠定新語學與古典科學基礎的大科學家——伏爾夫，歷史學家尼布爾等等。

新人文主義給了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中學和大學以極大的影響。

德國社會生活的繁榮和文化運動的蓬勃自然不能不影響德國教育思想的發展。

在這一時期的教育思想領域中，最顯著的現象就是泛愛主義者的教育學和康德的教育觀。

**泛愛主義者**（**巴爾特柴爾茨**、**曼寧**等）  
生活條件中的一種企圖，但因為德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落後於法國，所以泛愛主義者的教育思想也只是虛梭教育觀的模糊的和甚至歪曲的複寫。固然與過去相比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但這個進步是脆弱的，不堅決的，保存了虛梭所堅決反對的過去的階級成見和宗教成見的。



泛愛主義的最著名的代表和奠基人是巴瑞特 (Johann Bernhard Basedow, 1724—1790)。一七六八年他在盧梭「愛彌兒」的影響下，寫了一篇「告人類友人與有產人士書」，批評當時的學校組織，要求創辦以盧梭教育原則為基礎的新學校。信末要求各界給與創辦此類學校所需要的物質援助。

巴瑞特用募捐所得的款子在一七七〇年印了一部「父母之書」 (Methodenbuch für Vater und Mutter)，在一七七四年印了一部類似兒童百科全書的「初學入門」 (Elementarbuch)。

巴瑞特在第一部著作中，把自己的教育觀列成了公式。教育的目的，是在發展人和社會有用的成員，是在準備兒童進入社會有益的愛國主義的和幸福的生活。這種教育是只有學校能夠給與的。

要對體育教育（清潔空氣的利用，簡單的生活方式，鍛鍊及體育練習）加以極大的注意。要實施「心的教育」：發展兒童的人類愛（泛愛這個名字就是從這裡發生的），慈仁，快活的世界感。在道德教育方面，要注意節制、謹慎、勤勉、廉恥和貞操的發展。巴瑞特對家庭教育是很重視的，要求學校建造依照家庭的模型。農業手工業的實際工作在教育中應佔極大的位置。

在學習方面，巴瑞特要求避免早熟的發展，注意兒童的興趣，使學習變成輕鬆愉快，避免目標過多。但在這一方面的努力中，巴瑞特是站在「娛樂、教育」的立場上的，他企圖把學習變為消遣。實物的研究應該先於文字的學習。

在這許多見解中，可以發現盧梭所給與的有力的影響。但在某些問題上，上面說過，巴瑞特的見解是與盧梭不同的。當時德國生活的家長制的性質使他不得不和盧梭相反的提出了盲目紀律的要求：「從童年起，就要實施育目的僧院式的服役」，兒童方面不能有絲毫的反對，沒有命令動機的說明。在宗教教育問題上，他和盧梭也持不同的意見：巴瑞特是由幼年開始實施兒童宗教教育的擁護者（雖然他不是懺悔教育的擁護者）。

一七七四年巴瑞特在台隆創辦了一個教育機關——「泛愛院」 (Philanthropinum)。泛愛院的學



生數目在各個時刻是不同的，最少時只有十三人，最多時有五十三人。巴瑞特因爲不願放棄階級劃分，就把學生分成了三組：貴族子弟爲學士院生，擔任未來教師和家庭教師的爲教育院生，不屬於貴族階級而在貴族家庭中充任僕役的貧民子弟爲助理生。

在德國各地模倣台鑿的泛愛院產生了許多同樣的學校。其中最有名的是巴瑞特的同志之一柴爾茨曼（Christian Zalsman, 1741—1811）在一七八四年所創辦的和直到二十世紀還存在的秋林根森林中希納浦芬塔爾村附近的泛愛院。這個泛愛院奠定了森林學校的基礎。

兒童在夏天每晨從四點鐘起身（春天五點鐘，冬天六點鐘），到花園或菜園中工作，飼養動物（兔子，鳥類與魚類等。柴爾茨曼很重視這種早晨的工作，他認爲這些工作可以鍛鍊兒童的體力，養成兒童的愛勞動的習慣。柴爾茨曼的泛愛院的全部生活，是建築在良好家庭的方式上的。重視教師個人的模範作用。廣泛舉行參觀旅行與實物學習。

泛愛派之一，康配（Johann Heinrich Campe, 1745—1818）以其「青年魯濱遜」一書（模倣狄福的「魯濱遜漂流記」一書而寫成的）和幾部遊記小說，奠定了兒童文學的基礎。

以人的教育當作學校的目的，教授方法的改進，實物教育的採用，兒童興趣的考慮，體力教育和勞動教育的提倡——這就是泛愛派教育學的進步要素。這些教育與學習原則固然不是泛愛派所最初提出的。但他們的最大功績是在於把盧梭的許多教育思想轉到學校的實踐，並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推進了德國的學校事業。

## 康德的 教育觀

著名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奠定了德國古典唯心論哲學的發展基礎，他曾擔任凱尼斯堡大學的哲學教授，並在這個大學中擔任教育學的講師。這些教育學的講稿後來是被康德的學生印出的。

在康德的教育觀中，可以找到盧梭和泛愛派所給與的鉅大的影響，他深化了他們的許



多教育思想，並給它們以自己的哲學根據。例如康德說過：「說到醫學，有人認為醫學只是自然的侯人，那末道德學家可說也是一樣。消除外界的影響，自然本身也就會找到最好的道路了」。在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到對於「自然教育」重大意義的確信，這是我們在盧梭那裡也見到的。

像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的哲學家一樣，康德對於教育給了極大的意義：「人之所以能成爲人，只是通過教育。他是教育造成的」。每一個後代要在改進的路上向前跨步，因爲在教育中，蘊藏着人類天性改進的偉大的秘密」。依照康德的見解，教育的目的是在引導人類走到完善的境域，協助人類完成它的使命，發展它的人類天性。「兒童不是爲了現在而受教育，而是爲了人類未來的可能良好的境況，也就是說，爲了人類的思想，和適應着它的一般的使命，而受教育的」。人的義務，是在於自己完成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發展自己的精神品質。

康德把教育分成五個方面：（一）肉體教育，（二）紀律訓練，（三）教化，（四）文明，（五）道德教育。

在肉體教育方面，康德繼盧梭之後，要求常帶兒童到野外，不束縛嬰兒，使肉體教育的進行適應於兒童的天然的生長。他對於兒童的遊戲和一部份的運動是很重視的。

在紀律訓練方面，康德和盧梭不同，他踏襲他的「自治的善的意志」和義務感的理論，發展了獨立的學說。康德把紀律訓練解說爲對於兒童的野蠻意志的摧毀，對於激情的鬥爭，熱情對於理智的有調節的力量服從。「紀律使人類不迴避他們的使命——人性，由於動物的衝動，這種迴避是可能發生的……因此，紀律不是否定的東西；它是消滅人身中的野蠻性的工具」。

依照康德的意見，兒童應該永遠感覺自己的自由，但只要不妨礙別人的自由；因此他應遇到對抗的行動。

依康德的解說，教化就是發展天然的能力，智力教育，和習慣的獲得。在這方面，學習起着極大的



作用。康德把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提到第一位，但比盧梭更正確的接近於學習意義的問題，提出了系統學習的正確的原則。

康德極端反對任何使學習變成輕易可就的努力，駁斥「由兒童興趣出發」的不正確的學習原則，要求認真的學習態度。康德說得很對，兒童應該遊戲，應該有休息時間，但它也應該學習工作。康德的這一個要求，主要是以反對巴瑞特的企圖把學習變為消遣行為為目的。在學習方面，康德標榜着所謂形式教育，就是說，發展思維、記憶、注意，但他同時正確的指出，「任何一種精神能力，都不能夠單獨的培養，而應該在互相關係中培養」。

適應着他的認識理論，康德要求學習由明顯的知覺開始，然後進到以理智在這些知覺上加工。不但讓兒童學習思想，而且讓他們自己思想。一個人有廣博的記憶而沒有足夠發展的智慧——這至多不過是一部活字典。康德極重視學生的自修，反對早熟的和皮相的概括，要求學習的徹底性。他認為注意力在學習過程中起着極大的作用，注意力分散是學習之敵。

康德指出研究國語與外國語的必要性；要在研究過程中廣泛利用圖畫。要研究自然科學、地理、歷史。康德極重視數學教育的意義。

康德所理解的文明就是發展處世的本領，培養良好的態度。康德說，這一方面的教育在實際生活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依照康德，道德教育的本質，是在於培養為內部原則所管理的道德的性格，發展自治的善的意志。人應該遵守自己的行動規則，不受外部的（不規則的）衝動和本身的性癖所指揮，而應受自己的自由的（自治的）善的意志所指揮。

義務感在康德的道德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依照康德的見解，這一道德義務是全人類所固有的，是經常和利己行為處於對立地位的。康德把道德的本質用「無上命令」的形式來表現：「要使你的行為規則



能够成爲一切人的行爲規則」。

康德以自己的倫理學宣佈了人類人格的價值。他在他的道德教育論中，像盧梭一樣，要求人的教育。我們知道，這種要求在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時代乃是對於等級制度和封建特權的反抗，所以在這一關係上，對於當時是一個進步的要求。但是同時也要指出，康德的倫理學，是形式的，抽象的，他沒有估計到道德的階級性和歷史性。它要求成爲超階級的，對於一切時代和一切人民都能絕對適用的倫理學，而實際上却成了十八世紀末葉軟弱無力的德國市民階級的倫理學。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給了「德國市民階級的無力、抑壓和貧弱」一個明白的說明。十八世紀的德國社會條件，反映在康德關於道德教育的見解上。康德曾作下面的忠告：「要忍耐和抑制——這就是聰明的穩健態度的訓練方法。如果要養成良好的性格，就先要掃除他的熱情。人應該習慣於支配自己的性癖，要使這些性癖不變成熱情。在拒絕時，他應該會避免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偏向。Sustine 的意義就是：忍耐和養成忍耐的習慣」。

康德所特有的調和思想，明白表現在這些忠告中。不是強有力的鬥爭的人格的製造，而是應該忍受、抑制、自滿、中庸的、會適應條件的（不管這些條件是怎樣苛刻和不公正）的人的培養——這就是康德在道德教育方面的最初的忠告。然後他在這些忠告上面又加上一些急性的美德：寬大、慈善、自制、誠實、有禮、溫和、廉潔，貞潔、適度。

康德哲學雖然在其全部二重性和調和傾向的形式下，但仍是哲學思想發展中的重大的進步。馬克思形容康德哲學爲「法國革國的德國人的理論」。在教育領域中，我們駁斥他的教育學的許多方面，但尊重他的人的教育的要求，發展思維和系統學習的思想，以及紀律和養成兒童的認真學習態度的問題提法。

康德的哲學原則和教育學原則給了海爾巴特的教育學以極大的影響。尤其是康德的五個教育方面，海爾巴特歸納爲三個：管理（即康德的紀律訓練）、學習（即康德的教化）和道德教育。康德的教育原



則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在裴斯塔羅齊的教授法上。



## 第十四章 弗祿貝爾的教育學說

### 傳略

弗祿貝爾 (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 是牧師的兒子。還在哺乳的年齡就喪失了母親，弗祿貝爾沒有得到父親方面和繼母方面的愛撫及教育上的關心，像棄兒一樣的長大了。只於叔父把他收養以後，他才被送進中學，但後來爲了要準備土地測量員的職業，又被送到林務官那裡去習業。在習業時期，他對自然科學發生了興趣。後來弗祿貝爾湊集了一筆款子，考進大學，在大學裏，給他影響最大的是唯心論哲學。

因爲錢的不够，弗祿貝爾沒有在大學畢業，就棄學就業，做了模範學校的教師。實際的教育活動給弗祿貝爾看出了他的教育知識的不够。弗祿貝爾到瑞士訪問裴斯塔羅齊，在他那裡逗留了約二星期。在一年的實際工作以後，他又到依弗爾敦，在裴斯塔羅齊的研究所中充任兩年實習員（一八〇八—一八一〇年）。和裴斯塔羅齊的接觸，給了弗祿貝爾的教育體系以深刻的印象。

後來弗祿貝爾在二十九歲那年又進了大學，專心研究自然科學和謝林的哲學。

一八一七年，弗祿貝爾在自己的故鄉開爾高（秋林干亞）爲學齡兒童創辦一個教育機關，企圖在那裏實施裴斯塔羅齊的教育原則。

這時正在「神聖同盟」締結以後，保守勢力在西歐猖獗。弗祿貝爾的行動既受到檢查，他就不得不停閉了他的教育機關，離開德國，跑到瑞士，在那裡他恢復自己的事業，但他所經營的已是學齡前兒童的教育了。

弗祿貝爾回到德國後，一八三七年在開爾高附近的勃朗根堡小城中開辦了一個第一級幼稚園。在這裡他第一次在實踐上研究了幼稚園的方法，宣傳幼稚園的必要性，並通過他的課程系統訓練幼稚園的



「園丁」——教師。

幼稚園的發展是很迅速的。在弗祿貝爾逝世前不久，由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壓平後保守勢力的進攻，所有弗祿貝爾在普魯士境內的幼稚園都被國民教育部長以宣傳無神論的罪名封閉了。弗祿貝爾對封閉幼稚園的抗議是徒然的（下面我們就會知道，他是很信奉宗教的，不過他的宗教不是儀式的教會的宗教，而僅是一種確信，認為在世界之上統治着一個創造的原則）。幼稚園的封閉是過了九年弗祿貝爾已經逝世以後才被解除的。

弗祿貝爾的生活和實際教育活動，像麥斯塔羅齊一樣，是深刻的愛護兒童和埋頭於教育工作的模範。弗祿貝爾以自己的毅力，以自己的愛護兒童的態度和新的教育部門——學齡前教育——的熱烈宣傳，善於把許多幼稚園教育的熱心人士組織在自己的週圍。

在弗祿貝爾的墓碑上，刻了一句摘自他的主要著作「人的教育」中的話：「來吧，為我們的兒童而生活吧！」

一般人常認為作為教育家的弗祿貝爾只是學齡前教育的理論家。實際上他的體系是包括全部教育，對於學校教育是很注意的。

### 弗祿貝爾的人 的教育理論及 其哲學基礎。

弗祿貝爾的教育體系是建築在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基礎上的。弗祿貝爾主要是憑藉謝林的哲學來建立他的教育學的基礎的。一部份的因素他取襲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有的取自費希德的哲學。以謝林的影響佔優勢的這些哲學體系的因素會被哲學家克勞瑞（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 1781—1872）鑄於一爐，弗祿貝爾也就利用了克勞瑞的萬有在神論的思想。

謝林認為，自然與精神在其自我發展中發現了世界創造的原則。自然與精神為某一種的創造的神的原則的發現，在其發展中服從於某一種法則（這種哲學常被稱作自然與精神同一哲學）。



謝林的這些論據，也被弗祿貝爾在其主要著作「人的教育」(Die Menschenenerziehung, 1826)中加以發揮，這本書的頭幾句話是這樣：「到處都埋藏着，活動着和統治着永久的法則；它表現在外部，在自然界裡，也表現在內部，在精神中，並表現在接合自然與精神的生命中，永遠是同樣的明白，和同樣的確定」。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這一強有力的法則的基礎就是永久存在的統一，也就是神。

這種統一也就是一切生命和整個教育的出發點和主要法則。弗祿貝爾是很重視這種「統一法則」的，他說：「我的教育體系的基础，完全是在這個法則中；體系的消滅或存在，要看這個法則的拒絕或容許」。依照這個「法則」，教育應該喚起和發展埋藏在人裡面的「神的原則」。依照裴斯塔羅齊的公式，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埋藏在人裡面的力量 and 能力的自我發展，弗祿貝爾則在這個公式中插進了自己的思想。適應謝林的哲學，自我發現被他解釋為人的內部本質——創造原則——在外部的表現。

弗祿貝爾教育體系的第二個原則，就是對立與對立調和的發展法則。

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人也像自然界一樣，在其發展中表現自己的內部的本質。他認為作為理智和思想的本質的人的特殊使命，是在於使他的這種本質達到明白理解的境地。人的整個生命及其教育的使命就在於此。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一切教育與學習的唯一目的與最後目的，就是無止境在止境中的體現，永久在臨時中的體現，天上在地上的體現，神在人間的體現」。

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一切發展是創造的世界原則的自我發現，它是由簡單的統一通過複數進到複雜的統一。兒童在教育過程中也要經過這條道路。弗祿貝爾說，在每一個人中，「反映着人類，這不是完全成熟了的人類，不是已經鞏固和確定了的人類，而是經常和不斷形成中的人類，永久活着而從沒有停止的，由一個發展和形成的階段進到另一個發展和形成的階段，並向着隱蔽在無止境和統一中的最後目標前進的人類」(人的教育)。他由此作出一個結論，認為在每一個人中，反映着尚未成熟而還在形成中的整個人類的生活。



思想，據弗祿貝爾在他的教育學中所說，是自然中的無止境的發展，是人在整個生活時期的發展，是對於人的可能更進一步臻於完善境地的確信——這種思想是有價值和深刻的。這種思想給弗祿貝爾的教育學染上了教育樂觀主義和信仰兒童創造力的色彩。但是（一）弗祿貝爾所了解的發展是唯心論的，是一種神的原則的自我發展，（二）他雖然也說到對立，但他所了解的發展不是對立的鬥爭，而是對立的調和。

因為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自然發展的法則和人的發展的法則是相同的，所以教育應該適應於自然。自然適應的法則是弗祿貝爾教育體系的第三個原則。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兒童的發展應像「自然的兒童」，「人類的兒童」，和「神的兒童」的發展一樣。弗祿貝爾認為兒童自幼就賦有四種本能（活動、認識、藝術和宗教）。他把教育的自然適應性了解為「對於本能的謹慎的踏襲」，了解為人的內部本質在外部的表現。所以，弗祿貝爾的教育自然適應性的了解，是從裴斯塔羅齊的公式——埋藏在人內的力量與能力的自我發現——出發的，但他給這個公式作了謝林哲學所堆積的神秘主義的說明。依照弗祿貝爾的解釋，人的天性本來是良好的。這種人的「天性」的理想化，是從他的教育體系的基本原則出發的：他認為人也像自然界中的一切一樣，是創造原則的反映。

弗祿貝爾雖然在其自然適應性的理解中出發於唯心論的和神秘主義的立場，但他所提出的某些實際要求（這些要求似乎是從這個自然適應性中產生出來的）却是寶貴的：他認為必需細心的研究兒童和兒童發展的法則，要顧到他們的年齡特殊性，不要「把兒童當作貨幣來鑄造」，不要過早訓練兒童的職業。

弗祿貝爾認為自動性是最主要的教育原則之一。這一原則也是和弗祿貝爾的教育學的哲學前提有聯系的：他認為人也像自然界中的一切一樣，表現了作為人的內部本質的創造的神的原則。我們在拋棄這個神秘主義的根據，指出弗祿貝爾發展兒童創造力和積極性的號召在教育學上的積極特徵。



弗祿貝爾認為兒童的發展是多方面的：「人的本質，如感覺的和知覺的，活動的和表現的，思想的和認識的各種本質，最初就表現在兒童身上」。弗祿貝爾指出，精神和肉體須同樣發展。要重視肉體教育（遊戲，勞動）。這種教育是和道德教育，智力教育、美學教育有密切聯系的。

像裴斯塔羅齊一樣，弗祿貝爾要求訓練兒童成爲偉大的人類整體的成員。

在弗祿貝爾的教育學的哲學基礎上，和一般的在他的教育學中，包含了某些個別的唯心論辯證法的因素。在弗祿貝爾的神秘主義中，也像在當時德國的浪漫主義的教育學和哲學中一樣（費希德，謝林），反映了弗祿貝爾的擺脫當時德國的艱難現實和走向神秘的幻想世界的要求。

弗祿貝爾在「人的教育」中，曾用下面幾句話來說明當時這種週圍的現實：「我們日常的談話都是死的，是沒有內容的外殼，無生命的傀儡……圍繞在我們週圍的東西，我們所看到和觀察到的東西都是死的；這只是窒息的一大堆」。

弗祿貝爾沒有對這種窒息的現實號召革命的鬥爭；他是當時脆弱無力的德國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代表。然而他希望青年的一代能够生活得更好和自由。他就號召自己的一代爲兒童們保證這種良好的未來：「父親們，雙親們，讓我們矯正我們所沒有得到的東西，給與我們的兒童；我們所不能再得到的東西——兒童生命中一切活潑的和一切形成中的力量——通過兒童再回到我們的生命中來吧。我們要爲我們的兒童而生活！」

### 關於本能

據。

第一種是活動的本能。弗祿貝爾在他的哲學觀中，承認創造的原則爲唯一永久的原則（或「神」）。人的整個生命，也像整個的自然界一樣，是這種創造的原則的表現。

### 的學說

因此，弗祿貝爾企圖用神秘的方法在自己的哲學上建立活動本能的根據。



我們一方面拋棄這種不正確的「根據」，同時另一方面即要尊重弗祿貝爾的喚醒和發展兒童的積極性、創造性及自動性的要求。

第二種本能，據弗祿貝爾說是屬靈的本能。這種本能也是被弗祿貝爾建築在宗教神秘的立場上的，認為是埋藏在人身中的一切事物的「神的原則」的發現及其內部本質的認識的要求。我們一方面駁斥事物的神的內部本質的思想，及「埋藏」在人身中的認識這種本質的要求的思想，同時另一方面却要指出：弗祿貝爾絲毫沒有康德的不可知論和承認「自在之物」不可認識性的痕跡；不過弗祿貝爾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站在唯心論的立場上的。

第三種本能，據弗祿貝爾說是藝術的本能：人既具有創造的原則，就能給無形式的物體添上美麗的藝術的形式。一切存在的東西都是創造得很美的。因此這個本能也是被弗祿貝爾建築在他的宗教哲學的觀點上的；不過弗祿貝爾對於色彩在生命中的意義的重視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種本能，實際上就是弗祿貝爾前三種本能的歸結，他認為是「宗教的本能」。

### 年齡的分期

弗祿貝爾把教育年齡分為三期：哺乳期、兒童期、和青年期。弗祿貝爾認為哺乳期的兒童教育的任務，主要是在發展外感覺器官。兒童期為家庭教育，遊戲與發展語言的時期。青年期為已有自覺目標的時期，學校教育的時期。

### 創造、戲遊與

### 動勞在教育過

### 程中的作用

在弗祿貝爾的教育學中，對兒童的創造性給與極大的注意。他認為必需利用各種作業、練習和遊戲，有系統地發展這種創造性。

弗祿貝爾的最大功績，是在於他說明了兒童遊戲的鉅大的發展的教育意義。他認為正是在遊戲中能夠最好的表現兒童的創造性和自動性，但他認為不能排除成人對於兒童遊戲的領導影響。弗祿貝爾極詳細的研究兒童遊戲的整個體系，並

着重指出遊戲在學齡前教育體系中的獨立地位。



兒童的第一種玩具是叫做弗祿貝爾的禮物，關於這種玩具，我們要在敘述和分析學齡前教育的理論時詳加說明。這種玩具玩過以後，弗祿貝爾就讓兒童玩建築材料（各種形式的木塊），讓兒童建造寶塔、窗子和弓形門等等。從弗祿貝爾時期起，這種以發展兒童構思能力為目的的遊戲，已經成了兒童生活的習慣了。

勞動練習：照顧植物和初步的本身勤務練習的實施，也是以發展兒童的創造力為目的。

弗祿貝爾關於兒童遊戲和勞作的意見，雖然有他的整個的意義，但是要指出，弗祿貝爾所提出的遊戲和勞作是極端法規性的，枯燥的和很少給兒童以創造餘地的。

### 學齡前教育的內容 與方法。幼稚園。

#### 「弗祿貝爾禮物」

弗祿貝爾對於廣泛推行於西歐和美國並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流入俄國的學齡前教育的理論與體系，曾作詳細的研究。像裴斯塔羅齊一樣，弗祿貝爾在原則上極重視家庭教育。但他願到，大多數母親沒有足夠的時間，也沒有足夠的教育準備，可以担任自己兒童的學齡前教育的工作。實際上，像幼稚園那樣的學齡前教育機關（不過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在弗祿貝爾以前是已經存在了（他是在一八三七年開辦幼稚園的，而歐文在一八〇一—一八〇二年已經在紐蘭納克創辦了學齡前的教育機關了）。但是弗祿貝爾的功勞是在於詳細的研究。學齡前教育的理論、體系與幼稚園的方法，訓練幼稚園的教師，和熱烈的宣傳學齡前教育和幼稚園的思想。

客觀上幼稚園的需要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引起的；報酬比男子低的婦女勞動廣泛的採用於機關與企業中。兒童在這樣的條件下留在家裏就無人看管了。因此幼稚園的思想自然而然的符合於已成熟的生  
活需要，幼稚園就迅速的在德國和在其他資本主義各國（另一種名稱——「母親學校」、  
「兒童學校」）發展起來了。

但是促成幼稚園發展的這種社會經濟條件，唯心論者弗祿貝爾本人是不了解的。



依照弗祿貝爾的見解，在幼稚園中，要發展兒童的感覺器官，擴大他們的週圍生活的概念。在這裡要發展兒童的創造力和他們的言語。養成兒童在同伴中集體生活的習慣。養成他們守秩序和基本服務的習慣。授與兒童所能接受的道德教育的各種要素。這就是弗祿貝爾體系的寶貴特色。但也要指出作為弗祿貝爾幼稚園理論的缺點的學習上的極大迂腐性，道德教育的市民階級唯心論傾向（尤其是宗教教育），以及兒童可動性和創造性及其幻想的特殊性的估計不足。

爲了幼年期的兒童的發展，弗祿貝爾設計了六種「弗祿貝爾的禮物」。第一種禮物是羊毛織成的五彩的圓球。第二種禮物是木質小圓球、小立方體，和圓柱（球的直徑、圓柱的柱脚和小立方體的高度是相同的）。第三種禮物是切成八個小立方體的一個立方體（將立方體對半切開，每半塊又切成四塊）。第四種禮物是切成八片木板的同樣大的一個立方體。第五種是切成二十七塊小立方體，其中九塊又切成更小立方體的一個立方體。第六種是切成同樣二十七塊小立方體，其中許多塊又切成木版和對角綫等的一塊立方體。

在「弗祿貝爾的禮物」中，最寶貴的特色就是提出了使兒童認識最簡單的幾何形式的某一種的體系，提出了循序性及建築材料的思想。這些「禮物」的缺點是它們的杜撰的象徵的「根據」，和材料的枯燥、抽象與形式性。

### 弗祿貝爾 關於學校 的學說

弗祿貝爾常被一般人誤解爲只是學齡前教育的理論家。但我們却看出弗祿貝爾所發揮的教育理論是一般的（他的主要著作是「人的教育」）。自然，弗祿貝爾既發揮了整個的教育體系，他就不但注意學齡前教育，而且也注意學校教育。

弗祿貝爾認爲，在學齡前兒童教育的過程中，發展外感覺器官的方法主要是讓兒童認識物體的外部特性。弗祿貝爾認爲兒童在學校中已經進到物體的內部本質的認識。因此依他們的解決，學校應該讓兒童認識物體與自然的聯系，教育他們關於最高統一的思想。弗祿貝爾認



爲這兩者之間的媒介就是語言。因此他規定學校教育（初等學校）的內容爲：（一）宗教，（二）作爲自然認識的自然科學，（三）作爲幫助思維發展的課目的數學，（四）作爲人與週圍環境間的媒介物的語言。

弗祿貝爾極重視自修，強調練習在學生學習中的作用。弗祿貝爾在他關於學校教育與學習的一般教授方法的指示上，受了裴斯塔羅齊的極大影響。尤其是裴斯塔羅齊的初步學習要素——文字、數目與形式——在他的教學方法中佔了極大的位置。

在語言學習上，弗祿貝爾強調語言的正確性和表現力及字彙擴大的重要意義。弗祿貝爾極注意語言韻律的教育（詩歌）。

### 弗祿貝爾的教育體系中的矛盾。

弗祿貝爾是大教育家之一。他建立了以十九世紀初葉德國古典哲學爲基礎的教育體系。在他的教育體系中反映了這一哲學中所包含的那些進步特徵，尤其是發展的思想，和某些辯証法的要素（固然是唯心論的）。但除了某些辯証法的要素以外，弗祿貝爾的全部體系是完全形而上學的。弗祿貝爾極重視兒童的創造性，發現作爲教育工具的遊戲的意義，第一個極詳細的發揮了學齡前教育的理論，並發展了社會的學齡前教育——幼稚園——的思想。

弗祿貝爾給與許多國家的學齡前教育的發展以極大的影響。他的體系成了二十世紀初葉以前學齡前教育領域中的統治的體系。弗祿貝爾主義傳播到一切國家。在美國，在十九世紀末葉給它添加了新的特徵，這變形的思潮也就獲得了新弗祿貝爾主義的名稱。在這新的流派中相當削弱了弗祿貝爾的神密主義，減輕了弗祿貝爾許多教學方法的迂腐性，添加了使兒童認識社會生活的某些要素。

當六十年代教育學開始在俄國發展的時候，弗祿貝爾的思想曾引起了俄國許多進步教育家的注意。在黑格爾派的教育家雷特金（Родина）的主持下，七十年代初產生了一個弗祿貝爾學會；弗祿貝爾的



體系開始在教育雜誌上被研究和闡發；甚至出版了「幼稚園」雜誌。依照弗祿貝爾體系而工作的幼稚園最初在俄國開辦了。

在弗祿貝爾的教育體系中，有許多矛盾和我們所不能接受的原則。上面已經說過，這個體系是建築在唯心論的原則上的，它包含着許多神秘主義。它雖然說到兒童的創作，但在它的課程中有許多形式主義，抽象性和枯燥性。

弗祿貝爾體系中的這些缺點和矛盾，是爲他的時代的歷史條件，尤其是爲十七世紀第一個三分之一時期中德國所特有的那種矛盾和限制性所造成的。

我們顧到弗祿貝爾體系中的這些歷史所造成的限制性；而加以拋棄，同時我們要尊重上面所指出的弗祿貝爾體系中的這些進步的特徵。



## 第十五章 第斯多惠的教育學說

另一個非凡的教育家第斯多惠，是和弗祿貝爾同時生活和工作的，他也像弗祿貝爾一樣是裴斯塔羅齊教育體系的信徒。第斯多惠更進一步的發展了裴斯塔羅齊的教授法原則，給與當時國民學校的發展尤其是國民學校中的工作方法和教師的訓練以極大的幫助。

### 略傳

第斯多惠 (Friedrich Adolf Wilhelm Diesterweg 1790—1866) 生於官僚的家庭。童年時他極好自然——歡喜在田野和森林中散步。他常到鐵工場和各種作坊中參觀，攷察勞動條件和方法，並親自參加了工作。他歡喜和農民及手工業者談話。後來在他的著作中所表現的那種對於勞動者的同情，所以還是在童兒時就產生的。

大學畢業後，第斯多惠於一八一三年擔任了佛蘭克福模範學校的數學及物理學教師。在這裡他落到教育家——裴斯塔羅齊的熱心信從者的環境裡，研究了裴斯塔羅齊本人的著作。在佛蘭克福擔任學校教師的這種實際工作，鍛鍊了他成爲善於概括學校工作經驗的教育家。

第斯多惠被聘爲摩爾斯師範中學校長後，就在這個中學中實施了裴斯塔羅齊的教育原則，並在他所主辦的「萊茵教育雜誌」(Rheinische Blätter Fu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 上宣傳了這些原則。不久第斯多惠的師範中學成了裴斯塔羅齊學說在德國的中心。

一八三二年，第斯多惠改任柏林師範中學的校長，在這裡他繼續裴斯塔羅齊學說的宣傳，同年他組織了教育學會。第斯多惠在後來仍繼續這種教育界的職業團結的活動。舊的教師協會依照他的提議改造了。一八四〇年他創辦了新的「柏林教師協會」。這種教育界的職業團結活動和第斯多惠在宗教問題上的自由思想（他是僧侶主義的反對者，是抄襲於裴斯塔羅齊的合理化基督教信從者），以及他對於貧



民和勞動者的同情，給他招來了保守的普魯士政府的壓迫。

第斯多惠在他的「生命悠長的文明問題」(Die Lebensfragender Zivilisation 一八三六年)的三篇論文中，指出了社會的不平和社會中的貧富的矛盾。第斯多惠認為這種不平是「人類的不幸」。第斯多惠在這些論文中甚至說到團結勞動者「至最後一個短工」加入以互助為目的的組織中。但是第斯多惠認為這些組織不應該是革命的。它們是依據裴斯塔羅齊的主張，為了人民的和平自助，而建築在人道及對人民的積極愛護的原則上的。像裴斯塔羅齊一樣，第斯多惠是和社會的根本改造的思想離得很遠的，他只限於在現存制度的範圍內，從事於提高勞動者物質生活的活動。

一八四八年革命接近了，革命情緒和甚至反動派的情緒日益在德國生長，政府從一八四〇年威廉四世即普魯士王位時就開始與革命運動的發展進行強烈的鬥爭。

一八四六年，第斯多惠以慶祝裴斯塔羅齊誕生一百週年的機會，創辦一個教育機關來紀念這位大教育家，並極天真的請求普魯士政府給與物質上的幫助。威廉四世不滿於第斯多惠在裴斯塔羅齊紀念大會上的演說，就用粗暴的拒絕和申斥來回答這個請求，威廉四世說，裴斯塔羅齊的行動是依據「順從和自我犧牲的愛的精神」，而第斯多惠的觀點却和這些「美德」相對立。

一八四八年革命後一年，第斯多惠在受到政府的嚴密的檢查之後，就辭去了中學校長的職務。

第斯多惠在辭職以後，就集中全力於文字上的教育工作，繼續出版「萊茵教育雜誌」和「教育年鑑」(從一八五一年起)。

第斯多惠像過去一樣，防止學校受教會的教條主義的影響，反對懺悔主義。當一八五四年普魯士政府頒佈反動的學校法令的時候，第斯多惠曾以極堅決的態度反對這個法令：他在三個小冊子中，給了這個降低學校教育水準和加強學校懺悔性的愚化主義的法令，以極激烈的批評。在普魯士的眾議院中(他是在一八五八年被選為議員的)，他也繼續這種反對學校事業中的反動趨勢的鬥爭。



第斯多惠寫了四百篇論文和短評，以及許多關於教育問題尤其是關於數學及國語教授方法問題的書籍，和許多國民學校的教科書。其中最著名的是第斯多惠在一八三四年和信率裴斯塔羅齊學說的許多教師合編的「對於德意志教育家之教育指南」(Wegweiser Für deutsche Lehrer)一書。

### 第斯多惠的 基本原則。

第斯多惠的領導的思想是全人類教育的思想。學校應該教育人成爲人，應該發展人和公民（而不是「真正的普魯士人」等等）。第斯多惠在他的一篇爲教師而寫的論文中，着重指出：「讓你們這樣的說和想：人是我的名字，德國人是我的渾名」。

第斯多惠的教育觀的基礎是三個原則：自動性、自然適應性和文化適應性。

裴斯塔羅齊認爲教育的任務就是在兒童中的人的發展，第斯多惠也承認這個原則，說：「人中間的人類的東西——就是他們的自動性。一切人類的，自由的，獨創的東西，都是從這個自動性中出發的：詩歌、思維、觀察、感覺、言語、行動，一切自由的活動和表情都有自己的中心」。第斯多惠認爲教育只能在這自動性的範圍中伸展。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發展自動性。「教育的最高任務——它的主觀方面——就是自動性的發展」。

第斯多惠一方面承認自動性爲教育的最高的主觀方面，同時却又加以保留說：自動性本身是空的，因爲須要指出這種自動性的目的，或教育的客觀方面。這種目的，據第斯多惠的解釋就是「真、善、和美的思想，也就是人類生活的最後目標」。第斯多惠以心理學將這三個教育的倫理思想聯系起來，指出自動性的認識應該是以求真爲目的，自動性的感覺應該是以求美爲目的，自動性的意志應該是以求善爲目的。

第斯多惠的後來的一切教授法上的指示，也是從這個作爲最主要的教育原則的自動性的觀點出發的。

第斯多惠發展了裴斯塔羅齊的自我完成的思想，指出在兒童中有着「一般人類的素質」，而這一般



我完成的目的就是人的一切素質以練習的方法（也就是以自動性的方法）達到多方面的調和的發展。

除了自動性的原則以外，從盧梭和裴斯塔羅齊的教育學中抄襲來的自然適應性的原則在第斯多惠的教育學中也起了極大的作用。第斯多惠所了解的自然適應性，就是埋藏着的兒童天然素質的發展。因此第斯多惠認為「以自然方法實施教授」的原則，是一切教學的最重要的法則。

第斯多惠區別人的發展為三個階段：（一）感覺統治的階段，（二）記憶（或概念積蓄）的階段，（三）理智的階段，而提出了第二個教授法的規則：「在教育時依據兒童發展的自然的階段」。

第斯多惠利用了德國古典哲學的成就，對於兒童發展所給與的意義是應該認為很有價值的。和盧梭不同，第斯多惠除了自然適應性的原則以外，更提出了文化適應性的原則，他說：「在教育時，應該注意地點和時間的條件——總之，要注意整個的現代文化，尤其是學生祖國的整個現代文化」。在這一方面，第斯多惠要比盧梭進步得多，因為盧梭只重視「自然」的人，而不能正確提出文化的問題。

### 學校的意義 。學生紀律 的作用

第斯多惠極重視學校，並極重視教師的作用。第斯多惠在他的一八二〇年所寫的第一篇教育論文中（論一般教育與學校教育），指出學校的目標不僅是在教授，而且是在訓育。第斯多惠說得很中肯：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有系統的教授，良好的榜範和紀律。

學校——是家庭生活 and 社會國家生活之間的媒介物。學校的最大的價值，是在於兒童的集體生活，有教育準備的學校領導者的教導工作，兒童紀律的訓練和有系統的學習。

第斯多惠一方面提出了作為領導原則的學生的自動性，同時又對紀律給與了極大的意義。第斯多惠認為紀律就是用來決定和調整學生行動的秩序；教師在紀律幫助下，可以確立和提高學生的勤勉、愛護秩序和法律的習慣，以及整個的活動。



第斯多惠對於紀律雖給與了這樣重大的意義，却解釋它不是盲目的服從，而是學生自覺的對於自己的義務及周圍環境的態度，是和學生自動性相調和的東西，是內部的激勵。

## 教授規則

第斯多惠提出了教授原則和規則的整個體系，其中有許多是很有價值的。例如他主張個別的接近每一個學生，適應他們的能力，以及實物教授。

在記述性原則的說明上，第斯多惠不是站在單方面的感覺論的立場上的。他極正確的指出，人類智慧的發展，只是從外部世界的感覺的觀察開始的，但更進一步的智慧活動，是把這些感覺加工成爲概念，概念又概括成爲某種的世界觀。第斯多惠說：記述性的原則，要求由明白的事物出發，由明白的進到思辨的。由局部的進到一般的，由具體的進到抽象的，而不是相反的！

在說明這些原則時，第斯多惠要求在教授上由簡單的進到複雜的，由接近的進到遠處的，由容易的進到比較困難的，由已知的進到不知的。在這些原則中，可以看出夸美紐斯所給與的鉅大的影響。第斯多惠反對經院主義學校的言論雖然具有整個的價值，但仍不能不指出某種歸納主義的偏向。第斯多惠爲要遵循「發展的自然行程」（這種行程是需要歸納的教授方法的），就把基礎的學習方法和科學方法不正確的對立起來了。他認爲，「所謂科學的方法，是繹譯的方法，系統的方法，進步的方法，常常也是（在惡劣的情形下）教條的方法。基礎的方法是歸納的，分析的，後退的，配合得宜的方法；壞的教師令把真理絕滅，好的教師令把它尋到」。

第斯多惠要求：「關心兒童不要忘記已習得的東西」；「養成兒童的工作習慣，不僅強迫他們愛好工作，而且要他們和工作結緣，使它變爲他們的第二天性」；「在基本學習的時候不要性急」；「在接愛派生的原理時要時常回到基本的原理，要從最後一個原理來推論第一個原理」——這些要求都是很寶貴的。

第斯多惠區別教授方法爲兩種：教條的和發展的。第一種方法通常就是敘述的方法，第二種是問答



的方法。

第斯多惠作了這樣的區分以後，就不正確的認定：敘述的方法應該應用於言語能力尙未發展的未成熟的新生，或應用於（以演講的形式）已成熟的青年。問答的（發展的）方法則最適用於初等學校（除一年級的最初幾個月以外）。

在這些論斷上反映了第斯多惠的某些公式主義。顯而易見的，（一）要發展新生的言語能力，不僅需要教師的講解，而且需要問答方法的採用，（二）在初等學校的任何一級中，不但需要與學生的談話（問答方法），而且需要教師的講解。

第斯多惠自己後來也承認，任何一種教授方法（教師講解或談話的方法）的採用應該適應教材的性質。但是這個完成正確的教授法的原理又被第斯多惠放到狹窄的公式中了。

他把教材分爲兩組：一組是歷史的課目，另一組是理性的課目。歷史的課目包括歷史、地理、「聖史」、文法的歷史部份。理性的課目據第斯多惠的解釋則包括哲學與數學物理科學等等。對於歷史科學，第斯多惠認爲需要採用敘述的方法，對於「理性」科學，則需要採用發展的（問答的）方法。

這種劃分當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發展的方法不但是談話，而且也是教師的講解。所以，把發展的方法和敘述的方法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這一點是第斯多惠自己也是部分地承認了的，他說，除了這兩種基本的方法以外也能採用發展敘述的方法。同樣要指出，談話不但在自然科學和數學中適用，而且也在別的課目中適用。

第斯多惠的上述原理，是從他的形式教育的理論中產生出來的。第斯多惠把教育分爲形式教育與物質教育：「澈底的，盡可能發展的思維及言語天才，銳敏的觀察力，在理智幫助下吸收研究新事物的能力」——這就是第斯多惠所確定的受教育人民的形式上的品質。第斯多惠雖然沒有把形式教育看作孤立的東西，但他強調形式教育的優越性却是不完全正確的。



## 對於教師的要求

第斯多惠在他的一篇初期的論文「論一般教育與學校教育」（一八二零年）裡，提出了教師的一般特徵，並對他的使命作了高度的估價：

「教師——不是公衆情緒的僕人，而是最高價值的指導者。一切時代的教育家的永久目的，就祇是一個任務——人性，人道性」。

第斯多惠認為，兒童的自動性的發展祇有在教師的聰明的領導之下才有可能，因此整個學校工作的順利進行，有賴於教師的高度的品質。

良好的教師——就是有教育的人，他有廣泛的文化和廣泛的一般教育的修養，他認識教育學心理學，熟悉自己的課目和教授方法，善於講解這些課目，並善於鼓勵學生對於他們的力量、信心和前進的意志。

第斯多惠在他的「對於德意志教育家的教育指南」一書和其他許多著作裡，提出了許多關於教師的教育技術的寶貴的意見。

他認為教育具有訓育的性質，「只有堅決，有毅力的，性格強硬的，懂得他需要什麼，爲什麼需要，和用甚麼方法完成他的意志的人——只有這樣的人能夠訓練堅決的，有毅力的，和性格強硬的人」（對於德意志教育家的教育指南）。

教師既是學生的模範，就應該有高度的道德的品質。

第斯多惠所提出的下面許多規則都是最寶貴的：「要強迫學生把已學過的東西正確的念出音來！要時常注意良好的發音，明確的措辭，明白的說明和正確的思想結構」。「要使教授變成有魅力」。

第斯多惠認為教師不能把自己的活動只限制在學校的範圍內。應該在他的提倡和直接領導之下組織圖書館，讀書會，在成年人中間實施另一種方式的文化教育工作。

教師一方面熱心地獻身於教育事業，同時還要不斷的增進自己的教育水準。第斯多惠勸告從事自我



教育的教師不要分散精力，而要集中注意力於基本著作的研究。除了自己職業上的專門著作以外，還要注意教育學、心理學、和方法上的著作。

第斯多惠對於國民教師的訓練是很注意的。他所領導的師範中學曾被認為模範的學校。未來的教師獲得良好的教育以後要在第斯多惠領導之下經過在該校長期的實習。第斯多惠自己也在該校經常的工作，並同時擔任師範中學中的教育學，數學及德國語的講授。

第斯多惠的授課據他的許多學生的證明是高度教育技術的模範。他的授課通常採取談話的方式。

第斯多惠雖然有其作為教育家的多方面要求，但同時也像魏斯塔羅齊一樣要求在學校中造成家庭的空氣。第斯多惠很明瞭他的所有學生的情形，樂於幫助他們解決困難，關心他們的生長。他和他的過去學生在他們於畢業中學以後還保持着聯系。

### 第斯多惠 的意義

第斯多惠因為從事於德國教師的訓練及其職業團結與領導的活動，就被稱作「德意志的教師」(Magister Germaniae)。這位非凡的民主主義教育家還得到了一個「德國魏斯塔羅齊」的名字。

第斯多惠的教育觀是被唯心論所貫串的。這些教育見解充滿了許多不正確性和矛盾性。然而在夸美紐斯的「大教授法」以後，「對於德意志教育家的教育指南」一書却成了一部最好的教授法原則和規則的全書。

第斯多惠對於十九世紀德國教育界的影響是鉅大的。在他所提出的教授法原則的基礎上，許多方法論者研究了局部的教授方法。

第斯多惠的教授法的國際意義也是偉大的。尤其是在六十年代俄國開始發展國民學校和對西方的教育思想發生興趣的時候，第斯多惠的著作曾引起了許多方法論者（科爾夫、包爾生、耶吐希夫斯基等）的特別注意。



第斯多惠是當時進步的教育家，他重視學生自動性的意義和熱烈的反對經院主義的學校。

第斯多惠是民主主義的教育家。他的教育觀充滿了人文主義、對於人的信仰，以及對於兵營式的普魯士君主學校精神的反抗的勇氣。

第斯多惠的反對反動的普魯士的學校法規和反對懺悔學校的不倦的鬥爭在當時會有過特別偉大的歷史意義。第斯多惠在他對於教條式的宗教的批評上沒有比合理化的基督教更前進一步。他反對懺悔學校，却保存教授上的宗教傾向。但他反對教會束縛學校事業的一切言論在當時却成了先進的大學的旗幟。爲了這些見解和爲了對廣大民衆的同情，普魯士政府就迫害和毒殺了第斯多惠。



## 第十六章 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歐美學校

（從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到一八四八年革命）

### 一、學校發展的一般特徵

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以後，開始了先進各國內的資本主義勝利和奠基的時期。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作為統治階級的市民階級的政權的加強，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的影響，第一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憲章運動）——促成了十九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各國學校尤其是初等學校的發展。

十八世紀法國革命時期所提出的民主主義的學校原則，在這一學校發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市民階級鞏固了自己的政權以後，沒有把這些原則在上述時期中全部實行出來，但在勞動群眾的壓迫之下隨時對勞動群眾的民主要求被迫作局部的讓步。當然，市民階級在自己的法案中除了反映這些被勞動者所爭得的讓步以外，也表現了他們的對於提高勞動者文化的關心。在估計這種「關心」時，要永遠記住恩格斯的話：「市民階級給工人」受教育只是因為這對他們的利益相符合」。

前面幾章中我們所研究的教育理論，在這一時期的學校發展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盧梭雖然很少提到學校，但是他對經院主義學校的批評，他的兒童積極性，實物教授、實科教育等的要求，却在學校事業上起了極大的作用。我們已經看到盧梭的觀點尤其是對於泛愛派學校所直接給與的影響。

對於各國國民學校的組織和工作方法給與特別有力的影響的是裴斯塔羅齊的教育體系。同時要指出，因為這一體系是民主的，所以對於有民主情緒的國民教師和研究學校教育方法的最進步的教育家的工



作所給與的影響也最大。

十九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各國學校發展的一般法則是這樣：

國家在學校事業中的作用加強。這一法則在各國的反映顯然是不同的。它在法國所表現的學校管理的中央集權的形式爲最強，而在英美所表現的爲最弱。

勞動者爲爭取學校教育而進行的革命鬥爭——市民階級則在鬥爭過程中被迫向勞動者在學校事業上作若干讓步。我們在英國看到這一個法則：英國在工人革命要求的壓迫下於一八三四年頒佈了工廠法，規定爲工廠中的做工的兒童開辦學校。法國和德國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制定了許多民主主義的學校法令，但由於革命的失敗這些法令沒有獲得實現。學校網的擴大，國民學校的創辦，是爲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和勞動者的爭取學校教育的鬥爭所引起的。市民階級在這樣的情形下不得不擴大了學校網，但設法利用這些學校爲宣傳市民階級意識形態的工具。

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中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英國、法國、瑞士、美國等）的「互助教育」（*mutual or monitorial instruction; l'enseignement mutuel*）的發展。這一體系是爲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人民識字的需要，教師的不足和市民階級想把這種教育廉價供應人民和縮減國民教育費到最低限度的要求所引起的。在這一教育的普及上，人民教育與學習的「機械化」和使這些人民自幼就「紀律化」的努力也起了極大的作用。

高等小學校網（在德國爲 *Bürgerschule*，在法國爲 *école primaire supérieure*）的發展，主要是爲資本主義企業和市民階級國家需要充分的識字人民以經營工商業企業的要求所引起的。同時這種學校也成爲吸收經濟力不够升入中學的一部份青年的工具。

初等學校網的發展迅速的在各國提出了國民教師的訓練問題。因此就在這個時期出現了師範中學，「正規學校」和類似師範學校的教育學院。



各種課目的局部的教授方法是在這個時期開始被研究的。這種研究是爲學校數量的增加所引起的，而爲裴斯塔羅齊和第斯多惠所提出的教授法基礎所準備的。

供給市民階級子弟教育的中等學校在這一時期比在十八世紀更前進了一大步：學校網發展了，課程內容改變了，加強了國語、數學、自然科學、地理、各種新語言等的課目，但學校在基本上還是古典的；爭取實科中學的鬥爭是在同一時期開始的。

提出了學校發展的一般特徵以後，我們現在就進而研究各國學校發展的概況。

## 二 英國學校

### 十九世紀初

### 期國家對於

### 學校組織的

### 忽視。

英國在十八世紀末葉仍像以前一樣還沒有國立的國民學校的體系。學校大部份是在英國教會的手裡。

工業的發展和識字工人的需要不得不使政府於一八〇二年頒佈了一個法令，規定工廠和手工業的學徒在最初四年的每日相當部份的勞動時間中學習閱讀、書寫和計算，而由企業主出資聘請教師負教授之責。

但是這一法令實際上並沒有實現，或者至多只是形式上的實現。馬克思在「資本論」裡引了許多甚至在十九世紀中葉這些工廠學校中非常惡劣的學習條件的說明。工廠主請了半文盲的人來充當教師。

初等學校是慈善機關，所以連學校的名稱都叫做慈善學校（Charity Schools），貧民學校（Pauper Schools），窮人學校（Ragged Schools）。

從事以傳教爲目的的學校活動的宗教團體（如聖書公會）在十九世紀初期比在十八世紀更爲普遍。除了少數的例外，英國的初等學校也是由英國國教會、新教分離派和聖書公會等經營的。這種學校



的總數在一八〇〇年約有八百個，而在一八五〇年增爲一萬個，學生人數增爲一百零五萬。只有半數的學校是實行男女共學的，其餘半數是男女分校的。

這些學校都教授閱讀；書法不是所有學校都學的；算術教育的成績更惡劣。主要注意力是放在宗教教育之上的。

### 倍爾——蘭開斯特的教育體系

志願求學的人數，到十九世紀初期已經大大的超過了現存學校的數目。爲要減少每一學生的教育費的支出，英國在十九世紀初期就採行了倍爾——蘭開斯特所創立的互助教育的體系。

蘭開斯特 (Lancaster, 1778—1838) 是真誠的要求幫助貧民和使初等學校容納最多數的貧民子弟的民主主義者。一七九八年，他在倫敦開辦了一個學校，免費供給大部份兒童的教育。他爲要擴充學生的數量，就利用成績最優的學生爲監督生——教師的助手。這種體系使他能把校中學生數量增加到一千人。到一八一一年，採用互助教育體系的蘭開斯特學校已經普及到英國全國，包括了三萬個學生，並開始發生於北美洲和英國殖民地了。一八一四年，蘭開斯特的信從者組織了「英國與外國的學校協會」。

在同一時期，牧師倍爾 (Bell, 1753—1832) 也努力普及互助教育的學校。但和蘭開斯特不同的，蘭開斯特以民主主義的要求爲其活動的指南，而倍爾則利用互助教育的體系達到勞工子弟宗教教育與訓練的目的。他在印度人那裡抄襲了互助教育的體系，在十八世紀末葉應用於他在印度所主持的戰時孤兒院中，並在十九世紀初期把這個體系移植到倫敦。倍爾的體系在方法和蘭開斯特的體系是沒有區別的，和它區別最大的是在教授精神上。這些學校只接收信奉英國國教的學生，全部教育的進行是依據宗教的精神的。由於教育上的這些方面，倍爾就爲自己的學校吸收了英國貴族階級和教會人士的保護和金錢上的幫助。一八一一年，產生了一全國統治教精神的貧民教育普及協會」，依據倍爾的體系實施教育普及



的工作。由於學校的強化的普及，這種學校中的學生數量到一八二〇年時就增到了二十萬人。

在人數衆多的互助學校中，一個大課室放着許多排桌子，每桌坐十五—二十人。每十個學生中指定一個年齡最大的學生爲監督生。上午八點到十點，教師只上監督生的課。他匆促的教完監督生怎樣在這一天去教其餘的學生。十點鐘，集合全體的學生，監督生就擔任了教師，把早晨教師對他們說過的話盡可能逐句的重複一遍。教師主要是負擔教授上的一般監督之責的。這種體系只有在最嚴格的紀律和教學機械化之下才有可能。

在這種互助教育的學校裡，關於學生的思維的發展，關於裴斯塔羅齊的原則的應用，都是不可想像的。關於個別接近兒童也是不可想像的。互助學校所提供的知識容量是極端有限的。教育變成了動物的馴順。

雖然如此，倍爾—蘭開斯特學校在整個組織的明確性和模範秩序的意義上，却和過去的學校成了極大的對比。這些學校使初等學校的學生數量增加了許多倍。

我們知道，互助教育的學校的建立，是爲原因和目的之間的矛盾所促成的，這反映在兩種學校的型式上——蘭開斯特的民主學校和倍爾的懺悔學校。因此在各國，這種學校的組織者就或者以進步的目的——普及教育於大量的人民——爲領導原則，或者以保守的目的——限制人民知識容量和馴化勞動者——爲領導原則。但是這兩種學校的組織者從這些矛盾的目的出發，都發展了互助教育的學校網。因此這些學校就迅速普及於許多國家（英國、美國、法國、瑞士、比利時、荷蘭、丹麥、俄國）。

### 國家在學校 職業上的作 用的加強

最進步的政治家要求國家干涉初等教育的事業和國家對國民教育的經濟上的補助。這樣在一八二〇年國會就通過了一個有關的法令，但這些企圖最初就遇到英國教會和所謂「任意行動派」的反對——「任意行動派」是藉口保持「個人在學校事業上的創制自由」而主張國家不干涉國民教育事業的。

實際上這種「自由」所造成的是英國民衆教育水準的降低和學校數量的激減。在一八



二〇年，英國三分之一以上的教區已經沒有一所初等學校了。

在英國初等教育的設施上，只有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纔發生了相當的變動。一八三三年在工人革命運動（憲章運動）的打擊下，國會撥了二萬英鎊為學校校舍的建築費。一八三四年頒佈了一個工廠法，要求工廠主為十四歲以下的工人子弟開辦學校，並禁止接收無上課證明書的兒童在工廠作工（因為我們知道一八〇二年所頒佈的類似的法令並沒有實現，而且到了這時已經陳舊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一八三四年的法令是企業家第一次的吝嗇的讓步。這些吝嗇的讓步沒有使工人滿足，他們的爭取學校教育的鬥爭在四十五十年代還是繼續的進行着。這個鬥爭使英國市民階級的國會不得不漸次加強國家對於學校事業的補助。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末期（一八五〇年），這種補助的金額已經達到了十七萬五千英鎊。由於這種補助，政府對於接受補助的學校就建立了學校監督的關係。但政府不開辦自己的國立學校。

### 憲章派在國民教育上的

#### 革命要求

依照列寧的解釋，憲章運動是「第一次廣泛的，真正羣衆的，政治上成熟了的勞工階級的革命運動」（全集第二十四卷二四九頁）。

憲章運動的領袖奧勃倫（James Bronterre O'Brien, 1805—1864）在「大憲章」或「人類憲章」中，提出了一切人民的全國、科學、體力、智力和道德教育的要求。

他所理解的「全國教育」，就是全國規模的國家的教育的組織。憲章運動的另一個領袖羅瓦特（William Lovett, 1800—1877）提出了國立的國民教育體系的要求，但同時他要求國家（當時是由市民階級領導的）不干涉課程內容和教授方法，不干涉教師的委任。依照憲章派的要求，整個學校的內部生活應由每一學校區域的普遍投票所選舉的學校委員會來管理。除了智德體三種教育以外，羅瓦得更要求學校教授農業，和設立學校工廠。

一八五一年的憲章會議，通過了關於實施普遍義務免費教育及由國家組織中學大學與工業學校的決



職。

一八五一年在憲章派的壓迫下，產生了一個國會調查學校事業的委員會。調查結果，發現私立學校的七百另八個教師和公立學校的三十五個教師甚至完全不能寫字（他們在調查表上劃了一個十字來代替自己的簽名）。

### 中國的 發展

從十七世紀時期和十八世紀初期起，英國中等學校的教育計劃、課程內容、方法和制度幾乎都沒有變更。國家依舊不參與中等教育的組織；貴族中學依舊處於指導的地位（伊頓、溫采斯德、魏斯敏斯德、雷格比、哈羅、希夫斯伯里等等），這些貴族中學是依賴募捐來的鉅額基金來維持的，徵收着極高的學生學膳等費用。

每個學校都保存了幾世紀的傳統和確立了自己的教育計劃。但這些學校的課程的一般性質是多少相同的：拉丁文和希臘文佔了絕對的統治地位（佔全部上課時間的三分之二），宗教教育起了極大的作用，遊戲和運動給與極大的注意，並注意形式上的性格訓練與發展。所有這些學校都設有寄宿舍。每個學校都努力發展學生的階級精神。爲要提早養成「青年之花」的統治習慣，在這些中等學校中確立了監督生制度；年齡最大的學生要負責保護幾個年齡較小的學生，幫助他們學習和防止他們受別人欺凌，處於被保護者地位的學生要服從監督生和給他們做各種工作。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爲了訓練市民階級和工商業企業領導人的子弟，在大工業中心裡就產生了具有實科傾向的中學。在這些學校的課程中，數學、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地理及各種新的語言被置於主要地位。

## 三、美國學校

在十八世紀，英國在美洲殖民地上的學校事業沒有比宗主國更好。正如研究美國學校歷史的史家所



指出，在十八世紀末葉的獨立鬥爭時期和在美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十年中，學校事業的狀況還是很惡劣的。工業發展既極薄弱，城市數量又極少，爲了經營農業開闢新的農地不得不使用大量的勞動力。剛剛成立的國家還要負擔獨立戰爭時期所借的鉅額外債（註）。因此在十九世紀的最初四十年中，就沒有看到美國學校的任何顯著的發展。

這個年青國家的先進的社會人士在學校事業組織問題上，受了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所提出的教育原則的極大的影響。他們要求廣泛的學校網，要求一切環節都有相互聯系的學校體系。但在實際上，這些要求只有部份的實現。

從美國成爲獨立國存在的初期起，公立學校就被當作「俗界」的學校來組織的。這當然不是說這種學校忽視了宗教教育。這只是要排除公立學校中的宗教分歧和爭論。甚至在禁止教授神學的學校中，學生每晨都要唱宗教讚美詩或讀聖經。此外也容許「私立學校」的存在，這種私立學校幾乎完全是爲宗教團體所創辦的。

從美國存在的初期起，也確立了學校管理的地方分權的辦法：每州（當時有十三州，現在有四十八州）在國民教育事業上是獨立的。由於各州間在經濟關係上的強大的差異，這種分權辦法逐漸造成了學校體系，課程等的極端雜色性，和美國學校發展的極端不規則性。

到一八三〇時，美國公立學校多少流行着這樣的體系：

- (一) 爲四—五歲至七—八歲的兒童而設立的，有初等學校 (Primary School)；
- (二) 爲七—八歲至十二—十四歲的兒童而設立的，有英文文法學校 (English Grammar School)



(三)爲十二—十五歲至十五—十七歲的兒童而設立的，有專門學校 (Academy)。

除了這一體系以外，在許多州裏更爲一部份兒童設立了拉丁文法學校 (Latin Grammar School) 大教育家荷拉斯·曼 (Horace Mann) 在一八三七—一八四八年時給了美國學校的發展以極大的影響，他在當時擔任剛成立的馬薩諸塞州的教育局秘書。他建立了整個的學校網，組織了三個師範學校，召集了許多教師會議，宣傳當時最好的教授方法，出版教育雜誌。他的歐洲學校概況的調查報告和每年向國會所提出的報告是內容極充實的教育著作，對於各州學校的發展會有極大的幫助。

到了上述時期的末期，美國大多數州內已成立了教育局。學校網也大大的發展了，但學生只限於白人。只有到了一八四七年纔爲黑人開辦了幾個以宗教教育爲目的的教會學校。

#### 四·法國學校

##### 拿破崙關於國民教育的法令

拿破崙一世關於學校教育的法令，適應着他在其他方面的一般的政策，是以學校事業的中央集權化和國家在各種型類的學校管理中的作用的加強爲特徵的。教師變成了國家的官吏，和對行政機關處於極大的依附地位。

根據一八〇六—一八〇八年的法令，一切學校的管理權是屬於「大學」的。這個法令的第一條說：「在帝國大學的名義下，成立一個以管理帝國全境公共教育爲任務的團體」。沒有得到「大學」的同意，或者更正確的說，沒有得到它的首領——皇帝所委任的騎士團長——的同意，就不准在帝國境內開辦任何的學校。根據這個法令，教師須成爲特殊的階級（公立學校教師的絕對獨身生活，特殊的服裝式樣，嚴格的紀律等等）。

在初等學校方面，拿破崙只限於對基督教學校的保護和補助。對於政府及城市自治機關所開辦的中等學校給與極大的注意。政府經營的中學稱作官立中學；地方自治機關開辦的中學則稱作專門學校（這



些名稱，直到現在還保存着）。一八〇五年時有三十個官立中學和約有二百五十個私同學校。除了古典的語文以外，法國中學課程中也包括了許多實科的課目（數學等等）。

過去的大學是被國民公會封閉的。代替了它們而開辦的是個別的學部。一八〇三年開辦了醫學部，一八〇四年開辦了法學部。無論在執政官政府時代和在帝政時代，法國高等教育都是嚴格地專門化的。對於各種型類的學校課程、教科書、教授方法和內部規則，都訂有嚴格的法規。

### 復辟時代 的學校

拿破崙崩潰後接踵而來的波旁王朝的復辟，引起了學校宗教傾向的加強。在一八一六年路易十八的勅令中，就說到教育應該以宗教和道德的真正規則為基礎，和協助「社會良好秩序的保持」。

一八二四年查理十世即位以後，保守勢力就更加活躍。初等教育要受主教管理。學校的課程充滿了天主教宗教的精神。

初等學校的破產程度達到了連法國教育部長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爆發以前不久都不得不承認這樣的事實：「一半變成廢墟的校舍，飢餓的教師，書本的缺乏——這就是法國國民學校境況的一幅悲慘的圖畫」。到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時期，只有五分之一的學齡兒童在法國初等學校中求學。

像英國一樣，法國初等學校的學生數量的增加主要是利用互助教育（*l'enseignement mutuel*）的方法。模倣英國教育協會的方法，法國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組織了一個「初等教育協會」。互助學校的組織和教授方法是依據倍爾——蘭開斯特的體系而建立的。法國教育史家康派拉（G. Compayre）說：「在復辟時期，互助教育的成功成了一件超時的甚至令人瘋狂的事件」（註）。各黨派爲了爭取初等學校進行了猛烈的鬥爭，而互助教育體系就成了「自由黨在教育領域中的旗幟（*l'enseignement mutuel était*



devant le drapeau du parti liberal en matiere d'instruction ) ]。自由主義的市民階級努力保存這種學校的蘭開斯特的進步形式而加以普及，不像倍爾的學校那樣把宗教教育做成學校工作的中心。這樣法國學校的互助學校就自然激動了宗教學校的擁護者尤其是基督學校兄弟會的反對。它們在革命以前是幫助初等學校的發展的，現在却成了初等學校更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物了。

### 七月王政時期

(一八三〇—

一八四八年)

的市民階級學校的發展

在路易、腓力普在位的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市民階級王政時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市民階級的加強促成了法國學校的發展。

一八三三年，教育部長基佐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 1787—1872) 頒佈一個法令——這個法令就成了初等國民教育方面的基本的法令。每一個市區應設立一個初等學校。每一個大城和人口六千以上的城市應設立一個高等小學，每省應設立正規學校，即訓練國民教師的學校。爲了初等國民教育費的支出，每一個沒有充足資金的市區可以征收附加的特別稅，專作補助學校之用。

市區應負擔學校校舍、設備及教師俸給等的各項支出。學校收費的辦法是保留的，但貧民可以免繳學費。教師的報酬規定每年不得少於二百法郎。

在一八三〇—一八四八年時期，法國學校數量上的發展是可注意的。學校網和學生數量幾乎增加了兩倍。

正規學校 (師範中學) 的數量在一八三〇年爲十三個，而到一八四八年增加到八十六個。小學數量根據良好的和顯然縮小的估計在一八三〇年爲二七〇〇〇個，而到一八四八年增加到四六六一四個，學生數量增加到二一七六〇〇〇人。

日益發展的工業要求高等小學的普及，就在這一時期，創辦了許多高等小學。根據基佐的法令，這些學校中應教授幾何及製圖，自然科學、物理、歷史、地理、唱歌。許多成人班也是爲工業的需要所引



起的，成人班的數量在一八四七年時已有六八八七個，學生共有一一五一六四人。

跟着學校數量的發展，路易、腓力普政府就努力加強對學校的控制。爲了實行這種控制一八三五年在每省設立了山部長委任的初等教育監督官，因此，地方自治權就縮小了，中央政權加強了。

在復辟時代起過自己的作用的互助學校，現在就讓位於比較正規的學校和有教育準備的教師了。當然，地方自治學校代替互助學校的交替過程，是逐漸的，有些互助學校一直存在到一八六七年。

### 一八四八年 革命時代的 國民教育

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勞動群眾在國民教育方面所提出的革命要求，在卡爾諾（*Ch. Carnot*）的民主主義的學校改革草案中作了系統的說明；卡爾諾曾充任短期的（四個月）國民教育部長。

這一草案規定實施普遍義務免費教育，廢除宗教對學校的影響，實現教育行政的民主化，並規定由公社免費供給學生課本與膳食。

依照這一個草案，初等學校的課程包括閱讀、書法、法文文法、算術與米突制的尺度常識，初步自然及工農業常識，基本法國史地常識，人與公民的權利義務的研究，自由平等博愛的感覺的發展，基本的衛生常識，體育教育，繪畫、音樂。神學科從學校課程中排除了，但規定父母如果願意子弟受與宗教教育，可許他們請私人教授。

這是市民階級共和民主的要求，但當六月工人暴動失敗後保守勢力佔統治地位和代替了卡爾諾的未實行的法令而通過法民的保守的學校法令的時候，這些要求就獲得了社會主義的意義。馬克思認爲卡爾諾是「共和主義的市民階級的代表，他的民主主義的公式在和秩序黨衝突中獲得了社會主義的意義」（註）。

（註）。馬克斯文集第八卷第八十三頁。



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指出，卡爾諾的民主主義的法令後來會成爲「反對耶穌派學校法令的活的抗議」(註)(指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後保守勢力抬頭時的一八五〇年法律而言)。

卡爾諾在任部長時期，曾號召國民教師協助鞏固共和國：「國民教師的職業在王政時期是很低微的，而在共和時期却成了最光榮和最受人尊敬的一種職業。讓三萬六千個國民教師明瞭我的號召吧！」

果然，法國國民教師熱烈參加了一八四八年革命，因此在革命失敗以後第二帝國的保守派就瘋狂的迫害教師。

## 五·德國學校

### 初等學校

十九世紀初葉，在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和「暴風雨」運動的影響下，德國初等學校迅速的發展了。裴斯塔羅齊對國民學校的組織和任務給了極大的影響。自由主義的普魯士國民教育領導者在十九世紀初葉曾派遣了一批教師到裴斯塔羅齊那裡去實習。這些教師回到祖國以後就成了裴氏思想在德國的執行者。

但這初等學校方面的活躍是不長久的。在拿破崙帝國崩潰以後，歐洲就開始了保守的統治。根據「神聖同盟」加盟各國的決議，一八一七年在這些國家(普、俄、奧)成立了精神事業及教育部。

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對於舊有的學校數量自然是不滿足的：發展中的工廠和作坊需要識字工人，資本主義化的農業需要識字工人。而普魯士政府和德意志其他各國的政府由於害怕革命的醞釀也將學校當作宗教及僧侶主義的宣傳工具。學校網擴充了(一八四〇年時普魯士已有二二六四六個初等學校和二二六〇〇〇個學生)，課程內容也漸漸地帶了宗教性。

(註)馬恩文集第八卷第八十四頁。



這一時期的德國初等學校仍舊是懺悔學校；宗教教育佔了極大的位置。

閱讀教育的發音法的推廣和實物教授的發展是十九世紀上半期德國初等教育在方法上的最大的進步。發音法是斯堆法尼（Heinrich Stephani）所宣傳的。斯堆法尼於一八〇二年根據發音法發表了一套字母，第二年出版了「閱讀教學的方法指南」，他在這部書裡說明了發音法的本質及其對疊字法的優點。實物教授的方法是在裴斯塔羅齊和第斯多惠的直接影響下形成的，但同時由於對它們的原則的曲解，實物教授往往帶了極度的形式性。

隨着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接近，各國政府由於害怕革命運動的發展，就對國民教育施行了報復。坡爾善（Friedrich Paulsen）描寫一八四〇—一八四七年期間政府對國民教師和國民學校的態度是這樣的：「對於教師階級的深刻不信任，對於『過度』教育的不滿——這就說明了現今學校管理的情形……到處對國民教師作了苛刻的非難；非難他們學識不夠，非難他們傲慢無禮不信任和不服從」（註）。

與民衆接近的國民教師的努力激怒了德意志各國的統治階級。國民教師分了德國民衆從十九世紀初葉起就懷抱了的發動本國革命的希望，在他們的工作中實行了裴斯塔羅齊的民主思想。並擴大了貧乏的初等學校的課程，添入史地及自然等學科。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產生了兩個國民學校的改革草案：一個是立憲會議的委員會所編製的，一個是第斯多惠編製的。第一個草案，宣佈學校開辦的權利是自由的，實施普遍義務教育，及學校擺脫僧侶的監視。依照第斯多惠的草案，學校是獨立於教會的國立機關；實施普遍義務教育。

依照一八四八年十二月五日的憲法，宣佈私人辦學是自由的，實施教育的免費制；學校經費由市政當局負責。但學校中的宗教教育還是保存的。

（註）坡爾善，德國教育史綱，一五六—一五七頁。



國民教師普遍參加了革命。許多年來在學校中幾乎用秘密的方法所實施的民主原則開始公開的實行了。史地及自然科的教授加強了。有革命情緒的教師在兒童和成人中宣傳了革命思想。

### 市民學校

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工業的發展（工場手工業的生長）和市民階級的生長提出了高小教育的問題。許多教育家在這個時期要求開辦市民學校。從十八世紀七十年代起德國許多大城市裡就產生了大量的這樣的學校。

和經院主義統治下的普通中學校不同，這些市民學校都是最有活力的，和生活有聯繫的。這些學校中都是廣泛採用了實物教授，舉行參觀學習，設有實驗室和陳列室。其中許多市民學校後來會轉化為實科中學。

### 師範中學

小學數量的增加在十八世紀後半期已經尖銳的提出了小學教師的訓練問題。過去那種大部份由手工業者充任教師和把教書當作副業的情形開始不能忍受了，而成了小學校的更進一步發展的障礙物了。

我們知道十八世紀初期虔派法蘭克曾在高盧城中開辦一個師範中學。一七五〇年在柏林第一實科中學中也附設了一個師範學校。泛愛派在開辦師範中學的宣傳上有過極大的貢獻。十八世紀六十年代在德國各公爵領地中產生了幾個師範中學。在八十年代創辦的有十個以上，在九十年代創辦的約有十二個。

到了十九世紀的初期，普魯士境內已經有三十個左右的師範中學了。

在十八世紀的八十九十年代，德國大多數師範中學都是普通中學，實科中學或市民學校的附屬物。除了普通教育的科目以外，這些中學中也研究教育學、教育方法，農業和音樂。

但從這一時期起，師範中學已經開始成了少數人可入的特種的學校了。到一八四〇年時，已經完全確定為特種教育學校的師範中學數目增加到四十五個。在十九世紀時期，每個師範中學中都設有實驗學



校，作教育實踐之用。

師範中學從十九世紀二十年代起受了裴斯塔羅齊和第斯多惠的強大的影響。師範中學的課程包括德文與文學、數學、地理、歷史、自然、物理、神學，教育科的科目有教育學、心理學、人類學、教育方法。

## 中學

在十九世紀初期，當自由主義的政治家，當時最有教養的人物之一，新人文主義的代表溫鮑爾德（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 1797—1835）在一八〇九—一八一〇年担任普魯士的國民教育部長時，中學校經過一次很大的改造。

溫鮑爾德和他的同志們在一八一〇—一八一二年所實施的普魯士中學改革，在中學校的酸敗的空氣中注入了活的氣流。一八一〇年爲了確定中學教師的身份，曾舉行特種的考試。這樣就開始了中學教師的成員的刷新和打破了中學教育對僧侶階級的依賴（在這以前擔任中學教師的普通都是神學科畢業的神學者）。

溫鮑爾德的合作者之一編了一個新的中學授課計劃，這個計劃以拉丁文，希臘文、德文和數學爲基礎。歷史和地理也佔了極大的位置。拉丁希臘文的教授方法是改變了：注重古代文學的研究而削弱形式主義的學習。

各方面的一般教育的思想，是編製中學授課計劃時的領導的思想，它一方面以古典文及德文爲更進一步的大學語言學科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爲數學及自然科奠定了基礎。顯然的，這個新的授課計劃和過去中學相比是很大的進步，因爲在過去中學，數學是次要的學科，國語是不注意的，自然科是完全沒有的。

新的授課計劃保證了人文教育的任務的解決，同時也相當符合於市民階級關於加強數學、物理、自然及新的語言教授的要求。



新人文主義的中學供給了優良的古典文知識，直到談話的技術，介紹了最優秀的古典文學作品，製造了文學的體裁，發展學生的智慧能力，並供給了數學及歷史方面的知識。

但是反動的普魯士政府已經很快採取了各種方法反對新人文主義對於中學的影響了。在一八一五年以後，對學生和教師，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以及對大中學的教育方向建立了警察監督的辦法。一八一九的會議提出了許多反對解放運動影響學校的辦法。

說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的德國的中學，就需要提到實科中學。

從一七四七年赫克爾創辦半職業性的柏林實科中學以後，實科中學就迅速向前發展了，因為這些學校符合於發展中的市民階級的需要。

一八二二年實科中學開始轉化爲「服從於實踐目的的普通教育的學校」。一八二二年在柏林實科中學的課程中，包括神學、數學、自然、德法英文、歷史、地理、圖畫。自然和地理的教授是適應於地方工業的需要的。其餘的實科中學也依照這個課程計劃逐漸的改造了。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期，中學教育問題曾在許多教育會議上提出討論，同時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市民階級人士還要求創辦古典與實科聯合的中學。

中學主要是爲準備進大學的貴族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實科中學甚至在一八二二年改造成爲普通教育的學校以後還沒有被正式承認爲平等的中學，實科中學的畢業學生是無權投考大學的。中學經費由國家供給，而實科中學的經費由地方供給。實科中學在課程上既與市民階級的需要比較的符合，自然市民階級就要求承認實科中學的權利了。

## 大學

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德國各大學由訓練國家官吏和某種職業上的專門人材的學校改造成爲科學學術機關。大學的任務不僅是對學生教授某一種學問，而且是科學工作的發展。



新人文主義影響下的科學的繁榮和精密知識的發展代替了法律科（在十七—十八世紀）把哲學科及兩個分部——歷史語言學部與自然數學部提到了第一位。

領導這一科學與哲學運動的是一八一〇年溫德爾德所創辦的柏林大學。

此外，在不列斯勞、波恩、慕尼黑，也產生了依照同樣的原則而建立的大學。

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的大學是科學和哲學的中心：最著名的新人文主義者——語言學家伏爾夫，歷史學家厄布爾，哲學家康德，費希德，謝林，黑格爾，教育家和心理學家海爾巴德，都是這些大學的教授。

工業的發展在十九世紀的上半期促成了許多技術學校的誕生。

大學是暴風雨時代德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在維也納會議以後，當保守勢力在歐洲確立的時候，作為革命運動中心的大學就開始受到了迫害。一八一九年德意志各國曾召集一個代表會議，提出了許多反對解放運動的方案，其中包括加強審查制度，確立政府對學校教育的統制，對教授行動甚至對他們私生活的監視。

這些措施固然把大學中的解放的哲學和新人文主義運動絞殺了。但暴風雨時代所喚起的科學創作的精神並沒有凍結：哲學開始在大學的校外發展了（費爾巴赫、馬克思和恩格斯），大學的科學活動轉成爲實驗研究，歷史文獻的搜集和公布等等。



## 第十七章 海爾巴德的教育體系

十九世紀後半期，是中等學校蓬勃發展的時期。對於德國及其他國家的古典中學的實踐（對於它們的教育內容和方法），海爾巴德在五十一六十年代的許多教育理論家中給了最大的影響。他的主要的教育著作是十九世紀初期就問世的，但從五十年代起才享有廣大的名聲和實際的影響。

### 略傳

海爾巴德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 生於官僚——法官的家庭中。初等教育完全是在母親那裡得到的。海爾巴德十二歲時被送入拉丁學校，從小就以他的聰敏和對於哲學問題的興趣引起了全校的注意。他在這裡第一次認識了伏爾夫和康德的哲學。

一七九四年，海爾巴德考進耶拿大學（該校是當時德國哲學生活的中心）。康德、費希德，和當時剛剛發表的主張一切存在爲統一的和永恒的希臘哲學家帕爾梅尼特 (Parmenides) 的哲學著作，給了海爾巴德以極大的影響。耶拿大學畢業後，海爾巴特於一七九七年在一個瑞士貴族家庭中擔任家庭教師。他對教育的興趣是由這個職務養成的。

海爾巴德曾在布格多夫研究教育心理分析的裴斯塔羅齊相識。這一認識給與他的印象是很深的：他在以前已經認識裴氏的著作，就開始了他對裴氏的研究和論文寫作，回國後並廣泛宣傳裴氏的思想。經過兩年的教育準備以後，一八〇二年海爾巴德擔任格丁根大學的教育學講師，一八〇五年升任爲教授。

從一八〇六年起，海爾巴德就陸續發表了許多教育學，心理學和哲學的著作：「普通教育學」(Allgemeine Pädagogik aus dem Zweck der Erziehung abgeleitet 1806)。「普通論理學」(Hauptpunkte der Logik 1808)。「普通實踐哲學」(Allgemeine Praktische Philosophie 1808)。



這幾部著作發表以後，海爾巴德就擔任哥尼斯堡大學的哲學和教育學教授。他在大學中創辦了教育學院和實驗學校，並親自參加了未來教師的實際訓練工作。這一時期海爾巴德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於心理學問題的研究。一八一六年出版了一部「心理學教科書」，稍後（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又出版了「部結實的著作——科學的心理學」（*Psychologie als Wissenschaft*）。

一八三三年他又回到格丁根，在這裡出版了許多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和教育學的著作。

### 作為海爾巴德 教育學基礎的 哲學和心理學

依照海爾巴德的見解，世界是由無數不變的永久的抽象的本質——因其抽象的品質而為我們所不能認識的實物——所構成的。這些不變的本質是在相互間的各種不同的關係中存在着的，而這些不變的本質的各種不同的關係就造成了世界變化性的幻影。

我們知道，海爾巴德是和辯証法的思維絕緣的。海爾巴德的同時代人黑格爾的哲學却在他的身旁通過。海爾巴德雖然說到經驗，要求「質問經驗，質問一切真理的根源」，但他所理解的經驗是不正確的，他認為存在是不變的。海爾巴德在心理學中也是一個形而上學者。他認為精神本身是不變的單純的本質。精神和肉體結合後便獲得了個性，通過肉體發生感覺，並產生概念。

海爾巴德把整個精神現象歸之於概念。感情和願望——這只是一定的概念狀態，就是說：抑止的，等待着急流的概念狀態——就是感情，抑止的概念走向表現的要求——就是願望，而願望和到達可能性的概念相結合——就是意志。海爾巴德認為心理學就是關於概念及其表現、結合、消滅的科學。

海爾巴德的哲學是沒有顯著的影響的。他在心理學上却起了極大的作用。意識急流、潛在意識、以及自覺等的概念在心理學中是應用很廣的。

海爾巴德把整個精神生活只歸結於概念，他是主知說（*Intellectualism*）的輝煌的代表。他在教育理論中對「多方面興趣」給了極大的意義。



海爾巴德確定興趣就是精神的積極性。

多方面興趣的概念在海爾巴德的教育學中是基本的概念。他所了解的多方面興趣就是那種越出狹隘的職業範圍和某個人的日常生活範圍的興趣，是不僅包括利己的個人的而且包括一般的人類生活的興趣。興趣依賴於經驗（海氏把經驗理解為對於周圍事物的認識）和依賴於與人的接觸。

適應於經驗的是經驗興趣，適應於人的接觸的是同情興趣。「在關於經驗對象的強化的思考中，發展了思辨興趣，而在關於更廣泛的人類相互間的接觸所造成的關係的思考中，發展了社會興趣。我們在一方面要加上和美興趣，在另一方面加上宗教興趣；這兩種興趣不是在強化的思考中得到的，而是在事物的靜止的思辨中得到的」。在這六種興趣中，可以指出兩個方向：（一）自然主義的方向——屬於這個方向的是經驗興趣（以觀察為基礎），思辨興趣或哲學興趣（思考）和審美興趣，（二）歷史的方向——屬於這個方向的是同情、社會和宗教興趣。

海爾巴德對於道德教育問題也是站在主知說的立場上的。有德行的人就是一種以道德的概念和思想為指導的人。因此，從海爾巴德的觀點出發，倫理學便歸結為一定的道德思想，海氏認為這種思想共有五種：（一）內部自由的思想，（二）改進的思想，（三）慈善的思想，（四）權利的思想，（五）正義的思想。

海爾巴德的倫理學，也像他的心理學一樣，是建築在形而上學的基礎上的。

## 作為科學的

## 教育學

海爾巴德的教育學，是市民階級建立教育學為科學（以心理學與倫理學為基礎）的第一次企圖。海氏認為倫理指出了教育的目標，而心理學指出教育的方法。

作為教育科學的教育學和教育藝術（或實踐）間的劃分是屬於海爾巴德的。海氏正確的指出：理論的準備應該先於教育的實際工作。他着重指出：只知實踐是容易落入墨守舊法的歧路的：「只有理論能夠學習如何通過經驗和觀察向自然質問，如果願意向自然獲得一定



的回答的話」。

### 教育的目的

### • 教育的基

### 本分類

海爾巴德認為，科學的教育學應該首先確定教育的目的，其次是使教育方法適應於這些目的。依照海氏的見解，教育目的的完滿的狀態，可以用一個「善」字來表示。這一目的，是所有大教育家——理論家所努力以赴的理想。教育家在向這個理想的努力中，應該向兒童提出後者成爲成人時要提出的同樣的目的。

海爾巴德認爲學生的未來的目的可以分爲兩部份：（一）與職業選擇有關係的可能性的目的，和（二）必要的目的。海氏認爲職業性質的問題（可能的目的）不應該包括在教育中。但教育應該造成最好的執行任何職業的條件——應該培養人的積極性和多方面興趣。因此教育的任務所要包括的就只有「必要的目的」，也就是：有目的的道德性格的養成，人的積極性和多方面興趣的發展。教育以發展上述特點的方法既爲職業的選擇和執行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同時顯然的也是爲了「可能目的」的良好實現。

海爾巴德把整個教育過程劃分爲三個部分：管理，教授，和道德教育。

### 兒童的

### 管理

依照海氏的見解，管理不是以兒童的未來爲目標，而只是調整他們在現在的行動。管理並不是教育，而只是教育的先決條件。

依照海氏的見解，管理的任務就是「壓制兒童的野生的戲謔」。海氏認爲自幼養成兒童的意志和他們的「野生的戲謔」的表現，就要「出現無秩序的原則」，要破壞成人秩序，並使「兒童未來的人格遭受各種的威脅」。海氏認爲服從可以用武力來達到。

海氏確定管理的影響只發生於兒童的現在，而不發生於兒童的未來，但在另一個地方却又自相矛盾的寫道：兒童的管理除了維持現在秩序的任務以外，也還有一個未來的任務：就是防止未來的鬥爭。

雖然海氏也肯定「教育在嚴格的意義上是一件與管理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海氏却不能證明管理與



教育間的區別。他企圖（抄襲康德）作這樣的劃分是失敗的，是與生活的經驗矛盾的，是從海氏的形而上學的心理學和倫理學中產生的。

這種對於影響兒童方法的分類，在另一方面也是形而上學的：依照海氏的見解：管理的目的是外部的，而教育的目的是內部的（兒童精神的）。海氏把教育只限制於「精神」，就不得不從教育的領域中排出了肉體教育，而把它歸入管理了。

海氏認為「管理」的方法是威脅、監視、命令和禁止、懲罰（直到體罰）、命兒童作工和消磨他們的時間；一部份已越出管理範圍的補充的管理方法，是權威和愛。

「第一種管理方法是威脅」，但是這種方法的成就是不可信仰的，因為一方面兒童是不顧任何威脅和大膽敢為的強烈的天性，另一方面是脆弱到經不起威脅的天性。

海氏認為比較威脅更實際的第二種管理方法是監視。關於監視，海氏提供了許多寶貴的方法上的意見。例如他認為監視在童年時和性器官成熟時期是特別必要的。在其餘的時候，監視不必過分嚴格，可厭、和頻繁，因為這樣的監視「對於監視者和被監視者是同樣的困苦，以致通常兩方面都想用各種狡猾方法避開它」。嚴格的監視會阻碍兒童的自制力，嚴格的經常的監視會使性格變成脆弱和歪曲。

和監視相連的是命令和禁止。命令和禁止不應該籠統，而應該真確和具體。

海氏認為再其次的一種管理方法是懲罰，其中包括體罰。「完全取消體罰是徒然的，當叱責已無濟於事的時候，通常還要採用體罰；但是不要常用它們，最好站在遠處威嚇，不要實際的採用」。

梅爾巴德贊成「數小時的飲食剝奪」。「自由的剝奪是最普通的懲罰，只要它與過失相符合，而且也是最妥當的懲罰。同時要分成各種不同的等級，從立牆角開始，到獨室禁錮為止」。「至於像逐出室外或校外，這樣重的懲罰應該只在必要時採用」。

海爾巴德提出權威和愛作為管理的補助方法。我們承認教師的權威具有極大的意義，但是只要讀過



海氏對於這一方法所提出的根據，就明白在我們的教育學和海氏教育學的權威的概念之間，有着深刻的原則上的區別。依照海氏，「兒童的精神會在教師的權威面前屈服，權威阻止着他們的精神活動，因此權威就可以用來絞死能夠向不正確方向發展的初生的意志」。

除了這些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海氏關於「壓制」和「奴役」兒童意志的見解以外，我們也看到他的寶貴的意見。海氏指出，父親的權威和母親的愛還在入學以前的童年時代，就起了極大的作用（但爲什麼要這樣劃分？——我們會說：雙親的權威和愛；而海氏因爲是保守的市民階級的代表，不能把女子——母親置於和男子——父親平等的地位）。海氏認爲權威和愛是最好的管理方法，並認爲雙親不應該與學校遠離。他承認有專門訓練的教師在教育事業中的重大意義，和完全正確的承認雙親和學校聯系的必要。

海氏關於兒童管理的學說，雖然包含了許多個別的寶貴的見解，但是一般說來却是保守的，它爲各國保守的教育界所利用。尤其在俄國，它在革命前的中學校中會被廣泛的採用。

## 教授的理論

教授是海爾巴德的整個教育體系的中心：「廣義的教授，是積極教育的最主要的工具」。因爲教育的目的爲善，而教育的最主要的工具是教授，所以海爾巴德就自然而然的提出了訓育教授的思想。

我們重視海氏對於教授給與這樣大的注意，但不能承認海氏的教授論的根據的正確性，是因爲海氏的整個的教授理論是建築在他的單方面的主知說的心理學基礎上的，這種心理學把人類的全部精神生活只歸結於概念。海氏教育體系的公式是這樣：他把人的全部精神現象歸結於概念；兒童的概念是用教授的方法來增加和調整；因此，教授也就是教育的主要方法。

海爾巴德把多方面興趣的思想作爲他的教授理論的基礎。教授應該鼓舞學生的興趣，海氏稱這種興趣爲自動性（智力自動性）。迎接學生精神中的新的印象要提高已有的概念並與這些新的印象相結合。

在興趣的鼓舞上，注意有着極大的意義，海氏把注意也歸結於概念。



「注意是達到現有概念擴大目的的努力」。海氏把注意分爲專斷注意和不專斷注意兩種。他稱依賴於原有目的的注意爲專斷注意。不專斷注意又細分爲原始注意和自覺注意兩種。原始注意依賴於印象的力量（顯明的色彩，強有力的聲音）；自覺的注意據海氏解釋則爲已有的概念與新印象的結合。

說到注意的鼓舞，海氏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教授上的意見：不要過久舉示同一件事物，因爲千篇一律容易使人疲倦；但也不要使教授時作過於激烈的跳躍，因爲過去的概念會阻止新的概念的吸收。

要避免過分的單純。海氏認爲這是教授上的主要的規則：「在學生自己開始工作之前，先要引起他們對於有關這一工作的各種概念的趣味；尤其是在授課開始時，先作一個簡短的評論，說明要讀到的或講到的東西」。

如果在良好的教授方法之下還不能鼓舞學生的興趣，那就要採用專斷的注意，專斷注意要求教師方面的強制，或最好學生自身方面的自我的強制。

尤其是在學習暗記時，需要專斷的注意，海氏認爲暗記「在一切科學上也是極端需要採用的」。暗記也要求學生產生相關的概念，遠離那些與要記的東西無關的概念。如果遇到了障礙（無關概念的出現），「就先要念出對於暗記有希望的概念，叫學生學習，使它們更接近他們」。暗記的字眼不能連續得過長。三個外國字往往已經算是很長了」。

海氏正確的指出，爲了防止已吸收的材料之忘却，就要「訓練學生經常利用暗記的材料與引起他們興趣的事物相聯系」。

海氏關於注意及記憶工作的教授法上的推論，以及關於最適宜的暗記方法的提示，有許多是正確的和有價值的，而且爲後來的實驗研究所確証了的。

我們在敘述海氏教育學的心理學基礎時，曾分析他的多方面興趣的理論和興趣的分類：（一）經驗興趣，（二）同情興趣，（三）思辨興趣，（四）社會興趣，（五）審美興趣，（六）宗教興趣。



海氏認為中學各種學科是和這幾種興趣相符合的。

自然、地理、化學、物理大體上符合於經驗興趣；論理學、數學、文法符合於思辨興趣；外國語（古典語及現代語）符合於同情興趣；歷史、政治、法律符合於社會興趣；唱歌、繪畫、文學符合於審美興趣；神學符合於宗教興趣。

但是這種某一學科對於某一興趣的從屬不是孤立的：每一學科只是大體上屬於某種一定的興趣，但通常是和幾種興趣有關係的；例如海氏認為高年級的歷史研究已經為思辨興趣供給了材料。

在海氏的這一理論中有一個寶貴的推論，認為教授應該以發展多方面興趣為自己的任務。海氏指出，上述各種興趣應該同時用教授方法加以鼓舞和發展。這一興趣多方面性的原則不僅在各種不同興趣的配合上須要遵守，而且在每一種興趣的範圍內須要遵守。單方面興趣是有的，那就是經驗興趣只灌注於一種範疇的科目，例如有人只對植物學或動物學發生興趣。審美興趣不應該單方面的只限於音樂或圖畫，而應包括各種種類的藝術。

海爾巴德是古典教育的擁護者，但他把數學和自然置於重要的地位。

海氏說到教授的方法（「進程」）時，區別教授為敘述、分析、和綜合三種。

教授的基础是學生的經驗，但這種經驗是很有限制的。因此在教授上就需要（一）發表經驗和（二）補充經驗。也因此，這種兒童的經驗是可以由兒童自己來敘述的；但由於兒童的經驗的限制性，和擴大這種經驗的必要性，因此教師本人的新的事實的口頭講述，在敘述教授中佔了主要的地位。

敘述教授可以擴大兒童的經驗，但不能矯正它們和深化它們。因此分析教授就成了它的必需的補充。分析教授激勵學生把他們所知道的事物分解為組成部分，探索它們的特徵，並加以比較。如果敘述教授的工具是教師的講述的話，那末分析教授的工具就是教師和學生的談話（問答）。

不能分析學生所不知道的事物。因此敘述教授要先於分析教授。但對於年齡最大的兒童還有一種



方法——綜合教授，教師在這種教授方法下，說明新的實際材料，但不僅限於敘述，而且在敘述中把結論、概括和事實聯合起來；他在這種方法下，把新的概念和學生的過去經驗配合起來，在學生的自覺中爲新的概念找到了支持。綜合教授和思辨興趣有密切聯系，敘述教授和經驗興趣有密切聯系。

海氏認爲教授過程通過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普通稱作形式的教授階段。

這種名稱的產生，是因爲海氏認爲一切教授都通過與內容獨立，也就是說與教材學課主題等等獨立的這四個階段。海氏把教授過程分爲兩個基本的階段——加深和理解。每一階段他又分爲靜止狀態和運動狀態。因此在這樣的劃分下，就得到了下面四個依次遞進的教授階段：

(一)明瞭——這是概念靜止狀態中的教材上的加深。這種加深要求把教授盡可能的表現爲支解的形式：「一切教授藝術的第一步，主要是在分解主題爲最小部份」。這一階段——是許多細目的靜止的和集中的加深。在心理學上，這一階段的特徵是學生集中的注意。在教授法上，符合於這一階段的是教師的講解和舉證，或新材料的提示。這一階段的任務是新的教材盡可能的明白、確切、詳細的爲學生獲得。學生獲得了一切概念。

(二)聯想——這是概念運動狀態中的加深。這第二個階段的特徵就是前一階段上所獲得的新的概念和學生原有的過去的概念相結合。在心理學上，這一階段的特徵是期待；從新材料和舊材料中要得到什麼呢？在教授法上，符合於這一階段的是「最好的方法——非強制的談話」。教師利用談話激發學生的已有的概念，並把它們和新的概念建立了聯系。這種新概念與舊概念間的聯系，在第二階段上是無系統地發生的。

(三)系統——這是靜止狀態中的理解，這一階段是把大批已接受的和已結合的概念列成系統，取其主要的部份，棄其特殊的部份。在這一階段上，要作出結論，概括，定出規則等等。在心理學上，這一階段的特徵是迫切的探索；在教授法上，這一階段應該是教導。



(四)方法——這是運動狀態中的理解，在這一階段上，學生要把列成系統的知識在實際上應用。在這一階段上，心理學上已有了行動。學生要在這一階段上「作哲學的思考」(海氏這一術語的意義就是合理地應用知識)。在這一階段上，學生要養成習慣，「通過問題解決、獨立工作、和依據教師的指示修正這些工作的方法」，進行有方法的思考。這些練習應該顯示：學生對於主要思想的了解是否正確，他們能否把它們在實際上應用。

這四種形式上的教授階段，可以用下表來說明：

教授階段	心理狀態	教授方法
(一)明瞭	注意	教師講述，新材料的舉示
(二)聯想	期待	談話
(三)系統	探尋	結論、概括、規則、定義、公式
(四)方法	行動	實際應用(練習、問題解決等)

海爾巴德的這四種形式上的教授階段在市民階級的教育家中享有極大的名聲。海氏的信從者(齊拉、威爾曼、雷恩)曾竭力宣傳這些階段，並在它們中間添了不顯著的變化。

這四個教授階段中的每一個個別的要素都在教授中有着位置並為海氏深刻的研究；但是整個說來海氏的公式是機械的，因此也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海氏的公式是形式的，是割裂方法和內容，是建築在陳舊的甚至已被市民階級的心理學家所拋棄的聯想心理學之上的。我們的教授法的原則和海氏的教授階段之間的最大區別，是在於我們不把任何一種循序，或任何一種教授方法普遍化(而海氏的形式階段却



普遍化了：開始總是「明瞭」，然後強制的進到「聯想」等等。

我們是依據教材、依據所研究的問題，依據教授用的標本的貯備情況，依據某一級學生的個性和其他條件，在一種情形下是由新材料的提出開始授課的，在另一種情形下則由說明學生對於某一問題的已有的知識開始，而並不勉強遵循海氏所提出的程序。

海氏對於科學、學校、和學校所供給的系統知識，給了高度的估價。他認為學校教授的目的就是各方面的，或更確切的說，「多方面的知識」。要做到靈魂愛好於一種知識的對象，了解它的價值，了解它的關係，了解它的邏輯聯系，要訓練深入這種知識，或者說得更好，要訓練利用這種知識的技能和藝術——這就是主要的事情」。海氏正確的指出，學校可以用系統教授的方法達到這一目的。海氏認為每一種學科都應該教授，要求教材容量（在學生能力所及的範圍內）足夠的龐大，要求各科間有聯系。

說到各科教授的問題，海氏對於神學是極重視的。我們只知道海氏重視知識，但他把宗教看得比知識更高：「任何的知識都不能給與人類比宗教信仰更大的信心」。他稱宗教為「人類之友和保護者」，而要求宗教教育的開始儘可能提早，並要求在科學與宗教發生分歧時，教師立刻禁止學生關於宗教的評論。

海氏關於歷史教授方法的指示是很有價值的。例如他要求事實的敘述嚴格依據年代的秩序。教師應該在活的歷史的講述中，生動和有趣的敘述這些事實。不要使講述過於冗長。在歷史事實的循序的敘述中，教師應該「善於利用描寫和繪畫，激起聽眾的高潮，而不喪失自己的健全意識和謹慎」。歷史講述的語言要盡可能的簡單。要廣泛採用實物教授的原則（人像，建築物 and 廢墟圖片，地圖等等）。被研究的那一歷史時代的藝術作品和後來描寫這一時代的藝術作品，在歷史教授過程中也是極有用處的。

海氏關於地理教授也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例如他指出地理作為一種學科的重大的價值，指出它對於正確了解歷史和自然科學的意義。他要求教師的生動的講述。「教師應該像自己就是一個旅行家那



樣的講解」。海氏關於地理教育中的實物教授和地圖利用方法的指示都是寶貴的。

## 道德教育

海氏在原則上不正確地把兒童管理和教育分開，但承認在許多場合中管理和道德教育是合流的。因此我們在敘述海氏對於兒童管理的見解時，會有許多地方說到道德教育。依據海氏的正確的判斷，道德教育主要是用教授的方法來實施的。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性格的教育。「沒有道德教育的教授，只是沒有目標的方法，沒有教授的道德教育（或性格教育），也只是失去了方法的目的」。

道德教育像教授一樣，也是以多方面興趣和道德概念為根據的。這種教育應該在學生中發展我們已經說過的五種道德思想（內部自由思想、改進思想、慈善思想、權利思想、和正義思想）。

除了作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法的教授以外，海氏更提出下列各種方法：

（一）抑制兒童——管理兒童和養成兒童的順從。「兒童應該永遠有這樣的感覺（雖然在程度上是薄弱的）：他是沒有權利跨越某種界線的」。

（二）限定兒童：兒童應該承認他的願望的限度和不懂由教師的指示而且由本身經驗中產生的道德觀念。

（三）確立行為的規則。

（四）保持學生精神中的安靜和澄清，不容許情感的發展。

（五）以贊許和非難「波動兒童的靈魂」。

（六）訓戒兒童，指出他們的過失，和矯正方法。

海爾巴德對宗教教育給了極大的意義。海氏要求兒童宗教興趣的發展盡可能提早和加深，使「靈魂在晚年在他的宗教中得到和平和甯靜」。海氏認為宗教是由於最高本質的「依賴的感覺」中發展起來的，宗教要求「順從的感覺」。



### 海爾巴德 教育體系 的意義

海爾巴德是第一個建立教育學方針，企圖把它定為科學的規律的教育理論家。在他的教育體系中，包含了許多新的和有價值的東西。

海氏教育學的積極特徵，是教育學與心理學的密切聯系，學校和教授的高度評價，訓育教授的原則，教授的系統性，多方面興趣的發展要求。海氏在方法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他深刻的和詳細的發揮了教材系統講解的方法，提出了關於講述和談話的許多寶貴的意見。關於兒童的思維的發展和教育過程中的記憶和注意的利用，他也提出了許多意見。

海氏關於地理教授尤其是歷史教授上的某些個別的方法上的指示（如年代的次序，歷史事實的生動的講解，文藝作品的利用等等）都是有價值的。

但除了這些推進教育學的寶貴的特徵以外，在海氏的教育學中，尤其是在他的唯心論的基礎中，也有許多保守的成份。他有許多形式主義的成份，很少注意兒童的創造性。在海氏的體系中宗教教育佔了極大的位置。紀律在這一體系中被解釋為兒童的「意志的摧毀」；他提出了許多為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懲罰方法。古典教育在教授內容中佔了極大的位置。海氏的整個教育體系是以特權階級的兒童為對象的。

海氏曾領導一個很大的教育學派——十九世紀中葉和末葉影響最大的海爾巴德學派。海氏對於中學教授方法的影響特別偉大。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歐美古典中等學校基本上是建築在海氏教育學的基礎上的。



## 第十八章 斯賓塞的教育觀

在上一章裡，我們看到十九世紀上半期市民階級教育學的最大代表人物海爾巴德主要地適合於當時最普及的古典中等學校和適應於德國唯心論哲學的原則，建立了教育和教授的理論。

從十九世紀上半期資本主義各國的學校分析中（第十六章），我們看到在中等教育的領域中，傳統的古典教育和——為工業發展所促成的——實科教育之間的鬥爭是很尖銳的。

古典的中等學校不能滿足工商業的市民階級。實科學校的数量就增加了。自然也就產生了教育上的實科趨勢的理論根據的需要。

這種需要引起了斯賓塞的教育學說的出現，他在他們的理論構成中所依賴的是市民階級的新的哲學傾向——實證論。

斯賓塞是十九世紀大工業市民階級的思想家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是十九世紀後半期英國最著名的哲學家，當時英國已經成了歐洲工業最發展的國家，廣大殖民地的擁有者，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他是市民階級社會的熱烈的辯護者，是繁榮中的市民階級的社會觀的真正表現者，他相信資本主義制度是一切可能的制度中最完善的一種。

斯賓塞讚美這種制度，他在他的「社會學原理」中說國家內部的戰爭似乎已經停止，各國間的戰爭也開始減少。斯賓塞稱市民階級和工人間的關係是「志願的合作」，他不看見那種放在這一關係基礎上的經濟強制的事實。他讚美「工業社會」，說在這裡社會階級的劃分就會減少（註一），軍國主義就會消滅，社會會走向平等（註二），工業中和政治生活中的強迫會減少，信仰、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和遷居自由就會增加。



在那正以瘋狂的速度發展着競爭的社會裡，斯賓塞却看出了「個人利益的調和」。我們知道，市民階級社會裡的財產所有人的數量正在減少，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正向少數人的手裡集中，小所有者喪失了生產工具的所有權——無產階級化。斯賓塞却不看看這些事實，反而說：「財產的整個的個體化是和工業進步相伴而來的」（註三）。

作為市民階級的真正的思想家，斯賓塞對社會主義的態度是深刻敵對的。

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思想家當中，沒有一個有像斯賓塞那樣的熱心和露骨的擁護市民階級的制度。自然他的著作在市民階級的世界裡也就獲得了極大的影響，起初在北美洲和英國，後來擴展到德國和俄國，法國和斯塔的斯維亞等國，直到日本。

### 作為斯賓塞教育學的 哲學基礎的實證 論和不可知論

斯賓塞以他的包容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的「綜合哲學」，成了實證哲學的創始人之一。他認為他的世界觀是站在唯物論和唯心論之上的，是以積極的（實證的）知識為根據的，以事實為根據的。但實際上實證論是形形色色的唯心論之一種。

由於我們的感覺器官的限制性，依照斯賓塞的見解，我們在認識上不能洞察事物內部的本質。因此，斯賓塞就認為我們的認識是永遠相對的，而事物的本質是不可認識的。

實證論者在事實方面要求確實的知識，要求確實的和實驗的研究方法。

但他們在事實方面要求證據和確實性，却又宣佈事物本質的不可認識性，宣佈「彼岸的世界」。依

（註一）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463.

（註二）全集 S 462, 488, 533.

（註三）Principles of Sociology, § 541.



照實證論者的見解，這種彼岸的世界就是宗教的領域，在這一領域上是不能證明而只能信仰的。

依照斯氏的見解，在科學和宗教之間「應該存在根本的調和」。『真正的科學和真正的宗教是雙生的姊妹，她們的分離當然是兩者的死亡』，斯氏企圖把科學和宗教調和起來。他了解科學在生產發展中的作用，重視自然科學的知識，但同時又想挽救宗教因天文學、化學、生物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發展而受到的打擊。

在「此岸世界」的關係中，斯賓塞以進化原則作為他的研究的基礎，並把它應用於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和倫理學。依照斯賓塞的見解，進化的特徵是三個標誌：第一，由薄弱的聯系進到鞏固的聯系（集中），第二，由同質的進到異質的（分化），第三，創造着集中和分化間的調和或平衡的增大的確定性。

斯賓塞承認進化的原則，但是不正確地把它和飛躍式的革命發展置於對立的地位。斯賓塞的哲學是建築在經驗論之上，建築在對赤裸裸的事實崇拜之上的。

斯賓塞在他的「綜合哲學」中，把這個杜撰的發展「法則」（集中—分化—平衡）同樣應用於生物學和社會學，應用於心理學和倫理學。斯賓塞認為在社會生活中和在生物學中，是適用着同一個法則的，所以他站在機械論的立場上。社會學在他的理論構成中佔了中心的地位。正是在這裡，平衡的說教成了現存的市民階級制度的保障。

斯賓塞不正確地肯定說，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從這一不正確的「社會有機論」的觀點上，斯賓塞給現存的榨取關係提出了「根據」，「證明」了市民階級政權的必然性和適宜性。斯賓塞認為在人類社會中，也像在一切有機體中一樣，各部份都應該共同的和有次序的工作。在人的有機體中，如果頭部不工作，手也就不能工作。斯賓塞把有機體中的頭比之於市民階級的國會，要求防止工人以革命方法改變現存的制度。



斯賓塞給數學和自然科學添加了極大的意義，他要求確實的證據和實驗的考查。他認為科學已經像一個有主權的統治者一樣登了王位。這種對於數學和自然科學的意義的強調構成了斯賓塞的觀點的進步特徵。在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已有鉅大的成就，技術的進步以科學上的材料作根據。單方面的古典教育已經不能滿足市民階級的需要。

但斯賓塞在宣佈精密科學的高貴的價值時，因為他站在經驗論的立場上，所以又陷於矛盾，暴露了他的科學觀中的狹隘的實驗主義。

### 斯賓塞的教育觀。教育內容

斯賓塞在「智力、道德及體育教育」一書中說明了他對教育學的各种見解，這部書是由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所寫的許多論文編輯而成的。這部書在英國獲有廣大的銷路，並被譯成各國文字。

這部書的開頭時解明一個問題：「那一種知識對於我們最有用處」。他激烈的批評了現有教育制度，認為社會中最燦爛的知識應該是積極的實用的對於個人發展所必需的知識。對於經院主義的和表面的「世俗」教育的批評是斯賓塞教育學說中的積極的方面。

為要確定那一種知識對我們最為需要，就要考察各種知識的比較的價值。教育的任務就是教每一個人怎樣生活和準備他們過完全的生活；因此，在解決各種知識的比較價值的問題之前，先要決定人類活動的各種不同的種類。

個人主義者斯賓塞把這些活動編排成下列的意義漸次遞減的程序：

- (一) 直接服務於個人自保的活動；
- (二) 以獲取生活資料為目的，因而也是間接服務於個人自保的活動；
- (三) 以種族自保為目的（以後裔的教育為目的）的活動；
- (四) 以履行社會義務為目的的活動；



(五) 以滿足趣味和感覺爲目的的餘暇活動。

這裡可以看出，斯賓塞在教育學中也像在社會學中一樣，首先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他把個人自保置於第一位，而社會生活只佔了倒數第二位。在這五種活動中，有三種是直接包括個人生活的，一種關於家庭生活，只有一種關涉於社會生活。斯賓塞在更進一步的推論中也是到處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站在極明顯的個人主義的立場上。

斯賓塞適應着這五種的人類活動，建立了中等教育的課程計劃。爲了個人自保，就需要解剖學和生理學（和衛生學）的知識：這是「合理教育的最重要部份」。過去的教育使學生知道二千年以前已有生命的存在，却沒有闡明肺臟是怎樣呼吸的，脊髓活動是怎麼一回事，以及諸如此類的知識，斯賓塞對這種教育表示極大的不滿。

爲了生活資料的獲得，除了基本的習慣——閱讀、書寫和計算以外，還需要有帮助「商品良好生產和推銷」的各種知識，這就是：

- (一) 論理學——處理事務關係所必需的科學。
- (二) 算術——指導工商業活動中各種計算的知識。
- (三) 幾何學——各種建築、鐵道敷設、輪船製造時所必需的知識。
- (四) 機械學——整個發達的現代工業所賴以創建的知識。
- (五) 物理學——熱學提供了工業中的燃料使用的知識，電氣學和磁力學引起了羅盤針和電報機的發明，利用這些發明來實施商業和政治生活的領導。

(六) 化學——「現在決設有一個工廠不是在化學的指導之下……化學與我們的整個工業有關；化學的意義與一切直接間接與我們工業有關係的人有關」：

(七) 天文學——是保持「大量的海外貿易」的航海所必需的知識。



(八)地質學——鑛、煤礦等開發所依賴的知識。

(九)生物學——指導食料生產的科學。

(十)社會學——對於任何工業部門的工作人員所必需的市場法則及其他社會問題的知識。  
屬於人類這種活動的還有外國語的知識。

爲了準備人類第三種的活動，斯賓塞要求對生理學略加研究，以便實施正確的兒童體育教育，並要求具備心理學知識，以便實施兒童的智力教育及道德教育。斯賓塞極詳細的證明父母沒有最基本的育兒常識所給與兒童的害處。

爲了第四種活動——社會義務的執行——需要歷史的研究。這不應該是帝皇的、戰爭的、宮廷陰謀等的歷史。必需研究「社會的自然史」，也就是說，研究社會進步的現象。斯賓塞認爲這樣了解下的歷史應該是敘述的社會學。

末了，爲了最後一種的人類活動——餘暇——就需要「自然、文學及藝術享受」所給與的一切。斯賓塞說，沒有繪畫、彫刻、音樂、詩歌、生命就失掉了它的極大部份的魅力。但是斯賓塞雖然這樣讚美藝術，他對於藝術的態度却是散文式的：這是以藝術來消磨餘暇的事業家的態度。

這裡可以看到，斯賓塞的中等教育的內容是包括了很大的學科範圍的。其中佔了最大的比重的是數學和自然科學，也就是所謂精密科學。斯賓塞是實科的中等教育的熱烈的擁護者，他曾在十九世紀下半期自由主義的市民階級爭取實科中學與古典中學的平權鬥爭中起了極大的作用。

只要一看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中等學校是純粹古典中學的事實，就可以估計斯賓塞在這一爭取實科中學的鬥爭中的意義了。西歐各國的實科中學雖然已經得到了存在的權利，却沒有獲得與古典中學平等權利的承認。

斯賓塞的積極意義，是在這普通的實科教育的權利的擁護上，在這一教育與工業發展的密切聯系的



指示上。斯賓塞所提出那份科學總目錄（除教育學與心理學以外）已經列在歐美各國的實科中學的課程表裡了。

但是斯賓塞關於教育內容的見解的最大的缺點，是他的功利主義。世界觀及一般的智力發展問題在斯賓塞的教育學中都是退到了次要的位置。

斯賓塞對教授方法問題雖然給與極大的注意，却沒有像海爾巴德和第斯多惠那樣提出了具體的指示。

## 教授方法

他的意見只限於一般的方法論趨勢的指示。

他激烈的反對機械的背誦，反對當時中學校中（尤其是英國古典中學校中）所盛行的形式主義和經院主義。斯賓塞要求教授建立在學生的自動性之上，提出興趣在教授過程中的極大的作用。教授應該由簡單的進到複雜的，由不定的進到一定的。由模糊的概念進到完全的和確實的認識。

這一反對形式主義，反對經院主義，反對教條主義的抗議，這一學生自動性的要求——就是斯賓塞方法論見解上的積極方面。但在這些要求中，斯賓塞在盧梭、裴斯塔羅齊和第斯多惠以後並沒有提出獨創的東西，第二，這些見解的理論根據和具體實施方法都是不正確的，是站在純粹的個人主義和赤裸裸的經驗論的立場上的，是帶了完全不能接受的誇張性的。例如斯賓塞籠統的否定一切背誦，反對規則的暗記，反對對兒童教授文法。

斯賓塞要求兒童的教授由觀察的方法開始，然後逐漸的進到概括，着重指出兒童的個人經驗是最主要的教授工具，並介紹教授的方法主要應該是啓發和「自我發展」，因此在他的方法論中就過份估低了人類的歷史經驗，降低了教師的領導作用。

斯賓塞提出了學生「內部滿足」的原則作為最重要的教授方法的原則之一。他認為教授應該遵循一個一般的法則：「在正常的條件下，有效的行動都是愉快的；而引起痛苦的行動都是無效果的」。這真



是一個可疑的「法則」！這裡可以看出，斯賓塞和他的實證主義爲後來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鋪了道路，實用主義教育學就是以「內部滿足」爲真理的基本標準的。斯賓塞從這一個原則出發，要求教師在教授上以學生的興趣爲出發點——這是破壞了教授的系统性和插進了自發性要素的不正確的教授原則。我們考慮兒童的興趣，但不應該以這些興趣爲出發點。

斯賓塞的許多方法上的見解，他「把教育變爲自我發展過程」的要求，他的兒童個人經驗的提示，是和盧梭的見解相似的。但斯賓塞和盧梭之間存在着極大的區別：盧梭的原則是在完全另一個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提出的，它的目的是在反對當時——十八世紀——最盛行的封建的經院主義的學校；盧梭的教育體系在歷史上曾在這一時期起過進步的作用。斯賓塞已生活在另一個條件下；他的方法上的見解是盧梭不正確指示的市民階級自由主義的翻版，他抽去了盧梭體系中所包含的寶貴的民主內容。

## 道德教育

在「智力、道德和體育教育」一書中，關於道德教育的一章沒有說到道德的內容。整個的「道德教育」一章只是證明「自然後果」的原則的適用，就是說，只說到紀律。斯賓塞所了解的道德的內容因此要在他的「倫理學原理」中去探尋。

斯賓塞企圖建立「進化的倫理學」。他已經在動物世界裏找到了「倫理學」，然後又在人間探尋道德的發展。他的道德公式簡單地說來是這樣的：「凡是有助於種族自保的行爲，都是好的行爲；這種好的行爲如果同時以改進本身個人，改進他的後裔和他的同胞的生活爲目的，那就成了最好的行爲」（註）。斯賓塞提出個人自保爲最主要的道德原則，認爲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必須調和。因此，斯賓塞在說到道德的發展時，就展開了他的杜撰的進化論圖式：

(一) 利己主義（集中），

(註) Spencer Principles of Ethics S B



(二) 利他主義 (分化) 。

(三) 作爲最高的道德階段——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的調和、平衡。

在紀律方面，斯賓塞反對懲罰，而熱烈的宣傳自然後果的原則。在這一原則的應用上，他遵循着他的進化理論。

「必須從我們所擁護的體系中產生一種自由主義的家庭管理方式，這種方式不在專制地約束兒童的各種行爲。我們的兒童永遠會體驗他們的行動的後果，你們不必採用多餘的管束，像許多父母所做的那樣」。

但因爲在過於幼少的兒童中不能採用自然後果的紀律（不能對玩弄開口刺刀的三歲小孩採用「認識自然後果」的紀律），所以斯賓塞認爲在過於幼少的兒童中要有極大部份的專制主義。「要把我們家庭管理的歷史以縮小的形式去重覆我們政治管理的歷史」；起初是專制主義，而後來是日益擴大的立憲主義。

## 體育教育

斯賓塞把體育教育的必要性基因於（一）每一個個人的利益——他的幸福，和（二）現代生活中的日益擴大的競爭。在他的公式中非常明白的表現了體育教育目的的市民階級性。「不但戰爭的結局憑藉於兵士的力量和勇氣，甚至商業都是部份地依賴於它的生產者的身體的忍耐力。因此爲了未來的鬥爭就要使兒童的教育適應於這樣的目標，不但在智力上訓練他們，而且在體力上訓練他們」。

在飲食問題上，斯賓塞反對食物量和質的過份節制和簡陋。他認爲有滋養的飲食不但對於兒童的有機體工作而且對於他們的發育是必需的。

斯賓塞對體育鍛鍊是很重視的，他認爲遊戲和競技比體操更爲重要。女童須和男童同樣參加體育鍛鍊。



末了關於青年智力的過度疲勞問題，斯賓塞曾有詳細的說明。他認為現代的生活和生活競爭，要求人類的緊張的勞力。父母給與兒童的有機體是薄弱的，這個有機體又在過度的智力工作中受到削弱。兒童往往被迫從學校中得到體力消耗的後果。往往在教室中暈倒，功課的負擔既這樣重大，而教師的要求又極端苛刻，以致學生不得不在一天中以十二三個小時埋頭於智力工作。斯賓塞要求制止這種智力過度疲勞的現象。

在斯賓塞所提出的建立男女兒童的良好體育教育的要求中，在他關於建立體育教育的許多具體的指示中（歐洲大陸各國的中等學校對於體育教育是很少注意的），包含了許多寶貴的成份（如果把市民階級的論據拋去的話）。

斯賓塞的教育觀，尤其是他的實科教育的宣傳，在當時曾起過極大的作用。但在他的教育觀中，也像在他的社會學和政治觀中一樣，反映着強烈的市民階級的限制性。

在斯賓塞的教育觀中，已經沒有前一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教育學中所包含的那些進步特徵了，也沒有我們在夸美紐斯、裴斯塔羅齊、海爾巴德和第斯多惠那裏所看到的學校工作的概括了。



## 第十九章 十九世紀五十一—六十年代的歐美學校

### 一·法國學校

#### 法勞的法案

#### • 初等學校

在一八四八年工人起義被壓平以後，保守的市民階級就在一切生活領域裏開始推行各種逆流的計劃。

市民階級對參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教師施以殘酷的報復。在幾星期之內，解雇了六百個教師。自由主義的教授被逐出大學。

一八五〇年三月十五日，第二共和國的立法會議通過了保守的教育大臣法勞所提出的關於國民教育的法案，這個法案把法國一切學校交到僧侶階級的手裏。

一八五〇年的法勞法案，開始了對師範學校（訓練國民教師的教育學院）的壓迫的時期。國民教師開始受僧侶監視。在教師的空位的填補上，優先權是留給僧侶階級，宗教兄弟會的會員的。教職的委任權是屬於教會組織的。宗教聖會開辦了許多自己的學校。

四個主教參加最高的國民教育會議的機構。許多政府官員——總監督官、中學監督官、小學校監督官——對教師和教育活動建立了嚴密的監視。此外，市長，當地地主所委任的「州代表」，和每一省的警察總長，也有學校監督的權利。

在路易、波那帕特政變和「第二帝國」成立（一八五二年）以後，這一保守的法勞法案經過了一次修改，使法國學校事業更加惡化了：政府對學校的監督權加強了；最高國民教育會議的全體成員改由皇帝委任；地方自治機關完全被剝奪了教師的委任權。



代替了一八四八年革命時代加爾諾部長所訂定的廣泛的課程範圍，小學的課程只限於宗教、閱讀、書法和算術。神學佔了主要的地位。小學教師的物質狀況更惡劣了。

一千個以上的地方自治體完全沒有學校，兩千個左右的地方自治體利用鄰區的學校。因此六十萬以上的兒童就被學校拋出門外了。

## 中學

這一時期的法國中等學校一部份是由政府經營的（官立中學），一部份是由地方自治體經營的（專門學校）。官立中學有八級，分人文科和實科兩部。專門學校是一種尚未定形的學校，其中有許多還沒有學級的定數，課程通常是比官立中學為低。

在教授上（無論在小學和中學中），背誦佔了極大的地位：學生要背誦整整幾頁的書。學校所注意的與其說是兒童的教育，不如說是兒童的馴養，他們的宗教精神和僧侶主義的培養。

法國學校在整個第二帝國時期中渡過了悲慘的時代。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前夜，它完全是在教會和警察的手裏。

## 二、德國學校

### 一八五四年 的學校法令 。國民學校

在德國，十九世紀的五十—六十年代也是殘酷的逆流時期。一八四八年革命在第二年就被壓平了，它在學校事業上的一切成就也被取消了。這裏也像在法國一樣，開始迫害參加革命的國民教師。威廉四世在師範中學校長教員會議上，發表了一篇粗莽到無禮程度的演說：「過去一年所發展的一切災害，都是你們而且只有你們的過失。

這是虛偽的教育，虛偽的哲理推究的過失；你們藉這種教育，腐蝕了我的國民靈魂中的信仰和信心，使他們的心轉到別處。像孔雀誇耀它的羽毛一樣，你們所誇耀的這種虛偽的教育，當我還是在皇子的時候就被我恨入靈魂的深處，我會盡我的全力去制止它。我現在還是堅定的站在同一條道路。



，任何地上的力量都不能強迫我離開這條路……當舵還握在我的手裏的時候，我善於制止這種醜惡和背理的事實」。

普魯士政府在壓平革命以後，從一八四九年就加強了對學校的壓迫。學校據同時代人的描寫是已經「上了枷鎖」了。

一八五四年十月頒佈了一個學校法令，把國民學校向後拋擲了幾乎一百年。

這個法令要求把國民的生活和學校建築在基督教精神的基礎上。小學課程限於下列各科：

一、宗教——每週六小時。「基督兒童（法令上說）應該體驗聖經的歷史」。他應該背誦五十二節禮拜福音，精通宗教問答，學會各種讚美詩，三四十首祈禱文，大約一百五十隻聖經故事，大約一百八十篇聖書原文。

二、讀本、德文和書法——每週十二小時。德文的學習也是建築在機械背誦之上。兒童應熟悉拼字法，但理論上的文法知識却被認為是多餘的。（*Theoretische Kenntniss der Grammatik wird von den Kindern nicht erfordert*）。

三、計算——每週五小時；注意正確的文字及口頭計算。

四、唱歌——每週三小時；兒童應練習最通用的教會的和愛國的歌曲。（*Die gebräuchlichen Kirchengesammlungen und eine möglichst reiche Anzahl guter Volkslieder, wobei besonders die Vaterlandslieder zu berücksichtigen sind*）。

國民學校被課與的任務是教育忠實的教會子孫，服從的臣民，未來的兵士和模範的家庭父親。

在教授方法中，所有以發展兒童創造性為目的的一切方法都被取消，裴斯塔羅齊的發展兒童思維的要求受了駁斥。留下來的和極度加強了的是背誦。

在師範中學的課程表中，取消了心理學、教育學（*in dem Seminar ist kein System der Pädagogik*）。



zu lehren auch nicht in Populärer Form)、教育方法、而以政府的法令和佈告的研究（取名爲「學校學」）來代替它們。師範中學給與未來教師的普通教育知識的容量是大大的縮小了；文學取消了，數學只限於算術了。

② 一八五四年的法令是普魯士政府反對德國教師的民主努力，反對裴斯塔羅齊學說及其相關聯的大規模的方法運動的明顯表現。

## 中學

一八四八年革命壓平後的保守勢力的發展，引起了中學校中的文法古典主義的加強和身分制度的發展。政府對新人文主義的殘餘展開了鬥爭；宣佈新人文主義是反基督教的和反教會的。古典中學中的自然科學被大大的縮減了。

但工業的發展及其相關聯的對於實科教育的需要，不容許政府把所有中學都變成十六世紀末葉的中學。德意志各國政府不得不和古典中學並行地給了實科中學以發展的地位。

根據一八五九年的實科中學的法令，實科中學分爲一等實科中學（九年制，授拉丁文），二等實科中學（八年制，不授拉丁文），和城市實科中學（六年制）三種。

在一等實科中學中，依授課時間的數說，數學佔第一位，其次是拉丁文、自然、德文、法文、圖畫、歷史、地理、神學等等。

## 三、英國學校

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在學校事業上遠比大陸各國落後。對於英國，十九世紀五十一六十年代是國家對學校發展的影響繼續加強的時期。在憲章運動的壓迫下，國家對學校的補助增加了。在一八五八年，國家的補助金已達四十三萬一千英鎊，比一八五〇年增加兩倍以上；一八七〇年國家對學校的補助金的數額增加到九十萬英鎊。



雖然由於這些措施的結果學校事業有了相當的改進，而英國的初等學校（大部份是慈善設施）繼續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這種英國學校尤其是工廠學校的水準的低落，是爲國會專門委員會的學校調查報告所確証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曾利用了這個委員會的報告，引了許多英國學校貧弱狀態的證據。

馬克思指出礦工們要求一個兒童義務教育的法令。他引了工人回答六十年代國會委員會的問題的原文說：

——城郊一帶的學校够嗎？——國會委員會問工人。

——不够，——工人們回答。

——如果國家要把所有的兒童都送進學校去，有這樣多的學校讓兒童去進嗎？

——我以爲（一個工人回答），如果情形改良，學校就會增設起來的。

國會委員會結束了它的拖延許多年的調查工作之後，發現了甚至在工業中心裡國民教育的極端悲慘的狀態，和工人羣衆的教育要求的極大的增長。雖然初等學校迅速改善的必要是符合於工業的需要，而當權的保守派還是竭力阻礙初等學校的發展。

只有到了一八六八年，當那代表工業市民階級利益的自由主義者在國會選舉中佔了絕大多數的時候，學校事業的推進纔比較的迅速。一八七〇年頒佈了一個基本的初等教育法案（Elementary Education Bill），這個法案爲英國國民學校奠定了基礎。

這個法案雖然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但正如市民階級的教育史家自己所承認（註），它是調和的法案

（註）例如 Cubberley 在「教育史」（The History of Education）中說：「一八七〇年提出和通過了一個調和的法案」。



：它沒有消滅「自由學校」的體系，但又並行地建立了所謂公立學校的體系。

依照這一個法案，在學校數量不足的地方，以選舉的方式建立學校委員會（School Boards），負責注意學校開辦及經營，實施本區五歲至十三歲兒童的普遍義務教育的權利是屬於委員會的。委員會能確定學費的數額，但必須免除貧民的學費。國家在學校監督的條件下補助這些學校。公立學校所接收的學生應不分宗教信仰。

委員會有權在相當限度內舉辦地方的學校稅。

公立學校的數量在一八七〇年以後迅速的增加了。

在教授方法上，英國初等學校在二十年中因為始終是慈善學校的緣故所以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可以指出的只是十九世紀上半期所盛行的監督生制度（倍爾—蘭開斯特制度）逐漸的消滅。少數互助學校保存到一八六七年。

英國的中學在五十一六十年代也像在十九世紀初期一樣是極端保守的。

這些學校不受國家的控制。宗教和古代語文在課程中佔極大的地位。

只要一看一八六一年伊頓學校的授課時間表：每級（共有六級）每天二—三個小時授拉丁文及希臘文，數學佔較小的地位，歷史及地理佔更小的地位——就可以知道為貴族階級和工商階級而設立的中等學校的課程和教育性質，在一百五十年中的變化程度是怎樣的小了。

英國中等學校對體育教育（遊戲、競技）以及對性格、自制、自動的訓練是很注意的。

工業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長，自然科學的成就，日益擴大的提出了中學實科教育的問題。我們知道，這一問題是被斯賓塞尖銳的提出來的。

在整個十九世紀期間，尤其是在五十一六十年代，產生了許多各種社團開辦和經營的學校，也產生了許多以實科教育為目標的私立學校，以及除了人文科的部門以外更有普遍教育的實科部門或職業性部



門（如商業班、工程部等等）的私立學校。

#### 四。美國學校

五十一六十年代是學校數量迅速增加，各州開始實施普遍義務教育和全國教育局組織的時期（過去各州的工作是不在聯邦規模內處理的）。

公立小學的學生總數到一八七〇年時已達七五六一五八二人，佔五歲至十八歲兒童總數的百分之六一·五（或佔全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七·八）。

教師的總數到一八七〇年時已達二十萬人，其中女子佔百分之六一·三。

第一個普遍義務教育的法令是一八五二年在馬薩諸塞州頒佈的（由於荷拉斯·曼的活動，該州的國民教育水準從三十年代起就已在其他各州之上）。到一八七〇年，同樣的法令已在十個以上的州裡實施了。

給了公立學校的發展以強有力的刺戟的是聯邦政府所分給的公有地，從一八五三年起每年又給與大量的金錢補助。以附加所得稅的形式所征收的學校稅也有極大的意義。

在五十一六十年代，大多數州的學校體系是由三年制的初等學校（爲六歲至九歲兒童而設），五年制的文法學校（九—十四歲）和準備升大學的三—四年制的中學（稱高等學校 High school）所構成的。

無論在文法學校和「高等」學校中，由於地方分權的結果，授課計劃和課程內容是極端複雜的。但在這種雜色的情形下，有一個共同的實科中學教育傾向（數學、自然、地理、現代語言，圖畫）。尤其是對圖畫和製圖給了極大的意義，因爲這些科目是和工程技術人員的訓練有關的。許多學校除了普通教育的科目以外更添授職業科目（簿記、商品學、工藝學等等）。選科是很普遍的。

學校中廣泛的應用實物教授。在教育理論中，給了中等學校影響最大的是海爾巴德的體系（他的進



步的方面)。斯賓塞的體系是在六十年代末期開始流行的。

一八六七年組織了全國教育局。但它沒有行政上的實權，它的工作只限於搜集各州的學校統計資料和研究這些資料，公佈新的方法和教育上的發現，召集會議等等。但是這一個教育局作爲評估某種學校措施、方法、體系等等的管轄機關的作用，却是很大的。



## 第二十章 十九世紀初葉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

### 教育思想

#### 一、空想社會主義的特徵

工業革命和十八世紀法國市民階級革命以後所建立的資本主義制度，很快的已經暴露了它的否定的方面。「英吉利手織工人漸次的消滅（那曾在再數十年之久，至一八三八年才算完全），是世界史上的一幕空前可怕的悲劇。其中，有許多是餓死的，有許多是長期間每日以二個半便士養活一家的」（資本論第一卷）。

由於機器代替手工勞動的結果，可怕的失業現象就發展了。工人的榨取加強了，工作時間延長了，到二十世紀初已延長到十四—十五小時。廣泛的採用低工資的婦女和兒童勞動。

恩格斯在「反杜林」中，給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初幾十年的情形一個明白的特寫。

「建築於資本主義基礎之上的工業的迅速發展，馬上引起了工人群眾對於社會生存必需條件的貧困與窮乏……革命的箴言「博愛」是在詭計和競爭敵視中實現的。賄賂代替了暴力的壓迫，金錢代替了尖槍，成爲社會權力的主要來源。「初夜權」從封建領主轉於有錢的廠主。賣淫的廣佈，爲以前所未有……總而言之，和法國啓蒙學派所作的華美的約言相較，「理性的勝利」所造成的社會及政治制度，祇是一幅引人深刻失望的諷刺畫。所缺少的，祇是寫定這種失望情形的人罷了；可是這種人，在新世紀來到時，也就出現了。在一八〇二年，出版了聖西門的「日內瓦書簡」；在一八〇八年，出版了傅立葉的



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的基礎，在一七九九年時是已經規定的了；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歐文接收了紐蘭納克工廠的管理」（註）。

十九世紀的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傅立葉和聖西門曾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燦爛的批評，他們指出了這一制度的矛盾，其中充滿了競爭，不生產者的盜用人類勞動，工人的榨取。他們明白，勞動在這個社會裡是「人的呪咀」，因為它是建築在貧困，壓迫和飢餓之上的。他們指出了資本在少數人手裏的集中和其餘勞動人民的困貧。

空想社會主義者在批評資本主義制度時，提出了未來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他們認為在這一制度下，生產是社會化的，人對人不再有剝削。

可是空想社會主義在提出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時，由於勞工階級還不夠發展的結果，沒有達到社會鬥爭和社會革命是轉向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方法的概念；他們沒有看到能夠實現這一社會的唯一階級是勞工階級。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慈仁的僧侶和善良的商人之上；傅立葉請企業家捐款建築社會主義的自治團體。

像十八世紀的哲學家一樣，空想社會主義者對社會現像也是保持着唯心論的觀點，他們認為「意見統治世界」，認為要轉向到新的制度，先要充分開化人的智慧。自然，教育的作用就被一切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是非常重大了。

像法國唯物論者一樣，空想社會主義者對於環境也是給了重大的意義，重視環境對於人的影響。當需要對神學家的把人類看做神的創造物的見解做鬥爭時，法國唯物論者和——稍後——空想社會主義者把人類看作環境的產物的學說是一個重大進步。這個學說第一次把人的唯物的解釋和人的唯心的解釋

（註）馬恩文第十四卷第二五九—二六〇頁。



置於對立的地位。但這是機械的唯物論。在這樣的見解之下，人不過是週圍環境的消極的產物，而不是積極的人——一方面受環境影響，同時又能改變環境，並在這一積極對環境的影響過程中改造自己的本性的人。

## 二·傅立葉的教育觀

「文明制度」和  
市民階級教育的  
批評。調和制度  
中的生活和教育

傅立葉 (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 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辛辣的批評。他指出了競爭，資本在少數人手裡的集中，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矛盾，商品生產的過程等等。在這個資本主義制度裏 (傅立葉諷刺地稱它爲「文明制度」)，「一種人的幸福是建築在另一種人的不幸之上的」。依照恩格斯的描寫，傅立葉不但是個批評家，而且是一個諷刺家，甚至是古今最大的諷刺家之一。「他無情地揭穿市民階級世界的整個物質上和精神上的貧困……」。

「他證明文明社會，是運行於『罪惡的循環』之中，運行於矛盾之中，它 (文明) 自己永遠產生着新的矛盾，而沒有能力來把它們戰勝，所以它所達到的，總與它所希望的相反，或是落在它所希望的目的之外。所以我們看到，『在文明社會中，貧窮從過剩中產生出來』。因之我們可以看到，傅立葉也和他的同時代的黑格爾一樣，巧妙地應用着辯證法」 (註)。

傅立葉對「文明制度」中的教育的批評是很注意的。兒童的教育在這一制度中只是迎合社會的輿論來損毀教育，是建築在強制之上，完全不顧到兒童的天性的。這一教育對於體育發展是絲毫不注意的。理論在教育中統治在實踐之上。兒童從幼年起就被幽閉在學校——監獄。現代的制度剝奪學習的一切樂



趣，不去發展兒童的研究興趣，只是利用懲罰和壓迫來強迫兒童學習的。教師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間的親切和率直，信任的關係。對於勞動教育的要素也是不注意的。

傅立葉認為必需代替「文明制度」，建立一種調和的制度，人們在這裡生活在社會主義的共同體（Phalange）之內，每個共同體有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共同體的一切成員都參加勞動。生產是社會化的。共同體擁有一大塊的土地。土地的中心是一個大的建築物（Phalanster），裏面有住宅，休息室，食堂，科學研究室，兒童教育機關，工場。傅立葉認為可以向了解新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企業家籌募這種共同體的組織經費。

自然界裏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因此傅立葉認為在社會中也不應該和不能夠有平等。勞動的產物要在勞動，資本和才智的參加者之間分配。產品的十二分之五分與勞動，十二分之四分與資本，十二分之三分與才智。由於勞動的履行，由於對共同體的投資，由於才智設計，共同體的一切成員同樣可以自己的報酬。

我們在考察法國唯物論哲學者的教育觀的時候，知道海爾盧西從他的輿論出發，認為人的熱情是教育的主要推動力。傅立葉襲取了這一理論並加以發揮。依照傅立葉的見解，感情在人的生命起了主要的作用。感情是人的生活 and 活動的積極的運動的基礎。傅立葉發揮這一套的感情吸引和推進的理論，認為感情在社會生活中的意義像萬有引力的法則在自然生命中的意義一樣。這一「感情吸引和推進」的理論，會被傅立葉在調和制度的教育建築中多次地利用。

依照傅立葉的見解，這一制度中的教育（「調和教育」）是以發展兒童的天然性癖和本能，使每一個人能適應於自然所課予的使命為目的。

傅立葉對教育問題的各種見解主要是在「一般統一論」和「新工業世界」兩部書裏發揮的。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一方面是發展人的工業習慣和傾向，另一方面是發展和加強社會的感覺，訓練社會生活的



工作者。教育應該把人類引向幸福，而幸福是在兩個條件下可能的：就是財富和健康。因此就必須發展兒童的健康，力量，敏捷，也就是給與良好的體育教育，而因為財富是勞動所創造的，所以又要發展兒童的工業習性，使他們認識各種種類的勞動。因為正確的生產方式只有在調和制度下是可能的，所以就必需發展人類的聯合的傾向，社會的感覺，集體主義，以代替現在用暴力方式注入人類頭腦中的個人主義的傾向。

傅立葉認為教育的最主要的工具是工業勞動，因為這種勞動能够發展人的體力和智力，發展人的社會合羣精神。

教育和科學是必需的，但「學習必需以工業勞動中所發生的好奇心為基礎；學校的課程應該和工場和田場中的工作有直接聯系，應該解答這些工作中所提出的問題」。

傅立葉是家庭教育的堅決的反對者，他熱烈的證明在同年齡的兒童中，在勞動環境中進行社會教育的優點。

### 顧到兒童年齡上的特殊性

傅立葉要求教育家顧到兒童年齡上的特殊性。他認為這些特殊性就是活潑、好動、傾向於宣鬧工作、模倣、以及由弱轉強的進步努力。傅立葉在他的教育體系中努力利用兒童年齡上的這些特殊性。

除了這些普通特徵以外，傅立葉更細分年齡為幾個集團。他把三歲以前的兒童分為三類：（一）從出生到一歲；（二）從一歲到二歲；（三）從二歲到三歲。他把更長大的兒童分為：（一）由三歲到四歲半；（二）由四歲半到六歲半；（三）由六歲半到九歲，以後每段加半歲。每一段年齡給與一個有特徵的，往往極奇怪的名稱。

### 幼年兒童的教育

除了年齡上的劃分以外，幼年的兒童還應該依照他們的氣質來加以分類。例如，哺乳的兒童分為安靜的（*pacifiques*），不安靜的和惡魔的（*diaboliques*）三



種。

每一類的兒童在教育機關中應有特殊的房間：看護每一類兒童的嫗母應該依照性格來分配：忍耐心最小的嫗母看護安靜的兒童；最安靜的嫗母看護「惡魔」的兒童。嫗母的職務是社會主義共同體中的社會工作之一。這個職務是由最愛護兒童的婦女來負擔的。母親只有在喂奶的幾小時裏是和兒童在一起的；母親不在的時候有補充的乳母（也是社會職務之一）。兒童由醫生監視，醫生不是依病人的數量而是依健康人的數量來取得報酬的，因此他極端有利於兒童的健康。

### 體育與勞動 教育。工場

兒童從三歲起，就被送到小工場，利用小工具在他們的五歲同伴幫助下工作。兒童所特有的模倣的性癖和競爭的精神強迫他們認識許多勞動過程。

傅立葉詳細的指示各種可以在兒童中發展「工業聖火」的方法。這些方法有：舒適的工場環境，徽章，參加遊行和演習，依照每一個人的興趣和能力選擇各種手工業的可能性，年齡較大的兒童的模範，同一年齡的兒童間的競賽。

每一類的兒童有適應於年齡的特殊的工作和適應於年齡的生產工具。

傅立葉又詳細的指出兒童環境的教育意義。兒童會使落後的適應於自己。

幼年期兒童的整個教育歸結起來就是體育的發展，加強健康和鍛鍊工業活動所必需的敏捷和靈活。傅立葉像盧梭一樣，指出兒童過早的智慧發展的害處：不要把六歲的兒童變成埋頭於學術研究的學者；兒童在這一年齡上所要發展的是熟練和敏捷的工作能力，「不要延緩但也不要加快智慧的發展」。

### 感覺器官的教育。 美國教育

在兒童工場中開始的教育繼續實施於歌劇院和廚房。傅立葉挑選這兩個不尋常的教育工具是因爲鑒於兒童感覺器官發展的必需，傅立葉認爲兒童最常用的感覺器官是味覺和嗅覺（在廚房），視覺和聽覺（在歌劇院）。而兒童的天然性癖就是由這裏引起的（感情吸引和推進的理論）。



傅立葉指出，在歌劇院中有幾種藝術的結合：唱歌、音樂、舞蹈、繪畫、戲劇藝術。兒童在這裡同時得到體育、道德和美學教育。歌劇院訓練兒童把他們的運動和活動服從於一般的調和，歌劇院是協調和紀律的最好的學校。

最後，傅立葉認為參加歌劇活動在勞動教育的意義上有極大的意義：它可以發展韻律，而韻律在工

作上有重大的意義。

傅立葉因為生活在工業還沒有充份發展的時代，他認為農業是經濟生活的基礎。因為農業生產產品的最後加工是在廚房裏進行的，他就認為廚房是最重要的教育工具之一。傅立葉指出，在廚房裡可以發展感覺器官——味覺和嗅覺。這兩種器官的發展向來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傅立葉認為在廚房裏的工作提供了許多教育材料（動植物的實物研究、衛生常識等等）。

在這些論斷中，如果拿它們比較一般的形式——教育原則——來觀察，我們就看到實物教授的思想，使兒童對學習發生興趣的要求，顧到兒童年齡上的特殊性，學習的漸進性和適應能力的要求，以及發展外感覺器官的思想。傅立葉特別強調發展兒童的社會感覺和集體工作技能的必要。

傅立葉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地方說到新的科學，說到現實的知識，而沒有說到和他同時代的經院主義學校所給與的東西。但這一切論斷都是倉卒性的。他雖然很詳細的提出工場、廚房和歌劇院所供給的教育的計劃、根據和結果，却沒有畫出一幅社會主義共同體裡的學校教育的全景。

「學問應該佔第二位；學問應以工業勞作中所發生的好奇心為根據」——傅立葉說。「教育應該由工業的工作開始，現代的制度是在引導兒童實際工作之前先把兒童變成幾何學家或化學家，這是再沒有更惡劣的制度了」。

### 兒童的組織

傅立葉對兒童的組織問題是很注意的。他規定兩種型類的組織——「少年羣」和「少年黨」，四歲半至十五歲半的男女兒童都加入組織。傅立葉從他的「感情吸引論



「出發，認為在兒童中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偏向。一種兒童歡喜冒險，歡喜喧鬧的工作，和活動。像這樣的兒童傅立葉認為約佔男童的三分之二和女童的三分之一。這些兒童按性辯說應該編入「少年群」。其餘的兒童（約佔女童三分之二和男童三分之一）發展着另一種性癖：這是夢想家的兒童，是安靜、綺麗、愛好美麗外表的兒童。他們應該編入「少年黨」。

傅立葉利用兒童的偏向來滿足社會的需要，指出少年羣將來在社會上担任不潔的，不快的和危險的工作（如搬運垃圾、清洗陰溝、消滅農業上的危害物的工作）。

少年黨適應着它的審美的偏向，要擔任栽培花木，裝飾公共建築物 and 食堂，保護植物，注意語言的純潔和語法的工作。

所以，傅立葉在某些特殊的形式中，說到兒童組織問題時，又強調了社會精神的教育，並在教育史中第一次提出兒童社會實際工作的思想。

在傅立葉的教育觀中，我們看到許多寶貴的思想。尤其值得驚異的是他的觀察兒童特徵的能力。兒童特殊性的考慮要求，兒童創作的發展要求都是很寶貴的。傅立葉第一次所作的對市民階級教育的批評是深刻而正確的。在他的教育學中堅決要求社會的同志合作的教育，要求勞動教育，並指出了社會教育的優點。傅立葉第一個詳細地發揮了兒童組織和兒童社會工作的思想。

但除了這些以外還要指出傅立葉對智力教育問題的缺乏研究和在他的計劃中沒有學校教育的體系。

### 三·聖西門和聖西門派的教育觀

聖西門 (Claude Henri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 建立了歷史規律和進

#### 社會觀

步概念，指出整個的人類歷史是人對人的一種榨取形式代替另一種榨取形式；並指出政治制度、人的世界觀和道德的概念是為私有制的存在及其各種不同的形式所決定的：「人的



良心永遠是和各種不同的財產狀態相調和的」。

聖西門認為應該代替現存的制度另建一個新的聯合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中，人對人的榨取將被人對自然的榨取所代替，人類將達到普遍的合作，寄生的貴族要消滅，學術和工程將有極大的意義。「普遍的聯合——是我們的未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這是新的法律，這個法律要代替掠奪的法律。人不再剝削人；人類要互相聯合，去剝削整個世界」。

聖西門甚至觸到了這樣的思想：一個社會制度對另一個社會制度的代替，是用震盪和破壞的方法來實現的。雖然如此，經他對社會和對歷史的觀點上說來，聖西門是一個唯心論者。聖西門認為政治的體系是由人類理性進步的結果而發生的。未來的聯合制度應該要來到的，因為這是唯一理性的制度。聖西門認為工業的發展和人類對自然的權利的發展就是知識應用的結果。

未來的社會據聖西門派的想像是一種制度：生產工具為社會公有，生產本身是密切適應社會的需要而進行的；沒有生產過剩和工業恐慌。

這一社會的全部生活是依照嚴格的社會等級的形式組織起來的。這一堅固的政權的使命就是調整生產。

合理化的宗教、道德和秩序，是被聖西門派同等看待的。他們認為未來的宗教是團結人類的工具，是人類的集體思想的表現，是人類社會的一切行動的指導者。領導社會的人是最能愛護人羣，最有教育，善於把科學和工業，理論和實踐，過去和未來配合起來的人。

### 教育觀

「在最普通的意義上，教育這一個字，應該了解為一切努力的總合，這一切努力，是每一個新的一代為了適應人類的進步運動所號召的那個社會制度而應用的」——這是聖西門派對教育所下的定義。聖西門和聖西門派雖然說了許多關於教育作用的話，但他們對教育的了解還是相當消極的：他們只說到青年人應該適應未來的理性的制度，却沒有強調教育作為人類改



造過程的積極意義。

他們把教育分爲（一）普通或道德教育，（二）專門教育。聖西門和他的信徒對過去的教育作了尖銳的批評，指出不但在封建統治時期，甚至在法國革命勝利以後，「教育還是不能爲大多數人所接近」。和這種教育相對，在新的聯合制度中，教育「要爲一切人都能接近，不分出身或財富狀況，教育要依照每一個人的能力和使命來授與」。

所以，聖西門派就提出了各級教育完全開放的原則。

初等教育是爲一切人而設的，對於一切人是同樣的。初等學校是普通教育的學校；教授未來科學研究所必需的一切學科。初等學校的主要注意目標爲教德教育。道德教育的主導思想是反對利己主義的利益，培植社會合作精神，發展對人群的愛。這種道德教育「必需有政治的和社會的性質」，並以理智和感情爲基礎。

每一個人的使命、興趣和偏向，是在初等學校的「道德」教育過程中決定的。

這種道德教育適應於社會中的三個集團劃分：（一）道德家、也就是藝術和新宗教的活動家，聖西門稱他們爲「藝術家」；（二）學問家；（三）工業家。

由此就需要繼承普通教育之後的三種中等的「專門」學校：（一）實施人文科的預備訓練的美術與道德學校；（二）作爲學術活動（主要是數學與自然科學活動）的準備階段的科學學校；和（三）訓練工業人材的工業學校。繼這些中等學校之後，則有適應社會的各種活動而實施高深的專門教育的應用學校（高等學校）。

聖西門派對科學和工業的發展是很重視的，他們詳細地訂定「專門」教育——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所應依據的原則。他們指出，這一教育應該（一）包容現代一切的人類知識；（二）「把科學上的一切成就，由理論轉到實踐，由完成科學的學者，轉到教授科學的學者，然後又由後者轉到直接實際應



用科學的人」；（三）專門教育應該包容社會必需的一切職業；（四）各種等級的學校應該互相繼承地聯系起來。

所以，聖西門派的教育思想的特徵，就是：（一）社會教育的思想（作為發展社會精神的道德教育；作為訓練社會必需的一切職業的教育）；（二）初等教育的普遍性和各級學校教育的開放原則；（三）單一學校的思想；（四）兒童入專門學校前的能力和個人偏向的考慮；（五）學校與生活聯系，理論與實踐聯系；（六）重視學校和系統教育的意義。

#### 四· 歐文的教育觀和實際教育活動

##### 歐文在紐蘭 納克的實際 教育活動

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從一八〇〇年起擔任蘇格蘭紐蘭納克地方的一个大紡織廠（有二千五百個工人）的廠長。在歐文接辦以前，這個工廠的工作條件是和當時其他工廠一樣的。工作時間延長到十三—十四小時，工資是極低的，住宅條件是污穢的，工人的文化水準和道德水準是極低的：在工人區裏統治着狂飲、淫蕩、盜竊。

在歐文以前，廠中廣泛的採用童工；其中有很多只有六七歲。

歐文根據每一個人為週圍環境的產物的原則，企圖改善工人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他把工作時間減為十小時半，把工資提高，不准十歲以下的兒童做工，並為已在廠中的十歲以下的兒童設立幼稚園和學校。在工廠缺乏原料而臨時停工的時期，歐文繼續付給工人的工資。經過幾年以後，紐蘭納克就成了一個不容易認識的地方了。歐文把它變為「一塊模範的殖民地，在這裡面，狂飲，警察，監獄，法庭，貧民的救助，慈善事業的需要，完全成爲不相識的東西了。歐文之所以能夠達到這樣的地步，祇是在他使工人處於一種較合於人的境遇，特別是周詳地注意於青年的教育。歐文所設計的幼稚園，最初是在紐蘭納



克創辦的。從二歲起，兒童開始回上學，兒童在幼稚園裏，感覺到這樣的快樂，以致父母很難把他們領回家去」（註）。

所以，遠在弗羅貝爾的幼稚園出現以前，歐文已經在實際上實施了學齡前的社會教育。在他的幼稚園中（取名爲「嬰兒學校」Infant School）收容二歲以上的兒童。「兒童被置於可靠的地方，他們在這裏和他們未來的同學一起，訓練良好的習慣和原則，而在進餐時間和晚上，則由他們的父母領回」。這些學齡前教育機關的教育目標，是在擴大兒童的概念範圍，發展兒童對同年齡者同志感情，然後發展經濟社會的習慣和特性。

除了幼稚園以外，歐文更爲五歲至十歲兒童創辦學校。在學校中，教男女兒童閱讀和了解所讀的功課，迅速明瞭的書寫和基本算術規則；並教授初步的地理、歷史和自然知識。兒童滿十歲後，就開始工作，志願求學的兒童則繼續學習到十四歲，配合日間在工廠作工和晚上入夜校學習。女童則學習簡單的編織和縫紉，學畢以後，被送入公共廚房和食堂，學習經濟的烹調方法。她們更學習保持房間的清潔和整齊。

說到學校，歐文着重指出在學習時要使兒童認識事實——對他們的年齡所能接受的事實。歐文所提出的學校教育的基本原則，就是要通曉個人和整個社會的利益幸福間所存在的密切聯繫。歐文反對機械背誦，要求教師鼓勵兒童的積極性，注意兒童的興趣。

### 關於性格教

### 育的學說

歐文不但在紐蘭納克作實際活動，而且更在報紙和口頭上展開積極的宣傳工作。在一八一二—一八一三年，他出版了一部「新社會觀」(New Views of Society)。在一八三五年出版了一部「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

據歐文的解釋，人的性格是爲獨立於人的意志的人週圍環境的條件所決定的。因此，任何國家的人民，在改變這一環境的條件時，就能夠培養某一種的性格。罪惡——只是不正確的教



育和管理的結果。新的社會組織主要是用人民的教育和啓蒙的方法來達到的。

在「性格教育」中，歐文不祇一次的反覆說明：我們一切不幸都是從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的無知和惡劣的教育中產生出來的。

環境養成人的性格，而要改變人的週圍的社會環境，就需要把組成這一環境的每一個人的性格加以教育。由於不正確的襲取於法國唯物論者的對環境的見解的結果，歐文不能從這狹隘的圈子中得到解放。只有科學社會主義的創造人才能正確地提出這個問題，指出人在整個的社會活動過程中改造着自己的本性。

歐文認為，成爲社會改造方法的教育應該從最幼少的年齡開始。

在紐蘭納克的工人村落的中心，組織了一個「新學會」（一八一六年），這個組織把幼年兒童的托兒所和幼稚園，五歲至十二歲兒童的學校和成人教育機關（如工人俱樂部之類）集合在一起。在成人教育機關中，設有圖書館和讀書室，經常對工人舉行演講，並有工人遊藝和集會。

歐文要求建立廣大的學校網，以便容納所有志願求學的青年，並要求國家撥給充足的資金，以建設和經營這些學校（如果我們注意英國當時佔優勢的是私立學校這一事實，就可知道一要求是很重要了）。在學校中，應採用最新和最好的教授方法。國家應特別注意教師的訓練，因此就應開辦師範學校。

### 工廠生產勞動 和教育的聯合

歐文的教育觀中最有價值的方面是兒童的生產勞動和教育的結合。歐文在舊紙堆中發現一本倍拉斯（Bolton's）的小冊子，他在裡面找到了他過去所提出的那種見解的確證。歐文就把這本小冊子重印出版。他不限於倍拉斯的觀點，而是更進了一步，他在實際上實施了工廠生產勞動和教育的結合。

在歐文以前，在紐蘭納克工廠中，廠主台爾利用兒童的勞動；兒童在廠中在冬季和夏季都是從早晨六點鐘做到晚上七點鐘。在工作之後，兒童還要進學校學習。據歐文說，兒童的飲食和衣着都是很好的，並有醫生伴隨他們，注意他們的健康。但正如歐文的正確的指出，這樣小的兒童（六歲至八歲）「在



工廠中從早六點鐘做到晚上七點鐘（除了指定進膳的時間以外），再要他們好好的學習」是不可能的。歐文自己就不准十歲以下的倫敦教養院送來的兒童和當地的兒童在廠內做工。未滿這年齡的兒童只准在紐蘭納克學習。歐文要求法律上限制兒童勞動的年齡不能低於十二歲。滿了十一—十二歲的兒童入工廠工作，同時繼續在夜校學習。

歐文在勞動教育思想的發展上雖然進了很大的一步，但他實施這一工廠勞動和教育的聯合是平行的：教育在內容上是和勞動沒有聯系的。

歐文廣泛的提出兒童體教育問題。他為學齡前兒童和學齡兒童建築了遊戲場。學齡兒童除遊戲以外更參加軍事訓練。

馬克思在評價生產勞動和教育結合及歐文的體育教育的要求時，會對這些經驗作了正面的評判：「像歐文所詳細說明的那樣，未來教育——這種教育，把生產勞動和智育體育結合起來，使每一個已達一定年齡的兒童皆可享受，此不僅為增加社會生產的方法，且為生產健全人類的唯一方法——的種子，是從工廠制度發芽的」（註）。

關於共產主義教  
育的學說。在一

新調和「村實施  
這一教育的企圖

從一八一七年起，歐文的觀點發生了轉變。他開始相信社會生產的變化不是由他所實施的和他對企業家們所要求的那種慈善活動所能達到的，而要用組織共產主義共同體的方法。

恩格斯提到歐文生活和學說中的這一新階段時說道：「進於共產主義的轉變，是歐文一生的轉點。當他是慈善家的時候，他贏得了財富、贊許，名譽與光榮。他曾是歐洲最聞名的人物……但是當他發表了共產主義的理論以後一切都變

（註）馬恩文集第十七卷第五三〇—五三一頁。



更了……他爲上層社會所驅逐，爲報章所抹殺，且因美洲共產公社經驗的失敗，而喪失了全部財產——他於是直接與工人爲伍，在他們中間還進行了三十年的宣傳」（註）。

歐文在紐蘭納克郡會議的報告中（一八二〇年）給資本主義制度作了尖銳的批評，指出機器已經由人的恩物變成了人的呪咀。必需給這種「魔力」作正確的應用。

歐文在「新道德世界」和其他著作裡，指出共產主義制度是用破壞「罪惡的三位一體」的方法來建立的；舊世界就把不平，榨取和誤解安置在這個「罪惡的三位一體」之上。在現社會裡，這三位一體就是私有財產，家庭和宗教，他認爲代替私有財產，要實施社會公有的財產，代替家庭，實行集體生活，代替宗教，提倡知識。

教育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將是多方面的。教育要以真正的科學知識爲基礎。歐文很重視科學。「只有知識的發展，能够使人類相信：人類現在所處的不幸境遇都是無智的結果」。適應着歐文和其他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空想主義，這幾句話所指出的社會壓迫的原因自然是不正確的，但歐文對知識的重視却表現得極爲明顯。「沒有知識的發展，人就成了各種壓迫者和僧侶階級的牛馬，像他們在過去一樣」。在共產主義制度下，要爲一切人創造廣泛和深刻的教育的最大可能性。

這種智力教育是和體育教育的高度要求及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歐文在一八二〇年的一篇報告裏說道：「教育和學習應該和一切工作有最密切的聯繫」。同時歐文所說的生產勞動，不是手工勞動，因爲手工勞動「沒有大規模的科學力量的幫助是不能產生財富的」，是不能保證新社會的生存的。青年的一代應該「在機械和化學力量的協助下」建立自己的生產勞動。兒童要積極參加他們能力所能負擔的工作，認識各種農工業的勞動。



在全新的共產主義制度下，要實施道德教育：驅逐一切反自然的感情和反自然的行爲；人對人的誠實和正直要代替偽善、兩面態度和自然情感的壓抑。集體主義的精神將是道德的基礎。

歐文在北美洲的共產主義共同體「新調和」村中，開辦了幾個學校，依據社會主義的精神實施智力教育、道德教育、勞動教育和體育教育。青年除了從事科學研究以外還要認識農業和各種種類的工業勞動。

歐文在其教育觀上，比任何人，比別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更接近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這是馬克思也說過的。

我們要高度的評價歐文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思想，多方面（智力、道德、勞動和體育）教育的要求，他對宗教的鬥爭，教育與生產勞動在工廠工業基礎上的結合，知識和學校的重視，學齡前社會教育的首次實施，教師訓練的要求，成年工人的教育機關的創立。

但同時也要指出由於勞工階級不夠發展的結果而造成的歐文的空想主義。他沒有看出社會主義制度是只有用勞工革命的方法能夠達到的。歐文在大體上還是站在理性主義的立場上，因此他對教育作了過量的估計，他把教育看作進到社會主義的工具。

### 十九世紀空想社

### 會主義的教育思

### 想的意義

偉大的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還在資本主義存在的初期就給市民階級的教育作了痛烈的批評，提出了與它相對立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思想。

他們互相的補充，描寫這一教育的理想是人的各方面的發展、和市民階級教育有所培植的個人主義相反，他們提出了發展兒童社會精神與集體主義精神的思想。他們正確地指出了爲剝削社會所特有的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間的分裂，而提出了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思想。

他們供獻了可驚的教育思想的財富，他們以整個生命奉獻於由學齡前兒童開始的青年兒童的社會教



育。

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以這些教育思想的財富，以他們的教育觀的社會主義的傾向，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關於教育學說的先驅。



## 第四部 近代教育

——從巴黎公社到一九一八年底

### 第二十一章 十九世紀末葉第二十二世紀初葉的教育

#### 理論和實踐的一般特徵

這一時期的  
經濟和政治  
的一般特徵

從普法戰爭和巴黎公社時期起，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止，這一段時間，是資本主義開始衰落，巴黎公社對資本主義作初次打擊，舊的「自由」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俄國推翻的時期。

這是社會鬥爭非常激烈的時期。它開始於勞工革命的第一次實驗——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而結束於勝利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在資本主義各國，發展着資本獨佔，從二十世紀初葉起更代替了過去的一般的資本統治而建立了財政資本的統治，財政資本壟斷了一切工業。

「對於自由競爭佔完全優勢的舊的資本主義，商品輸出是典型特徵。對於壟斷佔優勢的最新的資本主義，資本輸出就成了典型特徵了」——這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所說的。資本主義各國的殖民地政策的加強，是和這一資本輸出有密切聯系的；因為世界分割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前一階段上已經完成，



所以各國重新分割世界的努力就加強了。

這自然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因此資本主義各國的積極備戰就成了這一新的歷史時期的特徵。因此就生長了軍國主義，民族主義，極端愛國主義。而市民階級就設法鼓動一個國家的人民去反對另一國家的人民，欺騙這些人民，並把那種爲市民階級利益而進行的戰爭描寫成爭取某一國家的民族利益的戰爭。

軍國主義的發展，是從這一新的歷史時期的初年，從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時期起就開始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的特別加強時期則在後來十九世紀末年以後。

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是資本主義衰落和腐蝕的開始，這種衰落和腐蝕，是以日漸加快的速度進行的，和特別有力的反映於市民階級的文化上。

在市民階級的文化上，可以看到衰落的趨向：唯心論、神秘主義和宗教性的加強。市民階級已經不能提出獨創的哲學體系，開始轉到平凡的利慾的實用主義哲學的立場（詹姆士 William James, 1842—1910）宣傳直觀主義（Intuitionism）的哲學（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崇拜「不合理」等等。市民階級沒有力量提出新的獨創的哲學體系，而提出了「回到柏拉圖」，「回到康德」，「回到黑格爾」的口號，同時他們不是從這些哲學家那裏吸收他們所有的寶貴的東西，而是吸收了最保守的特徵，加以強化，使它們迎合市民階級的利益。

在自然科學領域裡，十九世紀末葉產生了一個後退的自然科學學說——新活力說（Neovitalism）承認一種能夠調整有機體生活的神秘的「生命力」的存在。

榨取、民族和殖民地壓迫的增加引起了民衆反抗的加強，勞工階級發展和壯大了。由於生產集中的結果，他們的人數也增加了。大量的工人在大生產中的集積，助成了勞工階級團結的發展，幫助了工人階級作爲一種反抗力量的組織。



市民階級設法把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工人階級，並利用收買工人階級上層（工會官僚等等）的方法。市民階級的這些策略，部份地是成功的——因此就發生了各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但是勞工階級的基本群眾却漸漸站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下了。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列寧把科學社會主義的旗幟握到自己的堅強的手裡。列寧和各國工人運動中的各種機會主義傾向作鬥爭，和機會主義者把勞動階級的鬥爭只限於經濟問題的企圖作鬥爭，和機會主義者把哲學上的混淆物——「經驗批評論」——代替辯證唯物論的企圖作鬥爭。

### 十九世紀末葉和

### 二十世紀初葉的 教育理論和實踐 的一般特徵

上面所指出的十九世紀最後三十年和二十世紀初葉的一般特徵，自然也反映在當時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上。

鬥爭中的各階級都想用教育方法把自己的影響，自己的意識形態灌輸給兒童、青年和成人。但是市民階級考慮到日益成熟的勞工階級的自覺，就想把他們所給與工人群眾的那種教育的市民階級的目的很小心地掩蔽起來。因此就出現了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教育理論家關於教育的超階級超黨派超政治性質的空談。

但是市民階級却爲了保存自己的支配地位而鬥爭，因此利用了政治性的一切工具，教會，報紙和學校。

各國市民階級在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葉這一時期中，努力發展了學校網，實施普遍的初等教育，進行教育方法的研究。

但是把市民階級學校網的這一發展，看作市民階級當局關心「提高國民文化水準」的證據，却是錯誤的。市民階級在自己的手中既然握有幾乎全部的報紙，就竭力把普及識字教育變爲它的思想上影響人民的工具。市民階級發展學校網，使學校變成義務性，同時用適當的綱領和整個學校教育的管理方法在



羣衆中灌輸自己的意識形態，自己的道德。市民階級因爲需要熟練工人，不能不發展學校數量到它所需要的程度。

但因爲生活的過程是辯證的，市民階級學校的這一發展必然和內部矛盾相聯系；工人往往利用了學校中得到的識字教育去反對市民階級。市民階級無力消除這一個矛盾。

當權的市民階級往往不得不在學校發展上比它所希望的更走遠一步：在革命運動的壓迫下，它不得不作相當的讓步。如果像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裡所說，在勞工階級尚未鞏固的十九世紀初期，已經頒佈了一個一八三四年的英國學校法令的話（這個法令是「企業家第一次的吝嗇的讓步」），那末隨着勞工階級力量的增長，這種讓步就更頻繁了。但這種讓步是遠不能滿足勞工階級在教育方面的迫切的需要的。

市民階級在這一時期提出的口號是「爭取兒童的靈魂」。社會鬥爭中日益增大的教育作用在教育學上也找到了自己的反映。對教育問題的注意的提高產生了許多教育思想的趨向。在這一時期產生的新教育的趨向有：新盧梭主義，新康德主義教育，行動教育，「個人教育」，實用教育，實驗教育，心理分析教育；加強了「自由教育」論的宣傳，產生了「新學校」等的特殊的教育趨向。

在這各種種類的教育學說的發展中反映了爲市民階級文化的衰落所造成的教育思想的混雜。這種衰落是這一時期的教育學說中的反映就是缺乏偉大的教育體系。

出現在這一時期的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理論中的新要素大部份是否定的：美國教育學和「自由教育」理論的兒童中心主義，（Pedocentrisz）教師的作用的降低，系統知識和課程的否定，普通教育的「事務」知識的提高（「勞動爲學校工作的中心」），「設計方法」，「陶爾頓制」等等。

但以爲在這一時期的市民階級教育學中普遍趨向於保守和衰落的情形下就沒有個別的成就却是錯誤的。我們知道列寧在描寫帝國主義時，曾說到整個路綫上和一切政治秩序下的保守，但同時也指出在普



遍的腐蝕的趨向下若干國家內資本主義的迅速增長。

在教育學中的發展矛盾也是同樣的。帝主義時代市民階級教育學的一般路線是保守的，但這不能抹煞個別的成就，尤其是在教授方法上的成就（例如拉依「*Die*」的算術教授方法）。

資本主義各國的世界瓜分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必然發生，引起了這一時期的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極端愛國主義的發展。這一時期這些特徵也反映在市民階級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上。

這一時期市民階級學校中的國語、文學、歷史、地理和「公民」教育充滿了剛剛出現的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特徵。爲了學校的軍國主義化，就加強了「體育教育」，產生了軍國主義化的兒童組織。加強了反猶太人主義。

這一市民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市民階級各國的學校中是以各種不同的口號來實施的；在德國，是在汎日耳曼主義的形式下實施的（拉依、凱爾森斯坦納），在美國則在「百分之百的美國主義」口號下實施的。

學校的軍國主義化和民族主義及極端愛國主義的宣傳在戰爭時期的市民階級學校中是特別強化的。

在市民階級的學校和教育理論中可以看到唯心論和宗教教育的發展。霍爾（Steady Hall）宣佈大學爲「神聖靈魂的工場」。「新學校」的領導人李滋叫學生到森林的邊地去「虔誠地觀察日落」。拉依在他的「自然教授方法論」中（一八九二年）宣佈自然科學的教授對於宗教教育有着極大的意義。

許多市民階級「勞動教育」論的出現是這一時期教育學中的顯著現象。這是爲許多原因所造成的：市民階級想利用國民學校儘可能的爲市民階級提早準備熟練勞動力，市民階級想把工人子弟吸收到自己的學校中授以相當的勞動習慣，在手工勞動的教育的藉口下降低普通教育的水準。

市民階級的勞動學校的目的也是在作控制勞動子弟的工具，宣傳市民階級意識形態的工具。克魯浦斯卡亞對勞動學校的這一方面會有精闢的說明：「勞動學校鼓勵兒童的興趣，把他的靈魂，他的內部的「我」向教師公開。拿皮鞭的教師所不能得到東西，却爲和兒童一起繪畫，一起做木工，一起觀察自然



的教師所得到。像這樣的教師是會取得兒童的信任的。所以凱爾森斯坦納、弗爾斯特和勃托爾青會操縱兒童的靈魂，會牢不可破的培養他們對現存的德意志國家的崇拜，會宣傳德意志民族的統一。在戰爭時期，勞動學校是青年軍國主義化的最好的工具。兒童的一切創造工作都被納入戰爭的軌道（註）。

和這一時期的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教育學處於完全對立地位的是勞工階級的教育學。

還在這一時代的初期，巴黎公社就對黑暗愚昧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實現了學校與教會分離，學校的絕對世俗性宣佈了人民的教育權利。



## 第二十一章 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

### 巴黎公社是第一次勞工專政的實驗

在一八七〇年九月法蘭西第二帝國崩潰以後，市民階級所領導的共和國成立了。巴黎和法國的勞動人民面臨着君主政體恢復的威脅。巴黎已宣佈戒嚴。市民階級的政府首腦，巴黎公社的未來的屠夫，推爾下令沒收巴黎武裝工人的大炮。

這個命令的目的，是在完全解除工人的武裝，把法國出賣給侵略的普魯士人。所以這個命令就成了工人起義的推動力。起義的結果，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推爾

政府逃到凡爾賽。公社在巴黎宣佈成立。

依照馬克思和列甯的解釋，巴黎公社是勞工專政的第一次實驗。它在短時期中，以民衆的普遍武裝代替了常備軍；宣佈了教會與國家分立；頒佈了轉讓主人離境或停工了的工廠作坊給工人聯合會的命令；取消企業中的罰款制度；禁止許多企業中的夜工等等。

由於法國勞工級階級還沒有充分成熟和沒有準備與市民階級作鬥爭，公社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被推爾政府推倒了。巴黎和法國各省的大多數的勞工階級，是小企業的工人（每個企業只有三個至十五、二十個工人）。小市民階級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在工人中是很發展的。缺乏强有力的爲正確原則所領導的勞工階級的政黨，沒有和農民建立聯系。在屬於各黨各派甚至無政府派的巴黎公社的領導者中間，對革命策略沒有統一的意見，而有許多原則上的深刻的分歧。巴黎公社在許多迫切問題上表現了不穩定性，因而就給市民階級的凡爾賽政府有組織一切保守力量的可能。

公社雖然得到勞動者的英勇的保護，總於在普魯士的幫助之下被一切保守派的聯合力量摧毀了。三萬左右的公社社員被殲滅。四萬五千左右的社員被逮捕，斬首和充軍。



## 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

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日，巴黎公社委任愛德華·伐陽爲國民教育委員團的團長，伐陽是一個革命家，勃朗基派的社會主義者，醫生和工程師（公社失敗後曾被判處死刑，但逃到英國）。

由於第二帝國的保守的學校政策的結果，到巴黎公社成立的初期法國的學校已是完全僧侶主義的學校。坐在學校管理機關中的是高級僧侶的代表，大部份教師是由牧師、僧侶和尼姑充任的。整個教育尤其是在初等學校中充滿了宗教精神。

因此改造國民教育事業的最迫切的任務就是（一）國民教育體系的民主化，吸收勞動人民參加學校的建設和（二）學校脫離教會和宗教的影響。

爲了執行第一個任務，伐陽就代表巴黎公社的政府於一八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發表一個宣言，要求所有關心國民教育事業的人士向國民教育委員團提出學校改革的計劃。這樣，勞動人民就被吸引到國民教育建設事業中了。在委員團之下設立一個專門家——以自己的前進的教育觀出名的教育家——委員會，進行「最短期中的初等教育和職業教育的組織事宜」。在一個高等學校中，也由前進的教育家和學生家長組織一個委員會，以討論學校改革問題。

廣泛的吸收民主和革命人士的辦法在別的領域中也是採用的。例如爲了使藝術民主化，會成立了一個藝術委員會，邀請最先進的藝術家，雕刻家，建築家和其他藝術工作者參加。領導這個委員會的是公社社員，偉大的現實主義藝術家庫爾倍。領導全國圖書館的是著名地理學家愛里·雷克留。爲了改造高等學校，吸收了進步的教授、醫生和學生。爲了以世俗的教師代替教會的教師，國民教育委員團更所有能够担任教師的一切俗界人民發表一個宣言，請他們繼任教師的職務。

根據四月二日巴黎公社所頒佈的關於教會與國家分立的法令，學校中的宗教的教授和宗教禮拜的儀式都禁止了。在巴黎的許多區域裡，展開了積極的新式俗界學校的建設工作。



在五月十二日公社政府機關報「官報」上說道：「宗教教育已經很決的在巴黎所有學校裡消失了。但在許多學校裡現在還保存着這種教育的痕跡，像十字架、聖母像，和別的遺物。男女教員們要命令把這些崇拜的對象拿開，這些東西在這裡，是和良心自由的原則不能一致的」。

在對巴黎第十八區學校所發的訓令中說道：「我們請求你們把那些足以引起兒童們的關於愚鈍行爲的回想的東西從兒童的眼前拿開。在我們的學校中不應該再有一幅圖畫，一本宗教內容的書籍，一個十字架，一幅聖像的地位。你們用一層白色或黑色的顏料把拉丁文的宗教題句塗抹了吧，拿全人類的格言，像自由、平等、博愛、勞動、正義，去代替它們。同樣的，你們要取消，而且立刻取消聖史、宗教問答和教會歌曲的教授……總而言之，你們要記住：誤解的王國已經結束；我們要擴張真理的世界，和教別人愛護真理」。

被解除教師職務的牧師在兒童和家長中進行反對革命的宣傳，企圖鼓動他們去反對公社。有許多牧師繼續住在教師宿舍裡。在許多學校裡被解除教師職務的牧師鼓動學生罷課。

五月十二日伐陽就頒佈一個命令，叫被解職的教師——牧師遷出學校的教師宿舍。五月十四日更頒佈一個新的命令，逮捕所有進行反公社宣傳的過去的教師——牧師。

巴黎的勞動者在許多區域裏封閉了教會，把教堂改成俱樂部。

巴黎公社宣佈了義務的世俗的免費教育的原則。伐陽在他的一篇宣言中寫道：「每一個人都有享受一般教育的權利。巴黎許多區域在人民中積極宣傳教育的必要，要求父母把兒童送入學校。例如在對第四區家長的通告中說道：「每一個兒童都有不可剝奪的教育權，因此把兒童送入學校是家庭的或者並不過份地說是社會本身的責任」。

由於公社存在的歷史過於短促，國民教育委員會沒有來得及製定學校課程和授科計劃。但學校工作內容上的一般的傾向却堅固地建立起來了。在當時許多通告，宣言和論文中所貫徹的一種思想就是積極



知識應該成爲教育的內容。

在十七區的訓令中說道：「教員應該採取完全科學的以實驗爲基礎的方法，這種方法永遠是以事實觀察爲出發點……學生不應利用那種在任何關係上與科學方法及團結原則相矛盾的教本或參攷書」。

巴黎公社努力實施生產勞動與教育結合的思想。公社對於根據職業教育的新原則而建立的組織表示極大的關心。

伐陽在他的一篇通告中寫道：「最主要的，是保證每一個人以真正的社會平等的基礎——每一個人有權享受的普通教育；但同時還要幫助他研究習業和符合於他的興趣和職業習慣的更進一步的工作」。

馬克思的革命的、教育思想的影響特別表現在公社的學校政治教育的組織和兒童革命積極性的培養的政策上。

巴黎公社對國民教師表示極大的關心。在公社以前，絕大多數的小學教師所得到的勞動報酬是極低的——一年七百五十至九百五十法郎，而助教甚至祇有四百至六百法郎。巴黎公社增加教師的薪金至每年至少二千法郎，助教一千五百法郎。同時女教師的俸給也和男教師平等了，而以前做同樣工作所得到的報酬却要比男教師低得很多。公社以這來強調男女平等的思想。

最後要指出公社對於藝術民主化和改善藝術工作者生活的關心。公社採取了各種辦法，使私人手中的藝術作品變爲國家的財產。博物院對廣大勞動人民開放了。更採取了各種辦法保護藝術上的收藏物。開辦藝術工業學校，宣佈藝術教育發展的必要。

公社在創造新的國家機構和不斷對凡爾賽鬥爭的條件下存在了七十二天。在這短短的時期中，巴黎公社在教育方面完成了許多寶貴的工作。巴黎公社表示了勞工階級對於教育的重視，表示了舊的教育體系改造中的範圍的廣度，實施了教育民主化。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學校與教會的分立。並第一次實施了兒童的社會政治教育。



資本論的作者對巴黎公社的教育政策給了很高的評價，他用下面的話來形容這個政策說：「常備軍和警察——這些舊政府的物質權力的工具——一經消滅，公社就立刻更進一步擊破精神壓迫的工具；它宣布沒收和解散一切教會，因為它們都是擁有財產的法團……一切學校已被置於教會和國家的影響之外，就免費為大眾服務。這樣，學校教育成了人人都能接近；成見和權力所加給的桎鎖也從科學身上取掉了」（註）。

（註）法蘭西內戰。



## 第二十三章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的

### 歐美各國學校概況

#### 一、法國學校

##### 國民教育體系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巴黎公社的創子手推爾和麥克瑪供將軍領導第三共和國的時候，國民教育事業的任何市民階級民主改革都是談不到的。第三共和國的反動上層所保存的學校法規大部份是第二帝國時代所施行的（如法勞法令）。

第三共和國的市民階級只有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之後，在資本主義需要的刺戟下，才着手實行學校的改革。

教育大臣費利（Lules Francois Carnille Ferry, 1832—1893）在一八八一和一八八二兩年頒佈了兩個法令——確定法國初等學校的組織。一八八六年的法令確定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整整一個時代所存在的學校體系。

一八八一年的法令宣佈初等學校中的普遍、義務、免費教育和這些學校的「世俗性」。一八八二年的法令則具體化了學校義務性和「世俗性」的原則。六歲到十二歲的所有兒童都應送入公立或私立學校。在家庭受教育的兒童應每二年經學校考試一次。對於不送兒童入學校的父母課以各種處罰，直到罰款和逮捕。



因爲僧侶階級的情緒是保王黨員的，第三共和國的市民階級就限制天主教僧侶階級對學校的影響，但這決沒有破壞宗教在學校教育中的作用。所以，學校的「世俗性」遠沒有在實際上實現。固然，依照一八八一和一八八二年的法令，神學科已從國立學校的課程中廢除了，但同時市民階級却注意國立學校之外的宗教教育。除禮拜日以外，學生還要在一星期中的禮拜三一天中擺脫學校的功課，到教堂裏去受宗教教育。

在「私立」學校中，神學的教授是許可的。僧侶階級就首先利用了這一許可，用「私立」學校的形式開辦了許多教會學校，宗教教育在這些學校中佔極大的位置。到一八九〇年時，七分之一以上的小學和半數左右的中學已是「私立」學校了，也就是說，大部份是教會學校了。

一九〇四年當急進派執政的時候，在勞動人民的壓迫下頒佈了一個學校法令，「禁止聖會在法國境內實施各種教育」。但爲了取締數量衆多的教會學校會化了十年時間。

在國立學校中，神學科是取消了，市民階級就實施了「公民及道德」的教育。法國勞動者稱這些學科爲「世俗的神學科」。例如，在道德課本裡說道：「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和一切人的父親……！不管我們的宗教是什麼，我們都應該尊重上帝爲最高的存在」。所以，法國「世俗」學校只是一個名目罷了。

在學生的腦中注入這樣的思想：第三共和國的國家制度（即市民階級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在一本小學教科書裏有這樣的說教：「人類工作，是爲了要致富，」；「我們每一個人的願望，是在爲自己和自己的親屬謀取財富」。

當權的市民階級因爲不信任人民，就把地方自治體在學校方面的權力大加限制。地方自治體只能關心學校的經濟部份（校舍、教員、暖氣、光線）。固然，地方自治體有選舉學校委員會的權利，但根據一八八二、一八八六和一八八七年的法令，學校委員會的委員「是不准進學校的，也沒有監督和控制學校和教師的任何權利的」。學校委員會的職權的縮小，引起了人民對這個委員會的興趣的減弱：委員會



的選舉大多數是停止了。

市民階級爲了防止自己的政體受革命運動的搖撼，就在一切管理領域裏甚至在學校領域裡實施了中央集權化的官僚主義的管理方法。

這一官僚主義的學校管理方法殺了教師的一切教育創造和發現。由於這一監督、鼓勵方法和教師薪俸的區別（分爲五級），法國的教師就變成了第三共和國的官吏。

課程和教本都由政府審定。

法國國民教育的體系大部份是根據八十年代的法令而在二十世紀初期訂定的，其內容如下：

		年齡
	大學或高等 技術學校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師範學校 (三年)	中學(官立中學 或專門學校)  (Lycee, College)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中學預備班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兒童班	家庭教育	三 二 一



這一體系的最觸目的特徵是它的二重性。第三共和國的市民階級驕傲地稱自己的國民教育體系是「民主的」體系，却沒有實現單一學校的決心。一個體系（初等教育）是為勞動階級而設的，另一個體系，則為支配階級而設（中學與大學）。在形式上，固然沒有禁止勞動者的子弟進中學，和經過中學進大學，但實際上除了極少的例外，大中學不是勞動者所能接近的。勞動者的子弟在小學畢業後，因為受年齡的阻礙，就不能進中學的最低一級；兒童在小學畢業已十二歲，而中學最低一級的入學規定年齡是十歲。由於課程配合的不調和，由小學轉到中學也是不可能的（外國語是從中學一年級開始的，在小學校中是沒有的）。最後，主要障礙是中學校的學費過貴和父母無力負擔。

勞動者的子弟在小學畢業後至多能在高等小學中受「實際教育」，和在低級及中級職業學校結束教育。在高等小學裏，除了簡略的普通教育科目以外，更被授與許多專門（職業）知識。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的。

反之，市民階級的子弟在結束家庭教育以後就能進中學，最後又升入大學。

年齡	職業學校 (一, 二, 三年)
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高等小學 ( <i>ecole primaire superieure</i> )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初等學校 ( <i>ecole primaire</i> )
	母親學校 (三年) ( <i>ecole maternelle</i> )



學齡前教育機關（母親學校）的廣大是法國國民教育體系的特點。在那些沒有資金維持三年母親學校（即幼稚園）的自治體裏，開辦了一年的「兒童班」。市民階級因爲不願意他們的兒童和「郊外的兒童」混在一起，通常是不把自己的兒童送進母親學校的。這一爲勞動者的兒童而設的學齡前教育機關的發展，原因當然不是人道的設施，而是市民階級的利益。原因是這樣：法國在幾十年中只見生育率的激降。人口沒有增加。這樣的情形漸漸造成了軍隊數量的降低和勞動力生產的降低（因此在勞動力的求過於供的情形下所產生的提高工資的必要），和「勞動後備軍」的損失等等。因爲五—六歲兒童（尤其是勞體者的兒童中）的死亡率最大，所以市民階級不得不對勞動者兒童的學齡前教育表示「動人的」關心。

## 初等學校

六年制的初等學校根據一八八一—一八八二年的法令是普遍、義務、免費的。初等學校的課程計劃是根據一八八六和一八八七年的法令訂定的，直到一九一八年爲止在整個的這一段時期中幾乎沒有變更過。

在初等學校中，教授道德、閱讀、書法、文法、算術、歷史、地理、自然及農業常識、唱歌、手工、圖畫和體操。

小學教師應該在師範學校畢業或者經考試後取得小學教師的身份。擔任國立（公立）學校的教師，還要有兩年實習後所取得的教育能力證明書。

教師根據實習和監督官的評判分爲五個等級。每級薪額的差別是很大的：最低級（第五級）的教師每年獲得一千法郎，而第一級教師（服務滿十五年）獲得二千法郎。最高一級的女教師的薪額也比男教師的薪額爲低（最多一千六百法郎）。教師的薪俸是由國家發給的。

男女學童是實施分校教授的。只有在人口不多的區域（不滿五百居民的自治體中）是准許小學校的男女共學的。



一八八六和一八八七年的法令確立了初等學校的上層藥物——二年制的後來改爲三年制的高等小學。這一措施的目的是在防止勞動者的兒童升入中學。

實施這些學校法令的教育大臣曾明白宣稱：「在貧苦階級的孩童中，是不需要養成脫離他們的環境的夢想的」。除了這個考慮之外，在高等小學的組織時也注意到熟練的有教育的工人的需要。

市民階級不得不在一部份勞動者中實施高小教育，但不願把這種教育普及於廣大的勞動群眾；高等小學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是很少的。例如在二十世紀初期，已有初等學校十萬個，學生約有六百萬人，而法國全國的高等小學只有四百個，學生六萬人。在高等小學中，教授應用算術、初等代數、幾何、物理、自然、農工業常識、經濟知識、本國歷史、經濟地理、法文及外國文、簿記、手工。

高等小學的課程從二年級分爲農業、工業和商業三部。

## 中學

從八十年代起，關於法國中學的學制問題曾展開了古典派和實科派之間的尖銳的論爭。還在第二帝國時代，就創辦了一種所謂「專門中學」，這是實科中學之一種，裡面除了普通教育的科目以外更教授應用數學、農業基礎、工業經濟基礎。

一八九一年這些專門中學改爲人文科而無古典語文的普通教育的學校。中學分爲古典的和「現代的」兩種（後者以兩種現代語文代替古代語文）。

最後，根據一九〇二年的法令（萊格法令），中學分爲兩期：第一期（最初四年）及第二期（高年級）。第一期分爲A部（授拉丁文）及B部（不授古代文）兩部。第二期細分爲A部（授拉丁文及希臘文）；B部（授拉丁文及現代語文）；C部（授拉丁文及自然科學）；D部（授自然科學及現代語文）四部。

由中央政府經營的中學稱官立中學（Lycee），由地方自治體經營的中學稱專門學校（College），兩種中學的課程是少相同的。

中學是收費的。學費額極高，官立中學的每期學費額高至六百—八百法郎（專門學校則收費較低）。



在一九一三年，法國全國（包括阿爾及耳）共有一百一十一個官立中學和二百三十六個專門學校；學生總數九萬五千人（私立學校的學生不計）。

與小學數量及小學生的數量相比，法國中等學校及其學生數量是不大的。

在一八八〇年以前法國還沒有國立女子中學。教會組織（尤其是天主教教會）和私人企業主就利用了這個情形，創辦了許多女子寄宿學校。依照一八八〇年的法令開辦了五年制的國立女子中學（後來改為女子官立中學和女子專門學校）。就知識的水準說，女子中學遠比男子中學為低。在課程中，除了普通教育的科目以外，更有家政，手工等科。

克魯浦斯卡亞根據一九〇四年的國會調查書（徵集教育家關於中等教育改革意見的調查書）給法國中等學校的保守主義作了明白的特寫。學校監督官沛育在調查表上寫道：「老實說，我們的一切現代方法，都是中世紀教授方法的繼續」。著名的教授拉維斯在調查表中指出國內學校事業上那種絞殺教師和學生的一切創造性的瑣碎的規則：「在所有法國官立中學中，學生起身，就寢，進餐，學習，休息，都在同一個時間。課表和學校工作到處一樣的。一切最小的細目都是規則化了的」。克魯浦斯卡亞研究了許多調查表以後，得到一個結論說：教師們「所不安的是教育兒童們以服從和對權威屈服的精神，壓制學生的一切創造性，不給兒童自由發展個性，以最小心的保護去束縛他們的每一個步驟。教育只是灌輸現成的真理；批評、研究的精神在學校環境中是找不到自己的食料的。它們是逐漸的麻痺了」（註）。

在這一時期的法國學校教授方法的成績中，可以指出的是比過去更廣泛的實物教授的採用、自然、化學、物理的實驗工作的加強和旅行參觀的普遍應用。在這一時期末年，從電影出現以後，學校實踐中（主要是在設備良好的中學校中），開始採用了電影教育。

（註）克魯浦斯卡亞，國民教育問題。



在其他各國尤其是美國的學校實踐中，也在不同的程度上產生了同樣的方法上的改善。良好的教本編制（當然不是從內容和意識的觀點上，而是從方法上來看的）是法國學校的特色。這些教本都是簡潔的，容量不大而材料充實的，附有許多精美的（往往是彩色的）插圖，地圖等等。每一章的結尾用活字體排印一段短短的結論，和幾句恰當的問句，回答這些問題是需要學生的思政工作的。

## 二·德國學校

### 德國統一 後的學校 法規

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以後，普魯士既獲得勝利，就把過去使德國陷於分裂狀態的許多小國和公國，統一成爲德意志帝國。普魯士國王宣佈爲德意志皇帝。這一過去的德國封建割局而的取消，和德國向法國在三年中所取得的龐大的五十億法郎的賠款，大大的促進了德國工業的發展。

以前在經濟發展上落後於英法的德國，迅速的向前進展了。德國工業開始蓬勃的發展了，迅速爭得了國內市場，參加了世界市場的爭奪戰。

德國國民教育的狀態（尤其是實施了一八五四年法令，使全國學校退到十七—十八世紀狀態的普魯士教育），到了德國統一時期已經完全不適合於德國的迅速的經濟發展和這一發展的前途了。因此自然而然的在七十年代初期已經開始尖銳的提出了學校改革和依據市民階級原則的國民教育的發展問題了。教育大臣法里克於一八七二年取消了一八五四年的法令，頒佈了新的學校法令——「國民學校及教師準備的一般法令」。

這一法令使國民學校的學級增加到四年，並促成了四年制的高等國民學校的發展。國民學校的課程比一八五四年法令所規定的課程擴充得多了。從一八七二年起，國民學校的課程中包括神學、德文、算術、初等幾何、歷史、地理、自然、圖畫、唱歌、體操。在德文課中，除了讀本、書法、文法和拼音



以外，更要求學生節讀德國文藝作品。在算術課中，除學習整數以外更學習十位的分數。

除了初高等的小學以外，爲了訓練有充足教育的副手人員，和爲了防止勞動者的子弟升入中學，更設立特種的普通教育的學校，稱作中間學校（*Mittelschule*）。中間學校是六年制的，以四年制的小學爲基礎。這種學校的畢業學生，是無權升入專爲地主及市民階級而設立的中學的相當班級的，因此這種學校引起了勞動人民的不滿；但地主市民階級的德國頑強地保存了它們。

繼這一國民學校體系（四年的初等小學加四年的高等小學，或至多四年的初等小學加六年的中間學校）之後，是低級和中級的職業學校體系。職業學校由於學課的不同，分爲一年、二年、三年三種。所以，德國國民教育體系的特點，也像法國一樣，是二重性的。

「補充教育」是很普及的。補充教育是以八年初等學校爲基礎的學校體系（「補充學校」，國民大學等等），這種學校所供給的教育是普通教育的繼續，但把普通教育和實際活動及相當的職業聯系起來。補充學校通常都是夜校。

這種「補充學校」的畢業學生是無權升入中學和大學的。

封建份子——不願德國工業迅速發展，並與這一發展的利益相對立的土地貴族和天主教僧侶階級，在德國組織了所謂中央黨，由反對新教普魯士執盟主權的天主教僧侶階級擔任領導。俾斯麥和他所領導的政府在一八七二—一八七八年反對這個僧侶階級的鬥爭中實施了「世俗文化鬥爭」（*Kulturkampf*）的政策。

這一政策的本質，歸結起來就是加強中央集權化的君主政體的作用，反對天主教僧侶階級地方分權的傾向及其把持過去的教會特權的努力。

普魯士政府所實施的這一「文化鬥爭」，決不是對宗教和教會的原則上的鬥爭。俾斯麥絕不主張減損僧侶階級的作用，更不贊成根本顛覆宗教。「文化鬥爭」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在擊破僧侶階級的反



抗，削弱他們的反對德國統一的宣傳，和加強國家的政權。

一八七二年法里克下令禁止僧團團員在學校中教書（這一措施的目的不在反對一般的僧侶階級，而是反對天主教教會，因為在新教教會中是沒有僧團的）。同年又頒佈一個法令，取消僧侶階級對學校的監督權。學校監督權被宣佈為政府的特權，這一特權是通過學校監督官來實施的。但最可注意的是九百個學校監督官中有七百個是僧職人員（新教徒），不過他們已是國家的代理人了。

所以，俾斯麥並不預備把學校從僧侶階級的監督下解放出來。

在一八七九年，這些削弱教會對學校影響的軟弱的措施被取消了：「文化鬥爭」的政策結束了。接着頒佈一些法令，恢復僧侶階級過去所喪失的在學校中的地位。僧侶階級又得到了學校領導，教師監督和宗教教授的權利。根據信仰嚴格劃分的過去的懺悔學校又在德國建立起來了。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期間，德國學校的教育工作是在僧侶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精神中實施的。

威廉二世在他的一八八九年的勅令中，要求在學校中加強僧侶教育，使學校教育建立在反對社會主義思想的鬥爭基礎上；學校應該訓練學生畏懼上帝和服從法律。

一八九〇年十二月，召集了一個帝國各部的代表會議，討論中學教育「改革」問題。

在這次代表會議的第一次大會上，威廉二世發表了一篇很長的演說。他責備中學只注重知識，而不注意性格的發展，不注意對社會民主思想的鬥爭，不注意「愛國主義」。他要求「一切教育以德國為基礎」。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期的整個時期中，學校行政官就忠實執行了這個指令。

在第一次大戰前夜和大戰期間，這一僧侶主義和軍國主義教育是被特別強化的實施了的。克魯浦斯卡亞在一九一六年的一篇論文中（「論德國國民學校的時代精神」），說明當時德國學校的特徵如

下：



「現代德國國立學校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它正是教育國家所必需的僕人——首先是兵士……國民學校的更加軍國主義化，對兒童權利和人的權利的更加忽視，把學校變成達到國家及軍事目的的工具——這就是德國國民學校所期待的……」（註）。

## 初等學校

到十九世紀末葉，在德國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影響下，實施了由六歲到十四歲的學校（初高等國民學校）的普遍義務教育。未滿十三歲的兒童如果沒有受過這種教育是不准入工廠作工的（一八九一年法令）。

初等學校的經濟是由地方自治體負擔的；地方自治體有權向人民徵收學校稅。「學校管理局」是自治體中的學校執行機關，由地主、牧師，和兩個至四個委任或選舉的地方人民所組成。地主和牧師在學校管理局中佔着支配的地位。在有些地方甚至保存着作為封建殘餘的地主。在其莊園附近學校中舉薦教師的權利。在另外一些地方，教師是由自治體舉薦的。教師的委任權是屬於政府的。被委任的教師須在師範中學（三年制）畢業。擔任國民教師的職務須經過兩次考試：理論的考試和經過相當時期實習（暫時執行教師義務）後的實際的考試。

學校據上面所說是含有懺悔的和信仰的性質的。

所以就各別地存在着路德教和天主教等等的學校，同時每一學校的全體教師和學生，只應該有一種信仰。甚至學校監督官也是依照信仰來分的，他只能監督同信仰的學校。

在二十世紀初葉以前，學校是保存收費制的（除了幾個城市以外）。學校是男女分設的（除了人口過少的區域以外）。

在初等學校的教育工作中，宗教（而且是僧坊主義和懺悔的宗教）的影響是很強大的。



中學

實科派和古典派之間的尖銳鬥爭，是七十——八十年代的特徵。資本主義的發展提出了對實科中等教育的更大的要求，因為德國的中學是雙倍的古典中學。但在九十年代以前，只做到減少一部份拉丁文和希臘文的授課鐘點，和在中學校中添加了範圍很有限的自然科學。

一八九二年建立了三種中等學校的學制：（一）以拉丁文及希臘文為教授中心的古典中學，（二）只授古典語文中的拉丁文一種的實科中學，（三）不授古典語文而以數學、自然科學兩種現代語文為教授中心的高級實科學校。一九〇一年的法令承認這三種中學（各種九年）有全權准許畢業學生升入大學。

但在數量上仍以古典中學佔優勢。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普魯士有三百二十四個古典中學，一百個實科中學，和五十個高級實科學校。

除了九年制的中學以外，古典預備中學，實科預備中學和實科學校也是在德國極普及的。所以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的國民教育體系是這樣的：

六 學		
高級實科學校 (Oberrealschule) (九年)	實科中學 (Realschule) (九年)	古典中學 (Gymnasium) (九年)
家庭教育 或 起等學校		



**德國社會  
民主黨的  
學校政策**

從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九一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就是在拉塞爾學說的有力影響下所編成的哥特綱領。馬克思在他的「哥特綱領批判」中，給了這一綱領以尖銳的批評。哥特綱領在國民教育方面所提出的要求是：

「普遍的和人人平等的國家經辦的國民教育。免費教育」。綱領更提出了「信仰自由」的要求。

馬克思指出這一綱領中的許多地方的不正確性，說：「在綱領所提到的現代社會裡，教育是不能平等的；關於各級教育機關的免費教育的要求，馬克思認為如果這也指「高等」學校中的教育的話，那末實際上這「只是說，高級學校的教育費要由普遍的納稅方法來維持」（馬恩文集第十五卷第二八五頁）。

年 齡	職業學校	
	(一、二、三年)	中間學校 (六年) (Mittel Schule)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高等國民學校 (四年) (Volksschule)	
	初等學校 (四年) (Grundschule)	



關於宗教的一條，馬克思指出：工人政黨正要求解除宗教迷信的信仰，而哥特綱領所宣佈只是市民階級的「信仰自由」。

一八九一年，通過了一個新的綱領——埃爾富特綱領，這個綱領草案的起草人是當時已經站在機會主義立場上的考茨基。綱領對勞工專政問題一字不提；代替了這一根本問題，綱領提出這樣的思想：勞工階級只有通過議會的方法才能取得生產工具（也就是說否定勞工革命專政的必要性）。不但如此，而且在最低限度的綱領中甚至沒有民主共和國的要求。

埃爾富特綱領在關於國民教育的條文中，也像在它的政治和經濟要求中一樣，包含了許多機會主義的成份。關於國民教育的條文是這樣說的：「宣佈宗教信仰為私事……學校是世俗性的。強制兒童入公立的國民學校。公立國民學校中，和高等學校中的學費、書籍費、膳費是免收的，並承認男女學生按照他們的能力享受高等教育是適宜的……禁止未滿十四歲的兒童從事工業勞動」。

我們看出，這裏也有馬克思在「哥特綱領批判」中所指出的那些機會主義的條文：宗教是私事，各級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為一切「有能力」（而不是貧苦）學生免費享受。這後面一條，因為在市民階級社會裏是只有有錢人可以受高等教育的，所以使市民階級能把自己的兒童的教育費移到人民的資產上。

在指出埃爾富特綱領的，這些機會主義的特徵時，還應該指出，和哥特綱領相比，這個綱領已有相當的進步：供給國民學校學童（即勞動者兒童）的書籍和膳食的要求，提出了未來的實施普遍教育的可能性。

埃爾富特綱領作為領導的黨的文獻一直保存到一九二一年。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是一九二一年比一九一一年增長。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和大戰期間是特別強化的。



這種機會主義的強化也反映在國民教育問題上。在一九〇六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明亨代表大會上，亨利·蘇里茨作了一個關於國民教育問題的報告。這一個報告和大會所通過的提綱都顯出了機會主義的特色，尤其是在具體的實際要求上。蘇里茨的報告和大會提綱完全抹煞了勞工階級爭取學校鬥爭的作用。在報告和提綱中沒有指出作為新教育的政治先決條件的勞工專政。蘇里茨雖然說到訓練青年為自由而奮鬥，說到同胞的感情，愛真理和愛正義等等，却完全忽視了社會意識的教育。

第一個教育要求就是：「帝國學校法規建立在整個學校事業世俗性和統一性的基礎上」。如果我們研究，埃爾富特綱領沒有提出民主共和國的要求，那末「帝國學校法規的建立」自然是指霍根佐倫領導下的大地主君主政體所頒佈的法律了。像這樣的「帝國學校法規」，自然是不能滿足勞動人民的。

在「世俗性」這一個術語的不同的解釋下，在「世俗性」的概念的伸縮底下，學校世俗性的混濁的提出也就不能令人滿足了。在蘇里茨的「社會民主黨的學校改革」一書中（一九一一年出版），也像在埃爾富特綱領中一樣，是在機會主義的原則形式上解釋這一「世俗性」的：「宗教——是每一個人的私事」。蘇里茨着重指出：社會民主黨不反對宗教和教會，而只是反對教會的政治權力。明亨代表大會的提綱中所提到的學校「世俗性」，絕不是指反宗教教育或非宗教教育而言，也沒有要求學校與教會分立。它只是承認不強制對父母事先申明不願。施神學教育與他們的兒童的那些學生實施神學教育；但學校中的神學的教授是保存着的。

明亨代表大會，關於國民教育的其餘提綱也沒有比市民階級的民主要求更進一步。和這些機會主義的原則相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在蔡特金的著作中提出了真正革命的要求。克拉拉，蔡特金要求學校與教會完全獨立，普遍的強制的免費的初等教育，由國家出資供給貧苦兒童書籍、膳食與衣服。蔡特金對婦女的不平等權利和降低婦女教育水準的鬥爭是特別注意的。蔡特金對婦女解



放問題和吸收婦女參加社會生活特別重視，要求廣泛的組織學齡前教育。

蔡特金在白里門第三屆婦女代表會議上的「學校問題與勞工階級」的專題報告中，對市民階級的文化 and 市民階級的教育作了深刻的批評。他指出了依存於市民階級的科學家和藝術家的地位，說「市民階級社會把文化降落到商品的程度——商品是一切有錢人都能購買的」。蔡特金以「野蠻和可恥」來形容二十世紀前夜的德國學校狀況，並用數字證明市民階級阻碍深刻和普遍的教化民衆的事實。

蔡特金指出家庭教育的重大意義，同時也指出社會教育——統一的共同學習的學校——的優點。勞工階級所爭取的學校應該供給消除了宗教的影響的高深的科學知識，和各方面的發展人。

### 三·英國學校

#### 初等學校

一八七〇年的法令，奠定了英國初等國民教育事業的法規基礎。在這一法令發展上，又頒佈了許多法令（一八七六年，一八七八年，一八八〇年，一八九一年，和一八九三年），並根據它們實施了七歲至十一歲兒童的義務教育。未滿十一歲的兒童祇有在證明他們已經受過初等義務教育或將被送入日間學校之後方准入工廠做工。

根據一八九一年的法令，學校補助金是依據學生數量，考試和紀律的成績發給的。對初等教育的補助金數額大大的提高了。這一措施到十九世紀末葉便促成了初等教育免費制的實施。

到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為三歲至六歲兒童設立的幼稚園已在英國和蘇格蘭境內得到極大的普及。在這些幼稚園中，教授兒童的體育教育，發展外感覺器官，發展兒童的言語能力。兒童學習閱讀，書法和計算。

繼幼稚園以後的是六年——八學年制的初等學校（為十二歲——十四歲以內的兒童而設）。初等學校的授課計劃和課程表是相當複雜的，因為英國的國民教育體系不像法國，是建築在地方分權的原則上的。



。教育部沒有規定強制的授課計劃和課程表，只是規定受國家補助的學校所應供給的閱讀、書法、文法、算術、圖畫和（女生）手工等的最低限度的知識容量。

除了這些科目以外，教育部更提出，而在學校中也實際上教授下面的一些科目：英國文學、地理、歷史、自然、唱歌、體操。在有些學校裏，男生學習勞作和園藝，女生學習烹調方法。在有些學校裏，學生自願的選讀德文、法文、代數、幾何，初等物理和化學，簿記學和速記術。

對那些添授補充科目的學校（雖然只授與一部份學生），國家也給與每一科目以補充的補助金。

學校是男女兒童分別設立的，或在一個學校裡存在着男生部和女生部。

一八七〇年的法令，規定學校委員會有在本區實施或禁止神學教育的權利。

實際上宗教教育是在一切學校中保留着的。通常宗教教育是在每天的最初幾小時或最後幾小時實施的。此外，學校不但很關心的解除學生在休假日（星期日）的工作，而且解除他們在星期六的校課，使兒童們能到教堂設立的禮拜學校去受牧師的宗教教育。牧師用了種種方法，直到收買貧民父母，引誘他們的兒童進禮拜學校。

這些禮拜學校除了教授「神學」以外，還組織了各種遊戲和運動比賽；在電影發明後，更舉辦了電影會；有關的宗教團體還要對那些送子弟入禮拜學校的貧民父母送禮物。

最後要指出，「全國優勝教會的貧民教育協會」也設立了大量的學校（大半是小學）。也有許多學校是其他宗教團體設立的。這些學校都受政府的補助。

在大城市中，存在着數量不少的所謂「中心學校」（高等小學）中心學校是四年制的，以六年制的初等學校為基礎。

建立在八年制的初等學校的基礎上的是學年不同（一—二—三年）的手工學校和職業學校。建立在中心學校的基礎上的是三年制的高級技術班。



## 中學。國民教育體系

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至一九一八年期間，英國中等學校的數量曾有長足的增加，同時在資本主義要求的影響下，古典主義的優勢也受了相當的削弱；在中學校的課程表中，自然、物理、化學、數學佔了比以前更大的地位。甚至完全受古典教育支配的幾個最老的貴族學校，都不得不組織了各種分科：實科、商科、工程科。

國家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十年中還像過去一樣是不參與中學教育的事業的。中學還像以前一樣是由社會公立和私人創辦的。

在中等教育的組織方面，只有在在一九〇〇年國民教育部產生以後才發生了顯著的變動。

一九〇二年，代替原有的只管轄初等教育的學校委員會，成立一個兼管初等與中等教育的地方機關——設於郡議會之下的教育委員會。

政府依照一九〇二年的法令開始對那些符合於相當要求和服從政府監督官監督的中學校撥給補助金。不受補助而符合於國家所規定的要求和服從國家監督的學校，能夠請求編入「承認學校」的等級內。

「承認學校」是為十二歲至十七歲的少年而設的，普通有六級。此外還有專為九歲至十二歲兒童而設的預科。

依照一九〇二年的法令，中學授課時間每年不得少於三十六星期。學生中的懺悔性的神學教授是禁止了；但對父母願意實施這種教育的兒童則允許由父母或宗教團體負教育之責。因此這一個保留就把法令上正式訂定的懺悔性的最低限度的「限制」完全抹煞了。宗教教育還是全部的存在。

國民教育部沒有訂定中等學校的授課計劃和課程表，而只要求「承認學校」應教授：英文與文學，外國語中的一種，地理、歷史、數學、物理、自然、圖畫與製圖。

這些法令的要求不管如何的普通，却在其中表現出相當的原則：廢除了過去中等教育中的只偏向於語言學尤其是古典語教育的偏頗性，承認了實科教育的價值。



但實際上在英國的中學校中，尤其是專為貴族和市民階級上層而設立的不受政府補助和監督的中等學校中（伊頓、萊格比、韋斯敏斯德、哈洛、聖保羅等學校），古典主義還是很有力的。在其他許多學校中，雖然也實施了容量不大的自然科學的教授，而古典語仍是最主要的學科。

中學課程表是極端複雜的。教授方法遠比歐洲其他各國為低落。短短的學年，數量不多的每週授課鐘點（二十二—二十四小時）遠不能促進廣泛和深刻的智力教育。學校工作的重心是體育教育、性格、意志、毅力的教育。

雖然中學預科和小學之間並沒有很大的區別，但英國中學對於勞動階級是很少開放的。有許多中學是專為貴族和市民階級的上層而設的（這就是前面說過的伊頓、哈洛等四十個左右的學校）。這種附有宿舍的學校是收費極高的。一九〇二年的法令規定中學補助範圍只限於那些免除百分之二十五學生（即由小學升入中學的學生）學費的中學。這個措施顯然是為資本主義對於工程—技術和商業人員的需要所引起的，但由於勞動者的生活無保障，甚至這樣的措施都還是把中學留在貴族和市民階級的手裡成為他們的私產。

英國國民教育體系可用下表來說明：

大學	年齡 廿二 廿一 廿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中學 (Secondary School)	
中學預科	
家庭教育	



## 四·美國學校

所以在這一個體系中，也有着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的學校體系所特有的二重性：一個是民衆的學校體系，另一個是特權階級的學校體系。固然，從二十世紀初期起出現了某些由小學升中學的薄弱的可能；但這在本質上只是用「民主」的國民教育體系的外貌來欺瞞勞動民衆的工具。

年齡		
廿二		
廿一		
二十		
十九	高級技術班	
十八		
十七		
十六		手工與 職業學校
十五	中心學校	
十四	(四年)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初等學校(六一八年)	
九	(Elementary School)	
八		
七		
六		
五	幼稚園(三年)	
四	(Infant School)	
三		



## 國民教育體系

### 學校特徵

美國的國民教育在一八六七年全國（聯邦）教育局成立以後還是建築在地方分權的原則上。

每州的國民教育管理權是屬於教育委員會的，教育委員會的成員通常包括：州長、副州長和監督官（國民教育的主管長官）。後者在某些州裡是由州長委任的，在另外一些州裏由議會或直接由人民選舉。通常學校委員會所擔任的工作是確立公立學校的型類，學校的年齡，編製模範的課程表，和分配國家的補助金。

在每一個學校區裏，學校管理是由選舉的評議會實施的；這個評議會確定學校稅的範圍，學校開辦的程序，教師俸給的數額等等。

有些州內的教師是由學校監督官委任的，在另外一些州裏是由學校評議會委任或（不常有）由人民選舉的。

由於這種地地方分權化的結果學校型類，授課計劃，課程表，以及教育普遍性、免費性和強制性的實施時間，也就各州不同了。初等教育的強制性是最初從十九世紀中葉在個別幾州開始實施的。到一八九一年有二十六州（全國共四十八州）確立教育的強制性。到十九世紀末全國各州的初等學校都已成了強制的教育機關了。

學校預算，是美國國民教育組織的積極特徵：美國平均每一人每年所負擔的教育費，比其他資本主義各國都要大；學校經費的來源有兩個：（一）以某種對所得稅的百分比的附加方式所征收的學校稅；（二）由聯邦政府轉讓於學校的大批的國家土地。

美國誇耀她的國民教育制度是「民主」的制度。但佔美國人口極大百分比的黑人教育，尤其是在南方各州，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這一時期仍處於悲慘的地位。在八十年代初期，黑人文盲的百分比達到七十八（而當時白人文盲僅佔全人口百分之十六）。十九世紀中葉最初為黑人所創辦的學



校引起了農場主的反對，就不得不停辦了。八十一九十年代開辦的黑人學校成了對學校的諷刺：半文盲的教師；平均每一學生在學校求學時期總共不過二年四個月；學校所供給的貧乏的智識等等。據一八九〇年的調查，黑人中的文盲百分比為五六·八，白人中的文盲百分比為七·七。如果注意一下在南方幾州黑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事實，如果更注意一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這一時期中十五州所實施的法律是規定把白人和黑人的學校嚴格劃分起來的話，那末排除了真民主的美國學校政策的種族原則就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了。

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農村的國民教育體系間也存在着極大的差別；在城市中有優良的校舍，熟練的教師，良好的學校設備，教授方法上的發現；在農村學校中，校舍都是普通的往往是簡陋的小屋，教師是訓練不足的，一個女教師要教六十多個學生，一學年中的授課日數又極少（平均一百十五天）。

各級學校是男女共學的，但也有大量的學校（尤其是「私立」學校，即大部份由教會經營的學校）是只為男童或只為女童而設的。

在公立學校神學教授的形式上的禁止下，宗教教育却在學校中佔了極大的位置；在大多數學校中，每日上課之前要唱「我主」歌或讀福音書中的一節。在各科教授上也實施宗教教育。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唯物的解釋是嚴格禁止的。

在學校中，傳播着市民階級的道德和一般的市民階級意識形態。

在美國，沒有西歐各國學校中所有的那種學校體系的二重性。美國學校體系在形式上是單一的。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這一時期中，大多數州內所通行的學校體系是叫作八—四制的（八年小學和四年中學）。八年小學是普遍、強制和免費的。但在最後兩級却有大批的學生——貧民的兒童——受淘汰。他們不能負擔長期的兒童學膳費。許多州裡在這一時期的末期由八—四制改為六—三—三制，



就是說，把小學改爲六年，中學分爲兩級，每級三年。因此，到這一時期的末期，在各個州裡形成了兩種學校體系。這兩種體系可以用下面的圖表來說明：

廿四	大學研究院之科學活動準備	
廿三	大學 (College)	高級大學
廿二		初級大學
廿一	中學(四年) (High school) 或職業學校	高級中學(三年)
十九		初級中學(三年) 或職業學校
十八	小學校(八年)  (Elementary school)	小學(六年)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幼稚園	
四		

幼稚園的普及並不廣：進小學一年級的兒童是難得有十分之一進過幼稚園的。



## 小學

八年制的初等學校通常分爲二個等級：初級四年，文法級也是四年。

在這些學校的課程表中，包含閱讀、書法、綴字、文法、英文學、算術、幾何、代數、自然、衛生、初等物理與化學、道德與公民、圖畫、唱歌、體操，女生更有裁剪、編織、家政。在許多州裡，此外還有手工、土地測量、簿記、現代外國語中的一種。

初等學校中最注重的是語文（閱讀、書法、言語、正字法、文法）和算術。在一九一四年，這些學科佔全部課程時間的百分之五十四。歷史、公民、地理、自然與衛生合佔課程時間的百分之十五。「選科」：體操、圖畫、音樂、手工、家政合佔百分之三十一。

所以，普通科（國語與算術不計）所佔的時間並不多，而「選科」却佔了很多的時間。這些科目的正式目的，是在發展兒童的積極性，創造性，和靈活性，培養他們的毅力等等。實際上，這只是在降低勞動人民的普通教育水準。

在學生數量衆多而教師不多的城市學校裏，一個教師同時要教授一級。而在鄉村學校中，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這一時期中，始終盛行着單軌學校制，一個女教師要同時教授全部八個學級的學生。

在這樣的條件下，教師給與每一學生的教育時間，就不得不減少了，學校工作的重心，也不得不移到學生的自修工作上。在發展學生自修工作的習慣的意義上，美國學校確有極大的成就。在單軌學校中的各級學生同時教授，養成了教師在工作上的清楚明確。

但雖然有這個優點，這些單軌的農村學校的工作成績畢竟是不大的，到了這一時期的末期，就開始組織合併的農村學校（稱統一學校）。統一學校的活範圍包括過去五個至十個小學活動的區域。這就容許依照城市學校的形式來組織教學方法：一個教師至多在同一時期教一級或二級學生。

在一八九〇年，小學平均一學年的授課日數在城市學校中爲一百九十天，在鄉村學校中只有一百十



五天。同年學生上學的平均日數在城市學校中爲一百三十三天，在鄉村學校中只有七十一天。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十年中，公立小學網在數量上的發展是很迅速的：在一八七〇年，公立小學的學生人數爲七百八十萬人，而過了二十五年，在一八九五年，學生人數已增到一千四百二十萬人了。後來由於強制教育實施完成的結果，學校網的發展速度就逐漸緩慢了：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這些學校中的學生人數平均已是一千九百四十萬人了。

在學校網的迅速發展下，國民教師的準備遠趕不上學校的發展。在一八七〇年，供給中等師範教育的師範學校總共有五十三個，在一八九二年，師範學校的數量固然增加到一百六十個，但這些學校的畢業學生遠不能保證對於教育上有準備的教師的需要。甚至在這一時期終了後的一九二五年，美國的資料還不得不承認小學教師的極端不良的準備狀態：根據中央教育局在一九二五年的統計：「美國四分之三的教師是教育不夠的」。一千一百萬以上的兒童在受未經訓練的女教師的教育，三百萬以上的男女兒童在受本身還沒有獲得中學教育的女教師的教育」。

教師的經常更換，是小學校在師資方面的第二個缺點：根據一九二四年的統計（更早是不用說了），四分之一的教育每年保留自己的工作，而在保留者當中，有三分之二的教師是每年換學校的。

這些缺點的原因（尤其是在農村學校中），是小學教師的俸給過於微薄，下年度的教育工作毫無保障（在有些州裡小學教師的任期只有一年），各州教師薪資的差別極大，教師功課負擔過重。小學教師的報酬甚至低於許多不熟練勞動的報酬。尤其是黑人學校的教師，收入往往還不到最低限度生活費的三分之一。

這些原因，促成了「金元國家」的男子甯願擔任另外的工作，而把小學教師的職務「慷慨地」讓給婦女。女教師在小學教員中的比例在有些學校達到百分之九十五，在全國平均達到百分之九十。



## 中學

在七十八十年代，美國公立中學的數量極少；在一八九二—一八九三年，學校數為二八一二個，學生數為二十三萬三千人。到一九一〇年，學校數幾乎增加了五倍，學生數增加到一百十萬零五千人。

與西歐各國的中學相比，美國中學的積極特徵，是免費制（雖然沒有做到普遍開放），男女共學，與小學銜接，並為小學的直接繼續。

在美國學校事業地方分權化的條件下，中學校的授課計劃與課程表是極端複雜的；有嚴格古典主義的學校；有古典文中只授拉丁文一種的學校；有實科學校。也有許多中學除了授普通科的學科以外更授專門科：商業，農業經濟、技術、速記等等的。中學往往分為許多部門，每一部門的目標除了供給普通教育的知識以外更供給實際生活的知識。

美國一切中學的授課計劃雖然互有不同，而注重體操、運動和遊戲却是一樣的。

我們在檢討歐洲學校時所提到的那些方法上的成績，在美國學校中得到了最完全的表現。在這裏，廣泛採用（尤其是城市中學中）實驗室的研究工作，注重旅行參觀實施電影教育，採用學生的自修工作。



## 第二十四章 戰前帝國主義時代的市民階級教育學

### 「新學校」

「新學校」的特殊的教育潮流，是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市民階級教育思想中的現象之一。這一潮流的基礎，決不是任何一種確定的哲學體系。它可以說是不需要哲學目標的；這一潮流結合了在基本方法立場上互相不同的許多教育家。

在「新學校」所需要滿足的要求上，表現着許多教育家尤其是盧梭的影響。但如果盧梭的教育學雖然有其許多錯誤的原則，仍不失為當時進步的教育學的話，如果盧梭是民主主義者而夢想新社會的成立的話，那末，「新學校」的基本群眾所努力的却是曲解盧梭，利用它的某些理論來服從於完全相反的目的：鞏固衰落中的市民階級制度，準備市民階級社會的「積極指揮官」，使市民階級上層的青年變為殖民者和反對勞工的鬥爭領導者。

「新學校」——大多數是中學。學生不但在校內學習，而且在校內生活。這不是國立學校，而是個別教育家或市民階級的教育團體所開辦的私立學校。

「新學校」中的學生學膳費（除了少數的例外）是很高的，達到了戰前每年幾千個法郎。因此被選取的只有富人的兒童。

和德國的古典中學及英國的傳統中學相比較，「新學校」確是一種新鮮的存在。「新學校」的積極特徵是：歐洲中學校中所沒有的共學制，良好的體育及美學教育的實施，反對學科過多的傾向，沒有大陸歐洲各國中學所特有的形式主義和繁文縟禮。

這些積極特徵，加上手工勞動的實施，和「新學校」在郊外的自然環境，給予某些小市民階級的教育家以特殊的印象。他們在組織「新學校」時，夢想實現一種改造人類的「教育中的綠洲」。顯然這些



夢想觸到現實就破產了。

和繁文縟禮的中學校相比，「新學校」是自由主義的現象。普魯士政府的教育部甚至認它是「左派」的產物。從我們的立場來評價「新學校」，我們就在它的自由主義的外貌之後看出它的階級的本質。克魯浦斯卡亞還在一九一一年就給「新學校」作了正確的估計：「我們常把市民階級的『新學校』理想化，注意它的外表，而忽視它的與民主主義絕緣的，徹頭徹尾浸透了實利主義的精神。又是在花園中授課，又是注重唱歌和圖畫，又是實施手工勞動，又給兒童以自動餘地，又對兒童保持密切的關係，以及諸如此類的長處。但這些學校教兒童崇拜現存的極端愛國主義，崇拜宗教對於無知人民的需要，和沒有證書就沒有得救的思想」（註）。

「新學校」不是設在城市中，而是設在鄉村中；這是農民的學校。這種要求是從盧梭那裏抄襲來的，因為盧梭會叫他的愛彌兒離開城市到鄉村去接近自然。但如果盧梭這樣做的原因是爲防止他的學生去接觸封建制度解體時代城市中所特有的奢華和頹廢現象，那末「新學校」所努力的却在防止兒童去接觸貧困、失業等的景象。兒童在「新學校」中受教育的許多年中，是被鎖在市民階級的「幸福」的小世界裏的。「新學校」設在鄉村中的另一個目的，是在良好的自然條件中教育市民階級的兒童。

「新學校」的國際聯合組織認爲「新學校」的學生可以不住在寄宿舍，而以八人至十二人爲一組散居在民房和「新學校」教師的家庭中。

外表上，在這一願望中也反映着盧梭的影響：據「新學校」的教育理論家說來，學校應該爲兒童創造家庭的環境，重視家庭的影響。但在這一「家庭環境」之後，如果考慮「新學校」的整個目標的話，也隱藏着另一種努力。「新學校」是用這種方法，來加強它的市民階級道德教育的目的，加強對學生的

（註）克魯浦斯卡亞，國民教育問題。



監視，對他們的思想形式，對他們的閱讀等的監視的。

在「新學校」中，兒童每日至少有一個半小時參加勞作活動（這也「模倣虛梭」的木工和農藝活動）。這種勞作是被看作鍛鍊兒童體力和發展兒童積極性的工具的。「新學校」中的體育教育——體操、遊戲和運動等等——也是服從於同樣的目的。經常的旅行，尤其是繼續幾日之久的「遠足旅行」的組織，也是爲了同樣的目的。

在教授法的原則上，「新學校」也企圖模倣虛梭，重覆了他的許多不正確的原則：「教育應該遵循兒童天然需要的軌跡」——這是一個以兒童中心主義爲基礎的不正確原則（我們要顧到兒童的需要和興趣，要引導它們，但不能從這些需要和興趣出發，也不能跟在它們之後）。

「新學校」的國際組織對於理論永遠跟在實際之後的要求，也是不正確的。這是會發展兒童對於週圍環境的實利主義的觀點，和降低理論的作用的。在這裏反映着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學的不正確的實利原則對於「新學校」的影響。

在反對學科過多的正確的教育學原則的名義上，有些「新學校」就誇張了這個原則，在一個月中只研究幾種學科，和在一天中只學習一種或兩種學科。

許多「新學校」的低年級的課程不是建築在各個學科之上而是建築在破壞知識系統性的複合原則之上的。「新學校」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弗里爾曾依據「兒童的興趣特徵」，介紹了一套複合原則的課程表。

在「新學校」中，有依照立憲市民階級的國家形式而建立的「學生自治會」，其目的在訓練學生崇拜市民階級的制度和運用市民階級的國家「機構」（開會規則等）。

最初的「新學校」發生於歐洲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英國：一八八九年創辦了阿巴斯霍爾姆學校，後來又創辦了畢達爾學校。德國、法國、比利時、瑞士，美國等在九十年代也仿照了它們的形式設



立幾十個學校。

在日內瓦設有「新學校的國際聯合會」。

這一學派的最著名的教育家——代表：在德國爲李滋和維納根，在法國爲特慕倫，在瑞士爲弗里爾。

克爾森

斯坦納

從一八九五年起在慕尼黑領導國民教育事業的德國教育家克爾森斯坦納（一八五四—一九三二年）是戰前市政階級教育學的著名代表之一。

他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思想。他所理解的公民教育，就是市民階級國家的忠實儲備的教育。如果「新學校」的教育學的主要目標是在教育市民階級的上層的話，那末克爾森斯坦納所負擔的已是第二部份的任務——研究符合於市民階級利益的勞工兒童思想改造的方法。

克氏認爲吸收勞工青年入學校的最主要的工具是勞動學校。

他要「操縱青年公民」，「掌握對他們的領導權」，就認爲勞工不肯把他們的兒童送到這兒和他們敵對的學校是可能的。因此他企圖用勞動學校來吸收勞工的兒童：「我們能夠和必需在什麼地方去捕捉（packen）青年公民呢？在勞動中」。

克氏的勞動學校所供給的普通教育知識是只在市民階級爲了訓練熟練工人所需要的程度內，但竭力用勞動教育，某種手工方面的相當勞動知識，來吸收勞工兒童。同時，克氏還作了一個保留說：「勞動應該是一種閉鎖的教育部門」，就是說，學校中的勞動教育不應該和普通教育的學科有聯系。勞動教育應該只是準備執行某一種的勞動職業。克氏認爲對於準備「學術」職業的支配階級的兒童，勞動教育是多餘的。

343  
到了充分的表現。

帝國主義時代市民階級教育學中所代表的觀點，在克氏的普通教育的勞動學校的這一「論據」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在十六—十八世紀和在十九世紀初期，摩亞、貝拉斯、盧梭、裴斯塔羅齊等的教育觀中的勞動教育



的思想，是反對經院主義學校的抗議，是發展兒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工具，是反對特權階級的懶惰的抗議（我們記得盧梭曾叫道：「一切懶人就是盜賊！」），是發展兒童人性的工具（裴斯塔羅齊說過：我把家政、農業和手工業看作達到主要目的——發展人性——的補充工具）。

如果摩亞、盧梭、裴斯塔羅齊所說的是手工業，那這在歷史上是明白的：當時還沒有另外的工業（工場手工業也有它的手工業基礎）。同時這三人不僅說到手工業一種，而認為除此以外兒童還必需研究農業。克爾森斯坦納生活在普遍發展的大工業時代，但他却沒有把狹隘的落後的手工勞動的研究和普通教育的學科聯系起來。

在克氏所宣傳的為勞工青年設立的特殊的學校類型上，所謂「補充學校」（Fortbildungsschule）上，特別強烈的反映着他對職業主義的偏向。這是一種每星期授課二次的二年制的夜校，專收小學畢業的勞工青年。在這些學校的課程表中，有閱讀、書法、計算、自然。但這一切學科的教授是「適應於已就業的青年的職業」的。對於農民青年，設有農業補充學校；更有釀造業者、臘腸製造者等等的補充學校。「自然科」對於農民只限於農業知識，對於釀造業者則主要為釀造過程等等。

這些「補充學校」的本質是明白的：（一）以狹隘的職業知識限制小學畢業後勞工青年的更進一步的教育，避免真正廣泛的一般教育；（二）提高狹隘的職業上的熟練程度，以便向青年工人進行更大的利潤壓榨。

克爾森斯坦納是宗教教育的擁護者；他重視學校中的宗教的教授，並把宗教和民族主義密切聯系起來。

克氏在他的「性格的概念和性格教育」（Charakterbegriff und Charaktererziehung, 1912）一書中，研究了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教育問題。



他所了解的性格，就是「一經安定的精神狀態，在這一狀態之下，每一個意志的行動是決定於固定的原則的」。

然後分析這些性格的特徵，克氏指出四個要素——意志的力量、判斷的明確性、敏感、心理的昂奮性，並為每一類的訓練提出了許多教育上的指示。說到意志的力量，他最重視意志行動的持續性。說到學校中的性格教育，他指出勞動和勞動的集體在這方面有着極大的意義。

在克氏關於性格教育及其要素——意志力量、敏感等等的教育指示上，包含了很多寶貴的東西，尤其是當他說到方法的時候。但從政治目標上說來，從性格教育的目的上說來，克氏的理論也像他的其他言論一樣是逆流的：他努力使性格服務於市民階級的國家，並在「個人服從於全體承認的權威」的意義上去利用它。

克氏在兒童藝術創作的研究上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實驗工作是值得注意的。克氏在「兒童藝術創作的發展」一書中，根據三十萬幅的兒童繪畫的多年實驗，研究出兒童在繪畫方面的藝術發展的階級。

克氏利用繪畫分析的方法所得到的結論是兒童在他的造型活動的發展上通過四個階段：（一）概圖的階段，（二）形與線的感覺發生的階段，（三）利用影繪及輪廓線的方法的近似描繪階段（四）塑像表現的階段。

在克氏的結論中有許多不正確的論斷（原始人民和兒童間的藝術創作的類似，在藝術關係上勞工兒童的天才過於富人兒童和女童過於男童的論斷）。這一研究的最大的缺點是完全從形式方面來分析兒童的繪畫。

但除了這些缺點以外，克氏的著作在繪畫方法上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更指出了繪畫對於發展觀察能力，對於技術目的和對於美學發展的意義。



## 「行動」教育學。拉伊

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的德國教育家奧古斯特·拉伊（一八六二——一九二六年）企圖用生物學的現象解釋教育學，把教育歸結為反應的產物。

拉伊在「行動學校」、「實驗教授法」等書裏闡明了他的教育觀。關於方法問題，他寫過「算術方法」、「自然歷史教授法」等著作。拉伊認為任何有機體的每一個生命行動，是依照下面的公式來完成的：「知覺——改造——表現」。從原生動物起，到人類為止，一切有機體的任何行動，都要通過這個「普遍」的公式。

在這機械的三位一體中，拉伊認為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個成員——表現。或行動，拉伊的教育學也是由此得到「行動教育學」、「行動學校」的名稱的。

據拉伊的解釋，人的這種「行動」完全是推進的反應。拉伊認為這種推進的反應在教育過程中佔了極大的位置。在教育時的主要注意目標是學生的造型活動：繪畫、模塑、製圖、演劇、唱歌、音樂、經驗製作等等。

依照拉伊的原則而建立的學校，可以很公正的稱作圖解學校。

依照伊的原則建立的學校大部份時間化在繪畫、製圖、模塑、演劇等之上，因而不得不縮小了學生的知識容量。往往這種造型活動是和真正的教育工作脫節的。例如，文法規則的實例不是簡單地用口頭或文字引用的，而是用彩色的鉛筆畫出來；在研究文學作品時，大部份時間消耗在用彩色描繪它的個別的要素。却不去分析作品的內容、言語、人物特徵等等。

繪畫、製圖、模塑等的重大意義，特別是在學齡前教育和小學教育過程中，是不能否認的。圖解可以訓練兒童很細心的觀察事物，在許多場合下是最經濟和最精確的表現的工具。它在中學校中也有極大的意義，例如在植物學、動物學、生物學的教授上繪製顯微鏡所窺見的目的物。但把這種造型活動當作神明一樣來崇拜也是絕對不正確的。



拉伊在提出每一個人、動物、原生動物的有機體的生命過程中所通過的杜撰的機械的三位一體（知覺—改造—表現）之後，更企圖把課程表去適應這個三位一體，稱它爲「有機的課程表」。在這個表裡，列在「知覺」的一欄的是自然、地理、宗教、歷史、哲學；在「改造」欄內，拉伊甚至在他的牽強附會的解釋下不包含任何科目；最後，在「表現」欄內，他包括：（一）模型、實驗、動植物的看護，而用種種理由把這些各各不同的科目聯合在「塑像表現」的總標題之下；（二）繪畫形式的表現；（三）「數學的表現」——算術、幾何；（四）文字表現（演說、閱讀、書法、作文的學習）；（五）音樂表現（唱歌、音樂）；（六）「利用動作幫助的表現」（演劇、遊戲、舞蹈、體操）。

這一課程表的杜撰性和人造性是一望而知的：沒有一貫性和系統性——用種種理由把語言、文學、數學的學習歸到「造型（表現）活動」中。在自然科學中是破裂的：拉伊把自然科學的教授到觀察——知覺，而把實驗歸到造型（表現）活動，好像在實驗的時候學生就沒有觀察。學科的分類是不正確的，恣意的，不是根據每一學科在自然和社會認識中，在世界觀的產生和多方面發展中所處的地位，而是根據外部的非實質的標誌——是不是「表現——造型」的。但甚至連這一個標誌都是不適用的：用種種理由把言語，作文等的學習歸到「表現」教育，而把歷史和地理歸到「觀察」教育。那麼學生沒有用講述、用口頭或文字答覆的方法來「表現」自己的知識就不能研究這些學科——地理、歷史等等的了。同樣的，把歷史歸到「觀察」的科目是更奇怪了：很早就過去了的歷史事實不能「觀察」的。

從他的唯心論的立場上說來，拉伊是民族主義者。他完全擁護宗教教育，認爲每一個科目應該充滿宗教。

拉伊稱自己爲「實驗教育學」的擁護者，但是他的「實驗教育學」和「實驗教授法」歸結起來大部份是把學校生活的事實去順應普遍的完全不正確的三位一體：「知覺—改造—表現」。

我們在駁斥拉伊的整個教育理論時，同時要指出他的教育觀中的個別的積極特徵：對機械背誦的學



校的批評，對兒童積極性的要求（雖然拉伊本身對積極性的了解是不正確的），關於兒童造和創作的某些方法上的指示。拉伊在實驗教育學中（在他和曼孟的論戰中），正確的指出：教師應該在自身教育兒童的過程中去研究兒童，教授法的實驗應該盡可能的接近課堂中的普通的教授實踐。

拉伊從他的三位一體出發，也建立了「自然——歷史教授的方法」。在這一方法上，有許多不正確的逆流的成份。這個方法是建築在唯心論的認識論的原則上的，拉伊企圖把這一認識論和他的「普遍的三位一體配合起來；他把自然科學的教育去服從宗教教育，並肯定說：「能够以最自然的方式達到宗教的發展的，與其說是宗教教授的幫助——即使有很多的宗教教科的授課鐘點——不如說是受了自然和人的研究的影響……」

我們要拋棄拉伊的這種神秘主義和把一切教育順應於杜撰的公式的企圖，同時却要指出拉伊的自然科學方法中的許多寶貴的指示。例如他特別着重的提出用旅行參觀的方法去觀察活的自然界，而反對十九世紀末葉學校中的大部份由地圖、模型、圖表上所得來的原則的知識。

「青年們要更接近自然。在自然界中，我們可以找到活的本質，新鮮的色彩，自然的動作，活潑的聲音，正常的發展，普遍的相互作用，多種多樣的統一，簡括的說，——就是完成了的整體！不是孤立的事實，不是稀少的現象……因此就要接近自然！」拉伊認為，受縛的動物，最精巧的模型，最適用的地圖，都是比不上活的自然界的目的物。

形式主義的自然科學教授法的主要注意目標是描繪孤立的動植物的形態學上的標誌，不和它們的生活樣式及生物學的環境相關連；拉伊反對這種教授方法，要求在生物學的同類上去研究它們：「在觀察動植物的時候，要找出和確立因果關係：（一）在生活的同類和生活的樣式之間，（二）在生活的同類和身體的構造之間，（三）在生活的樣式和身體的構造或機能和器官之間，（四）在器官和它們的一切機能之間」。



拉伊詳細地發揮了自然科的旅行參觀的方法，提出了許多關於學校中的自然科學實驗工作的意見，提出了許多關於繪畫意義及方法的意見。拉伊反對那些輕視自然科學對於思維發展的意義的形式教育的擁護者。

### 美國的實用主義教育學

(杜威)

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實用主義哲學成了「金元國家」美國的最普及的哲學體系之一，這一體系的最完全的公式是詹姆士所提出的。實用主義者否認客觀真理和我們人在認識過程中接近真理的可能，而承認利用的原則為真理的標準。真理在實用主義者的觀點看來只是客觀上對某一個個人有用的東西。實用主義所要求的哲學似乎是站在唯心論和唯物論之上的，其實却是主觀唯心論和赤裸裸的經驗論及相對論的結合。利用的標準，據實用主義者的解釋就是「內部滿足」，自我滿足的感覺，也就是說，完全主觀唯心論的要素。

實用主義把社會看作機械的個人的總和。實用主義者驕傲地稱實用主義是生活的哲學，他們所了解的實踐只是個人主觀的實踐。在這一意義上，甚至這一哲學——起源於希臘文 *praxis*（事務）一字的「實用主義」——的名稱，都是很可注意的（實用主義者稱自己的世界觀為「事務哲學」）。

實用主義者宣稱，一切思想、概念、理論，能够被認為是真理的，只是因為它們「為人們工作」，帶給人們實際的利益。實用主義——是市民階級事務家的哲學，是美國商人的哲學。在實用主義者對宗教的關係上，明顯地反映着無原則性。實用主義的鼻祖詹姆士在「宗教經驗的種種」一書中，避免對問題作原則的決定，認定宗教存在的事實是從來為事實本身所証明的，宗教所執行的是「有用的職務」，因為它對於許多人是慰藉的工具，因此，它是需要的。

實用主義——是市民階級文化腐蝕的產物，是原則上決定根本哲學問題的迴避。它企圖消除信仰與知識間的差別，宗教與科學間的差別。



在各種實用主義學派當中，最極端的一種是「器具主義」(Instrumentalism)這是實用主義哲學和教育學的著名代表之一杜威(John Dewey 1859—)對自己的哲學所稱呼的名字。器具主義肯定一切理論、思想、概念應該當作「製造的工具」去評價。

自然，建築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的實用主義教育學就把狹隘的實際提到第一位，而把理論和系統知識的作用降低了。

確實，杜威在他的教育學中，承認「利用」為主導的要素；要求教育從兒童的興趣和實際經驗出發。因此杜威認為教育過程中的領導人物不是教師，而是學生，也就是說，站在完全不正確的兒童中心主義的立場上。由於這，全部的教育過程就帶了自發的性質。

實用主義的哲學和教育學，受了頹廢的直觀主義(Intuitionism)哲學(即亨利·柏格森的哲學)的極大的影響，反對「主知主義」(Intellectualism)而提倡「非論理主義」(Alogism)。

杜威的教育學完全符合於這些不正確的原則，不把普通教育的系統知識提到第一位，而把兒童本身的個人經驗和實踐提到第一位。「勞動是整個學校工作的中心」——這是杜威的狹隘的實用主義的教育口號。這一原則——破壞了學校的正規工作，降低了學生的系統知識的水準，宣傳知識無系統性，降低教師的作用——曾為「學校衰亡論」的宣傳家們所襲用。

杜威在描寫學校工作的組織時，說道：在學校中，應設立許多工場，讓兒童們去學習木工、金屬製造、紡績、裁縫等等；並沒有各種實驗室，學校廚房和食堂，學校農場。杜威認為，學校同時也是兒童的家庭生活的延長。在學校的中心，有博物院和圖書館。

兒童在這些工場、實驗室、廚房、農場中，從他們最感興趣的工作上，開始自己的「思辨活動」。在工作過程中發現對某一問題的知識不夠，這就使兒童得不到圖書館和學校博物院去找答案。

所以，杜威認為兒童是在「製造」過程中學習的。依照他的學習公式，實踐永遠先於理論。完全顯



然，像這樣的學校工作的組織是無論在何種程度上都不能保障有系統的深刻的普通教育的知識的，這只能使這些知識變為斷片性，變為極端無系統性。教師的作用等於顧問的作用。

實用主義的教育學成了最有名的「設計法」的「根據」。在美國實施「設計法」的杜威學生只是把他的深刻錯誤的原則應用到學校的實踐上。

杜威的「教育信條」是實用主義教育學的基本思想的最簡潔的說明。杜威在這一信條中，激烈反對教室授課的學習制度，反對系統知識和學科。

杜威激烈反對把學校和教育看作兒童參加未來社會生活的準備，並宣稱：「學校不應該以未來為目標，而應該以現在為目標」，學校是兒童生活的一部份。

在這一學校應以現在為目標的號召中，反映着市民階級對於前途的不信任和害怕。

杜威把學校看作「有組織的環境」，而把教育和兒童全部生活過程看作同樣的東西。這一不正確的觀點，這一「環境即是教育，生活即是教育」的口號——消滅了學校的專門性，把學校溶解在一般生活過程中的口號——也曾被實施「學校衰亡論」的教育家們所採用。

在教育方法問題上，杜威也保持了不正確的觀點。「教材提出和論述的法則，是從兒童本身天性中產生的法則……一切方法都要服從於這一製造的過程」——這是杜威在他的「教育信條」中所說的。

對於兒童個人經驗的物神崇拜，教師領導作用的否定，對於某種「兒童天性」的崇拜，積極性原則的不正確的了解，對於人類所積蓄的知識和必需由教師系統傳授的估計不足——也是杜威在教育方法問題上的不正確的立場。

但我們在駁斥實用主義教育學的方法論上的立場時，同時還要指出這一教育學中的某些以反對舊學校為目標的特徵。

杜威還在二十世紀初期就反對教育中的形式主義（當時這種形式主義在右派海爾巴德派的影響下在



美國學校中是很有力的)。他反對把教育當作動物的馴養來解釋。他要求注意兒童和兒童的興趣，發展兒童的創造性和主動性。他駁斥某些心理學家和教育家關於兒童利己性的見解，而認為「兒童的社會性強於利己性」。他的學校與家庭聯系，與學校周圍區域的生活聯系、與附近高等學校聯系的要求也是他的教育學說中的積極方面（雖然這一聯系的方式是不正確的）。

### 實驗主義的 教育學派

從八十年代末期起，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各國裡開始發展了所謂「實驗主義的教育學」，這一教育學據它的代表人的說明是以調和各種不同的教育理論為目的的。

實驗主義的教育學宣佈自己是「非政治的」，「超黨派的」，實際上却是市民階級的教育。這一教育學派把自己和「理論的」「哲學的」教育學置於對立的地位（據實驗主義教育學的代表說，「理論的」和「哲學的」教育學的基礎「是永遠主觀的」），而主張以事實為根據，以某種已得到的精確方法為依據；因此許多實驗主義的教育學代表有他們的經驗科學。

日益增長的教育的作用，以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灌輸兒童的努力，促成了下面的要求：為了「爭取兒童的靈魂」，就必須研究這種兒童。實驗主義教育學的主要努力目標就是研究兒童。

研究兒童，一般的說來是重要的，必需的，尤其是因為過去心理學和教育學在這一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很少。但市民階級的教育學當然是在市民階級的教育利益中提出這種研究的。

除了我們要在下面說到的兒童研究方面的某些成績以外，實驗主義教育學應用了許多不正確的兒童研究方法（調查測驗等），因此也得到了不正確的結論。它服務於市民階級教育的利益，企圖用實驗的方法「證明」市民階級的兒童的天賦才能優於勞動者的兒童。就它的社會趨向說，就它的結論和脫離教育過程的研究方法說，實驗主義教育學是兒童學的偽科學的搖籃。

實用主義教育學的初期代表之一，美國教育家霍爾企圖完全用群眾測驗的方法去研究兒童和各種教育問題。這些測驗表往往包含四五十個甚至更多的內容複雜的問題。回答這許多問題是需要鉅大的自我



觀察力否。馬克思主義的心理學認爲自我觀察的方法一般的是不够可靠的，它只能在某種限度內當作補助的方法來利用的。尤其是當研究那些還沒有自我觀察能力的兒童時，自我觀察的方法是更不可靠的。但霍爾却完全用測驗的方法去研究兒童。因此他的結論的不正確性就預先被命定了。

兒童的測驗「研究」法的缺點，甚至市民階級的心理學家和教育家（什德倫、李波、克拉巴列特等等）都是承認的。

霍爾反對識字、閱讀和書寫習慣的高度的評價，作了這樣奇特的「結論」說：「神母從來沒有在手中拿過鉛筆」。霍爾是不正確的把生原說（biogenesis）的法則推廣到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奠基人」之一。

另一個「實驗主義教育學」的代表俾奈（Alfred Binet 1857—1911）製定了一種確定兒童天賦才能的標準的「年齡測驗」表。這種測驗表的方法是反科學的，機械的。沒有對兒童作深刻的長時期的觀察，而用人工製造的測驗方法在五—六分鐘裏斷定兒童的「天賦才能」。

俾奈測驗表的要求是包羅萬象的：它爲某一年齡的兒童提出了與兒童的周圍環境無關，與兒童的經驗無關，與學習的內容無關，也就是說，不顧及兒童生活條件的許多問題。

這種方法的反科學性可用下面的事實來證明：一個調查在一九〇八—一九一一年調查了彼得堡的學生以後得出一個奇怪的結論說，百分之七十三的俄國兒童比法國兒童落後，而另一個調查者在同一時期調查了彼得堡的另外幾個學校的學生以後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說：俄國兒童在天賦才能上勝過法國兒童兩倍。

實驗主義教育學的著名代表之一歐倫斯特·曼孟（Ernst Meiman, 1862—1915）企圖在他的三卷「實驗教育學導論講稿」裡建立系統的實驗教育學的教程。值得注意的是他所了解的實驗教育學是關於兒童的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病學、刑法學、兒童學等等的知識（「從教育的觀點」上去搜



集和簡明的知識)。所以實驗教育學的對象不是一種一定的研究目標：「實驗教育學」不過是從研究者的「觀點」出發，從各種科學中抓來的零星知識的大全。所以這種「科學」是建立在主觀唯心論的基礎上的。後來在一九一三—一九一四年，曼孟已經不稱自己的「科學」為實驗教育學，而稱作「少年學」(Jugendkunde—德文術語，相當於兒童學Pedology)。

曼孟反對單一的學校，從他的哲學觀上說來是唯心論者；兒童的實驗研究方法歸根結蒂等於自我觀察，否定兒童的大眾的觀察，承認只有在心理實驗室的人造環境中的個別的兒童研究。所以曼孟通常所研究的都是孤立的心理上的機能(注意，記憶等等)問題。曼孟不正確地反對某些研究家把兒童學(即教授法)的實驗去接近普通授課環境的努力。

這是曼孟實驗教育學的基本缺點。但在指出這些缺點的時候，還要指出他的著作中的許多積極的特徵，這些特徵我們要在下面本章結尾處提出。

近年來實驗教育學在美國得到了很廣的普及。它的最著名的代表人是多倫大克。他站在精神現象和教育的機械說明的觀點上。他把精神生活看作行動心理學精神中的刺激與反應的一貫性。教育等於馴養——對於某種刺激的反應的發展。

因此，多倫大克也把教育的實驗工作歸結到機械的反科學的測驗。我們知道俾奈會利用這些測驗去研究兒童的「天賦才能」。多倫大克則應用這種不科學的方法去測量學生的成就(叫作「成就測驗」。在這樣的測驗下得到歪曲的結果：學生不是被教師在日常細心的注意過程中去研究的，而是填測驗表，教師(或調查者)用正誤答案的機械的計算方法去「決定」學生的成就程度。

「天賦才能測驗」和「成就測驗」的目的，是在承認貧民兒童通常都是天資薄弱和沒有成就的。這些測驗當然要求「客觀的指示」，實際上却是挑選市民階級兒童繼續受教育(在升學測驗時)和淘汰勞動者兒童的方法。



但在駁斥實驗教育學中所應用的許多不正確的反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指出「哲學」教育學及「實驗」教育學的對立的不正確性時，不能否認實驗教育學的某些成就。當它應用長時期的觀察，研究兒童的創作產物（學生的筆記，兒童的圖畫，作文等），並以自然的教育實驗和心理學實驗的方法研究兒童時，它會得到了不少寶貴的結論。

例如在測量的器械幫助下，用精密的觀察的方法，和部份地用實驗的方法，明瞭兒童身體發展的規律：體長、體重、各時期中兒童身體上各種器官發展間的相互關係，尤其是血液循環、呼吸、肌肉發展等等的變化。在這些研究的結果上，得到了無可置疑的結論：兒童的身體的發展（以及精神的發展）不是平均地完成的，而是跳躍式的進行的：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快，甚至很猛烈，另一個時期發展得很慢。

實驗教育學在兒童感覺（視覺、聽覺、觸覺）的研究上做了很多工作，這對於感覺器官的教育、實物教育原則的應用、和美育教育都有極重要的意義。

在兒童的注意力和記憶力的研究上，雖然得到的成績比較少，但也是很可注意的。這些研究確定在幼年期兒童中，以不專斷注意佔優勢，可以看到極大的注意不定性和抽象性。並確定練習對於注意教育的重大意義。在記憶力及其對於兒童教育與學習的意義的研究上，曼孟會有很多的貢獻。他在「經濟和記憶技術」一書中公佈了他的研究結果：怎樣發展兒童的記憶力，怎樣防止遺忘，怎樣使教材吸收比較順利，等等。

實驗教育學在兒童的美學發展的研究上（與兒童的視覺、聽覺和想像等的研究有關）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曼孟會研究兒童的色彩的概念，兒童辨別色彩能力的發展，審美觀念的發展。克爾森斯坦納曾研究繪畫方面的兒童的創造力。

實驗教育學在教授法問題的研究上是成績最少的。在這一方面，幼年兒童的數的概念的發展會有最詳細的研究。實驗教育學也有研究閱讀教育方法及綴字法的企圖，但沒有得到顯著的成績。







## 第六部 晚近教育

### 第二十五章 晚近教育學的特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從特徵上說來，一九一八年底開始的世界歷史時期——是「戰後帝國主義的時期，是資本主義各國經濟政治恐慌的時期，是法西斯主義與爭奪殖民地及勢力範圍鬥爭加強的時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蘇聯內戰和武裝干涉的時期，第一次五年計劃完成和第二次五年計劃開始的時期，勝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蘇聯境內資本主義最後殘餘剷除的時期，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勝利和繁榮，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勝利，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勝利的時期」。

戰前時代的資本主義腐蝕和市民階級文化衰落的特徵，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世界戰爭以後達到了它的最高峯。

在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國家擊破了白黨和干涉者，以飛躍的速度發展了社會主義建設。不久以前在沙皇時代俄國還是經濟政治上最落後的國家之一。現在却成了人類史上第一次把政權交給勞動者和實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大工廠增多了。代替小農經濟和貧乏的收穫量及極端落後的技術，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佔了支配地位；代替了耙田的木鋤，強大的曳引機正在耕耘集體農場的肥沃的土地。

當海外各國甚至有有限的市民階級民主主義的公民權利遭受消滅或瀕於消滅的時候，蘇聯實施了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憲法。



在這一時期，在資本主義各國中，市民階級的文化繼續更進一步的衰落。在教育思想方面沒有出現任何獨創的教育體系——發展和加深過去市民階級教育學成就的教育體系。

那些在戰前開始活動的市民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教育家，在他們的戰後的著作中強化了理論上的保守特徵。克爾森斯坦納加強了宗教和民族主義的宣傳。社會民主派的教育家們（麥克斯·阿特勒，萊溫斯坦，蘇里茨）更露骨的主張學校中的宗教教育的完全許可性，宣佈教育和學校的「非政治性」，實際上是宣傳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

在美國教育學中，加強了教育作為馴養的解釋。決定學生「天賦才能」和「成就」的反科學的測驗方法比以前更普及了。不正確的教育方法和組織也更推廣了。

由於經濟恐慌的結果，大多數國家的國民教育經費就縮減了，學校和教師的物質狀況也惡化了。文化水準的降低，科學的歪曲，對進步世界觀的任何表現的鬥爭——就是市民階級教育學中的智力教育問題的中心。

人的個性的壓抑，盲目的紀律，任何創造性的壓迫，對勞動大眾的輕蔑，對暴力和宗教的崇拜——這就是這一教育學在道德教育方面的綱領。

正當這個時候，蘇聯展開了蘇維埃的教育學。建築在科學的學語之上，利用古典教育家的一切優秀成就，蘇維埃教育學的努力目標是在教育多方面發展的人，訓練能够建設新社會的青年一代。

蘇聯教育學的目的，是在為青年的一代提供真正科學的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是用廣泛和深刻的有系統的普通教育知識武裝兒童和青年，是訓練能够把理論和實踐配合起來的人物。

蘇聯教育學提出了全新的道德教育的原則。無神論，國際主義，對世界各國勞動者的兄弟態度，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無限敬愛、對勞動和社會財產的社會主義態度、自覺的紀律、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尊重和關切每一個勞動的人、高度的警覺性、剛毅、勇敢、堅定性和樂觀的教育、履行社會主義同共生



活規則的能力——這就是蘇聯道德教育的基礎。

蘇聯教育學對美學教育賦與極大的意義。在多方面發展的人的概念中，它包括了優秀的文藝知識、藝術趣味的發展、評價偉大的藝術作品的的能力。

在體育教育方面，蘇聯教育學的努力目標是在發展能在必要時抵禦外敵的健康、有力、勇敢的勞動青年。

蘇聯學校實施了技術教育，提供各部門生產的科學基礎的知識。

當資本主義各國對許多民族實施殖民地的榨取政策，強調民族不平等性，普及貧弱的殖民地學校的時候，蘇聯却在人類史上第一次的實現了一切民族的真正平等。蘇聯實施了社會主義內容與民族形式的文化。大批人民的普遍強制的教育（在十月革命以前識字人民的百分比還不到百分之十一五），稠密的初等、中等、高等學校網，民族劇場和歌舞隊的輝煌演出，過去沒有文字的許多民族的文字的創造，自己的知識份子幹部的訓練——這就是這種文化的成果。

在一切領域裡，包括在教育領域裡，蘇聯在人類史上第一次實現了男女完全平等的原則。當一切市民階級國家（尤其是西歐各國）實施中學男女分校，降低女生教育水準的時候，蘇聯却完全實施共學制度和兩性學生完全同等的教育。

對兒童的深刻的愛，對兒童個性的尊重、顧到它的年齡上的特殊性，發展它的創造力，培養它的勇氣、生活樂觀和對於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在教師的領導作用之下）——這就是蘇聯教育學在對兒童關係上的特徵。作為社會主義的人文主義的表現，政府和人民領袖對兒童的關心更爲蘇聯的兒童創造了健康、愉快、幸福的童年。



## 第二十六章 從一九一八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

### 歐美各國學校概況

#### 一·法國學校

學校的管理。  
一九一四——  
一八八年戰爭  
以後的法國學  
校改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法國國民教育部改名為民族教育部。在民族教育部之下，設立國民教育最高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除了委任的顧問以外更有大學、中學和小學的代表，以及三個家長代表。國民教育最高委員會的責任是在決定教育綱領和方法、決定學校組織問題和教科書問題。在民族教育部之下，設有各級學校的主要監督官。

整個的學校管理和監督系統，和前一時期相比並沒有變更，照舊反映着極端中央集權化和形式主義的特徵。

在教育行政上，法國劃為十七個學區，每一學區以學校的總長為領袖，負責管理本區（包括幾省）的大學、中學，師範學校和高等小學。總長是依教育部長在大學教授中推舉出來經政府命令委任的。

在總長之下設學校委員會，其參加的人員為學校監督官，大學部長，中學的代表和教育部長指定的人員。



在每一省中，設學校監督官一人。他應有博士的學位。學校監督官負責管理本省的中學和小學。他在師範學校招生時期起了極大的作用，擔任競賽委員會的主席。他委任學校的考試委員會，指派教師擔任實習的工作，並監督學校。

初等學校的監督工作是由直接從屬於學校監督官的小學監督官執行的。小學監督官在每次蒞校視察以後要向學校監督官提出關於學校教育工作狀況的詳細報告，並提出關於教師（他們的行爲、能力、教育經驗等）的決定。監督官在蒞校視察以後留給每一個教師一份他所作的關於學校和教師的評判記錄，指出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並提出關於改正缺點的意見。

初等學校除了教育行政方面的依附關係以外，更服從於本省的文官機關（全省學校管理局）。省長委任和罷免初等學校的教師，並擔任全省初等學校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的人員包括：省長（主席），本省學校監督官（副主席），師範學校的男女校長，兩個小學監督官，小學教師代表和私立學校代表。

第三共和國學校政策的特徵、是初等學校對省長文官（行政）機關的絕對服從。這一秩序是還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就確立的，直到現在還完全保存着。在這裏反映着當權的市民階級對於國民教師和勞動人民的不信任。

小學和師範學校的財政經濟問題，學校建設和設備問題，都是歸全省學校委員會處理的。

最後，學校監督工作也是由市政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市長、市議會和州代表等執行的。

所以，法國的學校管理工作是非常複雜的，極端中央集權化的，以加倍的監視教師爲目標的。初等學校的管理機構特別複雜和多樣（學校管理局、省管理局、市管理局）。一九三二年的法令完全保存了這種臃腫架屋的官僚主義的學校管理機構。

在法國學校管理制度的積極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監督官的高度的教育水準和教育經驗，師範學校



校長的參加學校領導工作——照例師範學校校長也是這些學校的教育學的教授。

在物質條件上，城市學校和鄉村學校有着很大的差別。城市學校通常都有良好的校舍和設備。在城市小學中，每級有級任教師領導；而在鄉村學校中，一個教師和他的助教往往要教授一切學級。在經濟恐慌時期，國民教育事業的預算額逐年下降。例如在一九三三年，撥出三十五億法郎，在一九三六年降為二十九億法郎。一九三七年在勞工階級的壓迫之下，國民教育事業的經費又增加到三十七億法郎，但這個數目也只等於法國全部國家預算額的百分之八·五。由於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法國學校狀況便激劇的惡化了。

在一九二三年，法國學校實行改革，但這個改革非但沒有改善國民教育的設施，反而更加加強了戰前所保存的缺點。這一改革更加加強了兩個教育體系之間的區別：為勞工階級設置的初等教育和為市民階級設置的科學教育。一九〇四年的法令雖然規定在十年中取消在「私立」學校形式下存在的懺悔學校，但戰時和戰後的保守勢力的加強却使這些「私立」學校一直保存到現在。在初等學校的新的綱領中依舊着重的指出：教師在教授道德課的時候應該加強兒童敬愛上帝和服從上帝的感覺。

顯然的，在戰後保守勢力強化的條件下，一九二三——一九二五年的幾次學校改革完全沒有觸到法國學校的最大的缺點之一——男生和女生教育間的區別。學校依舊分爲男校和女校，結果就顯出法國女子教育的強烈的落後。

由於勞工階級頑強奮鬥的結果，政府不得不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頒佈一個將小學強制教育的年數增爲八年（原爲六年）的法令。

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初高等小學和中學校的課程計劃會有極大的變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等小學中的普通教育知識的加強——這是當權的市民階級對勞工階級的一個很大的讓步。

一九三三年實施了中學各級教育的免費制，但仍沒有使中學對勞工階級完全開放，沒有消滅學校體



系的二重性。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一日的法令雖然少許改善了教師的物質生活，但由於戰後法郎實際價值貶低的結果，這些改善仍是不能滿意的。

這些改革都是在勞動大眾的壓迫之下實行的。法國勞工政黨不倦的為學校民主化而奮鬥。右派的國會議員反對學校的民主改革；他們宣稱在現時所進行的尖銳的政治鬥爭中，「學校應該是中立的」。

法國殖民地的教育事業在人民運動的影響之下會有相當的變化。一九三七年在印度支那會提出了這樣的的要求：法國人和土人權利平等，普遍的選舉權，強制的免費教育，增加學校數量等等。但這些要求都沒有實現。

## 母親

## 學校

母親學校在法國是很普及的；勞動者兒童的學齡前的社會教育就是在這些學校中實施的：一九三四年在母親學校中共有四十萬零七千個兒童。

市民階級的兒童甚至在學齡前教育組織下都是和勞動者的兒童隔離的：為市民階級的兒童設立的是中學校中附設的幼稚園，幼稚園所招收的兒童是和母親學校的兒童年齡相同的（三歲到六歲）。

在大多數作為貧民慈善設施的母親學校中，都是設備不良和兒童的功課負擔過重的。

母親學校的任務包括：體力教育，感覺器官的訓練，言語的發展，兒童周圍世界的對象物（動物等）的介紹，道德的教育。在母親學校的高年級中，兒童已經學習閱讀，書法和繪畫。母親學校的工作的缺點是不注意兒童的遊戲。那種統治在學校管理和法國學校教育工作上的形式主義也損害了母親學校。法國教育家自己都承認兒童的娛樂、遊戲、創造性的不夠，母親學校的全部工作的枯竭，學齡前兒童的功課負擔過重。



### 初等學校

在討論一九二三年的學校改革方案時，市民階級的法國國民教育領導者曾強調的指出：一八八七年的課程計劃的基礎直到現在還是「理想的」。這個情形再一次的證明了當權的市民階級在學校事業上的保守主義：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時間已經經過了一世紀的三分之一以上；在人類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在這個時期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動，而法國初等學校的課程表據法國市民階級說來還是「完善到不需要修改的程度」。

八年制的初等學校是這樣劃分的：繼預備級（第一年）之後，是三個集中級——初級、中級、高級、每級二年；繼這三級以後是最終級（第八年）。我們在母親學校中所指出的兒童校課過於繁重的缺點，在中學校中是更加加強了：六歲到十二歲的兒童每天在學校中要上六小時課，此外還要在家庭溫習。在一九三八年，小學的課程表是改革了，但仍沒有消滅為市民階級國家所特有的小學與中學間的脫節。

小學新課程表是這樣的：

學科	每週授課時間數							
	預備級 第一年	初級 第二年	中級 第四年	高級 第六年	第八級	合計	百分比	
道德與公民	一	一	一	二	二	一一	四·六	
閱讀	九	六	三	一	一	二七	一一·二	
法	四	二	一·五	一	一	一三	五·四	



	法文	歷史與地理	算術	自然	圖書與手工	野外運動	有組織的課餘活動與唱歌	休息
三〇	二·五	—	二·五	—	二	三	三	二
三〇	五·五	二	三	—	一·五	三	三	二
三〇	六·五	二·五	四	二	一·五	三	三	二
三〇	六	三	四	三	四	三	三	一
三〇	五	三	四	三	六	三	三	一
二四〇	四三·五	一八	六·五	一六	二二	二四	二四	一三
一〇〇	一八·二	七·五	一一·六	六·七	九·三	一〇·〇	一〇·〇	五·五

小學課程表中的主要注意目標是法文（閱讀、書法和法文合佔授課時間百分之三四·八）；其次是算術（佔百分之十一·六）。自然科（百分之六·七）和歷史地理（百分之七·五）佔時間很少。

道德課就是市民階級的世界觀的宣傳；私有財產、「社會協調」、宗教精神的崇拜。

其他科目，尤其是法文、歷史、地理等科的教授也是滲入市民階級的精神的。在地理科上，只有一年的時間授自然地理，一年授洲及歐洲以外各國的地理，其餘四年都是授法國地理的。



但我們在駁斥歷史地理科的這種市民階級的傾向時，還要指出法國學校供給有關這些科目的教材的技能：地理科的教授是和法國地形、古代城市的畫像和法國農工業成績的提示相伴的；在歷史科上，則提出法國藝術品及大建築物等的畫片爲證件。這些科目的教授自然是以培養市民階級的愛國主義爲目的。

在算術科目的教授上，值得注意的積極特徵是口頭計算和理解運算的良好練習方法。算術教授的反面特徵是狹窄的實際主義。

這種實際主義和教授上的顯著的原始性，也表現在自然科的教授上。法國初等學校着重指出，不要向學生教授科學的基礎，而要教授這些基礎在實際上的應用。所以科學教育依舊是市民階級兒童在中學校中所獨享的特權。

法國初等學校給與學生的知識是不多的——這是它的缺點；但它却善於使學生理解課程的編者認爲必需向學生教授的那種材料。在法文科上，注重綴字法、文法、文章法的練習。教科書是很簡潔的，善於提出（用各種活體字、插圖、問題提示、每章末尾的簡短的結論等）法國教育家所認爲主要的東西。

畢業考試是注重形式和極端繁雜的。它不是在學生求學的那個學校裏舉行的，而是在監督官指定的考試委員會主持下分區舉行的。在這些考試上，起初都是筆試：（一）作文和默書，（二）算術科的筆試（二題），（三）地理及歷史論文，（四）自然科學論文，（五）圖畫考試。第二種考試是口試：課本選讀，口頭計算，以及唱歌，體操的考試。每一個學生的口試時間大約是半小時。考試及格的學生百分比在八十與九十之間。

一九三四年法國共有六八三四四個國立小學和一一五四〇個私立小學。學生總數爲五二二九三二五八。



## 高等小學

高等小學的數量仍像前期一樣是不大的。一九三〇年時共有五六一個高等小學，一九三五年甚至減為五四三個。一九三五年在這些學校中（包括「補充班」）求學的男生為一〇二三七六人，女生為二三七五一人，總共三三九八八七人。學校和學生的數量是人工地為當局限制的。

高等小學的第一年授普通教育知識，從第二年起就開始分為下列各科：普通教育科、農業科、工業科、商業科、海洋科和家政科（為女生而設）。

高等小學在相當限度內擴大了普通教育，同時却把重點放到實際的準備上。這一實際主義反映在普通教育的學科上，更反映在佔時間最多的專門教育的學科上：農業、工藝、工業或農業化學、商品學、簿記、速記學、打字、工場工作、家政等。

在高等小學的新的課程計劃中（一九三八年），授課時間縮減了（以前每週超過三十小時）專門教育的學科和授課鐘點減少了很多，反之，普通教育學科的比重却大大的提高了。

從一九二九年起，中學校中開始實施免費教育；但在低年級中（初中部）還是保存收費制的。

中學的初等部共有五級（第十一—十七級），專收六歲至十歲的兒童。中學初等部和「中學幼稚園」大體上是代替過去市民階級兒童的家庭教育的。初等部的課程也像小學最低五級的課程一樣，不過時間的數量分配是不同的。

乍看起來在這樣的條件下兩個體系（小學和中學初等部）的意義是消失了。但法國市民階級為使他們的兒童和勞動者的兒童隔離起見，是頑強地保存了他們的學校體系的二重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學初等部保存收費制，而小學却是免費的。這種在中學最低五級的收費制的保存（而在最後幾級却是取消的）含有一定的目的——使貧民不得把自己的兒童送到小學，而不送到中學的初等部（在學科學內容



上是沒有很大差別的)。

中學第六—第一級構成了它的基本的部份。這基本部份又分爲三科：(一)古典科(授拉丁文與希臘文，拉丁文自第六級起，希臘文自第四級起)；(二)半古典科(授拉丁文)；(三)「現代科」(授兩種現代語文)。以前數學和自然科佔大部份授課時間的實科部在一九二三年改革以後被取消了。

中學三科通用的學科是法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自然、圖畫。

在古典科中，此外更教授一種現代語，在其餘兩科中則教授兩種現代語。

中學(尤其是官立中學)的最高一級分爲(一)哲學級和(二)數學級。在這兩級中所教授的學科是一樣的：哲學、歷史、地理、現代語文、數學、物理、化學、自然，不過授課鐘點的數量是不同的。例如在哲學級中，每星期授哲學八小時半，而在數學級中每星期授哲學只有三小時。

法國中學的授課計劃的最大缺點是：

一、缺乏中學的實科部。

二、自然科的鐘點過少：在第六級—第三級中，每星期只有一小時—一小時半。

三、學生外國語(古代語)與現代語的學科負擔過重；古代語在各級佔授課時間的百分之二十八至三十四，現代語佔百分之十三至十四，而自然科只佔百分之七。

四、教育方法的極端形式性，教育與生活缺乏聯系。

五、學科上的中斷：例如在哲學級中是不授古代語的，因此，對於投考大學語言學科的學生，就要中斷一年古代語的研究。自然科的教授是在中學第三級上結束的；在第二級和第一級是沒有自然科的，而在兩年中斷以後在哲學級和數學級(中學最高一級)上又教授了自然科。

### 師範教育

小學教師的訓練，是在三年制的師範學校中實施的。師範學校所招收的學生都是經過入學考試的慎重的挑選的高等小學的畢業生。法國共有一七九個師範學校，其中八十



八個是女子師範學校。學生的數量是不大的（一九三五年時共有一一三七〇人）。最嚴格的挑選（主要是在政治關係上）使有志投考這些學校的學生只有五分之一得到錄取。師範學校的每年畢業生遠不能滿足對於國民教師的需要。

師範學校中的普通教育的訓練是不夠的。這主要等於高等小學的學科的重複，不過稍加補充罷了。哲學及社會學的要素和「道德」科的目的是在加強未來教師的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

訓練高等小學教師的有兩個高等師範學校（以初等師範學校為基礎）。

中學教師的訓練是在大學中實施的，但大學是沒有教育科的。祇有一個巴黎師範大學，供給專門教育（人文科的或自然—數學的）和師範教育。還有一個女子師範大學。

下面的比較數字證明法國師範教育的發展薄弱的程度：一九三五年在蘇聯有七四八個師範學校和一八六六二〇個學生，而在法國只有一七九個師範學校和一一三七〇個學生。一九三五年在蘇聯有九十一個高等師範學校而在法國只有兩個；在蘇聯有一九二個師範大學而在法國只有兩個。

## 一一、英國學校

### 國民教育法

### 令的變更。

### 學校網

在大戰以後，國民教育體系，學校組織和學校的課程一般說來還是保戰前的一樣。可以說的，只是對這過去的體系的一些訂正罷了。

例如，從國民教育部方面，出現了某些縮小英國學校管理事業上所特有的地方分權化的趨向。國民教育部的津貼制度加強了政府對學校的監督；但不受國家監督，拒絕接受政府的補助或沒有得到這種補助的學校還是很多的。

根據一九一八年頒佈的學校法令，提前（十四歲以前）解除兒童強制教育是被禁止了，實施強制教育到補充學校畢業為止。並採取相當的辦法以減輕兒童由小學升入中學的負擔。但是這些自由主義的措



施是附有許多保留條件的，是只有在地方當局（郡議會和市議會）認可之後才能實行的。爲二歲至五歲兒童而設的托兒所，第一次受到國家的補助。自由主義市民階級對學齡前兒童教育的這種「關心」，原因是由於戰爭時期的生育率的降低。在其餘方面，一九一八年的法令只是自由主義者的競選的策略，一切已規定的措施幾乎完全保留在紙上。一九一八年的關於補充學校的義務教育的法令的實施曾被延期了七年。許多新事業的補助費也在國家預算緊縮的藉口下被取消了。

一九二一年又頒布了一個學校法令，確定十四歲以前的教育的強制性，並授權地方政府增加強制教育的時期到十六歲。這一法令也確定了由七歲到十六歲的聾啞兒童，盲童和智力落後的兒童的強制教育。一九二一年的法令取消了小學校的收費制。

一九二三年工黨執政後，也宣布了學校事業的改革計劃。這一計劃允許人民將中學校中的免費學額由百分之二十五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宣佈減輕兒童由小學升入中學的負擔及提高強制教育的年齡。宣佈增加教員數量等等。

但在單一學校未確定之前，在學校體系的二重性未取消之前，工黨是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的。實際上工黨沒有實現它所宣布的諾言。

實際上在法令頒布以後諸年不但一切還是照舊，甚至國民教育經費都縮減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保守黨執政時，國民教育經費減爲一百二十五萬金鎊。

一九三六年的法令將強制教育的年齡更提高一年（到十五歲）。

戰後的學校法令沒有改變英國學校的基礎。宗教還是在學校的課程中占了很大的地位；教會組織在學校開辦和經營上的否定作用也是極大的。中學還是有錢人的學校；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由小學升入中學的學生祇占中學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九。英國學校的學科和整個教學方法還是充滿了市民階級的意識形態。三分之二的師範學校是在政府手中。



經濟恐慌的年代大大的縮減了中央預算和地方預算中的國民教育經費的支出。

### 初等學校

從下面的統計表中，可以探索初等學校和學生數量的變動情形：

年 份	初 等 學 校 數		初 等 學 校 學 生 數		
	公 立	私 立	公 立	私 立	合 計
一九二五年	九〇三一	一一七〇三	—	—	五五九七八一六
一九三〇年	九五四八	一一二五五	三六七四一三二	一八七一八七〇	五五四六〇〇二
一九三四年	一〇〇一四	一〇八一八	三八五九七一〇	一七八九六四四	五六四九三五四

形式上以「私立」或「自由」為名的學校，除了少數例外以外，實際上都是教會學校；英國國教會經營這一類的學校最多；其次是天主教會。

從這些數字上，可以看出：（一）公立學校（由地方政府經營）的數量增多是由「私立」學校的數量減少來實現的，但這種國立學校排擠「私立」學校（即教會學校）的過程是極慢的；（二）國立學校和「私立」學校的數量大體上相同，但就學生的數量說國立學校要大得多了；（三）直到現在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英國兒童在教會小學中求學。

在初等學校的課程和教育方法上，和前一時期相比沒有發生顯著的變化。初等學校根據一九一八年的法令分為低級、中級、高級三班；此外在許多學校裡更有預備班。低級班（五—七歲）的教育方法大



體上和幼稚園相同，沒有嚴格的授課時間。低級班修畢後，兒童已能通曉閱讀、書法和計算；此外也學習了繪畫。在中級班（七—十一歲）裡，除了閱讀、書法和算術以外，更有歷史、地理、自然、手工、唱歌、體育。高級班是收容十一至十四—十五歲的兒童的。

小學教師的訓練是在二年制的師範學校中實施的。一九三四年英國共有八十六個師範學校，其中三分之二是教會經營的。中學（和一部份小學）教師的訓練是由大學及其師範科實施的；一九三四年共有師範科二十五個。

一九三四年在小學教師中只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教師是受過師範教育的。

英國最大多數的小學教師都在教會辦的師範學校受教育，這一事實，使英國的小學變成極端保守性和宗教性（不問這些學校中有沒有神學科的教授）。

## 中學

學校事業上的地方分權主義和國家對於學校組織的不積極參加，在中學校中得到了更有力的說明。

英國的中學校可以分爲：

（一）地方政府（郡議會和市議會）的學校。

（二）受國家補助的「私立」（大部份是教會）學校；這兩種學校都被稱爲「承認學校」（即被國家承認爲成功的學校）。

（三）有許多學校主要是依靠遺產來維持的，不受國家的補助，也不受政府的監督，但其中有一部份素來以成功自誇，或者以調查的方法被認爲是成功的學校。這一類的學校也被列在「承認」學校的範圍內，但不受補助。

（四）載入「承認」的名單中的學校；這種學校一部份是依靠遺產來維持的，一部份是教會的或私人企業家經營的。



在中等教育的這樣的組織情形下，各校的課程和教授計劃自然就很不一致了。政府只爲受津貼的學校規定最少量的學科爲接受津貼的條件之一，這些學科包括：英文、一種外國文、歷史、數學、物理、化學、圖畫、唱歌、男生的手工和女生的家政，體育。但在政府的要求中沒有指出這些學科的教授的含量。

因此在實際上存在着古典學校、半古典學校、實科學校；還有許多具有各種實際傾向的中學。中學校的學習時期，也沒有確切的規定。這種時期的長短在各種學校裡相差有一年——二年之多。最大多數的學校是男女分設的，但也有男女共學的組織的趨向（尤其是地方政府經營的中學校裏）。

英國的中學是收費的。學費數額的大小是很複雜的。收費最高的是幾個古典中學（伊頓、哈洛、聖保羅等中學），這些都是有着保守傳統的貴族學校。至於其餘的中學，全年學費都在十鎊至十五鎊之間，但是由於勞動大眾的物質狀況的惡化的結果，沒有做到中學能普遍開放。

### 三、美國學校

#### 戰爭和經濟恐慌對於國民教育的影響

在前一時期中（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到一九一八年）就開始的八——四制到六——三——一三制的改變，在大戰以後進行的速度更快了。還保存着舊制（八——四制）的各州就把小學的課程縮爲六年，並實施了每級三年的兩級中學。小學七年級和八年級的學生淘汰過多促成這一改革的原因。

戰後第二個顯著現象是大量的小規模的農村學校的消滅，和所謂統一學校的發展。在一九一八——一九二五年的五年中，統一學校的數量增加了兩倍。

在戰後最初十年中，逐年增加的學校預算，從一九三〇年和以後諸年的恐慌發生以後就激烈的跌落



了。一九三四年的學校預算已比一九三〇年減少六六五百萬美元。

這種恐慌極端嚴重的打擊了學校事業的一切方面。大量的幼稚園在一九三〇—一九三四年停辦了。初等學校中的學生數在戰後最初十年中幾乎增加了二百萬人：一九二一—二二年爲一九三九〇〇〇〇人，一九三〇年爲二一二七八〇〇〇人。但在恐慌時期却逐年縮減，到一九三五年幾乎減少了四十萬人。

各州在恐慌時期的學年平均縮短二十天。教員的薪俸減少百分之二十五至四十。南方各州的黑人學校所受到的打擊特別大。這幾州把教育經費的縮減首先在黑人學校上實行。大多數的黑人學校被停辦了，同時「白人」學校的門又是不爲黑人子弟開放的。

戰後的社會鬥爭的加強和害怕教師以革命精神影響兒童的恐懼，從一九一九年起就引起了許多州裡的關於教師「忠實」於現存制度的專門法案的出現。這些法令的頒佈在恐慌時期（從三十年代初期）是特別強化的。

恐慌的年代對於小學尤其是中學課程的改變給了很有力的影響。在恐慌的影響下，實用主義教育的原則日益爲學校採用。在學校課程中，狹窄的實際主義更加強化了。

在許多州裏，原先已經不充足的數學科和自然科的教材更被減少了，而應用知識和習慣却加強了。實用主義的「效用」原則在學校工作中佔了比以前更大的位置。

在戰後學校教育的組織和方法中，可以看到許多不正確的，有害的體系和方法的發展。其中很普及的一種是將各種學校合併成爲「一科」，裏面包含各種知識的要素，以致造成知識的極端無系統性。

杜威的學生吉爾巴特里克和科林斯曾宣傳一種「設計法」。設計法的基礎是實際的主題——「事務」，而理論知識只有在爲執行實利的計劃認爲需要的條件下纔被引

### 美國學校的 「新」方法 及其本質



起注意的。

學習的完全無系統性，知識和習慣的偶然性和碎裂性，教師的作用的降低，理論服從於利慾的當面實踐——這就是這種方法設計的成果。然而美國某些教育家們還用於學校與生活聯系，兒童的自動性的發展，兒童的計劃工作能力的訓練等的奢華的措辭來掩飾這種「設計法」。但是設計法在美國學校中沒有得到很大的普及。

在本期（一九一八年到第二次大戰前）之初，帕克赫斯特，愛凡林娜、杜威（杜威之女）和美國其他教育家更努力於「道爾頓制」的宣傳。在道爾頓制底下，是沒有固定的授課時間表的，兒童得到研究每一學科的任務（通常以一個月為期），能够在個人研究之後，在一個月的限度內，在他所希望的日子中完成這個任務。

道爾頓制消滅了教室授課的制度，降低了教師的作用，把教師變為兒童自修時的顧問，使紀律降低，破壞每星期學習上的正常的更迭，並因專門研究某一學科而造成學習上的長期的中斷。教師對全級學生的集體工作是幾乎沒有的。學生的言語發展是緩慢的。

美國教育家的方法上的設計還不祇「設計法」和道爾頓制兩種。還有一種不正確的兒童分組方法（將兒童分為強、中、弱三組，並將每組置於特殊的並行的學級內），也在美國學校中是很普及的。這種分組方法是反教育學的，因為它降低「弱組」兒童對於自己的力量有信心，破壞了兒童間的同志關係，促成「強組」兒童對「弱組」兒童的傲慢和輕視心理，並阻礙了弱組兒童的進展速度。

#### 四·德國學校

##### 國民教育體系

德國勞動大眾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時期，曾要求取消學校制度的二重性，確立單一學校，使中學與大學民主化，實施各級學校的共學制度，使學校與教會完全分離



，根本改變學校教育的內容。

由於社會民主派違反勞動者的利益的結果，而些要求未曾得到實現。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取得政權的社會民主派，實行與市民階級合作。將勞動者所提出的學校民主改革的要求置諸腦後，頒佈了魏瑪憲法，使建築在市民階級的利益上的過去的國民教育體系繼續生效。

社會民主派在人民壓迫下對這個體系所作的那些「訂正」也是絕不能滿足勞動者的。這些訂正大部份只是社會民主派爲要製造學校民主化的姿態的一種手段罷了。後來更用許多與民主敵對的法令和行政活動使這些「改革」化爲烏有，完全恢復了革命前的體系。

例如，代替了單一學校的體系，魏瑪憲法規定四年的基礎小學（*Grundschule*）爲一切六歲到十歲的兒童的義務設施。至於更高級的學校還是像過去一樣，是保留着明顯的二重性的：一個體系是爲勞動者而設的初等學校和職業學校，另一個體系是爲有錢人而設的中學和大學。

社會民主派把魏瑪憲法中關於基礎學校義務性的條文看作向單一學校體系邁進的一個很重大的步驟。過去市民階級爲了準備進中學把自己的兒童送到特殊的「預備學校」。根據魏瑪憲法，這些學校應該在幾年中停辦。但是一九二七年的法令却取消了魏瑪憲法中關於停辦私立的預備學校的條文。因此，基礎學校對一切兒童的義務性，實際上並沒有實現。

社會民主派代替建設使勞動者兒童有受高等教育機會的單一學校，只是對過去的學校體系作一點修補：創辦了一種特殊的上層建築的學校（*Aufbauschule*）。在高等小學求學的一部份兒童，可以在畢業前一年轉到課程與中學一致的上層建築的學校。這樣似乎造成了勞動者兒童由高等小學轉到大學的可能。但是上層建築學校只是一條很狹窄的通大學的路。這樣的學校是很少的，而且能够在這些學校中求學的也只是佔百分比極小的勞動者兒童。社會民主派不建立單一學校，只是實行調和的方法，使兩種學校體系的存在更得到了保障。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前，德國的學校是懺悔的宗教學校。宗教教育在學校中佔了很大的地位。學校、學生和教師都在僧侶階級的監督之下。社會民教派在制定魏瑪憲法時，雖然提出了「世俗學校」的要求，但他們是在「宗教爲每一個人的私事」的公式下，來解釋這個不確定的伸縮性的術語的，並努力強調他們不反對宗教。社會民教派學校政策的領導人亨利，蘇里茨寫道：「世俗學校——這不是反宗教的學校，這只是不授神學科的學校」。

魏瑪憲法第一百四十六條在法規上訂定教授各派宗教的學校的存在，同時也容許懺悔學校和不授神學的學校的存在。這一條憲法是社會民教派和大市民階級勾結以後的產物，也是社會民教派對勞動者利益的叛賣。

於是在學校中繼續保存着神學科，教會的作用也重新加強了。根據最初（一九二五年）巴瓦里亞及後來（一九二八年）普魯士和羅馬教皇所締結的協定，天主教教會獲得了極大的學校監督權；新教教會對新教徒學生也得到了同樣的權利。

過去在德意志各國學校體系及其課程，學生知識的評價，教師的訓練和報酬，是互相不同的，以致爲學生造成了極大的不便。自然，在革命時代，就提出了統一學校事業，頒佈共同的（帝國的）學校法規（爲加入德意志版圖各國所共同遵守的法規）的要求。圍繞着這一整個帝國的法規的頒佈，展開了猛烈的鬥爭。市民階級想利用這個法規完全恢復過去的保守的國民教育體系。社會民教派照例是爲市民階級服務的，但又害怕因爲過份明顯的擁護了市民階級的利益而使那些還跟在他們後面的勞動者叛離了自己。

差不多每年（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實施這一帝國學校法規的企圖都是失敗的。在整個魏瑪憲法時代，在德意志各國的學校事業上繼續統治着極端的雜色性。某些德意志國家，尤其巴瓦里亞，利用了統一法規的不存在，甚至破壞了魏瑪憲法所規定的整個德國所遵守的學校事業的規範。



例如，魏瑪憲法規定，國民教師的教育準備應該建築在預備的完全的中等教育的基礎上。但是巴瓦利亞却把師範學校建築在高等小學的基礎上。

雖然爲防止勞動者的兒童升入中學而設立的六年制的中間學校（Mittelschule）曾引起了人民的抗議，但它還是保留在學校體系中。中學還是爲勞動者兒童所不能接近的。中學和甚至中間學校還是保存着收費制的。共學制也沒實現：中學和中間學校都是男女學生分別設立的。

在中學的體系中，除了原有的三種中學（古典中學，實科中學，和高級實科學校）以外，大戰以後更加入了第四種中學——德意志高級學校（Deutsche Oberschule）。在這種學校的課程中，德文和文學，德國地理、德國歷史佔了很大的比重。

國民學校是由四年制的基礎學校和四年制的高級國民學校構成的。八年的國民教育是強制的。

國 民 學 校
------------------

在德國國民學校中，一九二一—二二二年有學生八八九四〇〇〇人，一九二六年有六六二九〇〇〇人，一九三一—三二年有七五九〇〇〇〇人。學生數量激減的原因是大戰時期的生育率的降低。

不授神學科的「世俗」的國民學校是數量極小的（約佔國民學校總數百分之二）。

在基礎學校中，教授神學、「祖學」，德文、算術、圖畫、唱歌、體操。在高級國民學校中，則教授：神學、德文，歷史，地理，自然，算術，幾何，圖畫，唱歌，體操，此外男生更有手工，女生更有縫紉和家政。

全部國民學校（基礎學校和高等國民學校）的三分之一在一九二一年是一個教室的學校。這就是說，一個教師授全部八級的課。自然，在這樣的情形下，給與每一個學生的注意是很少的，而教師的授課負擔却是極重的（每天要預備全部八級的課）。這是人口數量很小的貧窮的學校區中的學校。所以，這



些學校的學生，也就是說，人口數量很小的貧窮的學校區的兒童，在教師對於功課準備的程度上，和在教師對於每一學生的教育影響的關係上，都是非常不利的。在這三分之一的國民學校中求學的學生只佔國民學校學生總數的十分之一。情形最好的自然是那有八個教師（也就是有八個教室）的學校。這主要是城市國民學校；它們的總數約有三千個（國民學校總數為五二七八三個），但在裡面求學的學生却佔學生總數四分之一。其餘的學校有二個到七個的教師。

每週授課數量（每課五十分鐘）在基礎學校中為低年級十八課，高年級二十八課，在高等國民學校中為低年級二十八課，高年級三十課。

在基礎學校的低年級中，是不分學科和採取混合（複合）教授制（Gesamtnumericht）的。

德意志各國國民學校的共同的課程表是沒有的。在每一個國家範圍內所採用的課程表中，教材是不依照學年甚至不依照基礎學校和高級學校的課程程度來分配的。

由於戰後德國的物質上的困難，國民學校的設備，尤其是鄉村學校的設備是很難使人滿足的。

在師範中學中受過師範教育的德國國民教師是通曉教育技術的，但他們的努力目標主要是在形式教育。

## 中學

從中學學生的社會成份上，證明中學還是像過去一樣幾乎完全是為地主、市民階級、高級和中級官吏服務的。工人子弟在中學學生中的比例在一九二一年只有百分之五，四。以後各年仍沒有改變這一個對比。

在一九二一—二二年，德國全國共有二一六七個國立中學，學生人數為七五一四四二人（女生佔百分之四十）。在以後各年，這個數字就激減了。私立中學約有三百五十個。

中學是收費的，而且學費額極高。各種中學都是九年制的。六年制的中學和實科學校也是很普及的。



神學在各種中學的學科中佔了很大的地位。神學是在各級都教授的，每級每星期有二小時（九級共有十八小時）。在古典中學中，拉丁文科（包括第九級至第一級），每週共有五十三小時，希臘文科（從第五級到第一級）每週共有三十六小時。所以，總計起來，古典中學在古代語文上每週要花八十九小時，也就是佔全部授課時間的百分之三十三（學生在家自修也要佔全部自修時間的一半左右），而自然科在古典中學中却只有十八小時，也就是佔授課時間的百分之七、六；國文（德文）和文學有三十一小時，也就是佔古代文授課時間的大約三分之一。數學科每週只有三十三小時，也就是少於古代文授課時間的一倍半。在各種種類的中學校中，古典中學是最保守形式，與生活脫離，最無生氣的學校。古典中學祇教授一種現代文，而其他各種中學教授兩種現代文。在現代文上，古典中學每週所花的只有十五小時（在七個學級中），沒有在這個時期供給甚至一種現代文的可以令人滿足的知識。

比較有生氣的一種學校是高級實科學校。在這裡，德文和現代文所佔的授課時間和古典中學一樣（每週三十一小時），歷史和地理的授課時間甚至多於古典中學，兩種現代文共佔六十二小時（比古典中學多四倍！），自然和數學科比古典中學多一倍半。

女子中學的分類一般說來和男子中學相同，也是九年制的，但它所供給的知識容量是很小的。

中學教師的訓練是在大學的相當學部中實施的。但是大學只供給大量的關於專門科學規律的知識，對於教育學的訓練是完全不能令人滿足的：担任小量的教育學的講師的不是明瞭學校實際狀況的教育家，而是哲學教授。





十五年出版新書目錄

世界外交史

蘇聯·波將金等著  
葉文雄譯

印刷中

(第一卷)

俄華對照蘇聯憲法

(附斯大林論蘇聯憲法草案)

印刷中

俄華辭典

印刷中

俄文單字簡捷記憶法

王世復編

印刷中

柏林大飯店

美國·韋基鮑姆著  
于紹方譯

基本定價  
六·九〇元

蘇聯文藝論集

阿瑪卓夫等著  
荒蕪譯

基本定價  
報紙本四·〇〇元  
片紙本三·〇〇元



# 世界教育史

著者 蘇聯·麥林斯基

譯者 葉文雄

發行人 金長佑

發行所 五十年代出版社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印刷者 五十年代出版社

印 刷 廠

北平崇內大街七五號

基本價定 八元二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初版

——二〇〇〇(總)



世界教育史  
基本定價\$ .20

